

## 目 录

导言	(1)
卢卡奇	燕宏远撰(17)
葛兰西	田时纲撰(113)
陶里亚蒂	毛韵泽撰(189)
贝林格	田时纲撰(231)
河上肇	宗 山撰(279)
户坂润	刘及辰撰(319)
永田广志	王守华撰(379)
铁托	柴方国 吴仕康撰(421)
卡德尔	邵滨红 柴方国 吴仕康撰(475)
涅德里科维奇	吴仕康撰(531)
康福斯	涂纪亮撰(583)
克劳斯	梁志学撰(629)
阿尔都塞	王荣栓撰(675)

---

## 导 言

本卷评述了欧洲和日本部分活动于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13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虽出生于不同的国家，又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但他们都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共同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对很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逐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铁托、卡德尔、克劳斯也在十月革命后一些年代里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一切，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和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本世纪初，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不仅西方国家发生了革命，东方也发生了革命，而且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具体实践和大发展时期。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也就出现了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局面。卢卡奇、葛兰西、铁托等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鲜明特征。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重要贡献，就是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马克思的学说”，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免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庸俗机械论的歪曲，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阐发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意识的重大作用。此外，他在不知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从分析商品出发详细探讨了异化问题，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突出强调了“总体”和“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也因其中有某些主观化倾向的理解和表述不清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判。卢卡奇在苏联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认识到并清算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观点，从而完成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转变。此后，他在自己所熟悉的哲学史、文学艺术评论和美学领域里，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在研究社会存在本体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斯大林某些错误的批评等方面，都创造性地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尤其是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写出了一系列很有份量和重大影响的名著。他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声望，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当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

在意大利，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之后，葛兰西、陶里亚蒂、贝林格代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路线。

葛兰西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及其他国家都受到普

遍的尊敬。葛兰西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理论贡献，而且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

在葛兰西之前，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曾为坚持和阐发唯物史观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葛兰西继承了这一传统，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在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他在二、三十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有广泛影响的情况下，正确地强调了认识的主体性和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针对克罗齐的历史唯心主义和一些人的直观（庸俗）唯物主义，提出了“实践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紧密结合，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来把握。

葛兰西在肯定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主体（意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根据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领导权的理论、阵地战的战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重大问题。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既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又反对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在意大利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展，并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灵活地运用于意大利的特殊情况，从而推进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陶里亚蒂继葛兰西之后任意共总书记，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是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哲学观点方面同葛兰西大致相同。他在接受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既对第二国际一些领导人的“宿命

论”深恶痛绝，也对克罗齐的唯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克罗齐的哲学是思辨哲学，“全部是超然存在和神。”

陶里亚蒂主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因此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实践方面。还在1919年意大利发生革命时，他就设想把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提出通过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他所说的民主是“要使人民的意志成为真正决定政治发展的因素，使它深入到经济生活，从而也深入到整个文明社会的组织中去，并改变这个组织”。所以，他既重视一般的民主运动，也清醒地看到，只有更换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性质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苏共二十大后，陶里亚蒂根据列宁关于任何革命都必须适合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提出“多中心论”，即由于各国党遇到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中心。他不同意照搬苏联的经验，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民族特点和国情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不同的国家中必然有自己的特点。

继葛兰西、陶里亚蒂之后担任意共总书记的贝林格，也遵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探索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贝林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共产党人的努力“不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社会和人们的实际问题出发。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来都没有以纯

粹的状态存在过，而总是存在于由历史决定的个别事件中”。正是根据这一思想，他拒绝有一种适用所有情况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依据意大利的特殊情况，提出“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思想，后来又进一步主张通过民主代替天民党执政的办法来实行独立的、多元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把这一思想的适用性扩大到整个欧洲范围，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设想。他建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应探索一条与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条道路既完全符合各个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又完全符合欧洲大陆这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是一种通过民主道路在欧洲发达国家实行以社会主义方向的变革为目的的战略。他这种设想正确与否，还有待进一步由实践来检验。

在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意见分歧问题上，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辩证观点。他坚持隆哥在“多样化中求团结”的原则，主张在国际共运中组织耐心认真的讨论，以便求同存异。他坚持认为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承认每一个党都有权自主地制定和充分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路线这个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排除对别国党的理论观点或政治观点也有判断的自由，各党可就工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但讨论要本着友好和理解的精神，坚决反对给任何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武断地扣上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上的修正主义帽子。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河上肇、户板润、永田广志就是这一时期的开拓性

的代表人物。河上肇从1905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的思想，随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从1924年起以“全部力量来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至1928年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来，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出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把它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对理论的重要作用，是河上肇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户板润和永田广志成熟于本世纪30年代。这期间，苏联哲学讨论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列宁关于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确认“哲学的列宁阶段”，为在日本传播、维护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此外，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对日本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对作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本主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当然，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述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他们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免有点简单和局限性，永田广志也受到斯大林错误观点的某些消极影响。但有人从否定的意义上把他说成是“日本的米丁=斯大林型哲学家的典型”，这未免有点过于偏狭。

铁托、卡德尔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主要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独立自主地探索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出具有南斯拉夫民族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他们把马列主义运用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铁托、卡德尔提出并实行自治的社会主义，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

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也指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阶级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主张“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会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正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铁托、卡德尔认为，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参加解决一切问题是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实质。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这一论断，区别和分析了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优劣利弊，主张逐步由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创造并管理社会生活，意味着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生产资料是社会和全民的财产，自然就必须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这是避免官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劳动者和公民在作出最重大的决策时能发挥直接的影响作用。

铁托、卡德尔虽然强调工人以至劳动者的自治，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而是明确肯定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作用，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先锋力量，以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确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保证社会民主并在社会主义自治范围内为民主化开辟广阔道路的政体。他们并没有把自治问题绝对化，而是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要以人民政权为后盾，也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在自治方面又提出了联合劳动一体化的思想。



涅德里科维奇是南斯拉夫老一辈最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直坚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高度评价列宁的历史功绩，确认列宁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肯定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致力于实现辩证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化和当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化。充分强调实践是一切人的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源泉，也是涅德里科维奇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较早地重视人、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铁托、卡德尔、涅德里科维奇的思想的共同特征。铁托、卡德尔强调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活生生的人，为了解放劳动和工人阶级，为了人的美好生活和幸福，为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人成为自己生活和劳动的真正主人。涅德里科维奇特别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一切人道主义的区别，指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它必须是具体的，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全人类，建设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

康福斯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在战后斯大林的影响达到高峰时开始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他把斯大林视为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接受了斯大林的一些机械论的观点，但他不

仅没有接受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上是辩证的，在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质和它的唯物主义性质是分不开的”。他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为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制定了一些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致力于如何改造社会，使生产力造福于人类。因而，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苏共二十大后，康福斯觉察到有些人对共产主义原理的理解一定有某些错误，认识到苏共远不是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监护人。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对此也应作批判的考察。有人曾因此而认为他后期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他对此反驳道，即使如此，他所修正的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它们是完全不需要修正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康福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一点也明显反映在他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态度上。原来他对西方哲学基本上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有时简单地、武断地下一些不恰当的结论。60年代以后，他改为采取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的态度，肯定西方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批判其中的错误观点。例如，他一方面看到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在考察形式逻辑和语义学问题以及使用语言等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哲学只对语言使用作出描述，而不提世界观。在批判有很大影响的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波普尔时，既肯定他对科学方法原则的研究是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也尖锐地驳斥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本质上对比了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优劣，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原来的学科处处有新的突破，新的科学理论层出不穷，新的技术不断涌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一切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急剧变化，其中哲学思想尤为活跃。资产阶级哲学对这一切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就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点掺加进来，甚至借此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回答，并在研究和争论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的中心任务。原民主德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克劳斯比较早地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而又严肃认真的探讨，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教条主义还颇为盛行之时，他已经开始提出和研究了一些充满时代气息的迫切问题。例如他1957年就不同意把数理逻辑当作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取消的教条主义态度，并明确指出，对待数理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并不象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反对数理逻辑本身，而在于反对数理逻辑中的唯心主义。克劳斯在控制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当资产阶级哲学家滥用这门新兴学科的重大成就，作出反对唯物主义的错误结论时，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哲学家则宣布控制论是现代机械论，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克劳斯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坚决反对这两种极端，既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里盛行的对控制论所作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如认为机器能

思维，也批判社会主义国家中某些哲学家否定控制论是一门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他坚定地认为，控制论是研究开放的控制系统的科学，是我们地球上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和精神发展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克劳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比较早地认识到控制论对现代社会以及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大意义的少数人之一。

苏共二十、二十二大对法国共产党产生了尤为强烈的影响，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出现了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因而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人本主义化”的解释倾向，法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对马克思的学说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为此，“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sup>①</sup>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双重成果是，他“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思想，正确地断言在社会中存在着“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并把这种社会结构的概念提到首要地位。进而，~~他根据马克思~~

---

<sup>①</sup>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12页。

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论断，提出“多层次决定”（或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他详细论证了经济因素所起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各因素如何发挥特殊效能的问题。这里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与结构主义在本质上是 inconsistent 的。他在其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中主要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学说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并以此反对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其他一些哲学唯心主义的表现。这是阿尔都塞的思想主流或主要倾向。为了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机械的和唯心主义的歪曲，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或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他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出了比较全面的哲学结论，认为革命取得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矛盾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其他的、起多层次决定作用的矛盾对它的总的作用。

阿尔都塞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他的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论述，正确地反对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但他片面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断言马克思在1945年有一个从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一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和批判。这一观点和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这种

仅仅从结构方面来反对从历史方面考察社会的方法，显然是阿尔都塞受了结构主义影响的突出表现。这并不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仅仅是“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而是明显违背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经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在全面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时，虽然必须明确指出他的一些严重的倾向性错误，但不应把他归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列，而应把他视为有过结构主义偏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上述哲学家，他们各自都有明显突出的特点。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贡献也有所差异。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人把它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人把它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一元论。有的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的能动方面，有的人则强调它的唯物主义的或科学的方面。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倾向或学派。有的人主要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问题。有的人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遇到的种种理论问题。有的人在文学艺术、美学、民主、人道主义等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有的人则在逻辑学、控制论等一些领域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既反对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或教条主义的解释。

本卷中所评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特点，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

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sup>①</sup>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应用于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特点里，才更具体地体现出它的普遍指导作用和强大生命力，显示出它的日益深化和新发展。

由于本卷所评述的人物面临的都是现实中人们最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在探索中必然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或失误，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往往引起重大的分歧、争论或批判。如20年代围绕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争论和批判，40年代末至50年代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之间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争论，60至70年代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参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争论等等。尽管在这些争论中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或偏差，但它对促进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争论和事实证明，卢卡奇并不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铁托、卡德尔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决非像共产党情报局在40年代末所指责的那样，“执行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是“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页。

真理，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探索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也引起过不同程度的争论和异议，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基本观点和主导倾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否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正确程度上有某种或大或小的差异，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某些人（如阿尔都塞）有原则性的错误观点。

我们在这里提供的评论以及本卷中关于他们的评传，仍然只是一种看法。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以及其他人的评价仍有所不同，对他们的某些哲学观点的评价，分歧似乎更大一些。但我们相信，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讨论，一定会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并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的发展。





# 卢卡奇

燕宏远 撰

## 篇 目

一、卢卡奇的生平和著作 .....	22
(一) 童年时代、求学深造和早期创作 .....	22
(二) 走上革命道路 .....	28
(三) 流亡维也纳 .....	29
(四) 侨居苏联 .....	32
(五) 回到匈牙利 .....	35
二、早期创作中庞杂的唯心主义观点 .....	41
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47
(一) 新的思想起点 .....	47
(二) 《历史和阶级意识》 .....	48
四、全面完成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转变 .....	63
(一) 《列宁》 .....	63
(二) 《布鲁姆纲领》 .....	65
(三) 清算过去的错误，全面确立马列主义哲学观点 .....	66
五、运用和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69
(一) 文学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 .....	69
(二) 完整的人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	77
(三) 《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 .....	81
(四) 批判非理性主义 .....	89
六、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	97
七、对民主问题的探讨 .....	101
参考书目 .....	110



卢卡奇 (1885年——1971年)



---

---

# 卢卡奇

燕宏远

卢卡奇·捷尔吉（1885—1971），匈牙利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他一生充满坎坷，几起几落。但他从不随波逐流，而是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既有非凡的贡献，也有明显的失误。因此，他的思想既受到肯定和赞扬，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异议。几十年来，他成了本世纪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曾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多次批判，也被誉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大受赞扬。与此同时，东西方都有一部分学者从肯定或否定的意义上把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至今对卢卡奇的思想，尤其是对他的哲学观点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卢卡奇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从主导思想倾向和基本观点来看，他仍然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列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

## 一、卢卡奇的生平和著作

### (一) 童年时代、求学深造和早期创作

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是“最后拿起武器来保卫1848年革命的民族”。<sup>①</sup>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奥匈帝国的封建专制统治。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匈牙利仍一直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但资本主义也在缓慢地发展。

卢卡奇·捷尔吉<sup>②</sup>于1885年4月13日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里。他父亲卢卡奇·尤若夫是匈牙利信贷银行的行长，1899年获得贵族封号，被称为“完全白手起家的人”。他经常给小卢卡奇讲述过去贫穷的家庭困境，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父亲的工作和才智颇为敬重。他母亲出身于维也纳贵族魏尔特哈穆之家，主要讲德语，很有教养。她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完全老一套地执行各种礼规，支配着卢卡奇一家的气氛和意识。卢卡奇家当时设了一个“沙龙”，一些政治家、企业家、教授、精神生活的各种代表人物定期在这里交往，这使他从小就受到自由探讨空气的熏陶。

卢卡奇从小就拒绝、但又被迫遵守形式上的礼规。在家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3页。

<sup>②</sup> 匈牙利人的名字和我国的一样，是姓在前，名在后，故这里根据匈文译为“卢卡奇·捷尔吉”。按西方人名习惯，从德文译成中文的有“格奥尔格·卢卡奇”，从英文译成中文的有“乔治·卢卡奇（契）”。——作者注。

里，他哥哥被看作是一个非常有出息的孩子，而他却完全没有被看在眼里，被认为是个“坏”的或持有不同见解的孩子，甚至有时被母亲关在小屋里作为惩罚。然而，他比哥哥聪明，从上小学时起，他不特别用功就能获得优良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

卢卡奇9岁时开始读儿童读物，主要有意大利作家亚米西斯的短篇小说《心》、印第安人科帕尔的《最后的莫希干人》、匈牙利文本《伊利亚特》等。他追求作家描写的各种事件，并站在弱者、被压迫者和战败者一边。《伊利亚特》中他喜欢的主角不是阿基里斯，而是赫克脱。与他父亲相信成功是行为正确的标准不同，他从《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伊利亚特》这两本书中了解到，成功并不是什么标准，一个人没有获得成功，他的行为也可能是正确的。读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的《莎士比亚童话集》，更为他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他从中得到一种很深的印象：世界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然而也存在于它的多种多样和丰富多采的扩展之中，这同安德拉西街里相当单调和墨守成规的家庭生活处于戏剧性的对立之中<sup>①</sup>。他也读过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和《赫克贝利·芬》。这些书使童年时代的卢卡奇知道有生活的理想，即应该象汤姆·索耶那样生活。

在新教文科中学时，卢卡奇对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学习过德文、英文、法文等，从15岁开始阅读很有价值的书，如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凯撒》、约凯的小说《心灵教养

---

<sup>①</sup> 参见赫尔曼·伊斯特万：《卢卡奇·捷尔吉的生平和创作》，维也纳、科隆、格拉茨、伯劳1966年德文版第10页。



者》、雅诺斯·阿拉尼的诗以及歌德、高特弗里德·凯勒、格哈尔特·豪普特曼、易卜生的作品。读马克斯·诺尔道的《退化》一书，使他了解了波特莱尔、史文明等人的诗歌，并成为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坚定拥护者，梦想能写出易卜生和豪普特曼那样的剧本，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上述这些人的作品对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使他产生了对社会的具体批判态度。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在15岁发生的一个转折。博览群书、勤于思索、思想上异常敏锐，是卢卡奇在少年时代就形成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世纪之交，尼采关于“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在匈牙利发生了很大影响，而卢卡奇当时就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破坏旧的价值，而且更在于寻求新的价值。他在德国戏剧家黑贝尔那里发现了现代文学的起源，而首先是黑贝尔和易卜生之间的联系成了他注意的中心。他于1902年写过作文《黑贝尔对戏剧文学的影响》。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在《匈牙利沙龙》、《未来》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是一些剧评。这是卢卡奇最早的文学创作。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戏剧在卢卡奇的文学评论和美学理论工作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

1902年中学毕业后，卢卡奇进入布达佩斯彼特-帕茨马尼大学法律系，但他很快就对法律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于1906年10月在科罗茨瓦还是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当时最著名的进步法学家之一鲍多格·索穆罗。在大学期间，对卢卡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利用法律系的无拘无束，于1904年同伯奈德克·马塞尔、巴诺奇·拉兹洛、海威西·山多尔一道创立了“塔利亚剧团”，上演高尔基、易卜

生、契诃夫、豪普特曼等人的剧本。这个剧团在匈牙利近代戏剧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卢卡奇以导演和剧评家的身份参加了演出工作。1906年和1908年他还分别参加了《20世纪》和《西方》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为其撰稿。这时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

在大学期间改读哲学系，是卢卡奇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09年11月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柏林一直是哲学方面最活跃和最有吸引力的城市。1906—1907年期间卢卡奇去了柏林，在那里结识了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和席美尔。在这之前的1905年，卢卡奇就曾幻想成为象他们那样的伟大哲学家。旋即，卢卡奇成了席美尔的学生，听他的课，研究他的著作，尤其从《金钱哲学》一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卢卡奇在大学期间还读了好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了给《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一个社会学基础，他还特别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柏林逗留期间，卢卡奇就写出了《现代戏剧发展史》的书稿。这本书于1908年2月获基斯法卢狄学会的克里斯蒂娜文学奖。不久，在席美尔思想的启发下经过修改的两卷本《现代戏剧发展史》于1911年在布达佩斯出版。这是卢卡奇以戏剧为标志的第一个创作时期的最重要成就。它对18世纪至20世纪头10年之间的戏剧发展作了最广泛的描述。卢卡奇当时反对官方的等级价值秩序，并力图寻求一种新的价值秩序。在他看来，易卜生及其先驱者黑贝尔就是这种新价值秩序的象征。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已表明他对资本主义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

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富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可以说，追求富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追求悲剧。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当时对卢卡奇影响最大的要算是20世纪初匈牙利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抒情诗人奥第·安德烈了，他1906年出版的《新诗集》对卢卡奇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激起了他的革命热情。他认为奥第对他的整个文学发展以及文学以外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持久影响，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之一。

卢卡奇因剧作获奖而一时变得很有名。他父亲是提苏党的支持者，因此要他在议会中代表这个党。但他对此感到好笑。卢卡奇虽然有改变旧的匈牙利封建制度的抱负，但根本谈不上把这种愿望变为政治行动，因为当时在布达佩斯根本没有这种运动。

从1907年秋开始，卢卡奇曾在商业部工作很短一段时间。1908年至1911年，他大部分在柏林停留，并曾到意大利和法国旅游，特别是同他的好友波培尔·列奥到佛罗伦萨去，使他熟悉了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这是他最伟大的经历之一。

这一段时间是卢卡奇的柏拉图主义杂文时期。1911年发表的第一部杂文集《心灵和形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它曾受到不少人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完美而深刻的著作”，“完整的哲学概论。其意义之深远、观察之敏锐，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评论”，因而，“它使卢卡奇扬名天下”。<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1910年冬，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同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认识，并建立了友谊。但后来又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了。布洛赫发现卢卡奇有一种完全应严肃对待的哲学才华。布洛赫主要影响了卢卡奇转向哲学问题，尤其转向美学问题。从1911年9月起，卢卡奇大部分时间在佛罗伦萨。

1912年卢卡奇移居海德堡，开始写《艺术哲学》这一专著，中间曾因战争爆发而中断一段时间。直至1916年才又完全改写这一著作，后以《海德堡的艺术哲学和美学》这一书名出版。

这期间，卢卡奇结识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维贝尔。他的社会学思想对卢卡奇产生了重大影响。维贝尔曾建议他以正在准备的美学著作争取在海德堡获得大学授课资格。

1914年春，卢卡奇在海德堡与一位书记官的女儿叶雷娜·格拉本科结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卡奇是最坚决的战争反对者，1915年写的一篇论文《德国知识分子和战争》，就是这种反战情绪的体现。当时他对任何形式的英雄崇拜都持批判态度。1914年8月初，当维贝尔的夫人在同卢卡奇的谈话中赞扬战争中的英雄行为的道义价值时，他回答道，行为越英勇，情况就越糟。

从1913年至1918年，卢卡奇常常参加左翼激进派“星期日社”的活动，并成为它的创始人和最老的核心成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在帝国主义阶段危机理论的推动下，卢卡奇在绝望中于1914—1915年间写成《小说理论》一书。它把整个时代描绘成“罪恶完满”的时代，其方

法论是建立在精神史学派的基础之上的。

1917年底，卢卡奇返回布达佩斯，开始埋头钻研伦理学问题，并在由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和阿诺尔德·豪泽尔创建的“精神科学自由学校”里讲授伦理学。1918年5月，卢卡奇在海德堡大学将要获得讲授哲学的职位，并为此提出了几项讲座。但系主任通知他，哲学系在当时形势下不允许录用一个外国人。卢卡奇这时已处在转向革命的门槛上，这一时期对伦理学问题的兴趣把他引向了革命。

## （二）走上革命道路

卢卡奇十分憎恨匈牙利封建主义残余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强烈敌视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他一直在探索新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对他起到了震聋发聩的效果。但他还没有立即参加革命。1918年10月匈牙利革命期间，他明确表示拥护革命，但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他在1918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中还对布尔什维主义提出过某些反对意见。这时他在思想上还未解决伦理和暴力的矛盾问题。1918年11月16日，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匈牙利宣布为共和国，匈牙利共产党于同月成立。1918年12月前后，卢卡奇写了《策略和伦理》一文（发表于1919年1月）。这是一种内心的清算。卢卡奇以特有的方式解决了伦理和暴力的冲突问题，从而为他参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扫清了思想障碍。

1918年11月底或12月初，卢卡奇第一次见到从苏联回来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12月中旬加入匈牙利共

产党，随后又成为匈牙利共产党的杂志《国际》的编辑部成员。卢卡奇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卢卡奇认为，成为共产党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合乎逻辑的归宿，即他早就坦率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抱有的同情心。

1918年，卢卡奇同早已认识的女友鲍尔特什蒂白·盖尔特鲁德关系密切起来，在流亡维也纳后她同卢卡奇一起生活，成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在卢卡奇具体决定是参加共产党还是停留在“左翼社会党”的立场上这一重大问题时，她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卢卡奇认为他一生中一些关键性的决定都有她强有力的参与。

1919年初，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被捕，卢卡奇所属的第二个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始工作，3月21日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卢卡奇是库恩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副人民委员，直接负责制定和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后他又是匈牙利红军第五师团的政委，领导恢复军队的秩序和抗击协约国军队的反革命干涉。由于协约国的军事入侵、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叛卖以及匈牙利共产党政策上的一些严重错误，存在133天的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了。

### （三）流亡维也纳

1919年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卢卡奇在白色恐怖下同科尔文·奥托一起领导布达佩斯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几个星期，卢卡奇接管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由于在匈牙利难以开展工作，卢卡奇在9月份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参加了在那里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工作。10月份，奥地利政府为准备引渡给匈牙利霍尔蒂反动政府而逮捕了卢卡奇。德国报纸刊登了由知名作家签名的拯救卢卡奇的呼吁书。呼吁书说：卢卡奇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知名人士和思想家，因此他应当受到保护。他完全献身于他打算实行的改革者的事业。营救卢卡奇不仅是党的事业，而且对于在个人交往中深知他的纯洁的所有人来说，对于惊叹他高深的哲学和美学创作思想的许多人来说，都有义务抗议这种引渡。结果，广泛的国际舆论阻止了奥地利政府把卢卡奇引渡给霍尔蒂专制政权。

1919年底卢卡奇获释。此后一直到1929年，他大部分时间在维也纳（曾一度潜回布达佩斯作地下革命工作）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19—1920年和1928—1930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党内斗争中站在兰德勒派一边反对库恩派，1920—1921年还参与主编《共产主义》杂志。1920年7—8月间，卢卡奇由匈牙利共产党兰德勒派选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间又以同样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列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流亡维也纳期间，卢卡奇于1920年发表了《论议会制》一文，遭到列宁尖锐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卢卡奇克服“左”的思想起了重大作用。这一时期卢卡奇最重要的著作，是他把1919—1922年写成的一些论文（其中有的作了补充和修改）汇集成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1923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这是卢卡奇初次详细阐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的早期代表作，是他继1918—1919年之后思想

发展的概括和总结。这本书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甚至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视为是“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几十年来，它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从肯定或否定意义上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主要就是依据这一著作。1924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卢卡奇受到严厉批判后，他就被迫离开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维也纳《共产主义》杂志编辑部。但他既没有公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也没有作检查，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

当列宁于1924年逝世时，卢卡奇写了《列宁》一书，高度评价了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功绩。1928年底，他受党的委托起草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匈牙利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匈牙利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即有名的《布鲁姆》纲领）<sup>①</sup>。这标志着他同过去左倾激进立场的决裂。但这一纲领也遭到批判，卢卡奇作了自我批评，从此就长时间地放弃了政治活动，走上了学术理论研究道路。然而正在这时，他受到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的威胁。德国著名进步作家托马斯·曼虽然表示要同卢卡奇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在给奥地利总理的公开信里却毫无保留地为这位学者和知识分子辩护，并描述了他的极度困境：卢卡奇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维也纳生活十分困苦，只有靠他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苦行僧式的天性才能忍受。他的朋友们确信，很难想像在这一驱逐令付诸实施之后的第一天和随后的一些天里，卢卡奇同他的家人怎么办。回匈牙利？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拷

<sup>①</sup> 布鲁姆是卢卡奇的化名。



问和死亡。到慕尼黑去？那里不会接待他。到柏林去？他在那里无法糊口，也无栖身之地。托马斯·曼把这一驱逐说成是“判决死刑的时候到了”。结果，这一驱逐的决议被否决了，然而卢卡奇也离开了奥地利。庆幸的是，他这时获得了去莫斯科的奖学金。

#### （四）侨居苏联

1930—1945年在苏联的15年期间，是卢卡奇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富有成果的时期。

1930—1931年，卢卡奇在梁赞诺夫为院长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里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因此他有机会系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这无疑对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刚到莫斯科时，卢卡奇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学家和哲学家的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并同他结下了深厚友谊。里夫希茨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文学》。这对卢卡奇从事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起了启发和推动作用。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通信开始，研究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成了卢卡奇30年代学术理论研究中心。

1931—1933年，卢卡奇受J.R. 贝歇尔和威廉·皮克的委托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负责人大部分时间在柏林从事党的工作。他以著名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参加柏林“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机关刊物《左曲线》的工作，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倾向性还是党性？》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并在他和奥特瓦尔特之间以及他和布莱希特之间

展开了论战。在这期间，他还在杜塞尔多夫、科隆和法兰克福做关于法西斯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的讲演。

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上台，卢卡奇被驱逐出德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苏联，从此在莫斯科定居下来，直至1945年。他主要参加了当时苏联最高水平的理论刊物《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工作，并且是《国际文学》杂志的经常撰稿人。1936年他参加了苏联关于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论战。1938年参加了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1939—1940年卢卡奇的《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又引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激烈争论。卢卡奇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些观点受到批评或指责。

从法西斯主义崛起到在苏联的整个时间里，卢卡奇一直主张同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而这同当时苏联流行着的斯大林关于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是孪生兄弟的理论是相抵触的。直到新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人民阵线政策以后，卢卡奇的人民阵线观点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对黑格尔的歪曲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黑格尔的错误解释，卢卡奇又开始重新研究黑格尔，并于1938年写成《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一书（1948年出第一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卡奇曾以这一论著在苏联科学院作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他在哲学史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主要论著之一。由于当时苏联盛行着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看成是对法国革命的贵族反动这样一种观点，因此这部著作暂时未能出版。

与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化遗产进步传统的同时，卢卡奇为反对和批判法西斯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1933年就写过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文章。1941年6月，当法西斯军队将要进攻苏联时，卢卡奇在莫斯科“滑稽”地被捕拘留了两个月。据说他被怀疑是匈牙利的政治警察。当1941年德军已经到达莫斯科附近时，他同其他流亡者一起疏散到塔什干。当有人认为苏联已经崩溃并建议他逃到西方去的时候，卢卡奇坚定地回答：“第一，苏联没有崩溃，第二，如果它真的崩溃，我将葬身于废墟中。”在疏散期间，卢卡奇也没有停止工作。1942年在塔什干完成了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新著的修改工作，其中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主义渊源，为1954年撰写《理性的毁灭》这一巨著作作了准备。

卢卡奇在苏联期间撰写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济金根论争》、《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倾向性还是党性？》、《表现主义的伟大和衰亡》、《弗朗茨·梅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意义》、《艺术与客观真理》、《德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托马斯·曼论文学遗产》、《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叙述与描写》、《巴尔扎克—司汤达的批判者》、《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诗人亨利希·海涅》、《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现实主义辩》、《浮士德研究》、《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人民性和真实的历史精神》、《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马克思和意识形

态的衰落问题》、《罗曼·罗兰的历史小说》、《左拉诞生百年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等。

### （五）回到匈牙利

卢卡奇虽然把苏联看成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但由于他的整个经历和文化传统，他仍决心回到匈牙利。在庆祝60寿辰之后，他于1945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员，由他的夫人和女儿陪同回到布达佩斯，从此一直住在多瑙河畔贝尔格莱德大街2号。

从1945年起，卢卡奇任布达佩斯大学美学和文化哲学正教授，讲授戏剧和小说，后又在研究班里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辩证“文化哲学”的发展和德国非理性主义史。除此之外，他是几乎所有文学和文化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6—1956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会议员、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华沙科学院院士、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5年成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柏林德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

从1945年起，他先后参加《自由人民报》、《新言论》、《社会评论》、《论坛》的编辑工作。1948年8月26—30日参加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代表大会，作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著名报告。1948年写了《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同存在主义展开了论战，集中批判了海德格尔和萨特的观点。

卢卡奇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角

色，但他通过演讲、著书立说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国际上冷战的开始，“左”的教条主义日趋盛行起来。据说主要是由于1948年重版《文学与民主》（1946）一书引起了围绕卢卡奇1945年以后发表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著作中的观点展开了一场公开的大规模的讨论。这一争论发展为国际性的，苏联以及德国、法国的一些杂志也发表了批判卢卡奇的文章。有人指责他提出的游击队员理论，即共产党的诗人当然是党的士兵，但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游击队员。这意味着，普通的士兵必须赞同党的策略要求，而游击队员则在他同党的战略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要求自主地决定必要的策略行动。当时特别引起相当一部分人强烈不满的是他针对M·霍瓦特所作的讽刺性评论。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方法中的突出意义时断言：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的喜马拉雅山，但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跳舞的小兔子并不因此是比非洲大象还要大的动物。此外，卢卡奇继续坚持人民阵线政策，并认为放慢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速度是绝对必要的。这些观点都受到了批判。在党的总书记拉科西同他谈话之后，他在《从文学讨论中得出的结论》一文中作了几点自我批评。

在这次卢卡奇问题讨论之后，他虽然还继续讲课，但大学的气氛变得对他十分不利了。只有他的学生佐尔塔伊、赫勒尔和赫尔曼等人忠于他，听他讲课的人也少了。尽管他是1949年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并参加了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而且后来仍继续对和平政策有积极性，但他已不在公众生活方面花更多精力，也不愿再让别人在委员会、会议等场合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作家联盟里，他实际上也是孤立的。1952—1953年他既不在大学

讲课，也不再开研究班了。于是就利用这一段时间，集中力量写他的大部头著作《理性的毁灭》，1952年写成，1954年在布达佩斯出版，同年获得科苏特奖金。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1956年夏，拉科西被罢免，格罗被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在这一段时期里，卢卡奇积极写他的美学著作，1956年10月已完成600页。当时他认为，从现在起可以真正自由地和不受干扰地工作了。但这种幻想在1956年10月23日消失了。这一天，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匈牙利领导纠正错误，从而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赫格狄斯政府被推翻，党的第一书记格罗下台，卡达尔当选为第一书记，纳吉为总理。在纳吉组成的政府里，卢卡奇有条件地接受了文化部长这一职务。在政府换届之后，他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几天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解散。卢卡奇也同意这种解散。他在接见波兰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相信党将继续存在下去，它将维护它的思想，它将成为一个思想中心。在临时管理委员会讨论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问题时，卢卡奇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拒绝退出这个条约，并同山托一起投票反对退出的提案。因此在这几天里，卢卡奇受到种种攻击，甚至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科学院的建议。当事态进一步发展、苏联军队快要进入布达佩斯时，卢卡奇同别人一起躲进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几星期之后，他被用飞机送到罗马尼亚，在那里被拘留几个月，1957年4月又回到匈牙利。1957年5月份，他写信给重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管理委员会，申请加入新党。由于他不愿作自我批评，以后十多

年中他都没有得到对这封信的答复。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卢卡奇受到严厉而尖锐的批判，被视为“修正主义”的代表。这是对他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批判。16年后，对此得出的比较客观的结论是，卢卡奇“没有参与纳吉集团。他在反革命时期所发表的声明中，一方面坚持反对宗派主义的歪曲，另一方面也反对民族主义的努力。即使在当时，他仍然认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前途的保证在于同苏联结盟，不同意旨在使国家脱离华沙条约的种种企图。同时，他却低估了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的危险。在镇压反革命时期，卢卡奇犯了政治错误”。对他的“政治错误的批判和谴责，有时也扩大到他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生，认为他的政治态度同所谓错误的理论观点有直接联系。因此，对他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和某些政治著作的评价往往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sup>①</sup>

匈牙利事件后，卢卡奇于1957年退休，专心致力于美学、本体论的研究。1962年完成大部头著作《审美特性》，1963年出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50年来从事美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写作美学期间，卢卡奇的处境十分困难，除了受到尖锐的攻击外，对他不采取否定态度的学生也被解除了职位，同他关系比较好的福加拉西也反对他。在民主德国，他的著作的出版也停了一段时间。尽管如此，当50年代末他得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邀请，而且他有可能迁居曼彻斯特这一点似乎也得到政府的赞同时，他仍然继续留在布达佩斯家里，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周围的紧张气氛直到60年代末才开始改变。除了前面提到的重要著作外，卢卡奇在战

<sup>①</sup> 《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一百周年提纲》，载匈牙利《社会评论》月刊1983年第8、9期。

后还写了以下比较重要的论著，如《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歌德和他的时代》、《文学与民主》、《现实主义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民主主义中的任务》、《黑格尔研究中的新课题》、《黑格尔的〈美学〉》、《德国新文学史纲》、《巴尔扎克和法国现实主义》、《作为美学范畴的特殊性》、《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近代文化中的进步和反动的斗争》等等。

1963年4月28日，卢卡奇与之一直相处极其和谐的妻子鲍尔特什蒂白去世。这对他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尽管他在几星期之后又能工作了，但失去她显然留下了一个难以估量的空缺，因为她在事业上对卢卡奇的帮助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虽然到晚年，但他仍尽心竭力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关心地注视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卢卡奇决心为马克思主义写一部伦理学著作。根据1962—1963年同学生们的争论，他认识到一种伦理学构思的前提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提纲，并试图对社会存在本体论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同时他还想把社会存在本体论作为他的伦理学的前言来写。1964年他开始写《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部巨著，1968年写完其中的《历史》篇和《系统》篇。但他对第一稿不甚满意，于是就把他在此期间已经成熟的思想概括在一个序言里，结果这个序言就扩大成独立的一卷，即卢卡奇晚年最重要的创作成果。

1965年是卢卡奇80岁诞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策尔·捷尔吉前去祝贺，并向他提到，他不久将得到对他1957年5



月就加入新党一事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答复。1967年8月，他又写信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并引用了他1957年写的请求重新入党的信。这时他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他过去的党员资格同样也被追认有效。

196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家们认为，卢卡奇也能够为此提出新的建议和想法。1967年圣诞节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肯定了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想法，并强调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订的匈牙利新经济机制从1968年被采用。卢卡奇完全同意这一重大决策。

1968年国际范围内的学生运动和其他左翼运动达到了高潮，并在五月份失败。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促使卢卡奇深入思考和探讨民主化问题，于1968年3—11月写成一部较短的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化》（又名《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这部著作在卢卡奇的政治论著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它是卢卡奇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个总结。

鉴于卢卡奇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哲学、美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于1970年85岁诞辰时荣获歌德奖金。他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这是这位哲学家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70年12月，卢卡奇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已不可能再做更多的理论工作了。1971年3月，根据他的学生们的建议，他在短时间内用笔记形式完成了《经历过的思想（自传提纲）》。此后，在剩下很有限的时间内，他就他的生平活动回答了他的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后来整理成《自

传对话录》。这两篇东西是卢卡奇最后留下的珍贵文献。1971年6月4日，他与世长辞，享年86岁。他被安葬在布达佩斯克列帕西公墓工人运动伟人祠里。

卢卡奇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我非常幸运的是能够经历一种极其动荡的、充满重大转折的生活，而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能经历1917—1919年的时期。因为我出身于资产阶级，我父亲在布达佩斯当过银行行长，我自己虽然在《西方》杂志上采取某种特殊的反对派立场，但从根本上说，我毕竟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我不敢说，也不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我的完全消极影响，是否就足以使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和继之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运动，使我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也为它献出了一生。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积极的一个方面。至于说我整个一生中曾出现过向上、向下和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摆动，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统一的。”<sup>①</sup>

## 二、早期创作中庞杂的唯心主义观点

卢卡奇的整个思想和创作深深植根于匈牙利和欧洲进步文化传统之中。他从小酷爱读书，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最初属于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匈牙利进步知识界有名的剧评家、文学艺术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先是十分喜爱剧

---

<sup>①</sup> 卢卡奇1970年的一次谈话，转引自《卢卡奇生平事迹图片文献集》，斯图加特1981年第260页。

评，后把兴趣转向哲学。据卢卡奇自己说，他在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就初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印象非常深刻。进入大学以后，他又读了好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从头至尾钻研了《资本论》第一卷。这种钻研使他立即确信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的正确性，首先是剩余价值学说、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和对社会的阶级划分使他产生了深刻印象。他甚至想通过研究《资本论》为他的第一部著作《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一个社会学基础。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本著作中已有所反映。卢卡奇在其中期望社会主义能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体系和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严酷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生活观的也许是最强烈的倾向是，尽可能贬低纯粹个人的意志、思考、感情的意义，并把它归之于比较深的、比较客观的原因，而这种原因远远在同个别人一起并直接在人那里发生的事件之外”。<sup>①</sup>然而，那时马克思对卢卡奇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卢卡奇甚至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方面已完全过时，其实他当时根本分不清辩证的唯物主义和非辩证的唯物主义。卢卡奇在大学改读哲学系，当时正值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盛行之时，卢卡奇先后在布达佩斯、柏林、海德堡学习哲学，特别研究了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哲学家、社会学家席美尔的著作，不久又研究了康德、费希特等人的著作，进而转向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的哲学。随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俄国文学家兼哲学家陀思妥耶

<sup>①</sup> 卢卡奇：《现代戏剧发展史》，1981年德文版第357页。

夫斯基也是卢卡奇十分感兴趣的人物。后来，维贝尔和黑格尔成了他研究的重点。在这一时期里，席美尔、维贝尔和黑格尔对他的影响更大、更深刻一些，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演变。

最初，卢卡奇从他的老师席美尔的《金钱哲学》一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把他的哲学视为《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的哲学基础。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和施蒂纳都是费希特的学生，他们都遵循费希特的雅各宾主义哲学的看法，就是从席美尔那里接受过来的。卢卡奇自己也承认，他当时是用席美尔的眼光来看马克思的。同时，新康德主义关于“意识内在性”的学说非常适合卢卡奇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他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就把它接受过来，作为提出每一个认识论问题的出发点。此后，卢卡奇在阅读神秘主义著作时发现了克尔凯郭尔，并在吸收柏拉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有道德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继而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思想吸收到他自己的思想中来。他们的著作既使卢卡奇加深了对当时社会严重危机状况的理论认识，同时也使他思想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有所加强。卢卡奇的《心灵和形式》就集中表现出生命哲学的观点。他在其中写道：“生活是半明半暗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生活中，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完全的实现，什么东西也不会有其结束……生活就是某种会死亡的东西。”又说：“表情是生活的最大矛盾，因为只有在僵死的永恒的表情中，生活的每一个即将消失的时刻才有自己的位置，才能在其中变为真正的现实。”这些观点常常被人们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发端。

卢卡奇在写《海德堡的美学》时，特别受到维贝尔的深

刻影响。维贝尔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席美尔的《金钱哲学》成了卢卡奇的“文学社会学”的样板。维贝尔的社会学思想使他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同时，研究世界可借以说明的那种本体论基础，也使他逐渐离开康德转向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卢卡奇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的《小说理论》就是他在深刻的危机意识气氛中从黑格尔哲学立场出发研究美学问题的一部文化科学著作。如卢卡奇所述，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从主观唯心主义过渡到客观唯心主义，即他“已变成黑格尔主义者了”。这表现在他提出古希腊精神怎样使史诗的形成“成为可能和必然”的问题、他的美学史观以及他关于希腊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史诗、悲剧和哲学”的论述上。此外，卢卡奇还借用费希特的提法，揭示了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及其深刻危机所造成的现存一切事物都表现为“罪恶完满”的状态，因而这个时代都应受到谴责。他还试图进一步探索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他在托尔斯泰那里发现了新时代的征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一种新事物到来的征兆。但这种征兆是如此之微弱，以致于可能随时被现有事物所压倒。他所期待的“新世界”，仍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框框内提出来的。因此，这是一种唯心主义救世主降临说的表现，正如卢卡奇所说，他所发现的“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带有纯粹海市蜃楼的空想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卡奇的伦理唯心主义倾向有所增强，例如他完全在费希特伦理思想的意义上强烈谴责任何机构，肯定伦理的基本要求、人的自主尊严。

随着卢卡奇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以及从人本主义方面对

费尔巴哈哲学的思考，他开始对马克思作第二次深入钻研，主要是注重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哲学著作，并努力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由此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伟大的辩证法家。大战期间的几篇评论表明卢卡奇的同情已转向马克思。但是，正如卢卡奇自己所承认的，他当时还是“用黑格尔的眼光”来观察马克思，还没有看到唯物主义在使辩证法问题具体化、统一化以及连贯一致方面的意义，只达到黑格尔关于内容优先于形式的水平，并试图实质上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卢卡奇1918年11月发表的《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文，表明他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还站在康德-费希特伦理学的立场上。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的反对意见，部分就是出自以下考虑：“尽管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构造了这种历史哲学的过程——即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将争得整个世界的解放，但在抉择的时刻，而且这种时刻现在就有，它必然会重视无情的经验事实和这种人的、乌托邦的、伦理的愿望之间的区别。”<sup>①</sup>这表明卢卡奇遇到了革命暴力和伦理之间的矛盾问题。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暴力从伦理观点来看是否合理？在发表上述那篇文章之时，即他加入共产党之前，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难以解决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那一段时间里，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明显呈现出不和谐的两重性：一方

<sup>①</sup> 卢卡奇：《作为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载《策略和伦理·政治文集1，1918—1920》，达姆斯塔特和新维德1975年第30页。

面是占优势的唯心主义成分，如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康德-费希特的雅各宾主义伦理学、克尔凯郭尔主义等。另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也在飞快地进行着。这后一方面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忽视这一方面则无法说明卢卡奇为什么不久走上了革命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然，他所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状况也十分复杂。除了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外，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主要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卢卡奇十分厌恶。而在当时的匈牙利，卢卡奇主要是通过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翼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萨波来了解马克思的，而萨波又处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索列尔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之下。此外，卢卡奇还研究了卢森堡的著作，并获得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所有这些情况，使卢卡奇的思想形成了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但他十分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主观上又倾向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当他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冲击和深入研究伦理学时，他已站在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门槛上，面临着政治方向和哲学理论观点的根本性转变。卢卡奇在谈到他的思想转折时曾经指出：“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使我们初见端倪。”<sup>①</sup>而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使卢卡奇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策略和伦理》一文则揭示了卢卡奇作出重大抉择的内在动机。

<sup>①</sup> 参见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

### 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一) 新的思想起点

加入共产党是卢卡奇政治方向的巨大转折。而他内在思想和理论观点的根本变化则始于他入党之前1918年底撰写的《策略和伦理》一文。据卢卡奇说，这是“一种内心的清算”和他“命运的转折点”。卢卡奇改变了前不久否定政治暴力的态度，论证了革命暴力的合理性。他明确指出：任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目的设定，都否认现有的和过去的所有法律制度在道德上的存在理由和在历史哲学上的现实性。在伦理学中，没有什么中立和无党性。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集体，牺牲个人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因此不应该逃避历史哲学的使命。

他还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确认社会主义解决了资本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方面完全遵循黑格尔的概念形态——“正在把先验的目的设定变为内在的目的设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目的设定本身，同时也是它的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同于以往所有社会的社会制度，它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为了结束经济上的依赖、贬低人的尊严的时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消除经济力量的盲目权力，由一种比较高级的、合适的并同人的尊严相适应的权力来取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仅是一种阶级斗争，而且是达到人类解放的手段，是人类历史真正开始的一种手段”。<sup>①</sup>

<sup>①</sup> 卢卡奇：《策略和伦理》第45页以下。



在1919年写的《旧文化和新文化》一文中，卢卡奇试图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一定历史趋势的形成，在于产生它的自我批判以及消灭它的可能性，“因为人的思想，作为目的本身，新文化的基本思想，是十九世纪古典唯心主义的继承。资本主义时代对未来建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本身创造了它自己崩溃并在它的废墟上建设未来的可能性。象资本主义产生了它本身灭亡的经济前提一样，象它本身产生了由无产阶级消灭它的批判的精神武器一样，它因此也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中创造了新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必然给它带来灭亡”。<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从1918年底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还试图从理论上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也必须指出，卢卡奇还没有准确地把握住马克思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影响，分不清他们的思想同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区别。

## （二）《历史和阶级意识》

卢卡奇不仅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实践这一理论。他不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显示出坚定的革命立场，而且还制订了现实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但是，在匈牙利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相继失

---

<sup>①</sup> 卢卡奇：《新文化和旧文化》，载《策略和伦理·政治文集1，1918—1920》第97页。

败后流亡到维也纳时，他和许多人一样仍然主观主义地相信大革命的浪潮将在短时期内把整个世界，至少是全部欧洲引向社会主义，它决不会由于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暂时失败而衰落。在这种世界革命不久将爆发的气氛中，卢卡奇也产生了世界无产阶级必然很快获胜的信念，主张同来自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制度和生活方式全面决裂。因而他在《论议会制问题》（1920）一文中坚持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参加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极“左”的观点是一种救世主式的宗派主义。列宁严厉批评这篇文章“左得很、坏得很”，“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没有注意最主要的东西（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所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sup>①</sup>列宁的这一批评对卢卡奇的思想转变起了重大作用。他的左倾激进观点逐步得到了克服。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于1923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这是卢卡奇早期向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阐明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阐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中，卢卡奇集中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前言中强调指出，他写作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要“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正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290页。

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方法的本质”。因为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学说和方法中终于找到了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sup>①</sup>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重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承认马克思的所有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相信’这一个论点或那一个论点，并不意味着对一部‘圣’书作出解释。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sup>②</sup>这种方法就是辩证法。卢卡奇之所以十分强调辩证法，还因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无产阶级科学中彻底取消辩证法”，而伯恩斯坦“反对辩证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sup>③</sup>卢卡奇十分熟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所说的“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并“完全赞同”<sup>④</sup>马克思在其中对他的辩证方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区别所作的实质性表述，即“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⑤</sup>显然，卢卡奇正是根

①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11），德国卢西特汉特出版社 1972年第2版第164、165页。

②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11）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82—183、175页。

④ 同上书第1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据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才在说明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sup>①</sup>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时突出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点和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说成是“方法”，<sup>②</sup>列宁把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的论断是一致的。

为了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卢卡奇依据马克思关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精辟论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sup>③</sup>并认为这一规定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论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卢卡奇重点阐述了以下几点：（一）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革命过程本身在思想上的表达。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首要的目的就是认识现实”。（二）把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放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标题下这个十分醒目的地方作为座右铭，并在这一篇文章中确认，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

①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11）第1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③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11）第172页。

改变现实”。<sup>①</sup>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卢卡奇特别强调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认为这是最根本的相互作用，没有这一规定，辩证的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了。而战争、危机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只有通过辩证的方法才能解决。(三)马克思关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论断是历史地认识社会关系的方法的出发点和钥匙<sup>②</sup>。在研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局部领域时都必然出现统一地把握历史过程的问题。辩证的总体考察的决定性意义就表现在这里。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认识作为总体的社会。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辩证的总体考察是理解和再现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总体范畴居统治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sup>③</sup>(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就其最核心的本质来说是历史的<sup>④</sup>，因为所有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任何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要在不断的变化中来理解，而且就其客观结构来说，它们也是资本主义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受历史的限制。因此，马克思注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点，而机会主义却忽视事实的历史性质。庸俗唯物主义的“粗率和无知首先就在于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即暂时的性

① 《卢卡奇全集》第3卷（早期著作11）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卢卡奇全集》第199页。

④ 同上书第165页。

质”。<sup>①</sup>因此，卢卡奇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在理论上最为关注的是要阐明历史和社会的辩证法，尤其是它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性质。这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一大特点。

(2)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运用问题。这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一个基本方面，然而它却被不少人在评价这本书时避开了。卢卡奇在该书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后两部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集中而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重要问题。他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及其运用的。他从肯定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开始，明确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②</sup>强调这是清算一切神话（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神话）的立足点，指责黑格尔看不到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sup>③</sup>。与此同时，卢卡奇还肯定地断言，马克思关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精辟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sup>④</sup>。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

卢卡奇的敏锐之处在于，他根据马克思关于“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

① 《卢卡奇全集》第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③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190、191页。

④ 同上书第192页。

素占优势”<sup>①</sup>的论点，认识到文明时代和在它之前的各个时代之间在结构上有所区别。因此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就有不同的规律占居支配地位。卢卡奇由此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当然可以运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它“不能象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sup>②</sup>

卢卡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别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并由此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不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同时也理解为暂时的、历史的现象；相反，庸俗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犯了马克思指责庸俗经济学犯的另一错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在于纯粹的科学认识，而在于行动。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始终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艰难地、一步一步地遏制资本主义，有意识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而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就一定指明如何“走上自觉监督和控制生产、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强制的道路”。<sup>③</sup>

(3) 资本主义物化(异化)现象及其克服。这是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的重点问题。卢卡奇的杰出之处，是他在不知道马克思《1844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②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414页。

③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431页。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对异化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深刻阐述。他的异化观的特点在于：①他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开始分析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出发，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为此，他特别引用了马克思的精辟论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①卢卡奇由此推论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不依赖于人的东西，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产生一个关于现成的物与物之间关系的世界（即商品和商品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为人们认识到，但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抑制不住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完善的商品经济那里，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异于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某一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运动”。②卢卡奇重点论述了工人的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89页。

②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260—261页。



动活动及其产品的异化。工人由于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而越来越丧失主动性。他进而又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人的一切活动都被异化了,不仅工人的命运被异化,而且官僚制成员本身也不例外。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此外,异化结构还深入到人的意识里,从而形成异化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最本质的异化就是总体的丧失,从而导致研究孤立事实的专门科学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事实。②卢卡奇明确认识到,笼罩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的拜物教假象不仅具有掩盖现实的作用,它还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①。所以,为了为认识现实廓清道路,要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辩证方法必须在撕破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永恒性面纱的同时,也要撕破它们的异化面纱。卢卡奇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是一种暂时的、可以克服的现象。但只有作出经常不断的努力,通过具体联系整个发展具体出现的各种矛盾,通过意识到这些矛盾对整个发展的内在意义去实际地打破现存在的异化结构,才能克服异化。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完全认识,将使认识的主体,也就是工人阶级获得这样一种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就意味着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②所以,无产阶级只要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它就能克服异化。③

①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186—187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③ 同上书第394页。

虽然卢卡奇在上述两点上超越了黑格尔而接近了马克思的异化观，从而在研究异化问题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他把物化作为异化的同义词来使用，把二者混同起来。这一明显错误又表明卢卡奇在异化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的概念系统，尽管他使用“物化”一词实际上指的是“异化”。

(4)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巨大作用。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充分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是卢卡奇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他之所以重点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异化结构产生了异化意识，反过来，异化意识也强化了这一异化结构。而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实证科学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窒息了无产阶级原有的革命意识。卢卡奇首先研究了阶级意识问题，指出阶级意识是历史的产物，仅仅是伴随着高度统一、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才得以产生的。它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各个个人思考、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数，而是“对生产过程中一定典型地位的合理适当反映”。<sup>①</sup>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起初，无产阶级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一个可以在市场上出卖的商品，因而它遭受着残酷的、无限制的奴役。当它了解了这种商品关系时，它就意识到自己是经济过程的客体。而“当资本的物化被分解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连续过程时，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主体”。<sup>②</sup>但是，无产阶级的阶

<sup>①</sup>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223~22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66页。

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也不是全部无产者群众的心理意识，而是“变得自觉的阶级历史地位感”。<sup>①</sup>

在谈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本质时，卢卡奇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一切阶级的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所说的一段话：“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sup>②</sup> 马克思肯定的西里西亚工人反对私有制社会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具体表现。革命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一种标志，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有组织的形态”和“行动的支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则已经光辉地显示出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正是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巨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卢卡奇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指明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这一过程越接近自己的目标，无产阶级关于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即它的阶级意识就越具有更大的意义，这种意识就越有力地、越直接地决定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行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于灾祸。当资本主义发生最终危机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取决于它的阶级

<sup>①</sup>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248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意识。”<sup>①</sup>

卢卡奇并非认为单靠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至少把实践问题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首先认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哲学变为实践的东西，借助实践的原则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从而解决了德国古典哲学未能解决的思维的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律背反问题。卢卡奇不仅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断言，人的实践活动是“改变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行动，实践，按其本质就是对现实的冲破，对现实的改变”。<sup>②</sup>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由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解决。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给无产阶级提供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这种改造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自由事业。

(5) 社会的、具体的人。与重视阶级意识和实践问题相一致，十分关注和探讨人的问题也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人认为卢卡奇在这本书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事实果真如此吗？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首先谈到：马克思要求把“感性”、对象、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这一要求意味着“人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意识到人同时是社会和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人成为真正词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成为人的现实。”<sup>③</sup>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sup>①</sup>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24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11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92页。

较多地揭示了商品(物)的背后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所造成的非人化(尤其是对工人来说)现实。他在这篇文章的第3章《无产阶级的立场》中,尤其是在标明“5”的那一部分中,集中分析了人的问题。卢卡奇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扬弃一切“自然界限”,并“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变为纯粹的社会关系”。<sup>①</sup>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提供了全面和深入把握人的本质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科学,甚至德国古典哲学,也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而往往把个人同社会对立起来,把现实的和具体的人理解为抽象的和固定的人,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卢卡奇完全赞同马克思十分尖锐地反对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sup>②</sup>同时也指责了费尔巴哈把人变成了固定的对象。当然,卢卡奇在说明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也谈到一般的人,如说“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具体关系的核心和基础”,是“现实社会变化过程的动力”,因此,“人成了万物的尺度”,<sup>③</sup>但他也同时指出,尽管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们对此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解释。卢卡奇断言,“个人决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只有阶级才能在实践的变革中同现实的总体联系起来”。<sup>④</sup>他得出的结

①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3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5页。

③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I)第361、367、371页。

④ 同上书第380页。

论是，“马克思从未谈过完人，即抽象的、绝对化的人，而且总是把人作为某一具体总体即社会的一部分来思考”。“关于不存在抽象的人这种观点，也始终是成熟马克思的基本观点”。<sup>①</sup>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卢卡奇在阐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确有不少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尤其是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方面。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如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还未发表），他未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例如，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了狭隘的理解，因而他认为“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社会的现实，是十分重要的”，并指责恩格斯“照着黑格尔的错误样子——把辩证的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的认识上”。<sup>②</sup>又如，他不正确地指责了恩格斯关于工业和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典型实例的表述，说“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哲学意义上的——实践”。<sup>③</sup>此外，他还反对了反映论，认为“思维是大脑的产物并因此同经验的对象相一致的观点”是“一种神话学”。<sup>④</sup>在论述意识的巨大作用时，他也作了一些过分的夸大，如说“每一种社会的统治，在本质上都是精神的统治，只有认识才能把我们从这种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无产阶级“意识的改革就是

①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Ⅰ）第376页。

② 同上书第176页注1。

③ 同上书第312页。

④ 同上书第390页。

革命过程本身”。<sup>①</sup>事实表明，他在正确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宿命论时确有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产生了一定的主观化倾向，从而削弱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方面。

正因为《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既有卓越而深刻的思想，又有明显的失误，所以它在1923年一发表出来，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这本书是马克思本人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是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充分哲学基础的重大努力，很好地反对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重新确立了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意识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作了辩证的理解，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即辩证法。另一部分人则批评他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否定哲学唯物主义，拒绝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1924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卢卡奇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从此以后，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但总的趋势是，它越来越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拟定的《纪念卢卡奇·捷尔吉一百周年提纲》确认，《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卢卡奇流亡维也纳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时期“最重要的而迄今争议最多的一部哲学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的异化关系、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无产阶级意识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方式充实了辩证法和许多概念，迄今为止仍然有效。卢卡奇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一贯的历史性，

<sup>①</sup>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I）第438、435页。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批评的普遍性和严密的统一性。”《提纲》同时也指出：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仍然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创造历史和现实的‘救世’力量。他的革命主观主义、救世主义的左的倾向和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的否认，一方面导致了对他思想的合理批评（在这一借口下，也有不少教条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后来成了修正主义、假激进派和新左派思潮的发源地。”

#### 四、全面完成向马克思主义 及其哲学的转变

##### （一）《列宁》

研究和接受列宁的思想，是卢卡奇完成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20年列宁对他的左倾激进的反议会立场的尖锐批评，使他“学到许多东西”，并迫使他对自已的历史观点做出修正，使其更加灵活，更少僵化，以适应日常策略上的迫切需要。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的批评是卢卡奇的观点变化的开始。同时，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列宁的著作，深刻理解了《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的重要理论意义。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列宁的思想，强调列宁的著作和演说对于通过批判地研究罗莎·卢森堡一生的理论著作获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在方法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列宁的“历史作用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具体的水平”，“从而为我们重新提供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钥匙。”<sup>①</sup>

<sup>①</sup> 《卢卡奇全集》第2卷（早期著作Ⅰ）164页。



卢卡奇于1924年列宁逝世后写的《列宁》一书，是他进一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这本书中充分肯定了列宁作为马克思理论和革命活动的伟大继承者，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为分析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作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复兴仅仅是从列宁的出现开始的。正是列宁恢复了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本质。马克思的历史性天才在于，他“在英国工厂的微观世界中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资本主义宏观世界的社会前提、条件和倾向”。象马克思的思想一样，列宁的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列宁从现实主义出发，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应用于社会主义问题。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经常从最内在的本质看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他总是把一切现象归之于它们的最后基础——人们实际的阶级利益，归之于具体的（换句话说由阶级条件限制的）人的具体活动。列宁从来没有规定过能够适用于许多不同情况的“一般原则”，他的真理来自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被庸俗马克思主义降低和曲解了几十年之后，恢复了它的纯洁性，并且使它的方法发展了、具体化和成熟了。列宁主义代表了具体的、非公式化的、非机械的、纯粹以实践为方向的思想。列宁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中的现实含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

他总是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列宁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一位深刻的实践哲学家，一位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位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所以，继承列宁主义传统，就是不失真地和灵活地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活泼、发展和创造的功能。

## （二）《布鲁姆纲领》

1924年以后卢卡奇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在理论上更加接近马克思了。他关于拉萨尔和赫斯的两篇评论，已更具体地将社会批判连同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植根于经济状况之中。他还根据马克思《神圣家族》的思想，尖锐地抨击了拉萨尔的纯粹唯心主义世界观。这一积极倾向明显反映在他以后的著作中。

1928年，卢卡奇受委托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了《关于匈牙利政治经济形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即著名的《布鲁姆纲领》）。他根据当时世界革命因素明显衰退、法西斯主义正在增长的形势，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在霍尔蒂专制统治下的匈牙利社会经济情况，提出了党的战略目标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卢卡奇试图把列宁关于两个革命阶段的理论具体运用于匈牙利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现实主义战略。他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同工农民主专政问题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他同过去左倾激进立场的彻底决裂。据卢卡奇自己说，他通过这一纲领动摇了自己过去那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

础。对卢卡奇来说，无论是在理论思想方面还是在实际政治行动方面，《布鲁姆纲领》都是一个转折点，并预示着不久即将实行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战略的产生。

### （三）清算过去的错误，全面确立马列主义哲学观点

从30年代开始，卢卡奇在苏联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重要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清算了过去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唯心主义成分，全面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卢卡奇曾谈到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有机会较早地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对他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在阅读手稿过程中，《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光”。他在30年代前半期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论争》、《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意义》、《艺术与客观真实》、《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他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成熟著作和根本标志。

1930年卢卡奇写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论争》一文，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因为在拉萨尔看来，“英雄”能够随意摆布各个阶级，在历史上实现“观念”的要

求<sup>①</sup>。

1933年卢卡奇发表在《国际文学》杂志上的《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批判地回顾了自己思想的发展道路，清算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承认过去未能“真正地和正确地把握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方面”。而《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虽然“已经有意识地试图用马克思来克服和‘扬弃’黑格尔，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辩证法问题还是按唯心主义方式解决的（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只是到现在，在做了将近十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在和马克思打了十多年的理论交道之后，我才具体地明白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全面和统一的性质。”他还更深刻地认识到，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

他在1934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共产党布尔什克化的意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检讨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反对反映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下半截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充分地肯定了列宁的这篇哲学著作对于批判马赫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1934年撰写的《艺术与客观真实》一文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在艺术中的应用。卢卡奇在其中强调指出：“任何一种对现实的正确认识，不管这是关于自然的，或是关于社会的，它的基础都是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就是说，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论争》，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11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322页。

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任何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看法，都不过是通过人的意识对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世界的一种反映而已。意识同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当然也适用于现实的艺术反映。

反映论，是通过人的意识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现实的所有形式的共同基础。因而，它同样也是关于现实的艺术反映理论的基础。”<sup>①</sup> 卢卡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既反对认识论方面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反对哲学唯心主义。

卢卡奇1935年写的《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集中阐明了恩格斯在文学和艺术理论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他特别重视列宁极有远见的论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年代里，“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处于重要地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心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sup>②</sup> 卢卡奇借此指责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只知道两个极端：“不是唯心主义地修正和‘纯化’马克思主义，就是简单机械地、庸俗地、非辩证地和直接地从常常是被简单化了的经济事实当中去引伸出思想现象和文学作品来。”<sup>③</sup> 卢卡奇最关注的是恩格斯在文学问题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要想正确和深刻地解决现在出现的新问题，就必须重新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理论上的指南。”<sup>④</sup>

<sup>①</sup> 参见《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第419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sup>③</sup> 卢卡奇：《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第25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36页。

## 五、运用和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从30年代以后，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卢卡奇就把具体运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在他“熟悉的领域里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并且按照新情况的要求予以相应的发展”看成是他“一生的中心任务”。他在文学评论和美学领域，在哲学史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 （一）文学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卢卡奇从事文学艺术评论和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他明确指出，任何一种对外在世界的看法，都不过是通过人的意识对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世界的一种反映而已。反映论是通过人的意识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现实的所有形式的共同基础。因而，它同样也是关于现实的艺术反映理论的基础。<sup>①</sup>卢卡奇确信关于人的意识反映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现实的正确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时借用列宁的话，一方面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

<sup>①</sup>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第419页。

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sup>①</sup>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卢卡奇特别强调艺术反映现实的客观性问题。他明确指出，每一种认识都是建立在外在世界的直接映象的基础之上的，映象是任何一种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它又只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不是认识的全过程。<sup>②</sup>马克思阐明了这一问题，列宁又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概括地说明了抽象的范畴、概念、规律在人认识现实的整体中所起的作用：“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sup>③</sup>卢卡奇认为，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并同实践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才能正确理解、反映和把握住客观现实的本质。而文学艺术也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正确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然具有客观性，或曰真实性。但是艺术反映是一种有别于科学反映的特殊反映。

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的特殊性就在于正确反映整体的联系。卢卡奇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那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sup>②</sup>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第420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般是作为个别和特殊的规律出现的，本质是在现象中显现并且人们能够感受到的，规律表现为特殊地推动所描写的特殊事件运动的原因。”<sup>①</sup>在卢卡奇看来，艺术作品是生活过程的运动和具体灵活联系的反映，它必须在客观上正确地、总体地反映生活的、客观的一般过程，选择和安排生活的细节仅以艺术客观地反映现实为基础，使之在整体中有联系地内在地起作用。所以，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越是“朴实”，它越是仅仅作为生活、自然起作用，那么，这部作品就越是清楚地表明，“它就是它那个时代的集中反映”。<sup>②</sup>总之，艺术作品的客观性就是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真实，它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构成一切伟大艺术的基础。所以卢卡奇既批判庸俗机械的反映，也反对对现实进行主观主义的歪曲。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艺术的客观性的党性，甚至认为这种党性是“艺术作品的灵魂”，因为它是“现实本身所固有的推动力”。<sup>③</sup>

正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艺术特殊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观点出发，卢卡奇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这成了他创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原则。

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是一个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又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

---

①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第429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379—380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374页。第2卷第435页。



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sup>①</sup> 卢卡奇据此发挥说，典型是“现实主义美学观的中心范畴和标准。”典型人物所以是典型的，是因为他们个性的最内在的本质是由那样一些规定性所推动和限定的，“这些规定性在客观上属于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发展倾向”。所以，典型“就是有机地概括了一般和个别的独特的综合体”。<sup>②</sup> 因此，在卢卡奇看来，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内容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的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东西。除此之外，它还认识和刻画一种在刻画时仍处于萌芽状态、其所有主观和客观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从荷马开始、经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直到高尔基等伟大作家，他们代表了现实主义传统。他们之所以能写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因为他们“从艺术上准确地、生动地、完全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sup>③</sup> 所以卢卡奇高度评价了不同历史时代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

卢卡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作了精辟的阐明。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一切优秀传统，但它们之间也有质的不同。他“在高尔基身上看到了伟大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有质的不同阶段上得到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462页。

<sup>②</sup> 卢卡奇：《巴尔扎克和法国现实主义》，载《卢卡奇全集》第6卷，新维德和柏林版1965年第438、436页。

<sup>③</sup>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3卷第394页。

进一步的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高尔基看到了人类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托尔斯泰是看不到这种远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社会主义远景在原则上的具体性和这样的要求，即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考察这一远景和那些促进这一远景实现的力量”。<sup>①</sup>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描写新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把新人的成长过程“真正广泛而又生动地描写出来，真正把这一过程的所有重要的客观规定性描写出来，并要正确地分布光明与阴暗面。”<sup>②</sup>

卢卡奇美学理论研究的高峰是他写成《审美特性》（1963年）这一巨著。这一著作是他将马列主义应用于美学领域的无与伦比的尝试，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在美学问题上尽可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sup>③</sup>具体地说，主要是探讨如何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卢卡奇认为，只有通过独立的研究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而“只有不带偏见地去考察现实，并用马克思所发现的方法对它进行加工，才能两者兼得：既忠于现实同时也忠于马克思主义。”<sup>④</sup>从实质上说，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

---

① 卢卡奇：《批判现实主义的现实意义》，《卢卡奇全集》新维德和柏林版1970年第551页

② 卢卡奇：《艺术与客观真实》，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3卷第397页。

③ 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④ 卢卡奇：《美学》第一部：《审美特性》上册，新维德和柏林1963年第18页。

卢卡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对各种反映形式以及对审美态度与对客观现实的其他反映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就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这条长河不断地用人类精神的最高成果丰富着，并使这些成果适应于人的日常实际需要，再从这种需要出发作为问题和要求形成更高的对象化形式的新分枝。“只有从人类生活的发生、发展、内在规律及其根源的动态关系中，才能推导出人对现实进行科学反映和艺术反映的特殊范畴和结构”。<sup>①</sup>正如卢卡奇所述，这就是《审美特性》一书的基本思想。

卢卡奇论战的锋芒是指向哲学唯心主义的，同时又认为也应该与普遍存在的机械照相式的反映观点划清界限。所以他一方面指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颠扑不破的事实”，“自然界的对象本身的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sup>②</sup>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唯物主义所说的第一性，即有无意识的存在，但没有无存在的意识这一事实中，决不能得出意识隶属于存在这样的宗教等级制的隶属关系。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但社会实践的目的也在于支配社会存在，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意识对存在的支配能力也不断发展。任何反映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都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而实

<sup>①</sup> 参见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践则是判断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实本身就其客观实质而言是历史的”。<sup>①</sup>卢卡奇在这里确认的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卢卡奇在分析各种反映形式时断言，日常反映、科学反映和艺术（审美）反映都是对同一客观现实的模写（反映）。但日常生活、日常反映是对客观现实作出科学反映和审美反映的基础和出发点。科学反映是对日常思维形式的一种超越和提高，是“非拟人化的”。相反，艺术反映（审美反映）按其本质来说却是“拟人化的”。科学强调同一存在的客体方面，而艺术则强调同一存在的主体方面。

艺术（审美）及其反映是卢卡奇研究的重点。他首先指出，艺术的形成起源于日常生活，审美反映是在长期劳动和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卢卡奇的新见解在于，他把模仿看作是“艺术的决定性源泉”。<sup>②</sup>他一方面深刻地看到，艺术反映总是以与自然界处于物质交换中的社会为基础，并且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以其特有的手段来把握和表现自然界，另一方面他也洞察出艺术（审美）反映的特殊之处。审美反映是从人的世界出发，并以此为目标<sup>③</sup>。也就是说，审美以人为中心。艺术的自身世界就是人的自身世界<sup>④</sup>。艺术是人类自我意识最适当和最高的表现形式，艺术形式把人提高到人的高度，并使人认识到他最深层的本质。

---

① 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443页。

“特殊性”范畴是卢卡奇美学的中心范畴。他肯定歌德关于在特殊中见一般，谁若要生动地把握住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的思想，并从中受到启迪，认为特殊性最恰当地表达了“美学结构的本质”。艺术作品的特性就是它的特殊性。从这一中心范畴出发，“个性”和“共性”就构成一个“感性鲜明的系统”。这样，一方面个性被普遍化，另一方面也决不会离开人类具体生活的基础。因此，审美典型就是“个别和一般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卢卡奇还把审美特性的规定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认为，艺术是对人类解放目标及其实现可能性的一种特殊反映，并实际地和具体地提出了人类的解放问题。所以，它能够促进实现工人阶级以及整个人类的伟大理想。在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压迫并创造人类现实的过程中，“艺术起着重要的、难以估价的作用”。<sup>①</sup>

卢卡奇的《审美特性》赢得了广泛而高度的评价。有的人指明这一巨著的“最大功绩在于，它把艺术描述为人类的一种感性意识，是人类争取自我解放和消灭阶级统治斗争的党性组成部分；按每个时代的标准不同而不同，但艺术同社会之间关系的中心是现实主义”。<sup>②</sup>有的人则认为卢卡奇在这一著作中“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列宁反映论的无比新颖、富于说服力和丰富的例证”。虽然卢卡奇的美学思想

<sup>①</sup> 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7页。

<sup>②</sup> 《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一百周年提纲》，匈牙利《社会评论》1983年第8、9期。

中也有值得研究的论点，但他在把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运用于美学探讨和提出深刻的卓越的见解方面，无疑成就卓著。因此，有人认为他的美学理论“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媲美”，卢卡奇是“美学方面的马克思”。<sup>①</sup>

## （二）完整的人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这是卢卡奇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他的独特贡献之一。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人物，给现代资产阶级打下基础，但没有受资产阶级的局限。……那时候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物用舌和笔，一些人物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sup>②</sup> 卢卡奇正是根据这一论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他们的同时代作家用使人物性格化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分工所引起的破坏作用和对人受到屈辱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要求作家们能从本质上、从整体上理解人”。<sup>③</sup> 这

<sup>①</sup>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

<sup>③</sup>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就是卢卡奇十分关注完整的人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依据。

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一切伟大文学的共同基础，乃是因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的完整性。现实主义的实质，就是“准确地从艺术上表现整个的人”。现实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维护人的完整性。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时期作了充分的描绘，“他们同时也成为为恢复人的完整性的个性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中的路标”。所以，卢卡奇高度评价了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及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巴尔扎克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肢解和畸形化，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使人性败坏、道德沦丧以及人们从心底深处堕落变坏的情况。因此他在维护人的完整性不受肢解的名义上痛恨这种现象。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则要求人的个性的完整，要求从剥削和压迫中、从资本主义分工的奴役中使人的个性获得解放。但卢卡奇也明确指出他们的人道主义都有由当时社会和历史决定的局限性和弱点。巴尔扎克是从右边，从封建的、浪漫主义的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托尔斯泰则具有偏执宗教的反动倾向。卢卡奇对人道主义也作了阶级分析。虽然现实主义者都是为了人，但他们都立足于不同的阶级。

“托尔斯泰的根源在农民阶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源在受苦的城市平民阶层，而高尔基的根源则在于无产阶级和贫民阶层”。<sup>①</sup>

<sup>①</sup>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卢卡奇真正肯定和确信的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因为它的目的就是恢复人的完整的个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并在质上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成为它的漫长的发展过程的顶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分析的是整个人以及他的发展史，分析他在不同时期部分实现了完善或者遭到肢解，并试图指出这些关系隐蔽着的规律性；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标就是整体的人，就是在生活本身恢复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就是实际上真正地消除由于阶级社会而引起的人类存在畸形化和肢解”。<sup>①</sup>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够认识到，人性的原则遭到真正的、最深刻的破坏，人的完整被肢解和畸形化，正是社会的物质经济结构的必然后果。阶级社会的劳动分工，城市和乡村以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人压迫人和剥削人，肢解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这一切都是物质的、经济的过程。”<sup>②</sup>由于找到了根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可能对阶级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着的反人道主义现象，不只是讽刺批评，不是想望回到早成陈迹的所谓牧歌式生活，而是“去科学地说明，这总过程来自何方，去向何方，如何才有可能真正地在现实本身中，在实在的人身上去捍卫人的完整性。这样，那个产生着使人畸形歪曲的必然后果的物质基础就必须改变；这样，已经觉醒了了的有觉悟的人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能够创造这样一种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不仅捍卫着社会和政治的、道德、精神和艺术的完美，而且还使之提高到

① 《卢卡奇全集》第8卷，新维德和柏林1965年版，第435页。

② 卢卡奇《美学史论丛》柏林1954年版第214—215页。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高度。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sup>①</sup>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不同状况作了对比，指出：“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简单异化即占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然被降低到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将它内在的财富从它自身产生出来……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完全解放；它之所以是这样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些感觉和特性既在主观上也在客观上都变成了人的感觉和特性。”<sup>②</sup> 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断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sup>③</sup>

卢卡奇还进一步研究了列宁的思想，指出“列宁活动的世界观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仅在政治上受压制，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由于这种压制和剥削组织的存在，造成了某些人的个人道德的衰落，限制个人、群众社会活动的严重后果。如果把这一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观察，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必须改变物质基础，人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彻底的改变。<sup>④</sup> 列宁不同于过去那些伟大道德家的地方，就在于他指出了新的道路：改变社会物质结构，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和消灭具有阶级性的机构。<sup>⑤</sup> 和唯心主义相反，必须充分地

①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③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④ 同上书第361页。

⑤ 同上书第362页。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正确性。列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要求通过消灭剥削的经济基础而产生出工人、农民的自由时间，只有这样，才意味着在人类文化发展方面达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为每一个人打开大门，才有可能使每一个人作为创造者真正地、积极地参加到文化的发展、建设和活动里去。<sup>①</sup>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重视和阐明完整的人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是卢卡奇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创之处。

### （三）《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

《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是卢卡奇在成熟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运用于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他之所以深入研究黑格尔，同他1930年有机会阅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有直接关系。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里一个重要而尚未彻底澄清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作了光辉的启示，但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而要想充分理解马克思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先对黑格尔的伟大和局限性作一实事求是的认识，乃是绝对必要的。当然，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种种歪曲，更是促使他研究黑格尔的直接动因。1848年以后，先是叔本华，后是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普曼，都企图取消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发展史，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R·海姆甚至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一切方面都是反动的。而帝国

<sup>①</sup>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65页。

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则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狄尔泰由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沿着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向篡改而获得巨大声望。他把黑格尔哲学解释成反理性的神秘主义。赫林甚至把黑格尔描绘为“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为法西斯主义所欢迎的哲学家形象”，从而使“德国哲学史家对黑格尔的篡改歪曲达到了高峰。”<sup>①</sup>因此，卢卡奇认为，“由于法西斯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已经利用黑格尔青年发展时期的某些材料硬把黑格尔说成是一个适合法西斯口味的反理性主义者，那么根据历史事实来驳斥这些对历史的篡改，就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因为，这种“最新的科学”钻了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对于黑格尔的青年发展时期还等于根本没进行研究的空子，已经把它的论调打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来”。<sup>②</sup>与此同时，卢卡奇在苏联也感觉到，尽管发表了列宁对黑格尔的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但已经有明显的绝对否定黑格尔的迹象。在随后的一些年里，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看成是对法国革命的贵族反动的倾向急剧地在增长。因此，卢卡奇认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指导原则对黑格尔作出实事求是的批判性评价，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卢卡奇首先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他明确指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

<sup>①</sup>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页。

<sup>②</sup>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6页。

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①</sup>这一论断，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正确而有效亦即符合历史的批判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是方法论上的深刻必然，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就是以他对经济事实本身更深刻更正确的见解为出发点的。恩格斯也反复指明，每一哲学体系同以前哲学里未决问题的纯粹哲学关联只是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底层的客观的基础之上。而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批评康德“多半是从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sup>②</sup>这一重要提示，也完全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作历史和批判研究的方法论。

卢卡奇明确指出，他写《青年黑格尔》这本书完全是以马克思的论点作为指导原则，而马克思的论点正是在方法论上有效地开展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大门。卢卡奇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里，明确提出一个哲学史的方法论的新观点，即“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关联”。<sup>③</sup>他明确表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这种关联。他要历史地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实际矛盾如何影响了最高形式的资产阶级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191页。

③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页。

辩证法。在法国发生的实际事件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及其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德国的一个儿子的头脑里统一起来，变成了辩证的方法和唯心主义体系。卢卡奇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指明了正是黑格尔所生活的那个特殊而伟大的时代，尤其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经济情况才造就了黑格尔这样一个既伟大而又有局限性的哲学家<sup>①</sup>。

卢卡奇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指明了评价黑格尔的方法论原则，而且充分肯定和具体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系统的批判研究。一方面，他肯定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高度评价，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成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sup>②</sup>并据此认为，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具体问题的一般原理的抽象（唯心主义）反映，但黑格尔是唯一理解这个运动的辩证性质并从而发展出普遍辩证法的人。另一方面，卢卡奇又根据马克思的见解明确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精神只是在表面上创造历史。“黑格尔的过错在于……不彻底性；他仅仅在表面上把绝对精神本身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

<sup>①</sup> 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9、141、14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像中。”<sup>①</sup>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是以他对经济事实本身更深刻更正确的见解为出发点的。所以他十分重视马克思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际事实的分析，对于从劳动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外化所作的如下描写：“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sup>②</sup> 卢卡奇认为，这里已经包含对黑格尔哲学观点的根本批判，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外化（异化）与客观性，与劳动里的客观化（对象化）作了严格的区分。后者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前者则是在资本主义里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所谓自由工人的附随现象。<sup>③</sup>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消极方面，因而在他那里必然产生出哲学上错误的分割、错误的统一和唯心主义的神秘化。黑格尔在哲学上把生活里外化（异化）的现实关联和规定性头脚倒置起来。在主体方面，他唯心主义地把人的本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sup>③</sup>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7—118页。

质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他错误地把人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在客体方面，他把异化与对象性等同起来。卢卡奇强调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别了在劳动本身里的对象化与在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里主体和客体的异化，所以他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穿黑格尔的错误的统一。

马克思把客观性（对象化）与人类实践的异化作出严格区别，这不仅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也为批判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准备了条件。费尔巴哈的弱点在于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纯粹哲学的、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人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跟哲学问题之间存在有辩证的关联，由于黑格尔认识到这些关联，由于他曾把这些关联（即使他的努力毋宁可以说是徒劳）充当他的辩证法的基础，这就使他的哲学尽管是唯心主义的，而（在一定的领域里，从一定的角度上说）仍然超过费尔巴哈的哲学。正因为这样，他的辩证法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它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因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发生的时候可以直接与之接合的那个中间环节。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的巨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根据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理解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来说明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所在和缺点所在。<sup>①</sup>

与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立场全盘否定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各种倾向相反，卢卡奇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具体阐明了黑格尔的伟大和局限性。他深刻地揭示出青

<sup>①</sup> 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7、141页。

年黑格尔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确认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是十分关心世界史里重大国际事件的伟大思想家。他一直到去世之前仍然还称赞法国革命是“灿烂的朝霞”，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即他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企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亦即资本主义的实际内部结构及其赖以实现的力量，并说明其运动的辩证法。

不仅如此，卢卡奇还细致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在考察黑格尔伯尔尼时期时，卢卡奇指明了黑格尔是从启蒙运动出发，愈来愈站到民主的左翼方面，强烈地反对基督教，因而不能说黑格尔思想发展史里有过一个“神学时期”，相反，青年黑格尔早期思想发展中有一种共和主义倾向，即有一个“共和国时期”，因为他把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视为当前社会和国家改造的永久榜样，而卢梭、雅各宾关于平均财产的思想又构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的经济理论基础。同时，卢卡奇也看到，青年黑格尔的整个世界观不可以简单地归入启蒙思想，甚至连德国启蒙思想也不是。他终生都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反对基督教，但从来没有发展到唯物主义无神论，从来没有象狄德罗、霍尔巴赫或爱尔维修那样一般地反对宗教，相反他过高地估计了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主张恢复古代宗教。在分析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时期时，卢卡奇指出黑格尔通过研究社会经济问题而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矛盾是生活的基础和动力，但他使用“生命”



这个概念，在内容上充满了神秘气息。而到了耶拿时期，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抽象陈述过的矛盾统一学说就变成了一种成熟的矛盾运动和矛盾扬弃学说（在《精神现象学》里），在这一过程中，“外化”或“异化”这一概念逐渐取得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所以，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详细研究分析了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和历史两者都是精神的“外化”，但自然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黑格尔不仅作了完全错误的区别，而且甚至承认精神先于自然。但他在作这种区别时接触到了人类社会史的一个本质规定：“人类自己创造他的历史”。黑格尔只从积极方面考察了劳动，并“把劳动正确地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但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消极方面，因而就产生了把外化（异化）和对象化（客观化）等同起来的错误<sup>①</sup>。而他把思维视为“外化”的动力，把生活里外化的现实关联和规定性头脚倒置起来，把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则是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是陷入“无批判的唯心主义”泥沼。因此，黑格尔式的“外化”观念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反动因素，即对过去的辩护。这就“足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说，他们正确地断言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可解除的矛盾。”<sup>②</sup>

《青年黑格尔》一书也引起过一些非议和批评，有些人认为卢卡奇高估乃至美化了黑格尔，有些人不同意卢卡奇关

<sup>①</sup>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第111、119、120页。

<sup>②</sup> 参见同上书第119、120、128页。

于黑格尔起初有一个“共和国时期”的看法。这在今天仍是需要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 （四）批判非理性主义

在卢卡奇看来，作为资产阶级哲学重要流派之一的非理性主义，已经兴起和扩散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方面。它是在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斗争中产生出来并发生影响的。因此，这种哲学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所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深入批判非理性主义就成了卢卡奇30至50年代哲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突出特点之一。而他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完成于1947年，1951年由柏林建设出版社出版）和《理性的毁灭》（1951—1953年写成，1954、1955年先后在布达佩斯和柏林出版）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最有份量的著作，也是卢卡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

1. 批判存在主义。卢卡奇之所以同存在主义哲学展开论战，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存在主义在战后产生了日益扩大的深刻影响，并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流派。在卢卡奇看来，自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一书于1927年问世以来，存在主义就被西方思想界的先驱们看作是哲学再生的希望和现代世界观的确切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存在主义思潮就已经席卷了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一些著名存在主义者及其方法上的先驱胡塞尔，在很大程度上征服了法国、美国及拉丁美洲。西方存在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即萨特的《存在和虚无》，于

1943年出版。从那时以来，存在主义在有关哲学的议论中，在专门刊物上以及小说和戏剧中，不可抗拒地扩大传播开来，并日益成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发展和最时髦的形式，因为它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标榜自己是“第三条道路”。所以，不可避免的哲学大论战本质上就在存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展开。

卢卡奇首先阐明了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列宁对马赫主义进行的认识论的批判带有根本性，对批判帝国主义时代所有其他哲学流派都有意义……以为“列宁的批判是专门针对着马赫的学说，而与那以后的哲学发展无关的想法是错误的”。<sup>①</sup>卢卡奇根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思想，主要强调和阐发了两条具体的重要原则：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但是由于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差异，“列宁展开活动的时代，问题的重点已经有了转移，从此以后，思想的发展便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其主流了。”<sup>②</sup>二、列宁所揭露的妄图在哲学中发现新的、排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第三条道路”的作法，在帝国主义时代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革新唯心主义、制造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的斗争形式。”<sup>③</sup>

根据列宁批判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方法论原

---

<sup>①</sup>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66—167页。

<sup>②</sup>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161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28页。

则，卢卡奇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存在主义的本质。他明确断言，“存在主义来源于现象学的本体论，代表着帝国主义阶段所固有的哲学上“第三条道路”在现代的顶点及其最精巧的形式。”<sup>①</sup> 在分析批判存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时，卢卡奇把重点放在当时影响最大的萨特身上。在他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当时法西斯主义压迫太久，欧洲，特别是具有旧民主主义传统的各国知识界都在最强烈而迫切地渴望自由。自由的抽象概念起了抵抗运动神话的作用。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就是绝对自由的哲学。这就是它所以大受欢迎和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卡奇对存在主义的批判性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即认识论领域中的客观性问题、道德领域中的自由问题和关于未来前途的估计问题。他着重明确地指出：一、存在主义的本体论虽然也承认存在独立于意识而存在，但它关于存在的定义、认识和解释，则完全是按照旧唯心主义那一套。它采用暗暗承认仅仅存在于意识内部的观念或概念本身就是客观实在的提法来模糊它的界限，同时也利用承认没有意识就没有存在的办法来放弃存在独立于意识的唯物主义。现代存在主义者们虽然指责别人的唯心主义倾向，但实际上他们“仅仅用本体论的唯我论来代替认识论的唯物论”<sup>②</sup>。萨特虽然，比海德格尔远为关心人同自然界之间的体验的、实践的关系，但是，往往使自然界服从于意识。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这一切，对于萨特，都是心理的即只属

<sup>①</sup>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7页。

<sup>②</sup>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48页。

于意识上的范畴，而不是属于现实存在的即本体论的范畴。存在主义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拒绝承认“客观现实在人意识中的反映起决定性的作用”<sup>①</sup>。二、在萨特那里，自由这个概念完全是抽象的。自由就是进行选择的自由，而并非选择自由状态。人不能超出选择的自由之外，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按照萨特的看法，也不存在任何道德标准。卑怯和勇敢也完全是选择的结果。这样，萨特的自由概念就变成了完全非理性的、随意的和无法控制的东西。假如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话，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就要变成极端决定论的世界<sup>②</sup>。萨特的正确之处在于，他强调资产阶级的决定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通常轻视的个人决定的重要性。但在他那里，选择或决定是独立于一切过去而存在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个人方面，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本身都一起被否定了。联结着个人同社会的真实关系也被否定了。萨特的自由概念在哲学上的诱人的秘密，就是它“为保持个人的本体论上的完整性而对社会考察和公共生活采取的轻蔑态度以及对自由和责任概念所作的抽象的、非理性的、不合逻辑的解释”。<sup>③</sup>三、驳斥萨特指责马克思主义“排除了主观性”，把应该加在机械唯物论身上的论点硬加在辩证唯物主义上面。卢卡奇强调指出：“为了理解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追溯到人类行为的物质基础、人类生活中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由于这种分析，发现了其客观的、历史的规律，但是并不因此就否

①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98页。

② 参见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63—67页。

③ 参见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68—70页。

认主观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只是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整体中，给主观性规定一个应有的正确位置而已。”<sup>①</sup>

2. 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思想先驱——非理性主义。早在30年代，卢卡奇就写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亲身经历和目睹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更促使他反复思考其思想根源，因而写成了《理性的毁灭》这部近六十万字的巨著。这是卢卡奇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他研究现实阶级斗争和思想史的理论总结。卢卡奇的独特贡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了主要是德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最有影响的流派，深刻地分析和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思想先驱——非理性主义。

卢卡奇当时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非理性主义已经兴起并扩散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方向。因此，为了研究这一现象，就必须探讨它的深刻社会根源，正如卢卡奇所说，“对哲学来说，问题及其解决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如不根据对这些首要推动力的认识，一个时期的哲学的根本线索就不可能揭示出来。”<sup>②</sup>任何哲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是由它的时代的阶级斗争决定了的。社会发生和社会功能是第一性的。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德国在哲学领域里走到希特勒那里去的道路”，就成了卢卡奇的研究材料和考察对象。他要指明，这条实在的道路是怎样在哲学里反映出来的，作为

<sup>①</sup> 参见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第93页。

<sup>②</sup>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德国走向希特勒去这一实际发展的思想映象的那些哲学论述，又是怎样帮忙加速这个进程的。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准备工作”。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正是就这一问题而言，而且“就哲学的意义而言，赞成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立场，就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本质，决定着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sup>①</sup> 卢卡奇所以这样认为，其用意在于从哲学斗争不同的角度突出强调德国现代哲学斗争的主要特点，即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但他并没有忽视这种斗争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斗争的交叉联系。卢卡奇明确指出，非理性主义是“在同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的不断斗争中产生出来并发生影响的。即使在这里，这种哲学争论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sup>②</sup> “非理性主义的两个重要阶段，都以它们当时哲学上最高的进步概念当作斗争的对手，即哲学上有质的区别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无产阶级世界观）<sup>③</sup>。他还更明确地强调：“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就之间的对立，是我们讨论和批判的当然基础。”<sup>④</sup>

卢卡奇从德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详细地研究了现代非理性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点和社会阶级根源。他认为，非理性主义的特殊性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特殊的

①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3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④ 同上书第4页。

阶级斗争之中。社会情况及其变化决定着思想家的信念和思维方式，主要是阶级地位支配着思想家在理性和非理性、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抉择。哲学家在本质上总是同社会中的特定阶级及其革命性或保守性联系在一起。非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是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和斗争加剧、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并最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过程中反动资产阶级在思想和哲学上的集中反映。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非理性主义者的动力和特点：“贬抑知性和理性，无批判地推崇直觉，贵族式的认识论，拒绝社会历史的进步，制造神话等等”<sup>①</sup>。

卢卡奇还根据列宁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非理性主义在要用辩证法解决问题的地方裹足不前，而且把问题绝对化，把合乎理智认识的界限完全凝固为认识的界限，实际上把问题神秘化为一种“超理性”的答案，从而以这种方式人为地使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哪里把知性物限制的知性和认识同认识限制的知性和认识等同起来，哪里就可能而且必然要向一种非理性认识继续前进，这就是非理性主义的最一般的特征。”<sup>②</sup>非理性主义不理解辩证法的本质，不了解认识只是近似地反映客体，看不到在反映和被反映之间的矛盾是不断克服、不断产生的，因而把认识的矛盾性解释成不可能获得关于现有事物的真正的、有客观内容的知识。

准确地再现德国非理性主义真实而典型的发展过程，是

---

<sup>①</sup>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0页。



卢卡奇的杰出贡献。在他看来，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来迟，走的是军事专制的“普鲁士道路”，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但没有民主，因而成为最富于侵略而又特别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些特殊条件使德国成为非常适合于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土壤。在反对理性和进步，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方面，德国从谢林开始就形成一种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新的特殊的哲学方法。谢林晚年的天启哲学和理智直观，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都有持久的国际影响，从根本上奠定了新的非理性主义的基础。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从美国到沙俄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反动派的典范。而后来的史宾格勒，直到汤因比以前，从国际范围看，他始终是非理性主义历史哲学观的榜样。海德格尔则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楷模，在法国和美国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帝国主义时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特别明显地表明了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德国非理性主义的一些特殊倾向在德国取得了“经典的”彻底的形式，它的国际影响在法西斯主义准备时期和希特勒时期获得非凡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它，以便从根本上克服它，毫不留情地清算它。卢卡奇乐观地指出，德国这个“有过丢勒、托马斯·闵采尔，有过歌德和马克思的民族，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东西，将来也有远大的前途”。<sup>①</sup>

<sup>①</sup>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27、28页。

## 六、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思考和研究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是卢卡奇晚年哲学活动的中心。五、六十年代关于辩证法和本体论问题的争论，存在主义对存在问题的唯心主义解释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某些机械教条的解释，促使卢卡奇下决心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他确信，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本体论，其次才是认识论。他要针对黑格尔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本体论的唯心主义解释，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卢卡奇撰写《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描述“唯物主义的现实观”，“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作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并借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卢卡奇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认为存在过程即历史在马克思世界观中居于统治地位。从这一观点出发，“自然过程存在于社会存在之前，而且正是它的真正形成才创造出社会存在出现的前提”。<sup>①</sup>先有无机的和有机的自然界存在，然后才可能出现社会存在。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必然得出以下结论：一般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只有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因此，“真正正确地理解自然辩证法是一

<sup>①</sup>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个必要的前提”。<sup>①</sup>

2. 强调三大类型存在(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联系和差别,指明物质自然界从无机界向社会存在的高级阶段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才可能一方面不忽视物质基础是任何一种存在的前提,自然的基本规律在任何阶段上都依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又能不把自然和社会千篇一律地等同起来,真正认清社会存在的本质和特点。正是基于此,卢卡奇才与传统的作法不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常用的术语“本体论”来描述关于客观辩证法的学说。他把这样理解的本体论看作是认识论即关于主观辩证法学说的前提,正如他说的,“作为关于主观辩证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际上始终以本体论即关于客观辩证法的学说为前提”。<sup>②</sup>卢卡奇强调自然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既是针对唯心主义对辩证法的曲解,也是为了纠正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否定自然辩证法的错误。

3. 有目的的劳动是社会存在的最重要范畴。劳动概念是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的关键问题,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产生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本质特点。劳动使人和自然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向社会方向的转化。因此,劳动在人变为人的过程中起着“突出的作用”。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人能从事有目的的劳

---

<sup>①</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黑格尔的真假本体论)》,新维德和柏林1971年第11,127页。

<sup>②</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黑格尔的真假本体论)》第89页。

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①</sup>由此出发，卢卡奇断言，设定目的是从事劳动的前提，有目的的劳动是社会存在最重要的新范畴。劳动实践是人类形成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4. 与有目的劳动直接相联系，是重视意识的重要作用。在卢卡奇看来，在人通过劳动变成人的开始阶段，就有目的设定这一意识因素的积极参与。当石器时代的人想制造一把斧子的时候，他必定意识到了斧子的作用和可能形式等，还意识到了特定琢磨的工具等，这恰好就是从生物决定的存在范围向社会性存在范围的飞跃。因此，有目的设定的劳动就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起源。社会存在不同于和高出于无机物和有机物存在的特殊之处，就是意识活动在人们目的性选择决定中常常表现为他们自己积极性的源泉。这是社会存在的特有现象，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卢卡奇一直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但他又认为意识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某种第二性的、被动的条件。它和物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始终参与社会形成的过程，因而是人类劳动活动的特殊因素，是社会存在中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人的主动性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存在所制约。卢卡奇强调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伟大功绩之一可以概括为：思想是从作为特殊的生命存在物——人的形成中形成的，是从作为人的本质上新型类属性特征的特殊基础和结果——社会的形成中形成的<sup>①</sup>。

5. 不仅强调人的能动性，而且重视外部条件的制约作用。在论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时，卢卡奇特别重视马克思的下述思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却决不是在由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sup>②</sup> 卢卡奇由此指明自由和必然在本体论上的联系，拒绝传统哲学的二者择一的极端立场，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必然王国的经济完善是自由王国的前提，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乌托邦才能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克服。史前史的结束只能以真正的经济基础的形成为前提。<sup>③</sup>

卢卡奇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的积极作用在于，为了反对对存在作出的唯心主义的和机械教条的解释，他全面地阐明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既充分肯定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力图维护马克思的存在论和客观辩证法，又十分强调劳动在社会存在中以及意识在人类劳动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作出了深刻而有价值的探讨。

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sup>④</sup>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哲学总

① 参见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第30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7页。

③ 参见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第70、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

结，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的深入探讨和阐发。

## 七、对民主问题的探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卡奇就不赞同西方民主。因此，他在1918年底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在1919年积极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就不是偶然的了。1928年，他在受委托起草的匈牙利共产党党纲中正确地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他有远见地指出：德国人民在未来不仅必须同反动的普鲁士传统决裂，而且也必须同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决裂，德意志精神需要一个真正民主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民主问题成了人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卢卡奇写了一些重要文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然产物。他分析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各种表现，断言这种民主是为一小撮富有阶层（垄断资本家）服务的，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卢卡奇根据这种情况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并提出了“什么样的民主？”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根据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民主基础”所作的比较，断定“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使人民意志的直接表达与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发生脱节”，相反，“列宁设想中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却包含了不知多少民主的因素”。<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26—328页。

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不同，卢卡奇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就是从民主中产生出来的。而战后欧洲民主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问题，这种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人民民主意味着“有意识地、经常有机地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民主只有在民主中才能学到。所以，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政治应成为每个人一生中直接自身的事情。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是向着“使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生活愈来愈大的部分服从于群众的直接倡议、直接领导和直接监督这一方向进行的”。<sup>①</sup>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而且必然是和最发达的民主不可分割的<sup>②</sup>。“社会主义所以能够成为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成为民主最完善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它使人们在各个重要的方面——经济生活和劳动方面获得彻底的自由。在这里，一切剥削人的形式，无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被消灭了。”<sup>③</sup>

60年代后期，卢卡奇对民主问题又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和前景。他认为“民主”这个概念是大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今天的民主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民主。在今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民主设定为目标，那么关于民主的任何一种想法都是无意义的。卢卡奇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粗暴压制民主的作法，指责他削弱了具有群众性质

① 参见《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第330—331页。

② 同上书第363页。

③ 同上书第363—364页。

的、民主建立的权力机构，并使之形式化。但是，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卢卡奇同时也警告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把倒退到资产阶级民主看作是一种可能性，或者甚至看成是一种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若要企图重新建立在历史上已经过去的民主形式，就是开倒车和犯时代性的错误。”<sup>①</sup>他明确指出，许多人用一般民主，更确切地说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是不正确的。

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主的思想，卢卡奇主张采用和发展巴黎公社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几年中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用理论表达就是日常生活的民主。其基本方向是，民主自治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层次发展，直至全体人民对所有重大的公共问题作出决定<sup>②</sup>。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上下的直接联系和在实践中互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化包括生活的全部，从日常生活到经济生活以至政治决策机制。卢卡奇把消灭私有制、剥削和异化看作是社会主义民主同过去任何民主的特有区别，把消灭最后的也是最发达的非人性的形式（资本主义）和彻底解放人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历史使命。而发动人民群众对公众实践公开提出沉默的、隐秘的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个步骤。<sup>③</sup>同时，社会主义民主的职能也在于确立一种更高级形态的人的社会化，对人的活动、观念和习惯的整个趋向进行再教育。

苏共二十大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如何进一步提高

①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86年第291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279—280页。

③ 参见卢卡奇：《社会主义和民主化》，德国森德勒出版社1987年第104、111页。



生产水平以便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的问題。卢卡奇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来解决。新的经济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揽子问题。一个问题不解决，另一个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对经济问題决不能孤立地看。经济发展无疑一向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拱顶石，但经济和社会是不能分开的。社会主义需要有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本身决不会产生出社会主义。所以卢卡奇认为，赫鲁晓夫说苏联的生活水平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平时，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这是绝对错误的。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題。社会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不自发地生产出适合它的“经济人”的经济形态，这是一个过渡形态。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象典型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自发地生产和再生产出适合于它的人，所以社会主义民主的职能正是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适应社会主义。这种职能是前无先例的，资产阶级民主中根本没有与它类似的东西。因此，今天需要的就是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即每次无产阶级革命（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时产生的民主制度。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題，卢卡奇明确指出：“若不开始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新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实行起来。改革的这两大课题是直接相互依存的。”<sup>①</sup>他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们，只有在他们同时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并且当“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无产阶级民主重新确立的时候，他们才能赢得胜利”。卢卡奇还进一步谈到，在改革方面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以民主方式改

<sup>①</sup> 《卢卡奇自传》第287页。

组生产，因为优质生产和民主化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经济改革负有解决基本民主问题的任务，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由于卢卡奇所强调的不是抽象的或一般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他决不把民主同专政对立起来，而是辩证地从实质上看待这一问题，并坚定地认为，“全面地发展民主只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因此，他主张恢复列宁的同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并列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

卢卡奇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是党真正有积极性的唯一可能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内民主<sup>②</sup>。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提供对现存事物的批判，帮助促进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的改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出路。”<sup>③</sup>

×                      ×                      ×

卢卡奇是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开始自己生涯的，中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和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的过程，逐渐变成一位卓越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在自己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开拓性地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率先提出了许多有不同凡响的新观点。然而，他的深刻的思想有时也和一些错误的说法混

①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第485页。

② 参见卢卡奇：《社会主义和民主化》第114、116页。

③ 《卢卡奇自传》第48页。

杂在一起。因而，从20年代以来，卢卡奇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卢卡奇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一次最尖锐、最严厉的批判，在公众场合成了“一座修正主义的纪念碑”<sup>①</sup>。随着“左”的教条主义被纠正，对他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卢卡奇1971年逝世以后，虽然仍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革命民主主义者”，或者相反把它视为“斯大林主义者”，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尤其是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大多数人越来越认识到，尽管卢卡奇有过这样那样的值得研究的观点和明显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他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在东西方大多数学者中间赢得了普遍的肯定和尊敬。

南斯拉夫各派哲学家比较早地对卢卡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实践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普·弗兰尼茨基赞扬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范围内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和理论家”。<sup>②</sup>“辩证唯物主义”派的布·彼特洛维奇也认为，卢卡奇“在列宁逝世后，对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sup>③</sup>《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杂志的主编米·尼科里奇说：卢卡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sup>④</sup>

① 《卢卡奇自传》第194页。

② 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三联书店，1963年第362、364—365页。

③ 布·彼特洛维奇：《马克思主义》，载《现代哲学》1975年第64页。

④ 参见米·尼科里奇：《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75年第8—9页。

德国一位评论家写道：“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西方和东方引起如此热烈的肯定和否定。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知识界那么多与自己世纪同年龄的人中，影响象卢卡奇如此恒久的，为数确实不多。事实上，不论过去和现在他的影响都既深且广。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部分地在英国和美国，都讨论着卢卡奇的哲学和美学著作”。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以来，“卢卡奇无疑地一直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认识社会和历史的唯一正确方法’。他要在‘创始者的意义上’把它们加以发展、延续和深化。这一点也延伸到他的文学史和美学著作中。”<sup>①</sup>

英国评论家认为“卢卡奇在美学上的成就，对本世纪来说，是无人能与匹敌的”。美国学者E. 巴尔则称卢卡奇是“批判的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老资格的伟人’”。<sup>②</sup>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1971年发表的悼念文章称卢卡奇是“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赞扬他“对世界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sup>③</sup> 苏联哲学教授B. H. 别索诺夫和И. С. 纳尔斯基断言卢卡奇“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之一”。<sup>④</sup> 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Т. И. 奥伊则尔曼则说卢卡

① 参见《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中《马克思主义和文学——关于卢卡奇著作的批判性导言》一文，德国卢西特汉特出版社1963年。

②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第120页。

③ 《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71年第11期。

④ 见《作为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卢卡奇》载苏联《哲学问题》1985年第3期。

奇是匈牙利杰出的哲学家，“本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sup>①</sup>

波兰哲学家K. 奥霍斯基认为“在过去五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捷尔吉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人类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②</sup>

原民主德国哲学研究所所长 M. 布尔把卢卡奇看成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完美的道德是不容争议的；同样，他的思想的完美性也是不容争议的”。<sup>③</sup>

匈牙利1975年纪念卢卡奇诞辰90周年时正式肯定卢卡奇是匈牙利在国际上享有很大声誉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I. 赫尔曼认为卢卡奇是“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sup>④</sup>

1983年为纪念卢卡奇诞辰一百周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对卢卡奇作出了全面评价，其中写道：卢卡奇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毕生理论工作，为二十世纪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他特别注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遗产、辩证法、认识

① T. H. 奥伊则尔曼：《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者的卢卡奇·捷尔吉》，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85年第11期。

② K. 奥霍斯基：《关于卢卡奇的争论》，载波兰《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杂志1977年第3期。

③ M. 布尔1985年10月赠给我国学者的文章，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1期。

④ 见原民主德国《哲学家词典》中的“卢卡奇”条目，1982年德文版。

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史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在他毕生的事业中，艺术哲学以及美学理论和美学史占有突出的位置。”“发现艺术特性，创立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他在美学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他的艺术理论，为本世纪的欧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一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遗产，最深刻地体验了他那个时代世界历史的冲突和基本矛盾，毕生忠于共产党。”“他以自己的著作和思想，投身于争取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世界历史规模的斗争。他深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驳斥一切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

“卢卡奇自从成为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直至生命的终结，始终不渝地捍卫和继续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遗产，巩固和改革其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

“卢卡奇是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马列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他“不断同自己的失误进行斗争，为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本质而斗争。”<sup>①</sup>

---

<sup>①</sup> 《匈牙利纪念卢卡奇·捷尔吉诞辰一百周年提纲》，原载匈牙利《社会评论》月刊1983年第8、9期。

## 参 考 书 目

1. Georg Lukács Werke, Frühschriften, II.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1977.
2. Hermann István: Georg Lukács . Sein Leben und Wirken. Wien. Köln . Graz 1986.
3. Georg Lukács: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81.
4. Georg Lukács: Seele und Formen. Neuwied und Berlin. 1971.
5. Georg Lukác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71.
6. Georg Lukács: Taktik und Ethik. Politische Aufsätze 1. 1918-1920.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75.
7. Georg Lukács: Prolegomena.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84.
8.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9.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0.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1.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2.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

- 
13.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 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
  15. 卢卡奇：《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6.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





# 葛兰西

田时纲 撰

## 篇 目

一、葛兰西伟大革命家的一生 .....	117
(一) 艰难困苦的学生时代 .....	117
(二) 从新闻战士到社会党左派 .....	123
(三) 从意共创始人到意共总书记 .....	128
(四) 囚徒——人——理论家 .....	132
二、葛兰西的哲学思想 .....	137
(一) 《反克罗齐论》 .....	138
(二) 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异议 .....	143
(三) 实践哲学 .....	152
(四) 约·狄慈根式的失误 .....	163
三、葛兰西的政治思想 .....	167
(一) 领导权理论 .....	167
(二) 论知识分子 .....	174
(三) 论社会主义民主 .....	180
四、结束语 .....	183
参考书目 .....	186



葛兰百 (1891年—1937年)



---

---

# 葛 兰 西

田 时 纲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20世纪最富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 一、葛兰西伟大革命家的一生

### （一）艰难困苦的学生时代

1891年1月22日，安东尼奥·葛兰西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阿莱斯镇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葛兰西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在当地房产登记处当职员，其微薄工资勉强维持9口之家的生活。在葛兰西6岁时，他因卷入当地竞选的党派之争，遭获胜的敌对派的报复。先是停职审查，次年被捕，1900年10月，在侵吞公款的罪名下，被判处5年8个月监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葛兰西一家陷入屈辱和贫困之中，葛兰西倔强的母亲马恰斯带着7个未成年

的孩子搬到娘家吉拉扎村。她决心一人顶住这可怕的风暴。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替人缝纫、干零活，养活7个孩子，也不愿乞求施舍，遭人白眼。母亲不向命运低头、不屈不挠的精神给葛兰西以深刻影响。葛兰西后来赞誉自己的母亲，

“她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她的一生向我们表明：用顽强的精神去克服那些看起来连意志坚强的男人也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多么重要”。

葛兰西自幼还受着疾病的折磨，4岁时因摔落在地治疗不及时，逐渐长成驼背，并经常出血、抽风，多次死里逃生。他为此深感痛苦。为了克服生理缺陷，增强体质，他和哥哥一起动手凿磨石头，做成圆球，插上木棒，练习举重。

葛兰西从小勤奋好学并勇于实践。没钱买书，他就借书和抄书来读。哪怕是一张印有字的纸片，一到手，也要如饥似渴地阅读。夜晚，他常常扒在大木箱上，在用残蜡制成的细蜡的微弱烛光下，为其姐妹朗诵《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逊漂流记》等名著的精彩片段。

葛兰西还自制玩具——小船、手推车。有一次，他用纸板制的双层甲板船极为精致，以致村里船工把它借去仿制铁皮真船。家里没有卫生设备，他就独立设计并制做了结构奇特的淋浴装置。

1903年，葛兰西以优异成绩获小学毕业证书，但家庭已无力支持他继续上学。为了分担母亲的重负，他不得不辍学做工。他，11岁的小小年纪，畸形低矮的身躯，却要在地产登记处整天搬运超过自己体重的注册簿。他每天干10小时的重活，连星期天上午也不休息，常常累得周身疼痛，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少年的葛兰西亲身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

他后来写道：“我的造反本能从儿童时代就是针对富人的：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

葛兰西在两年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自学了拉丁文。

1905年底，在其父被释放后，15岁的葛兰西到离家18公里的圣·卢苏朱中学上学。学校设备十分简陋，师资少且水平底，这使他未能弥补辍学两年造成的损失。家里寄给他的少量的零用钱不够花，他不得不卖掉奶酪、橄榄油和面食，再用所得的钱买书和报纸。每逢节假日，母亲看到矮小瘦弱的葛兰西，总责怪他不知爱惜身体。一回到家，葛兰西马上阅读哥哥杰纳罗从都灵寄来的红色报刊，为此常常受到父亲的申斥。

1908年底，初中毕业的葛兰西来到撒丁首府卡利阿里的德托利文科高中学习。一年级上学期他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并不气馁，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下抓紧复习，并补习初中的课程。到下学期各科成绩明显提高。

高二下学期，一位名叫加齐亚的年轻老师给葛兰西上意大利文学课。由于葛兰西作文条理清楚，文笔流畅，常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很快他就成了加齐亚最器重的学生。此时，读书成了葛兰西最大的乐趣，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他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此外，还读了不少撒丁文学作品，如黛莱达<sup>①</sup>的小说，但他并不喜

---

<sup>①</sup> 黛莱达（1875—1936），意大利女作家，192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大部分作品以撒丁岛为背景。



欢。他批评撒丁作家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指出，撒丁岛不仅有森林、牧场，孤独的老母亲，还有为外国资本家干活的矿工，他们用奴隶般的劳动换来的不是学校和疗养院，而是棍棒和子弹。

这个时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和萨韦米尼的文章很感兴趣。在他住址变更时，所订杂志改寄吉拉扎村，让其妹泰雷西娜务必将他们两人的文章剪下，放在纸夹里，留待回家时再读。

为了照顾远离家乡的葛兰西，其兄杰纳罗调到卡利阿里工作。葛兰西常随哥哥会见撒丁岛社会党领导人。1911年1月，杰纳罗当选为劳动协会执委会委员和司库，警察为此到吉拉扎村进行调查，这使他们的父母惶恐不安。葛兰西知此情况后，立即给双亲写信：“你们不要为警察调查一个人而担惊受怕……纳纳罗<sup>①</sup>担任了劳动协会的职务。警察注意到这个以前默默无闻的人的名字，想知道这个革命者，这个冒出来的警察的新对头究竟是谁，因此进行了调查……下次当你们再听到这类事时，请你们放心好了，还要当面嘲笑中尉和那些大胡子宪兵们。”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葛兰西为自己有一个使反动当局不得安宁的哥哥感到自豪。如果说，童年时代的葛兰西通过身受的贫困与屈辱，产生朦胧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中学时代的葛兰西目睹了撒丁悲惨的社会现实，开始思考撒丁贫困的社会根源；撒丁工农群众的革命壮举，对马克思著作和社会主义读物的学习，更使他坚定了民主主义的立场。

---

<sup>①</sup> 杰纳罗的爱称。

高中二年级时，葛兰西不满20岁，他在一篇题名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作文中，满怀对中华民族的深切同情，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他写道：“有一天，传来种种说法：义和团屠杀了欧洲的传教士。于是惊恐的古老欧洲诅咒野蛮人和不文明人，并宣布对这些不幸的人民进行新的十字军远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文明，而是为扩大贸易；英国人由于中国人不愿接受他们的鸦片，炮轰了无数中国城市。这根本不是文明！俄国人和日本人为了争夺朝鲜和满洲的贸易权互相残杀。”<sup>①</sup>

葛兰西接着揭露帝国主义者宣扬的爱国主义的虚伪性与反动性：“欧洲人民也曾有过他们的压迫者并经过浴血奋战才获得自由。而现在为他们的解放者、英雄们竖起了雕像和纪念碑，把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崇拜升华为民族宗教。”<sup>②</sup>

文章的结尾表达了葛兰西对社会革命的渴望：“法国革命推翻了许多特权，唤起了许多被压迫者；但它只是使一个统治阶级代替了另一个统治阶级。然而，它留下了伟大教益：特权与社会差别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此是能够被消灭的。为了消灭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正义，人类需要另一次血的洗礼。”<sup>③</sup>

1911年9月，葛兰西高中毕业，同年11月又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获都灵大学奖学金，在文学系注册，学习语言学、文学和哲学。在都灵，靠每月70里拉的奖学金根本不能生

---

<sup>①②</sup> 葛兰西，《2000页著作集》第2卷，试金者出版社米兰1971年版第13、15页。

<sup>③</sup> 《2000页著作集》第2卷第15页。

活，他不得不课余做工挣钱，但仍免不了挨饿。他因无钱买大衣，不得不穿着单薄的秋装渡过严冬。葛兰西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时常病魔缠身，头疼欲裂，甚至几个月不能正常说话。但意志坚强的葛兰西在贫病交加之中，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成了教授器重的高才生。

语言学教授巴托利对这个不修边幅、衣服破旧的撒丁穷学生抱有厚望，学生也崇敬教授。葛兰西不仅佩服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精深的造诣，还欣赏他把语言学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以后当葛兰西为了社会主义运动不得不放弃语言学研究时，对给老师带来的痛苦深感内疚。

在都灵大学的第四学年，葛兰西开始集中学习帕斯托雷教授的理论哲学课。帕斯托雷认为，马克思主义发现“在社会内部孕育着从正题到反题这一进展阶段的物质条件”，从而超越了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尽管当时葛兰西主要还是个克罗齐主义者，但上述解释对他产生了影响，开始摆脱克罗齐主义。

在都灵大学，葛兰西结识了同样来自撒丁的陶里亚蒂，两人经常在一起热烈讨论社会与哲学问题，成了亲密的朋友。

1913年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使葛兰西实现了从撒丁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化过程。

1913年3月19日，都灵6500多名汽车工人抗议大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场斗争坚持数月，取得最后胜利。葛兰西在和罢工工人的接触中，感到与工人阶级的距离缩小了，工人的理想、信心、激情和果敢精神感染了他，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后来他在

总结当时的思想收获时写道：只有了解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著作的革命意义。

同年夏天撒丁举行的普选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使葛兰西认识到撒丁的富人和穷人不是战友而是敌人，不仅北方的剥削阶级，而且南方、包括撒丁在内的反动集团应对撒丁的悲剧负责。

1913年11月，葛兰西从撒丁回到都灵不久，就与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接触，并参加了社会党。之后负责组织工人互助会，并为社会党地方报纸撰稿。1914年6月9日，都灵工人大示威，葛兰西坚决支持并积极参加。斗争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史称“红色星期”。

1915年4月12日，葛兰西通过了大学最后一门考试——意大利文学。在1915年底1916年初，葛兰西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专业，离开了大学，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 （二）从新闻战士到社会党左派

从1916年起，葛兰西经常为《人民呼声报》和《前进报》都灵版撰写随笔、新闻和时事评论。由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章一般不署名，至多只署上他姓名的缩写“A·G”。1916—1918年间他为《前进报》都灵新闻专栏《防波堤下》写的300多篇短文，以敏锐的洞察力，生动辛辣的文笔，一改过去该报枯燥说教的文风。

1916年2月5日，他针对都灵公立小学三年级的讨论题——“罢工者应受到正直者的谴责和鄙视”，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险恶用心——“一切人都应安于现状”，“良民的

责任就是像鹅一样任人宰割，但不要出声”。<sup>①</sup>

1916年2月17日，葛兰西就都灵商业银行小职员西尔沃拉贪污4万里拉一案，撰写了《替小偷辩护》的讽刺短文，剖析造成这一“罪行”的社会根源：“人的首要责任是正直，这很自然！但当两手空空，钱包罢工，肌肠辘辘，而大捆大捆的钞票在眼前经过时，只有英雄才能始终保证正直。”<sup>②</sup>接着，他指出，一个银行小职员每月只有90里拉的薪水，要吃饭穿衣，付房租和准备结婚物品，而这少于5千里拉就办不成，那又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呢？文章以“绝妙的资产阶级世界！”结尾，批判锋芒直指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剑与火的年代，年轻的葛兰西成了社会党新闻战线的一名英勇善战的主将。他目标明确，独立思考，从不屈从于黑暗势力。他说：“我是个非常自由的记者，观点鲜明彻底，从未为了讨好老板及其帮凶而掩饰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对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但从不计较报酬，《前进报》每月只付给他50里拉工资，他从无怨言。

葛兰西从来就重视文化活动对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1916年1月29日《人民呼声》刊载了他的《社会主义与文化》，该文指出：“文化……是自我内在的组织、教育，是自己个性的确立，是高度觉悟的形成，正是由于这种觉悟，人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价值、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但所有这一切不是靠自发进化产生的，不是

<sup>①</sup> 葛兰西：《狱波堤下》，艾伊纳乌迪出版社都灵1975年版第3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1页。

代替决定论，葛兰西写了一篇《批判的批判》。他指出，社会主义“新一代想要回复到马克思的纯正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与现实、生产工具与意志，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历史活动中相互统一的……他们认为战争<sup>①</sup>并没有摧毁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改变了正常历史环境的条件。因此，人们的社会、集体意志具有通常所没有的重要性。这些新的条件本身也是经济事实，它们使生产体系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必然要适应这些经济事实，在俄国必然要导致专政。”<sup>②</sup>

如果将上述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即可看出，葛兰西并不是脱离社会存在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谈社会意识的重要性的，而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环境的巨大变化，强调发挥革命主体能动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确信庸俗决定论不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学说，而是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坐等良机”的“惰性学说”。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脱离现实存在的个体、人们的意志和社会活动的自然规律，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自发地起作用，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并决心改变世界，在革命实践中应用并发展历史唯物论时，社会规律才起作用。以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又深化了这一思想。

从1918年起，葛兰西随着对《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列宁著作的学习，随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深入研究，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种摆脱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集团的影

<sup>①</sup>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sup>②</sup> 《青年时期著作集》第155页。

路线持有异议被开除出党时，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时常利用放风时间对难友们进行政治教育。为了让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同志觉醒，他提出了简明、深刻的口号：“托洛茨基是法西斯的娼妓”。他反对大多数共产党难友的宗派主义立场，与狱中唯一的社会党人佩尔蒂尼<sup>①</sup>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葛兰西向佩尔蒂尼表示，不赞成把社会党人看作社会主义的叛徒。葛兰西在复活节请他一起品尝家乡寄来的烤小猪。当佩尔蒂尼离开杜里监狱时，葛兰西送他一本书留念，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这一切引起共产党人的反感，他们没有理解葛兰西细腻的心灵和博大的胸怀，他们向党中央报告说葛兰西已经脱党，他为此感到很痛苦。

除了受到战友们的中伤和诽谤外，葛兰西与妻子朱利娅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罪恶的法西斯剥夺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权利，从被捕起他们再没有见面，长期的分居，朱利娅的患病，使他们之间产生误解。但葛兰西对她的爱始终如一，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谅解对方。为给妻子准备圣诞节礼物，他用了整整一个月制木质裁纸刀。

像野草一样朴实的葛兰西，“热衷于追求相互关系中的坦率和诚实”。他反对妻子将他被捕入狱的事实向孩子隐瞒，认为这有损于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无益于他们的成长。

葛兰西的幼子远在异国苏联，他只能通过照片看着孩子们成长，通过书信与他们促膝谈心。他收到大儿子德里奥寄的小鸚鵡羽毛和小花，是那么欣喜欢乐！他又是那么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自己艰辛而难忘的童年：撒丁岛奇异的蜥

<sup>①</sup> 佩尔蒂尼（1896— ），意大利社会党人，反法西斯战士，意大利共和国前总统。

蜴，月夜偷苹果的刺猬，用带洞的砖在海里捉鱼的小伙子，他幼年亲密无间的伙伴——小狗……

葛兰西比自由人更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他写信让亲人寄给他一些花卉种子，种在狱中一块4平方米的土地上，看它们生根、开花……

受伤的麻雀飞到他的窗前，他小心翼翼地替它包扎，精心护理，使其痊愈。康复的麻雀在他手上跳来跳去，啄食面包屑，和他开玩笑，成了他的狱中伙伴。

在狱中，葛兰西从未以领袖自居而高高在上。他积极参加难友们成立的公共食堂的帮厨工作，怀着愉快而“好奇”的心情削土豆，择生菜，做扁豆汤，当跑堂，乐于干“大人物”不屑一顾的日常小事，表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

葛兰西还把监狱当作课堂。在乌斯蒂卡岛，他领导组织了政治犯文化补习学校，并亲自教授历史和地理，他自己同时参加德语班学习。后来，他的德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将《格林童话》中的不少故事译成意大利文。为了阅读列宁的原著，早在莫斯科就学会俄语的葛兰西，在狱中能用俄语流利地背诵普希金的《村姑小姐》。一向酷爱文学的葛兰西还阅读了大量的托尔斯泰、契诃夫、杰克·伦敦等作家的名著。

葛兰西没有忘记敌审判长气急败坏的狂吼：“我们要使这个头脑20年不能工作！”1929年2月，当条件刚刚允许他工作时，他立即拟定了理论研究计划，向亲友索要所需的书刊资料。他要总结十几年的斗争经验与教训，作些带有“永恒性”的工作，探寻马克思主义的革新之路，使敌人的妄想彻底破产。

敌人的残酷迫害，狱中阴暗潮湿的环境，发霉变质的食



物，使得葛兰西本来就很虚弱的体质更加恶化；有时彻夜不眠，有时大口吐血，有时高烧不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为了达到“慢性杀害”的目的，又不给他以应有的治疗。不仅如此，敌人还阴谋利用葛兰西的病痛诱其变节；说什么只要向墨索里尼递交请求宽恕的申请书，就可获释。葛兰西的回答是：“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但坚贞不屈的葛兰西从不作无谓的牺牲，无损于革命气节又有权要求的条件他从不放弃。他申请订书订报，拥有笔、纸、墨水和单人牢房，从而在物质上保证了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

象刀剑一样坚韧的葛兰西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从1929年至1935年写就了一部《狱中札记》。这部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狱中札记》共计33本，长达2848页，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这是他自己建造的非人工所为的纪念碑。

1937年4月27日，身受法西斯残酷迫害的葛兰西脑溢血发作，在罗马奎济萨纳医院逝世，时年46岁。

葛兰西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爱戴，还受到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士（甚至其论敌克罗齐）的赞扬。这不仅由于他英雄的业绩，还由于他伟大的人格与崇高的品德。

在葛兰西逝世后十年——1947年，《狱中书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这部书包括葛兰西从狱中寄给家人（妻子、儿子、母亲、姐妹、哥哥、妻姐塔吉亚娜）和朋友的218封书信。<sup>①</sup>此书以其朴实无华的文风、真挚热烈的感情、深邃

<sup>①</sup> 1965年艾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新版《狱中书简》，包括428封书信。1986年联合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新书简》，包括6封从未发表过的书信。

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著名文艺批评家克罗齐赞誉它是意大利现代文学的杰作，当年荣获“维阿雷焦”文学奖。

同年，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开始分6卷陆续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文学与民族生活》、《民族复兴运动》和《过去与现在》，立即在意大利引起强烈反响。

从1954年开始，葛兰西的早期著作——《青年时期著作集》（1914—1918）、《防波堤下》（1916—1920）、《新秩序》（1919—1920）、《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1921—1922）和《共产党的建设》（1923—1926）也编辑出版。

60年代，随着葛兰西理论著作的广泛介绍，他作为思想家的形象才得到公认。70年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研究葛兰西的热潮。今天，葛兰西的思想遗产越来越受到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 二、葛兰西的哲学思想

葛兰西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狱中札记》第1卷——《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中。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一、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绪论；二、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三、对《社会学通俗手册》<sup>①</sup>企图

---

<sup>①</sup> 即布哈林1921年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学通俗教材》，葛兰西在狱中读的是1927年的法译本。

的批判札记；四、贝内德托·克罗齐<sup>①</sup>的哲学；五、经济学札记。这里，尤以中间三部分更为重要，大体概括了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倾向与特征，表明其哲学思想真正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 （一）《反克罗齐论》

19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sup>②</sup>的努力，历史唯物主义在意大利得到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大利的影响。但是，贝内德托·克罗齐在本世纪头十年形成的“精神哲学”仍然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克罗齐起着某种“精神教皇”的作用。为了确立无产阶级在思想阵地上的领导权，葛兰西认识到彻底清算唯心主义的现代形式——克罗齐主义的必要性。他决心效仿恩格斯写一部《反克罗齐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抓住克罗齐的历史唯心论这个要害进行分析批判，并对历史唯物论有新的阐发。

在克罗齐庞杂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历史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他本人后来把“精神哲学”改称“绝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学的方法论”。在他看来，一切实在皆历史，一切历史皆实在。但他所说的实在只是精神，即是说一切实在都是精神，历史是精神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总是“普遍的”、即概念的历史：“没有一个事件，包括人们通常所说

---

<sup>①</sup>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现代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文艺批评家。

<sup>②</sup>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2—1904），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过贡献。主要著作有《纪念〈共产党宣言〉》等。

的小事件，不能作为普遍的事件来考察、实现和区分。在最简单的形式中……历史是通过判断，通过个别与一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来表现的”。<sup>①</sup>这样作为历史判断特点的东西——用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给个别历史事件下定义，也就成了历史本身的特点，历史等同于历史判断。克罗齐还强调历史的主词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也不是法国、德国，而是文化、自由、进步等抽象概念。这实际上等于用抽象的“水果”概念代替了苹果、梨、桃等具体的水果。

葛兰西指出，为了把握实际的历史进程，需要确定一定的概念，但历史运动与反映它的概念应历史地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替了具体历史事件，就用观念否定了实际历史。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sup>②</sup>

接着，葛兰西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揭露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思辨性。他指出，克罗齐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机械地、随意地实体化，从而脱离了它的经济基础。克罗齐使上层建筑独立存在，用上层建筑的历史代替了实际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这样，在这个思辨的历史观中，出现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观念，精神成了现代上帝的代称。他一针见血地说：“实践哲学<sup>③</sup>是实在的历史观，没有任何超验

<sup>①</sup>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拉泰尔札出版社1917年版第49页。

<sup>②</sup>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联合出版社，罗马，1977年版第287页。

<sup>③</sup> 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神学的残余……而克罗齐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义还停滞在神学——思辨的阶段”，“它不仅存有超验和神学的残余，而且就是刚刚摆脱最粗陋外观的彻头彻尾的超验和神学”。<sup>①</sup>最终说来，这样的历史，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甚至就是克罗齐本人的思想发展史。葛兰西讽刺克罗齐就象拉·封丹笔下那个自命不凡的苍蝇，以为他的“绝对历史主义”的高论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

葛兰西进而坚决抨击了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范畴的攻击。克罗齐污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是“隐匿的上帝”，是新的形而上学——用经济解释一切。葛兰西尖锐指出，如果思辨地理解“经济”范畴，那克罗齐还有道理，事实恰恰相反，不能思辨地理解它，而应历史地考察它，结构<sup>②</sup>作为现实的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关系的整体，作为客观条件的整体，可以并应该用语言学的而不是思辨的方法来研究”。<sup>③</sup>葛兰西认为，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历史过程，而不是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的、僵死的东西。

克罗齐还污蔑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神学二元论。对此，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经济结构脱离上层建筑，相反，是从它们内在的联系，必然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它们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忽视和排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践哲学并不排除伦理—政治的历史，它批判只把历史归结为伦理—政治历史的做法，认为

① 《狱中札记》第1卷第238页。

② 指经济结构。

③ 《狱中札记》第237页。

这是不合法和随意的。”<sup>①</sup>

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批判可以见出：有的西方学者说葛兰西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优先地位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早在1918年他就认识到，理想、精神的“本质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在生产与交换的制度及关系中”，“理想得以实现，并不因为它逻辑地与纯粹真理、纯粹的人道相一致，而是由于它在经济现实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及成功的工具”。<sup>②</sup>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他反对对此作庸俗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是在庸俗决定论泛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最后，葛兰西还把克罗齐与黑格尔作了比较，颇有见地地认为克罗齐是对黑格尔的反动。他指出：黑格尔那里是矛盾的辩证法——“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sup>③</sup>历史是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是绝对观念在其矛盾推动下的发展。而在克罗齐那里，矛盾的辩证法成了差异的辩证法，他抱怨黑格尔“把对立扩展到精神与实在的形式，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无限性——循环，而产生假的、恶无限性——无限的发展”，<sup>④</sup>从而把对立辩证法改造成差异辩证法。结果，精神按不同的环节——艺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即“美”、“真”、“益”、“善”四个概念发展着；它们不能单独存在，只能在整体中得到活力；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对立；没有一种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扬弃，只存

① 《狱中札记》第1卷第235页。

② 《青年时期著作集》第219页。

③ 《狱中札记》第1卷第244页。

④ 克罗齐：《作为纯概念科学的逻辑学》，拉泰尔札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在循环运动。这样，克罗齐就阉割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部分——矛盾辩证法。社会矛盾得以表述的方式（虽然是在观念辩证法中曲折地不自觉地表述的）也就不复存在了。葛兰西写道：“克罗齐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就是所谓差异辩证法。实际需要区分对立与差异……因为只有对立才有辩证法。还有待考察从黑格尔向克罗齐、金蒂莱<sup>①</sup>的运动是不是后退，反动的‘改革’。难道他们不是阉割了黑格尔哲学中最实在论的、最历史主义的部分？”<sup>②</sup>

难能可贵的是，没有机会读到列宁《哲学笔记》<sup>③</sup>的葛兰西，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上独立地得出与列宁相近的结论。正是由于辩证法构成《逻辑学》的最高成就和实质，列宁才赞誉“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事实！”<sup>④</sup>

葛兰西还联系法国革命做出具体分析：黑格尔用思辨的方式在其哲学中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他所进行的战争。而克罗齐的《欧洲史》从1815年维也纳和会写起，对法国革命只字不提，这样就肢解了历史，使历史失去实际内容。因此，主要的是应把克罗齐的历史主义再颠倒过来，使它站立起来，用脚而不是用头走路。

在批判克罗齐唯心史观的同时，葛兰西高度评价克罗齐哲学反对一切宿命论，重新估价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

---

① 金蒂莱（1875—1944），意大利现代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曾任教育部长，后被游击队处死。

② 《狱中札记》第1卷，第298页。

③ 最早于1929年在苏联发行，当时葛兰西已在狱中，且法西斯当局禁止他读列宁的著作。

④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3页。

用，甚至认为“现在，必须象实践哲学的首批理论家<sup>①</sup>对黑格尔思想所进行的那种去伪存真的工作一样，对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也要进行同样的去伪存真。这是历史上唯一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实践哲学得到应有的恢复，并能把它（由于‘通俗化’和直接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恢复生机）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从而解决当前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最复杂的任务，即创造一种完整的新文化”。<sup>②</sup>

葛兰西这番话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讲的。从伯恩施坦的经济唯物主义到布哈林的机械论，从屠拉梯的庸俗决定论到波尔迪加的教条主义，使葛兰西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严重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此，葛兰西主张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不只是反对思辨哲学的论战，而且也要有反对实证论、机械论以及实践哲学的被歪曲了的形式的论战”。<sup>③</sup>可以说，对机械论、形而上学、庸俗决定论的批判构成其哲学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 （二）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异议

1933—1934年，葛兰西认真研读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撰写了批判性的笔记和评论。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② 《狱中札记》第1卷第245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于1921年在苏俄出版，第2年德译本问世，1925、1927年法文版和英文版相继发行。这部书作为第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拥有广泛读者。它在20年代曾被视为权威性的理论著作。无疑，它在当时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过一定作用，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处理，它的机械论、平衡论的基本倾向，不仅影响了包括波尔迪加在内的犯有“左派幼稚病”的人们，也影响了批判其理论观点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失误同这本书不无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葛兰西对布哈林的批判，也就是对斯大林和苏联哲学教条主义痼疾的批判。

首先，葛兰西敏锐地看到布哈林的教科书的缺陷。他写道：“当一种理论还处在讨论、论战和形成阶段，难道能够撰写关于它的入门书、手册和通俗教材吗？”<sup>①</sup>“如果某一确定理论还没有达到其发展的‘经典’阶段，任何使它‘教材化’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它的逻辑体系只是表面的和虚假的，正象‘通俗教材’那样，主要是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机械排列，尽管它们为着成书的需要有个统一的框架，但它们之间没有内在联系。”<sup>②</sup>应该说这不仅切中布哈林的教科书的一些毛病，也是对从30年代到60年代苏联哲学界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病的准确诊断。但葛兰西在指出布哈林教科书的弊病时，全盘否定用教科书的形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是不可取的。

葛兰西不同意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64—165页。

<sup>②</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65页。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独立的、相互封闭的概念体系加以叙述。他指出：“在通俗手册”中缺乏对辩证法的论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实践哲学分为两部分：即政治历史理论——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即根据自然科学（实证论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方法构建的理论和本义上的哲学，即哲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庸俗）唯物主义，在批判机械论的大讨论之后，“通俗手册”的作者似乎对哲学问题的提法没有多大改变。他在伦敦召开的科学史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继续坚持说实践哲学一分为二：历史—政治理论和哲学，不过他不再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老字眼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称呼它了。”<sup>①</sup>“本书及其作者全部错误的根源正是在于企图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学’，一是系统哲学。离开政治历史理论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sup>②</sup>。”<sup>③</sup>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布哈林被处决的同一年——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却沿用了布哈林的体系安排。斯大林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sup>④</sup>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65—166页。

② 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67页。

④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7年，上卷，第177页。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被提到首位，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仅是它的派生物，是低一层次的理论。

同布哈林、斯大林的观点相反，葛兰西认为，“以实践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恰恰是哲学的具体历史化及哲学与历史的同一。”<sup>①</sup>在他看来，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里，才能消除任何机械论和一切迷信‘奇迹’的痕迹”。<sup>②</sup>由此可见，葛兰西着重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紧密结合，是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把握的。

同把辩证法仅看作方法论的浮浅看法（布哈林和斯大林）相反，葛兰西认为“辩证法是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哲学”。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辩证法与哲学革命的联系，他写道：“只有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一种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它开创了历史和世界思想发展史的新阶段，它超越（超越的同时汲取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旧社会的传统表达方式——才能充分地、从根本上认识辩证法的作用与意义。”<sup>③</sup>，相反，布哈林把辩证法与政治历史理论分开，“这样提出问题，就再不会认识辩证法的重要性与意义，就把认识论和历史学及政治学的精髓贬低为形式逻辑的一个分支和一种入门的经院哲学”。<sup>④</sup>葛兰西认为，在辩证法即认识论中，“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一般概念融为有机整体”，<sup>⑤</sup>因此，它不能作为方法论而同运用它对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3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32页。

④ 同上书第128页。

⑤ 同上书第129页。

历史、经济及政治问题的解释分开。

葛兰西不能容忍把辩证法作为某种形式逻辑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截然分开。他指出朗格<sup>①</sup>的《唯物主义史》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庸俗唯物主义解释的根源，正是这本书把辩证法“仅看作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将它本身看作一种逻辑学，一种认识论”。<sup>②</sup>葛兰西反复强调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这种看法与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完全一致。

布哈林同朗格、普列诺夫一样，没有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此，他对反映论的理解还停留在费尔巴哈直觉唯物主义水平上。布哈林写道，“没有物质，精神就不可能存在，而没有精神，物质却可以满不在乎地存在着，“精神，是具有特殊组织的物质的特性”，“假如人们有办法按照原样重新把那些物质的元件拼凑好、安装好，就好比说象把一个拆散的钟表重新装配起来一样重新装配一个人，这时意识就可以马上恢复；就跟钟表修好了就马上滴嗒地走起来一样，人的机体一复原就可以开始思想”。<sup>③</sup>这里，可以看出，布哈林完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意识，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意义，不了解认识过程中主体能动性的作用。

葛兰西注意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意识和认识过程，坚决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仅把意识看

---

① 朗格（F·A·Lange, 1828—187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

②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51页。

③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54页。

作是对物质的机械反映的形而上学观点。

首先，他反对把那种“开天辟地”时的原始自然界看作认识的对象。他认为，实践不仅是人们认识的手段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而且它为自己“创造”认识对象，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认识主体。从现实的认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看，都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受着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葛兰西写道：“在科学中探索在人之外的实在性，从宗教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理解，只能是某种诗论。如果没有人，宇宙的实在性意味着什么？一切科学都和人的需要、活动和活动相联系。没有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的活动，‘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是混沌，即虚无。因为，实际上，如果设想人不存在，也就不能设想语言和思想的存在。对实践哲学来说，存在不能脱离思维，人不能脱离自然，活动不能脱离物质，主观不能脱离客观。假如发生这种脱离，就会坠入形形色色的宗教形式之一或毫无意义的抽象”；<sup>①</sup>只有当实在与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认识实在。由于人是历史过程，因此认识和实在也是过程，客观性也是过程”。<sup>②</sup>

接着，葛兰西以“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说明它们是对实际空间关系的反映，但又是历史范畴。他写道：“为了确切理解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可能具有的意义，有必要看一下‘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的例子。它们从来就是‘客观地存在的’，虽然分析时只呈现为约定俗成的、即历

---

<sup>①</sup>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66页。其中“存在不能脱离思维”一句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作者是从认识的主、客体的联系来讲的。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7页。

史—文化结构。”<sup>①</sup>他不同意罗素的如下说法：“地球上没有人存在，不能想到伦敦和爱丁堡的存在，但可以想到空间里两点的存在——它们就是今天的伦敦和爱丁堡。”<sup>②</sup>葛兰西认为，没有人存在，就不能想到只是由于有人才存在的任何事物与关系，“如果没有人，北—南、东—西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实际的关系，但没有人和文明的发展，它们就不会存在。很明显，东和西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即历史范畴，因为离开了实际的历史，地球上任何一点同时是东又是西”。<sup>③</sup>正是由于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领导权，才能使这些概念被普遍接受——”。日本是远东国家，这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对加里福尼亚的美国人 and 日本人自己也是如此。日本人根据英国政治文化可以称埃及为近东。这样，通过不断注入地理名词的历史内容，‘东方’、‘西方’最终揭示不同文明整体间的确定关系。意大利人提及摩洛哥时，通常把它称作‘东方’国家，正是归诸于它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化。但这些概念又是真实的，它们与真正的事实一致，它们使人们能够通过陆地和海洋旅行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使人们预见未来，使实在客体化，使人们理解外部世界的客观性。”<sup>④</sup>

其次，葛兰西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将主体选择、需要、价值、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丰富更完整。

葛兰西指出，人们只是认识自己——人们的需要与利益，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180页。

③④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181页。

如果超越这些而去思考实在的东西，就是“物自体的”、“不可知的”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认识。他写道：“什么是现象？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还是人依靠实践和科学利益而区分的质，即根据探索世界秩序及对事物分类的必要性而区分的质（这种必要性总与间接的和未来的实践利益相联系）。”<sup>①</sup>

就上述论断的实质来看，这是对20、30年代盛行的被动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的根本纠正。要知道自然现象并不是自动闯入人们的感官的。人只是在变革自然时，才与其发生联系，而实践又与人的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人们为了生存，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为了居安避险，就要首先区分出与实践有关的，对人有用的东西。人们以同动物完全不同的方式，仅仅把握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是一种干预，一种选择；现象是根据实践目的由主体翻译的客观实在。这就是葛兰西上述论断的真正含义。诚然，他在表述时某些概念把握不准，给人以“矫枉过正”的印象。某些西方学者，譬如科来蒂<sup>②</sup>甚至认为葛兰西象卢卡奇一样反对列宁的反映论。但我们只要联系葛兰西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来考察，就会得出他是用选择论丰富和完善反映论的结论。

意大利的卡米思教授，在1931年11月出版的《新文集》上，表示完全赞同“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说什么这再次提出了宇宙的主观存在的问题，

<sup>①</sup>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181页。

<sup>②</sup> 科来蒂（L·Coletti，1924—），意大利现代哲学家，罗马大学理论哲学教授。

很发人深省。

葛兰西对这种否定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马赫主义观点，给予了深刻批判。他反问道：“难道显微镜下被观察的物质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成了人们精神的产物？”<sup>①</sup>他进而剖析上述谬论的信仰主义本质；如果说“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很发人深省”的话，卡米恩教授首先应思考这个问题：“就象今天人们设想的那样，科学不再存在了，而是成了某种对他们个人判断的信仰活动”，“如果微观现象真的不能视为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被观察’，而是‘被创造’，而且坠入个人纯幻觉的王国之中。还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人是否可以‘两次’创造（观察）同一现象。这已不再是‘唯我主义’，而纯粹是造物说和巫术。不是现象（它不存在），而是这些幻觉成了科学的对象”。<sup>②</sup>

实际上，葛兰西主张一种选择—反映论。无庸讳言，列宁在1907年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新康德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经验批判主义等唯心主义倾向，着重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还应注意，列宁将此书副题定为“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称自己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对我们理解这部杰作的某些局限性会有所帮助。但我们不能同意西方学者全盘否定此书的观点。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

<sup>①</sup>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卷第60页。

<sup>②</sup> 网上书第62—63页。



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提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观念的思想；但他没有展开。而列宁在1914—1916年撰写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弥补了此书的某些不足。因此，说列宁的认识论思想是机械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由于葛兰西所处时代不同——20、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庸俗唯物论和机械论普遍泛滥，着重强调认识的主体性，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用选择论代替反映论，而是用选择论丰富、补充反映论。

葛兰西在分析批判了克罗齐的历史唯心论和布哈林的直观（庸俗）唯物主义、机械论之后，提出“实践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在“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这组札记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命、来源、体系及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大胆探索，发表了不少深刻、独特又有现实性的见解。

### （三）实践哲学

在评价葛兰西哲学思想时，人们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要数“实践哲学”了。有的学者把“实践哲学”说成是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新立异的哲学路线，并据此把葛兰西与卢卡齐、柯尔施等相提并论，通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这至少是严重的误解。因为葛兰西从未有过“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更无独树一帜的“雄心”，他关于实践哲学的笔记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为了避免引起法西斯监狱当局的注意，葛兰西在撰写《狱

中札记》时，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和独特的概念。譬如，他称列宁为伊里奇，用“社会集团”代替“阶级”。当葛兰西提及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停滞和进步》这一著作时，有意将书名改为《实践哲学发展中的停滞和进步》。更直接的证据是葛兰西不只一次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实践哲学的两个创始人”。这就足以说明葛兰西只是把自己视为实践哲学的继承者而不是创始人，他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这一特殊环境里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

此外，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看作几位伟大学者的综合，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这种新世界观独特而完整，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在他看来，这个时代要延续几个世纪。

葛兰西一贯反对对马克思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始终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他明确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存一切事物都采取革命的批判的立场，那么它对本身也不能例外。它是开放的、前进的；不是终极真理的绝对封闭体系。葛兰西精辟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否则就不能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挑战；但他同时注意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巨大意义。他写道：“实践哲学认为自己也是历史性的，也就

是把自己看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sup>①</sup>“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实践哲学本身，又不动摇为采取行动所必须的信念？”<sup>②</sup>葛兰西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慧眼准确把握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坚持、理论与政治宣传的辩证关系，既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又注意实践的灵活性。

葛兰西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问题。他一反20、30年代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的“权威”观点，深刻指出德国哲学的语言与法国革命的政治语言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他没有重复通常的说法，即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是在更大的视野里，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上估价李嘉图的贡献。他说：“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了他的发现以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的时候，首先利用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十大卫·李嘉图。”<sup>③</sup>凡是读过《〈政治经济学〉序言》的人都会记得马克思本人承认，正是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总结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

总之，葛兰西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

① 《狱中札记》第1卷第115页。

② 《狱中札记》第1卷第116—117页。

③ 《狱中札记》第1卷第112页。

成部分形而上学地一一对应地研究，而要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影响。葛兰西写道：“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19世纪前半期文化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及实践所代表的，断言这三种文化因素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应该从怎样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断论呢？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对应地促进了哲学、经济学和实践哲学的政治学的形成？或者是实践哲学综合地改造了所有这三种运动，即是说改造了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种新的综合中，我们考察实践哲学，就会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以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作为准备‘要素’”<sup>①</sup>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绝对化，从历史的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使人民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对立辩证化的，这一切思想、道德改革运动的结果。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sup>②</sup>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历史）、先进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愿望统一起来。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1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04—105页。

葛兰西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锐利目光察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受到歪曲和阉割的严重情况：“实践哲学的确受到了双重的修正，也就成了双重哲学结合的成分。一方面，它的某些因素，明显地或隐蔽地成了某些唯心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指出克罗齐、金蒂莱、索列尔、柏格森和实用主义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所谓正统派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种哲学，根据他们的极狭隘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历史的‘简单’解释更复杂，当他们基本上把这种哲学等同于传统唯物主义时，还自认为正统。”<sup>①</sup>葛兰西联系哲学史，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两方面修正的现状，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哲学领域的战斗任务：“黑格尔在法国革命与复辟的交接时期把思想生活的两个环节，即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化了，但综合的结果却是‘用头走路的人’。黑格尔的后继者破坏了这种统一，一些人回到唯物论体系，另一些人回到唯灵论体系。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全部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结果是‘用脚走路的人’。实践哲学也受到了黑格尔主义所经受过的遭遇：人们把它扯碎，一部分东西脱离了辩证的统一又重新回到哲学唯物主义，同时高级唯心主义文化企图把实践哲学里创造某种常生不老药所必需的东西吸收过来”，<sup>②</sup>“在现实中依然重现着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98—99页。

<sup>②</sup> 同上书，105—106页。

须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sup>①</sup>

无疑，这为我们准确判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正确把握“实践一元论”的真正含义指明了一个方向。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②</sup> 这里，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方面考察对象、感性，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sup>③</sup>

和马克思的看法相近，葛兰西指出直观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世界‘一般地’、客观地（这个词最庸俗意义上的）存在着”，<sup>④</sup> 把意识仅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整理”，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同时，他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首先使用了“创造性的”思想概念，即首次揭示主体的能动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1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48—49页。

<sup>④</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27页。

作用，但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和思辨的内容。由于唯心主义的“创造性”（能动性）概念表明外部世界是由观念创造的，就必然陷入唯我论。为了一方面肯定主体能动性又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抹杀主体能动性的机械论、庸俗唯物论，就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同时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sup>①</sup>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与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而恰好相反是‘不纯粹’的、最世俗、最普通意义上的行动的哲学。”<sup>②</sup>

正是这段札记被人们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激烈的争论，招来高度赞扬和严厉批评，从而关系到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全面估价这个根本问题。

有人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综合，因此是折衷主义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赞誉，对黑格尔、克罗齐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的某些庸俗唯物论观点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他正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反对任何

<sup>①</sup> 参阅《狱中札记》第1卷第27页。

<sup>②</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53—54页。

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结合的。要知道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sup>①</sup>

有人说，应在辩证法意义上，认识论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我认为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关于“实践一元论”的论述正是在题名为“认识的‘客观性’”的札记里阐发的。葛兰西写道：“在实践哲学中，关于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可以根据下面这句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里）来分析：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形式中——认识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是限于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根据引述的原文——还是指任何有意识的认识而言？这点有待研究，而只有用所有关于上层建筑价值的哲学理论才能研究。”<sup>②</sup>紧接着就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实践一元论”的论述。由此可见，葛兰西决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即物质与意识谁为本原，谁为派生的问题上发表见解。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属于传统唯心主义与传统（旧）唯物主义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早为旧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直觉唯物主义）所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最高形式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的主题、出发点、基础乃至命题、范畴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诸如“社会存在”、

<sup>①</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sup>②</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54页。



“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是全新的范畴，是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未使用过的。它所关注的问题，诸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也是传统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唯物主义又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在其他场合，葛兰西曾把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称作“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达到自己完成的并与人本主义<sup>①</sup>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是“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本主义”。<sup>②</sup>由此可见，葛兰西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历史主义和真正的人本主义。从本质上说，“实践一元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社会的人为出发点，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关于人和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

正如马克思肯定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葛兰西也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强调人是自然界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的积极的关系。葛兰西指出：“人们并不是由于自己也是自然而简单地与自然相联系，而是通过劳动与技术能动地与自然相联系。还有，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积极的、自觉的，即这一关系是与每个人对这些关系的或高或低的认识程度相一致的。”<sup>③</sup>由此可见，葛兰西所说的“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指人与自然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活动，即人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实践活动，人

① 意为umanesimo，可译作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

② 《狱中札记》第1卷第129页。

③ 《狱中札记》第1卷第34页。

与自然的统一就成了纯粹思辨的东西了。而“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就是指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当然也包括生产资料(即前人实践的产物)。这样，“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意思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而这种人类活动体现了人所特有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如何理解“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哲学”呢？我们知道，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把自己的哲学称作“行动主义”，说什么“思想行动是纯粹行动”，这样，自然、历史、上帝都成了(共相的)“我”的行动的产物。实际上，葛兰西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着意划清“实践一元论”与金蒂莱“行动主义”的界限，强调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物质活动，并且这种实践活动是有着物质基础的。

我以为这才是“实践一元论”的准确含义，因此，不能从中得出“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结论。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明确写道：“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而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sup>①</sup>另一段论述更清楚地说明他是把客观条件作为实践基础的：“但仅是客观条件、可能性、自由的存在不够，需要‘认识它们’并会利用它们，想要利用它们。”<sup>②</sup>显然，葛兰西所说的“客观条件”是指人们所面对着的外部世界，即上代人的实践改造了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由此可见，葛兰西既没有否认先于人类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但他认为对这代

① 《狱中札记》第1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42页。

人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否认上代人实践改变了的自然界是这代人实践的预先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在他看来，仅仅承认这点远远不够，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认识并利用客观条件，通过实践促使它们改变。因此，说葛兰西把“自然界”或“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视为实践的从属因素，偏离了唯物主义方向，是根据不足的。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葛兰西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在“历史”上而不是在“唯物”上。他对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很反感，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根源，因此尝试着改造它。他写道：“显然，对于实践哲学来说，‘物质’不应在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力学等）的意义（这些意义有待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考察研究）上，也不应在种种唯物论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物质的物理的（化学的、力学的等）各种属性的总和构成了物质本身（只要不陷入康德的物自体观），但仅当它们成为生产的‘经济因素’时才被考察。因此，物质不是作为其本身，而是作为生产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的物质来考察。这样，自然科学从本质上看好象历史范畴、人的关系。每种物质的全部属性总是一成不变的吗？科学技术史证明不是这样。很长时间人们对蒸汽的机械力毫无所闻？那么能说这种机械力在人的机器利用之前就存在着吗？”<sup>①</sup>“实际上，实践哲学研究一部机器不是为了认识和确定这一物质的原子结构，它的自然成分的物理、化学、力学属性（那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而是因为它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要素，是一定社会力量所有权的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99—200页。

对象，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又与一定历史时期相一致。”<sup>①</sup>

尽管葛兰西不赞成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但对“自然”从未提出疑义。他批判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对于克罗齐来说，只有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物理学或精密科学只是‘经验的’和‘抽象的’，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自然是某种约定的抽象，某种‘便当’等。”<sup>②</sup>

#### （四）约·狄慈根式的失误

象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

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联，“发散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并且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当提及法国唯物主义时对它进行了批判，并主张这种批判还应更彻底。因此，他从未用过‘唯物辩证法’这个公式，而是采用同‘神秘的’辩证法相对立的‘合理的’辩证法的公式，这就赋予‘合理的’一词以确切的意义”。<sup>③</sup>

的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包括法国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进行过尖锐的批判。然而，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则与事实不符。马克思不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

<sup>①</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200页。

<sup>②</sup> 葛兰西，《过去与现在》第196页。

<sup>③</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90页。

的唯物主义”<sup>①</sup>的。马克思还讲过，共产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概念的话，也绝不意味着他不同意这一概念。只要联系他的其它论述深入研究，就会看到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唯心”意义上来谈论“神秘”和“合理”的。

另外，葛兰西面对着庸俗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抛弃革命辩证法的错误时，有时在某些概念的把握和理解上有偏失，某些不确切的表述客观上起了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界限的作用，从而与他的唯物主义路线相矛盾。

譬如，当葛兰西批判布哈林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仅把意识看成对物质的反映的错误观点时，对“客观性”这一抽象概念涵义把握不准，将“客观性”与“对客观性的证明”混用，表述欠妥，造成混乱。

葛兰西不同意“在人之外的客观性”，他是这样提问的：“怎么能肯定一种在人之外的客观性呢？谁来判断这种客观性呢？”<sup>②</sup>接着，他在恩格斯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在引述了“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这段话之后，他写道：“恩格斯的公式包含着正确思想的萌芽，因为要证明客观实在，需要求助于历史和人。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人类地客观的’，它能与‘历史地主观的’完全一致，即是说客观的就是‘普遍主观的’”<sup>③</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sup>②</sup> 《狱中札记》第1卷第176页。

<sup>③</sup> 上同书第177页。

显然，葛兰西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那段著名的论述出自《反杜林论》。“江湖骗子”杜林借助“统一的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统一性，进而证明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恩格斯尖锐指出杜林的所谓“存在”是无差别、无运动、无变化的存在，等于虚无；并指出这一概念的实质是抹杀物质与意识的根本界限。最后，恩格斯得出了“世界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的著名结论。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自然界是在多种形式中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

至于说物质性的证明需要求助于人和历史，葛兰西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物质性（客观性）与对物质性（客观性）的证明是不同的。科学史和哲学史证明世界的物质性与统一性，但不是科学和哲学构成世界的物质性。它们只有从外部世界中抽象出来，正确反映外界的物质性，才成为科学和“头脑清醒的哲学；否则就成了巫师的咒语和神甫的说教。

葛兰西的“客观的 = 人类的客观的 = 普遍主观的”公式，从客观效果来看，就抹杀了主—客观的根本区别。

葛兰西还把忽视人和实践的直觉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应该说，他的意图和出发点都是对的，但在批判时没有瞄准靶心。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葛兰西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庸俗决定论扼杀斗争的主动性，宣扬“红旗必胜”，如同“橡子必然长成橡树”一样，从而使斗争失败。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直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耻于与那些唯物主义次货的小贩们（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伍，而重复着对唯物主义的偏见，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则对危害革命事业、抛弃革命辩证法的伯恩斯坦、屠拉梯、布哈林、波尔迪加等宣扬的“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从而不同意“唯物主义”这一名称。

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点：葛兰西只不同意“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提出异议，反而高度赞扬。因此，与其说他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不如说对旧唯物主义和他那个时代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抱有反感。他的失误更象约·狄慈根。列宁指出，狄慈根的那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sup>①</sup>

恩格斯没有因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偏见而认为他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也没有由于狄慈根有时“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抹杀他捍卫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功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

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思想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去寻找。的确，政治家的哲学立场决不取决于对于“物质”、“意识”的简单表态，而要看他全部理论与实践与政治活动以什么哲学思想指导，我以为这对于确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页。

### 三、葛兰西的政治思想

葛兰西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尤以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最为光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对葛兰西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也曾憧憬过在意大利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德、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西欧工业先进国家的革命没有继十月革命之后取得成功？

早在被捕前的1926年，葛兰西就开始初步分析西欧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具有像俄国那样的国家所不具备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后备力量。这意味着，即使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致于立即在政治领域中产生反响。”<sup>①</sup>

在狱中，他联系意大利和西欧的历史和现状，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全面深刻的探索，形成了领导权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葛兰西提出新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探讨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 （一）领导权理论

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

<sup>①</sup> 葛兰西1926年8月2日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是“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是“剥削被剥削阶级的工具”。

葛兰西从阶级观点出发，也认为国家总是属于一定“社会集团”（即阶级）的，是一定社会集团的统治工具。<sup>①</sup>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不满足于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国家。他指出：“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一行会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配备有强制装甲的领导权）。”<sup>②</sup>

显然，葛兰西扩大了国家概念，这是他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他看来，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机关——政治社会，还是“教育”机关——市民社会。

和马克思不同，葛兰西没有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关系领域，而是放入上层建筑。葛兰西从西欧社会现实出发，注意到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机构在对民众的教育和精神统一方面发挥的巨大威力，把它们称之为市民社会，并同政治社会一起置于上层建筑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某些西方学者（如博比奥和北村实）所说，葛兰西忽视了经济基础，而是说葛兰西鉴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善于从上层建筑分析把握经济基础。

葛兰西指出，统治阶级要维持对敌对阶级的统治，就不

<sup>①</sup> 葛兰西在狭义上理解的国家同列宁的完全一致。

<sup>②</sup> 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罗马联合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4页。

仅依靠暴力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行使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换言之，统治阶级通过学校、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将其世界观灌输给被压迫人民，并使它成为大家遵守的道德规范，从而获得后者对“合法”统治的认同。而当“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脱离”时，就“提出了新的领导权问题，即国家的历史基础位移了”。<sup>①</sup>

葛兰西鉴于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特别强调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写道：“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甚至应该成为领导者（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sup>②</sup>这里，葛兰西告诫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比工业落后的东方无产阶级更加注意开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成为统治者之前，首先作领导者——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夺取政权只是一句空话。这是葛兰西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西方学者竭力强调葛兰西与列宁的矛盾分歧，似乎葛兰西主张西方革命的主攻阵地是市民社会，这样，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是对其真实思想的严重歪曲。

早在1926年，葛兰西就写道：“都灵的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sup>③</sup>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的国家形式，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则为无产阶级专

---

①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第201页。

② 葛兰西：《民族复兴运动》，罗马联合出版社1977年版第170页。

③ 葛兰西：《南方问题》，罗马联合出版社1966年版第13页。

政提供社会基础，二者的紧密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葛兰西还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创立了动员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体制时，才能使自己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sup>①</sup>这里，他强调了工农联盟对领导权与专政的意义，同时也说明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总任务的高度来区分“统治”与“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

实际上，领导权与专政并不矛盾。葛兰西指出，当无产阶级“行使权力甚至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成了统治者时，它还应当继续充当领导者”。<sup>②</sup>

总之，葛兰西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懂得西方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仅靠暴力不行，他反对“没有领导权”的专政，但绝不是主张“没有专政”的领导权。在他看来，代议制民主国家也是要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也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

还需注意的是：葛兰西在不同场合应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概念时，涵义是变动的。大多数情况是指无产阶级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有时又扩展到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领导权，而当他联系列宁使用时，就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如此，也决得不出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抵触的结论。相反，它表明葛兰西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继承和补充。

葛兰西进一步具体考察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在

<sup>①</sup> 《南方问题》第13页。

<sup>②</sup> 《民族复兴运动》第170页。

东方，国家就是一切，而市民社会是原始和胶状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在国家动摇时，立即出现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仅是前沿战壕，在它后面有一系列坚固的堡垒和工事”。<sup>①</sup>接着，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种特殊结构的作用：“至于最先进国家，这里市民社会成为非常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抵抗得住直接经济因素灾难性的‘侵入’：危机、萧条等等，即存在对经济周期干预的手段，这里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如同现代战争的战壕体系。就像在战壕体系中发生的一样：疯狂的炮击仿佛摧毁了敌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但仅仅破坏了外层，在冲锋时就会发现面临着还非常有效的防线。在大的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有类似情况。进攻部队不会由于危机而在空中闪电般地组织起来，更不会具有进攻精神。同时，守卫部队并没有士气低落或丢弃防线，即使在瓦砾之中，对自己的力量与前途也没有失去信心。”<sup>②</sup>

在葛兰西看来，俄国的市民社会是流动的、少层次的，工人阶级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大量的小农群众分散在农村，而沙皇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与国家官吏融为一体，权力集中，官僚机构庞杂。一旦反动政权被砸烂，资产阶级政权土崩瓦解，无产阶级就可以立即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与俄国相比，西方资产阶级强大得多，他们不仅拥有“前沿阵地”——反动政权，而且拥有众多的、坚固的“堡垒和战壕”——思想、文化的优势，以及学校、教会、道德观念、习惯

<sup>①</sup>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第16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6页。

势力等。因此，“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十分复杂。所以，西方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而且还需要攻占市民社会的一切阵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更艰巨，所需时间也更长。结论是：在西方只能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

葛兰西在阐述自己的阵地战思想时，还将托洛茨基与列宁作了对比。他写道：“有待考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为运动战理论的政治反映，最终说来，只是一个民族生活只具雏形、松散、还未能成为战壕和堡垒的国家的一般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托洛茨基仿佛是个西方主义者，而实际上是位世界公民（无国籍者），即表面上的民族的和欧洲的——西方主义者。伊里奇则是深刻地民族的和欧洲的。”<sup>①</sup>葛兰西认为，托洛茨基标榜具有国际意义的“不断革命论”，实际上只是典型的俄国社会状况的反映，由于市民社会的解体，强大的正面冲击，决定性的阶级交锋才有可能。与托洛茨基相反，列宁“懂得需要将1917年在东方胜利地采用的运动战变为阵地战——这是在西方唯一可行的”，“只是他未来得及深化这一思想，虽然他懂得只能在理论上深化和充实，但基本的任务是民族的，即要求洞察环境并确定市民社会的哪些因素类似战壕和堡垒”。<sup>②</sup>

综上所述，葛兰西借用“运动战”与“阵地战”这些军事术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决定两种不同的革命战略。如果运动战是通过正面进攻、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而较迅速夺取政权的话，那么，阵地战则是着重从侧

<sup>①</sup>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第82—8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2页。

翼进攻，摧毁敌人的纵深阵地，为正面进攻，为占领前沿阵地做好必要的、充分的准备。运动战是速决战，阵地战是持久战，手段不同，但目的是共同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可见，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的区别绝对化是不正确的。脱离葛兰西的全部政治思想，拘泥于对字眼的抽象分析，将运动战说成暴力革命，阵地战理解为和平过渡，是没有根据的。

阵地战思想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上文引证的“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甚至应当成为领导者（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阵地战就是首先粉碎资产阶级领导权，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然后，才有条件夺取国家政权。

还应注意的是，葛兰西在批判克罗齐的《欧洲史》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过运动战与阵地战。他写道：“欧洲从1789年至1793年，在法国革命中有过政治运动战；从1815年至1870年是长期的阵地战。在当代，从1917年3月至1921年3月（俄国内战结束）是政治上的运动战；随后就是阵地战，对欧洲来说，其思想标志是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它还是实践的标志。<sup>①</sup>这里，运动战与阵地战是指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急剧变革时期和相对稳定时期；革命阶级进攻阶段和防御阶段；革命高潮与低潮。

当我们考察葛兰西的政治思想时，应在前一种涵义上把握“运动战”与“阵地战”，这是由于：按使用的时间顺序看，前一种涵义在后；从使用的次数来看，前一种居多；

<sup>①</sup> 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94页。

前一种思想更深刻，内容更丰富，更能体现葛兰西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 (二) 论知识分子

葛兰西从领导权理论出发，对知识分子问题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为关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职能问题，被英国当代社会学家艾论·斯温哥伍德赞誉为“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学作出了一个最有意义的贡献”。

葛兰西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而是根据他们特殊的社会职能来探讨的。为此，他对划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通常标准提出异议。他指出：“‘知识分子’概念容纳的最大限度是什么？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毫无差别地描述各种不同的智力活动，同时用以决定此种活动和其他社会集团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呢？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错误，在于试图在智力活动内部，而不是相反，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中寻找区分的标准。因为这些活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总体之中。譬如，工人，无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他从事手工劳动，而在于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活动。”<sup>①</sup>同样，企业家的社会面貌主要由一般社会关系所决定，尽管他们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最后，他得出结论：“可以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sup>②</sup>

<sup>①</sup> 葛兰西：《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罗马联合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页。

在葛兰西看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不是绝对的。除了分工的界限外,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发展某种智力活动,都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艺术鉴赏力。任何人类劳动都不可能排除“智力干预”。正是在这此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它一反“高贵者”与“卑贱者”、“智者”与“愚氓”永恒对立的阶级偏见,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现工农知识化,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提供了理论根据。

葛兰西似乎感觉到“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表述不够准确,他举例加以补充说明:“同样,每个人随时都可能煎两个鸡蛋,或缝补一件上衣,但不能说大家都是厨师或裁缝。”<sup>①</sup>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其“特殊职业活动重心方向”为“智力劳作”而不是“肌肉—神经力量”,并在上层建筑中执行“领导权”的人。这样,葛兰西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所有的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

葛兰西接着考察了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他用阶级分析方法,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独立自主的阶级,而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都有着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并竭力造就这一阶层。“每一社会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发生基本作用的原初基地上产生,同时也就有机地创造了一个

---

<sup>①</sup>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7页。



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sup>①</sup>葛兰西举例说,企业主必然具备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整个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葛兰西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知识分子,通常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个方面的‘专门化’”。<sup>②</sup>

这里,葛兰西肯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关,但它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起着特殊的社会职能。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使整个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具有同质性和自己作用意识”。<sup>③</sup>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如教会、教育体系、工会、政党等)。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政治家、官员、军官等)。领导权的、强制的、经济的作用都加强了基本阶级与其领导权在历史集团中的统一。“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的“官员”。葛兰西把“领

<sup>①</sup>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3页。

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在“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作了区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而向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发展着的每一集团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而斗争——这个集团形成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越及时，则同化与战胜也就越迅速有效。”<sup>①</sup>这里，葛兰西是从先进阶级实现自己的战略总目标的高度，看待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同化与教育的。另外，他还论及了建设新知识分子队伍与争取旧知识分子的辩证关系。

更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我们施之以暴力或合法的“消除”；对于后者，只能在思想上征服，组织上同化，尤其对那些无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同化更为容易。因为新的领导阶级的“精英”对于其他知识分子群众有着巨大吸引力。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无产阶级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任何粗暴的、简单的、过激的作法都会有损于革命事业。至于自己培养造就的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本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

<sup>①</sup>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7页。

葛兰西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待政党。他认为，“政党仅是建立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方式”，“政党恰是在市民社会中执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即更综合更广泛的范围内执行的功能——促成统治的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融合”，政党“使其作为经济因素产生、发展的成员，直至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组织者、各种活动及市民、政治整个社会有机发展固有功能的组织者”。<sup>①</sup>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葛兰西提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政党的成员或多或少，素质或高或低，要加以区分；但重要的是党应当实行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也就是教育与智力的作用。他举例说，农民不是为了掌握先进的耕作土地的方法入党的。这不尽完善却相当深刻的提法，应该视为意共创始人及领袖葛兰西的经验总结，他尤其是针对无产阶级政党讲的。的确，离开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精神上的巨大的吸引力，党就不可能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党员的文化水准很低，也很难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成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当然，他们也有一个做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的问题——要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与集团紧密结合”），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

在这里，不难看出葛兰西与列宁的一致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用人类全部精神财富武装头脑，才能建成共产

<sup>①</sup>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13页。

主义；葛兰西则把文化、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如果说，不断提高全党的文化水准，是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那么，同样也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产党的战略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离开了广大党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的一定的文化素养是办不到的。

葛兰西最后提出新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他认为，新知识分子，不是善于辞令的夸夸其谈者，而是“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不是纯粹的演说家”），“积极投身到实践生活中去”——生产劳动、科学技术活动，并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对于共产主义世界观，葛兰西特别加以强调。他认为，如果不确立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个“专家”，还不是“领导者”，而我们的新型知识分子是“专家+政治家”。<sup>①</sup>这就是说，既不是空头政治家，也不是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专门家。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有以下几点独特性。首先，它摒弃了依据所谓“知识分子活动本质”界定知识分子的方法，而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知识分子活动的社会功能来考察知识分子的地位。其次，它既肯定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又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中介性。最后，它强调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而且是富有文化教养、崇高理想和深刻思想的人。

---

<sup>①</sup>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第22页。

### (三) 论社会主义民主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他认为,国家具有历史性,自然有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果说国家创建初期主要作为“政治社会”存在的话,那么随其自身的发展,“市民社会”会越来越强大。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暴力和强制的因素呈逐渐减弱的趋势,而领导权和积极认同的因素必将逐步增强。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葛兰西并不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对少数人的专政,也不反对在无产阶级创始初期实行“中央集权制”,但他不赞成将专政绝对化、扩大化,忽视了领导权和积极认同这一重要环节,从而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抓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葛兰西写道:“对一些社会团体来说,它们在掌管国家生活的权力之前,并没有一个发展自己独立的文化和道德的时期……‘中央集权’的时期是必要的,甚至是适宜的。这种‘中央集权’只不过是‘国家生活’的一般形式罢了,至少是通向自主的国家生活和创立‘市民社会’的开始,这种社会从历史上讲是不可能掌管独立的国家生活之前就创建的。然而,那种‘中央集权’……不应该变成理论上的狂热,不应该被理解为‘永久性’的,而应该是可以批评的,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它获得发展,并产生国家生活的新形式,使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变为‘国家’的活力,即使这种积极性不是由于‘官员政府’才出现的(使国家生活成为自发的)。”<sup>①</sup>

<sup>①</sup> 《过去与现在》第165—166页。

显然，葛兰西的这则札记是针对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写的。在葛兰西看来，这种中央集权制不是目的，而是产生国家生活新形式的手段、工具；它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和唯一模式，而是像俄国那样‘市民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模式。中央集权制对于‘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就不适合。正是由于葛兰西洞察了苏联中央集权制有压制民主、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严重弊病，才强调它的暂时性和可批判性。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个人和集团的积极性”同社会主义制度协调一致，但这是“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而不是靠“官员政府”强制和行政命令形成的表面的一致。

葛兰西特别强调积极的直接的认同，肯定个人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即使这种参与有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对民主集中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写道：“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是被动和间接的认同，而是积极、直接的认同，即是个人的参与，尽管这种参与会引起表面上的分裂和混乱。如果多数人不通过个人的磨擦<sup>①</sup>而统一起来的话，就无法形成一种集体的意识，即一种活生生的组织机构。一个乐队在排练的时候，每件乐器都是各行其事，给人以演奏极不和谐的印象；然而，这些排练却是使乐队如同一件乐器那样存在的条件。”<sup>②</sup>

与此同时，葛兰西并不否定法律、纪律的重要作用，但

<sup>①</sup> 原文为L'attritodeisingoli,指人们中各种不同政见与认识的争论，有时甚至是较为尖锐的思想交锋。

<sup>②</sup>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和现代国家的笔记》，第158页。

他反对用纪律取消个性、扼杀自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性和自由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纪律的事实（否则，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或独裁主义的泥坑中），而是由于支配纪律的权力的存在。如果这种存在是‘民主的’，就是说，如果权威是一种专业技术职能而不是‘意志’或外来的表面的强制性命令的话，那么纪律就是民主秩序和自由的必要因素了。”<sup>①</sup>

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这里触及到社会主义权力性质有可能改变的问题。如果执行纪律的权威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纪律就是对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保障。相反，当权威只代表少数人利益，其‘意志背离民心，法律和纪律就会破坏民主秩序和公民自由。

葛兰西告诫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的共产党千万不要压制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他说：“如果一个政党努力使被剥夺权利的反动势力受到法制的约束，并把落后的群众提高到新法制的水平，那么这个党的作用就是进步的。相反，如果它企图压制历史上的有生力量，它的作用就是退步的……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官僚主义集中制意义上的官僚）。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sup>②</sup>

综上所述，可以说葛兰西在其理论建设中是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的，但他的思想又是创造性的。根据列宁的启

<sup>①</sup> 葛兰西，《过去与现在》第165页。

<sup>②</sup> 转引自《葛兰西传》中文版第4页。

示，他善于研究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刚接触的问题和刚出现的新问题。葛兰西的理论贡献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为如下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领导权既是夺取政权的阶级的政治战略的基本因素，又是维护既夺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这是他对许多问题的回答，这是他这个生活在20—30年代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强化历史条件下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

总之，列宁主义有力地推动了葛兰西的思想发展过程，在葛兰西理论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到处可见这种影响产生的长期效果。贝林格具体指出葛兰西从列宁那里吸收了三个基本主张：第一，给予主观因素、自觉行动和政治主动性以决定性的重视，从而为工人运动指出了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摆脱对资本主义的屈从的道路。第二，赞扬党作为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和有觉悟的部分的作用，以及党作为以民族利益为宗旨开展集体行动的倡导者和鼓动者的作用。第三，指出联盟问题的首要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它同一些社会政治力量结成联盟的体系，借以表明自己是有赢得赞成的最大能力，是有希望避免或清除会导致孤立的 各种 宗派主义和自欺欺人的“纯洁性”的具体愿望。<sup>①</sup>

#### 四、结 束 语

葛兰西是列宁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狱中札记》成为本世纪最富独创性

---

<sup>①</sup> 参阅1982年2月27日的意共《团结报》。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一，因其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概念新颖、语言晦涩及笔记性质，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颇为费解的作品。这在客观上为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及评价提供了条件，乃至有人说“只要有多少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差不多就有多少打出葛兰西旗号的办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葛兰西思想影响的巨大与深远。还应指出的是，尽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理解“实践一元论”、“领导权”、“阵地战”、知识分子等理论，但都一致公认葛兰西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葛兰西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们称誉葛兰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路线的创始人，在“领导权”与“阵地战”思想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十月革命道路，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今天，意共成为拥有170多万党员的西方最大的共产党，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不归功于葛兰西倡导的独立自主的路线及理论教诲。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高度评价葛兰西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唯物论。实践派把葛兰西说成是自己“实践哲学”和“自治理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弗兰尼茨基说，葛兰西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天才地提出“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人是实践的本质”。<sup>①</sup>

苏联学术界则强调葛兰西的理论是“把列宁主义、‘苏维埃’经验与意大利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sup>②</sup>称誉“葛兰

<sup>①</sup> 参阅《哲学动态》1987年第7期第32—33页。

<sup>②</sup> 参阅苏联《共产党人》1981年第2期。

西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理论贡献”，<sup>①</sup>“葛兰西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至今鼓舞着共产党人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而从事伟大的斗争”。<sup>②</sup>

欧洲共产主义尊葛兰西为理论先驱。

“新左派”学者（如佩里·安德森）称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狱中札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最伟大的著作。

总之，葛兰西以其英雄的业绩、崇高的人格，光辉的思想永远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进步人类所怀念。

他的英名不死！

他的事业长存！

---

<sup>①</sup>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

<sup>②</sup> 参阅苏联《共产党人》1981年第2期。

## 参 考 书 目

1. S. F. Romano: Gramsci, UTET, 1978
2. A. Santucci: Letture di Gramsci, Editori Riuniti, Roma, 1986.
3. N. Badaloni: Il marxismo di Gramsci, Einaudi editore, Torino, 1975.
4. A. Santucci: Antonio Gramsci, Editori Riuniti, Roma, 1987.
5. Portelli: Gramsci e il blocco storico, Laterza, Bari, 1976.
6. Bonetti: Gramsci e la società liberaldemocratica, Laterza, Bari, 1980.
7. G. Tamburrano: Antonio Gramsci. La vita, il Pensiero, L'azione, Lacaita, Manduria, 1963.
8. B. Croce: 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 Laterza, Bari, 1977.
9. N. Badaloni: Marxismo come storicismo, Feltrinelli Milano, 1975.
10. P. Andersen: Ambiguità di Gramsci, Laterza, Bari, 1978.
11. C. Salinari, M. Spinella: Il pensiero di Gramsci,

- 
-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5.
12. P. Sprian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Einaudie editore, Torino, 1967.
  13. L. Gruppi: Il concetto di egemonia in Gramsci,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7.
  14. 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15. 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16. 拉法埃洛·乌博尔迪:《佩尔蒂尼公民——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 新华出版社, 1985年。
  17.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 陶里亚蒂

毛韵泽 撰

## 篇 目

一、穷庶务员的儿子 .....	193
二、都灵的风暴 .....	193
三、步步高升 .....	199
四、从接受混杂的哲学思想到运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点 .....	201
五、在共产国际内的原则态度 .....	207
六、“阿尔弗雷德”在西班牙 .....	210
七、从意大利的实际情况出发 .....	212
八、同群众在一起 .....	215
九、立足于意大利 .....	217
十、独立自主的立场 .....	218
十一、《雅尔塔备忘录》 .....	221
十二、坚定、灵活的策略思想 .....	222
参考书目 .....	229



陶里亚蒂 (1893年—1964年)





---

---

# 陶里亚蒂

毛韵泽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曾任意共总书记。1927年起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一直到1943年该组织解散为止，曾主管拉丁地区的共产党事务，是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意共的杰出策略家。

## 一、穷庶务员的儿子

陶里亚蒂1893年3月26日出生于热那亚市。由于诞生的日子是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因此取名为帕尔米罗。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在热那亚一个国立寄宿中学当庶务员，后来升任会计。安东尼奥从小聪明能干，有一个当教士的叔叔契布拉里奥神甫曾有意留给这个侄子一笔遗产，条件只是让他把神职继承下去，这样就可以免费送他上沙勒斯教会学校读书，然后在札维诺地方的修道院进修。可是，年轻的安东尼奥自有主见，当他读完中学，该动身去修道院的前一天晚上，他背着铺盖卷儿出走，从都灵省柯阿索洛农村来到都灵城里。此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继续读完了师范学校，

在私立学校里当了几年教员，后来在国立寄宿中学当庶务员、会计。

陶里亚蒂的母亲特雷萨·维阿勒的身世更低微，双亲早亡，她从小是都灵一户富裕人家的养女。尽管这家人待她不错，送她上师范学校念书，但同这个家庭的某些成员相处，她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她早年在一家私立职业学校里教过书，安东尼奥也在那里任教，一对苦水里泡大的青年结了婚。

陶里亚蒂有兄弟姊妹4人，姊姊玛丽娅—克里斯蒂娜、哥哥欧金尼奥—朱塞佩、弟弟恩里科；他排行老三。这6口之家，要靠两个穷教员去维持生计，生活的道路相当维艰。颠沛奔波是常有的事，全家由于安东尼奥工作的变动，搬东迁西好几次：从热那亚迁徙到诺瓦拉，然后移居都灵，陶里亚蒂在那里上完初中，最后全家定居萨萨利，陶里亚蒂在国立中学读到毕业。

四个孩子都继承了他们父母勤奋苦学的精神。尤其是陶里亚蒂，只要有一本书在手，他好象身子钉在板凳上那样，谁也别想让他拔起身来。特雷萨·维阿勒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多方面的爱好：意大利文学、绘画、刺绣、外国语，因此，对孩子们的各门学习都能管起来。她严格地规定一条：要做完学校布置的功课，才允许读其他书籍。陶里亚蒂从小身体孱弱，安东尼奥夫妇对他作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凭这种身体即使他能学出一门手艺，就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别提娶老婆成家了。除非如法炮制，送他到札维诺修道院去，可以免费上学。可是对陶里亚蒂这一招也行不通，因为他对宗教的态度比他父亲更加消极。总算命运对陶里亚蒂一家也不是时时处处表现出冷酷无情，当时国立中学里开

始规定各门功课平均在80分以上的学生，可以免缴学费，这样四只书包的难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的学业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

陶里亚蒂在中学时代最早接触的课外读物还是在他父亲存放旧账册的柜子里偶然翻到的，有意大利文艺批评家戴桑克蒂斯的两卷《批评论文》，其中有对18、19世纪文化发展的评论，有《论维罗纳的犹太人》和《论席勒的戏剧》的论文，还有《叔本华和雷奥巴尔迪的对话》等，这对他以后喜爱历史、文学、哲学方面起了启蒙的影响。

陶里亚蒂一家有个共同的爱好，不花一文钱的散步和远足。安东尼奥工作之余的消遣就是遛弯儿。到了一年一度的短促假期，他就挽着孩子们出城，到田野或登山去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呼吸泥土发放的清香，对于庄稼人的后代，似乎格外亲切。

1911年，陶里亚蒂开始亲身感受到了生活上的煎熬。他后来在谈到他的父母时总是感慨地说：“他们都是聪明能干的人，可是生活的重荷和艰难困苦终于使他们支持不住了。”原来这一年的正月里，他的父亲由于长期劳累，患胃穿孔出血，全家人一起护送病人，从萨萨利出发，经过几天海路折腾，到都灵一家大医院做胃局部切除手术，没有成功，逝世了。母亲在悲痛之余要张罗全家的生活，光靠微薄的抚恤金是无法打发日子的，这时陶里亚蒂除了学习每天要给小学生授几节课来帮着维持家庭。

7月间，陶里亚蒂在中学毕业了，这个暑假，他要为考上“撒丁省卡尔罗—阿尔伯托中学”奖学金而拼搏，因为他深深意识到这场考试的份量，成败对于自己和全家的命运有什

么影响。9月初，他以名列第二赢得了这场考试。这时全家已搬到都灵来住了，陶里亚蒂进了都灵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共同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战友安东尼奥·葛兰西。

## 二、都灵的风暴

都灵原先是撒丁王国的首府，经济并不发达，主要是手工业，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商业。可是在1911年，即意大利统一50周年的时候，它已成了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它同其他两个城市鼎足而立：罗马—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中心；米兰—商业和金融中心。都灵也是孕育先进和落后事物的场所，这里既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也有吮吸工人血汗而膨胀起来的菲亚特汽车制造业。

都灵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都会冲击到最高学府，而尤其是都灵大学，因为这里的教授和大多数学生对政治生活非常积极。看来这位初到大城市的陶里亚蒂，在头两年严格遵照家训，除了读书，没敢越雷池一步。原来外祖父家规定他读不是他志愿的法律系，并特地嘱咐他不能同政府作对，否则就别指望弄到什么“一官半职”。可是，从1913年起，他的母亲、哥哥和亲戚已经摸不透他的心思，彼此间的谈话也有点格格不入了。陶里亚蒂一反常态，决心脱离中小资产阶级的圈子，而投向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因为他在工人身上找到了革新意大利的新“精神”和新“觉悟”。他后来在回忆起当年同葛兰西度过的一段生活时说：“1912年和1913年间，我们有时在上午……向波河走去，一路上我们经常遇到

与我们不同的其他人群……大家都朝波河及两岸的公园走去。罢工的或参加庆祝活动的劳动者们当时在那些地方举行集会。我们也随着这些人向那里走去。一路上，我们倾听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斗争产生了兴趣。”<sup>①</sup>

陶里亚蒂最早参加的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是1913年3月的都灵金属加工工人大罢工。起因是金属加工工人联合会向工厂提出，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少到58小时，周薪不变，作为计件工作制的修订。可是厂方断然拒绝，于是工人于3月19日开始罢工。罢工持续了93天以后，厂方终于同意签订新合同，陶里亚蒂喜悦地看到了工人团结的一次胜利。

平时，陶里亚蒂有选择地参加了一些俱乐部和青年团体的活动，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习方面。1914年，他在塔斯卡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党。都灵支部是个思想论战激烈的场所，当时墨索里尼还领导过社会党的“干涉主义者”，同以屠拉梯为首的“中立主义者”进行论战。陶里亚蒂同葛兰西可算是异军突起，既支持博尔迪加领导的一部分左派，又同博尔迪加这一派在理论上有所不同。他们在反对实证主义方面也是这样，尝试用新的方法和新的知识观来认识和解决工人运动中的问题。他们曾被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理论所吸引，并汲取了其中合理的部分，但终于离开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扬弃了第二国际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宿命论”，而是接受了创造性的实践哲学，这种

---

<sup>①</sup> 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983年中文版第80—81页。

哲学，照葛兰西的说法，强调意志和行动。

1915年，陶里亚蒂写了毕业论文《论殖民地的关税制度》，被授予法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投笔从戎，被委任为军官后因患肺病退伍。1917年重返都灵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学位，两年后毕业。在这期间，他学习了《资本论》第3卷、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吉奥尔达诺·布鲁诺的《逻辑学》。毕业后，他在一所私立中学里执教政治经济学。

1919年，都灵掀起了革命风暴。这次工人群众不只是为了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而是要求由他们自己选出的“工厂委员会”来取代资本家的代理人行使管理部门的权力。为了指导这次运动，5月，他参加了葛兰西等人创办的《新秩序》周刊的编辑工作。他们设想把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他同葛兰西在6月21日的《新秩序》上发表了一篇合写的文章《工人民主》，文章中提出：“‘内部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明天……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sup>①</sup>

但是，尽管这个运动到了1920年4月13日发展成为总罢工，高峰时参加罢工的工人达50万，终于因为都灵的运动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社会党领导机关不予支持而宣告失败了。当时，包括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革命左派，从这个事件中得出教训，1921年从意大利社会党中分裂出来，自行成立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陶里亚蒂以《新秩序》派成员

<sup>①</sup>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集》（1910—1920）第1卷，1977年伦敦英文版第68页。

的资格参加了党的创建工作。

### 三、步步高升

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就出现了意共和社会党两党之间没完没了的论战和斗争。似乎大家都把对方作为第一号敌人来看待，这样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钻了空子，1922年10月，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第二天国王授命墨索里尼组成政府，于是意大利的民主力量宣告破产了。此后，意共和社会党才把斗争方向针对法西斯，一直到1926年11月，所有反对派政党和团体被视为非法，勒令解散，这时意共的主要任务才真正转变为推翻法西斯政权的斗争。

陶里亚蒂在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后，1921年夏被派往罗马主编党的机关报《共产党人》。此后，他为该刊写了许多通讯和评论，其中一个主题是：只要能打退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可以不择使用任何武器。他以大量事实揭发了资产阶级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勾结活动。该刊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以后仍在秘密出版，但为时不久，一队黑衫党徒冲进了报馆，捣毁了刊物的机样和纸型。这次，陶里亚蒂在九死一生中逃出了这帮匪徒的枪口。

1922年3月，意共罗马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2月3日，博尔迪加、格里埃科、多诺弗里奥等意共领导人和许多基层负责人被捕，他受命参加新的领导机构，并担任中央执委会委员兼代理书记。后来两年，葛兰西在莫斯科作为意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他留在意大利领导意共的地下组织。1924年，他同都灵的女裁缝蒙塔尼



亚纳·丽塔结婚。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他写信给葛兰西，建议他回国领导党的工作。6月，他以意共领导机关多数派代表的资格第一次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对意共党内持关门主义立场的波尔迪加进行了批评，他说：“党今天在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一部分中间已经取得了极为巩固的地位……它应该成为一个群众的党，成为意大利工人群众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党”<sup>①</sup>，而不应当实行关门主义的政策。

1924年10月16日，陶里亚蒂针对亚文丁集团在对待马特奥提被暗杀事件的错误做法，在《新秩序》（是年3月在罗马重新出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资产阶级反对派各集团……是用国会和报刊斗争方式来反对那些支持和加强目前政权的右翼分子的道路，是轻视和否定群众运动的道路。……结果怎么样呢？法西斯克服了危机……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对无力击破黑衫党徒力量的反对派的下层采取暴力压迫，而对上层采取蔑视的政策。”

1925年，陶里亚蒂一方面为党报写反法西斯的文章，另一方面抓发展党员和在工厂进行党小组的组织工作。他认为，小组是“共产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因为共产党不满足于作为单纯的宣传团体，而要成为群众的党，并通过同群众保持联系来发挥政治作用。”<sup>②</sup>4月2日，他在罗马被捕，这时他已被警方视为“危险的共产党人”，但只关了3个月，7月实行大赦，他又侥幸逃出了法西斯的罗网。

<sup>①</sup> 1924年8月7日《工人国家》。

<sup>②</sup> 1925年4月1日《新秩序》。

此后，陶里亚蒂在政治生活中步步高升，1926年11月，墨索里尼实行大逮捕，所有意共议员、党和工会的多数领导人落入虎口，其中有葛兰西、博尔迪加、斯科奇马罗、特拉契尼、罗维达和马菲等。这时陶里亚蒂正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倖免于劫。他作为意共的代表，又由于新的形势，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政治书记。因此从1926年11月起，他已成了意共的实际领导人，在领导班子中，塔斯卡和格里埃科作为他的助手。

#### 四、从接受混杂的哲学思想到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陶里亚蒂最初接受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混杂的，我们在他的言行和策略思想中至少会找到斯宾诺莎、黑格尔和克罗齐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痕迹：

（一）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宣扬科学知识的自由，认为教育是摆脱一切社会灾难的手段。陶里亚蒂一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就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最初他参加的《新秩序》，就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机关报”。他同葛兰西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力把群众发动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具有文化，革除各种恶习如酗酒。”<sup>①</sup>甚至他本人的早年经历中，摆脱贫穷之道似乎也是不断地在求学、提高文化上身体力行的。

斯宾诺莎主张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他所说的“美好生活

---

<sup>①</sup> 葛兰西，《达官贵人》，1921年6月23日《新秩序》。

的规律”，其中一条是：“对那些不违反吾人目标的一般习俗，都可以遵从。”<sup>①</sup>这条准则对陶里亚蒂成了政治准则。他自己是无神论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天主教是意大利人民长期形成的普遍习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意大利的传统学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一般意大利人莫测高深。在他看来，这要依靠长期文化上的革新，才能摆脱这些旧习俗，因此，他在“新党”理论中就没有把“接受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因为他考虑到这些习俗并不妨碍意共的目标。

斯宾诺莎的哲学把寻求真理当作病人寻求药剂与寻求至善、寻求理想生活结合起来，他写道：“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不能不强迫我自己用全力去寻求药方，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确定；就好象一个病人与重病挣扎，明知道如果不能求得救药，必定不免于一死，因而不能不用全副力量去寻求救药一样，尽管这药方是如何不可靠，因为他的全部希望只在于此。”<sup>②</sup>

陶里亚蒂同葛兰西都把具有革命理论指导的组织，作为解救社会弊病的药方。可是，后者强调完善的革命理论，而陶里亚蒂则强调一个组织的存在，哪怕指导这个组织的理论并不完善，决不能放弃组织。1920年“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以后，葛兰西同博尔迪加主张同社会党决裂，自行组织一个由革命理论指导的共产党，当时陶里亚蒂一度同葛兰西分手，站在塔斯卡一边，主张仍然留在社会党内。直到意大利

<sup>①</sup>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1960年中文版第2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页。

共产党成立前不久，他才退出来加入了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时期，陶里亚蒂为了拯救党组织的生存，忍辱负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意识到极左政策使意共在意大利迭遭严重挫折，但意共这个组织的存在更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愿望。他为了不失去这个药方，哪怕这副药方如何不确定，他可以承受一切，“因为他的希望只在于此”。

斯宾诺莎的另一条生活准则中写道：“……他们的共同团结，毕竟是利多害少。所以最好是以宽大的度量，忍受人们所施的损害，而自己专心致志于足以增进人类的协调和友谊的东西。”<sup>①</sup>陶里亚蒂的策略思想中含有协调和团结的成分。他始终反对走极端或没有回旋余地的策略，如1923年和1924年，由于意共领导人博尔迪加的不妥协政策，使意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蒙上几乎要破裂的阴影，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提出的较灵活的策略解了围，为此他们被博尔迪加指责为“机会主义者”。陶里亚蒂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遵循着团结和协调的精神，使他领导的意共渡过了冷战时期的难关，并为“历史性妥协”策略打下了基础。

（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长期以来，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意大利影响非常深刻，不仅是教授们的学术活动，也是在复兴运动时期（1815—1848年意大利人民争取解放和统一的运动）市民生活中的一个要素，他们把黑格尔主义同意大利统一的哲学等同起来。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的形成、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明显地继承了新黑格尔主义的遗产；陶里亚蒂也不例外，他在都灵时期译过150多页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此他从来不隐瞒

<sup>①</sup> 斯宾诺莎：《伦理学》，1962年中文版第214页。

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他写道：“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的唯心主义的解释，的确满足了许多迫切要求，扩大和丰富了知识的视野，扫清了许多偏狭主义和其他庸俗观念所盘踞的阵地”<sup>①</sup>。

1925年，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学习布尔什维克，同时，布哈林谴责意大利党内重新产生“旧黑格尔主义”和“唯意志论”，陶里亚蒂在一篇文章中间接地反驳了布哈林，写道：“我们是遵循卡尔·马克思的同样道路，也就是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主义来到马克思主义的。”<sup>②</sup>

陶里亚蒂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汲取的营养突出地表现在他强调人的积极主观方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批评和反对认为文化是概念和知识堆砌起来的总和这种说法。有人以为教育人民无非是增加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数量，把科学研究的结果作为绝对真理传授给他们。这样，科学的真理在工人和农民的心目中就同过去象宗教信仰之类的绝对真理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传授技术知识，使人微言轻的学徒切身感觉到他是许多世纪来一直努力工作的人类大家庭中活生生的一员，那就是在进行一种崇高的教育，就是在帮助这个人体体会到，自己的工作表面上虽然是有限的事业，却有无穷的价值；这样也就会有助于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就会使他的意志的价值超越他个人的价值。”<sup>③</sup>

（三）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是当时意大利激进青年膜拜的思想导师。1919年，陶里亚蒂

<sup>①</sup> 参看《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933年中文版第72页。

<sup>②</sup> 陶里亚蒂：《我们的意识形态》，1925年9月23日《团结报》。

<sup>③</sup> 陶里亚蒂：《评论》1919年7月19日《新秩序》。

就表示，克罗齐是“我们一代意大利人的主要教育者”，并且“几乎没有人能在知识或在对人和事件作具体历史评价方面可以同他媲美的。”<sup>①</sup>

当时，意大利的思想界有两大学派：实证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克罗齐是唯心主义阵营批判实证主义的旗手。他认为：“首先收集事实，然后把它们同作为原因的事实联系起来，这就是代表宿命论传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但是大家知道，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作为原因的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连串的原因和结果，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于是开始无穷无尽地倒退，因此，我们永远找不到最终可以把这根链条串连起来的这个原因或诸原因。”<sup>②</sup>

陶里亚蒂对实证主义的反感，首先是对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印象造成的，他们大多是实证主义者，在陶里亚蒂看来，他们在群众面前能说会道，可是要搞革命时，这些人就在思想上表现出空空洞洞，也完全没有能力进行组织或采取实际行动。陶里亚蒂在1945年以后回忆时写道：“这段时期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科学和哲学是实证主义。他们试图削足适履，硬要把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起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到狭隘的天地中，当这个辩证法不就范而起来反抗的时候，那些自称科学而实际上肤浅不堪的理论家就饰之以伪科学解释。他们即使不再求助于形形色色的实验心理学和犯罪学……也会求助于最庸俗的社会学和最乏味的斯宾塞主义。”<sup>③</sup>

① 陶里亚蒂：《记克罗齐的辩论》，1919年7月19日《新秩序》。

② 克罗齐：《历史编纂学的理论》，1954年意文版第56页。

③ 参看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编：《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983年中文版第71—72页。

克罗齐的思想体系对陶里亚蒂的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克罗齐的“道德—政治历史”的学说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道德知识改革”理论的渊源。这一学说主张把人类的道德生活，人类抱负的整个领域，如艺术、宗教、道德和政治原则上的表现作为研究历史发展的必要课题。而陶里亚蒂不仅强调对人类道德生活的研究，而且主张社会主义要抓人的革新。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要革新生产，革新工业、农业和科学进步的方式，而且还要革新人，创造新人从而使得自由和人道具有新的意义”<sup>①</sup>。第二，克罗齐批判形形色色超然存在的观点，并认为哲学见解对超然存在的批判就是对神学的批判，也是对一切宿命论的批判。陶里亚蒂对宿命论深恶痛疾，他写道：“这种形而上学的教条宣称社会将来的各种形式是预先规定的，是一种绝对的命中注定的将来……而宿命论把它称为信仰，于是这种信仰有它的鼓吹者……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背后，进行了劣质政治商品的地下交易。被动、缺乏批判精神和夸夸其谈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特征。”<sup>②</sup>

1919年以后，陶里亚蒂对克罗齐逐渐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哲学固然是批判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它必然导致政治行动。他同葛兰西都认为，哲学史是阶级冲突史，所有阶级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即世界观），因此哲学是政治学。可是克罗齐的哲学不承认这一点，他的“伦理原则”也反对“阶级斗争”，认为社会的前进没有什么对抗性，个人应当服从“总体”（即任何的统治制度），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

<sup>①</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1966年中文版第29页。

<sup>②</sup> 陶里亚蒂，《我们的意识形态》，1925年9月23日《团结报》。

种制度都是历史的合理发展,包括法西斯制度在内。这样,根据陶里亚蒂和葛兰西的分析,尽管克罗齐的哲学自称为内在哲学,但它仍然是“思辨”哲学,在其中不只是一点点超然存在和神。它全部是超然存在和神。

应当肯定陶里亚蒂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是个绝对历史主义的信奉者,这我们从他的策略思想中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他的策略从来不受任何经典框框的束缚,正如他自己的说法:“不仅要把理论看作手段,也要把它看成非正式的和固定的东西,它的外延可以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以不断改造”<sup>①</sup>。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不是个专门的哲学家。他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和策略思想中。

## 五、在共产国际内的原则态度

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中使用的名字是“埃尔科里”。1926年第6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以后,他当选为书记处的11名书记之一。整个30年代,他主管国际的拉丁局。尽管这位“意大利教授”(斯大林对他的称呼)在共产国际中似乎很受重视,但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他步履艰难,险象环生,真感到象空中走钢丝一样。1926年整个一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中,忙于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进行论战。陶里亚蒂对于参与这一斗争有很大顾虑。他认为,俄共中央同反对派集团之间的破裂可能使意共的领导同

<sup>①</sup> 保·比柯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1983年伦敦英文版第116页。



志们受到震惊，因而迷失方向，甚至造成错误，因此他特别强调问题的政治本质，不轻易表态。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陶里亚蒂拒绝谴责托洛茨基“关于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问题，因为他没有看到用来证明某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当场被斯大林的支持者库西宁指责为“拘泥细节是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稍后，瓦西里·科拉罗夫专门走访他，要他加入他们的行列来清洗托洛茨基，他断然拒绝，遭到了批评，说他年青幼稚。<sup>①</sup>1928年末，斯大林把布哈林赶下台，自己掌管共产国际，陶里亚蒂深感要同这个铁腕人物打交道，采取“硬顶”必然要吃亏，于是他开始“软磨”了。塔斯卡的被开除出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1928年10月，塔斯卡开始担任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后，一直对共产国际的某些做法唱反调，如他反对共产国际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压制或组织措施；他有两次对斯大林支持的提案在投票表决中弃权，第一次是要求签署对德共一部分同志开除出党和换领导班子的问题<sup>②</sup>；第二次是要求批准关于对德共领导人安贝尔·德罗的谴责，他投票反对对德共内部进行清洗。<sup>③</sup>后来塔斯卡还对共产国际整个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一方面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尖锐化，而另一方面，1928年的群众战斗精神却比1921年还低落，这种差距如何解释？因此，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关于过渡时期的口号和同社会党搞

<sup>①</sup> 参看伊纳齐奥·西罗尼：《安全的出路》，载1950年1月6日《团结报》。

<sup>②</sup> 《塔斯卡1928年11月4日给意共书记处的信》，文件：12：531—534，第532—533页。

<sup>③</sup> 《塔斯卡1928年12月20日给意共书记处的信》，文件：25：596—598，第598页。

统一战线应当继续有效。1929年6月，他被共产国际开除出执委会主席团。事后意共中央批判了塔斯卡的观点，但仍保留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共产国际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意共谴责塔斯卡的反六大路线的错误，并把他开除出党。陶里亚蒂声辩说，意共所以没有把塔斯卡开除出党，其理由第一，因为塔斯卡同意今后不论在党内或中央委员会不宣传他的观点；第二，对塔斯卡的斗争除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进行，还要在普通党员中间进行，目前后一项还未来得及进行。可是这种“软磨”也未奏效，1929年9月，意共只得把塔斯卡开除出党。此后，共产国际很想搞掉陶里亚蒂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意共党内没有可以被它利用的适当人选。至于陶里亚蒂从1930年起就决定把活动中心搬回到意大利去，想尽量避免对共产国际事务的牵涉；同时，在党内把反对者开除出党，如1930年6月开除了莱奥内蒂、拉瓦卓里和特雷索；1931年7月开除了西罗涅。一直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才安全地走到了钢丝的尽头。他在大会上作了《帝国主义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动员一切力量，而不只是共产党人的力量去反对法西斯。这时他已成了仅次于季米特洛夫的共产国际第2号人物，看来只有这条路线是符合他的真实思想的。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尤其是六大的路线，他作了违心的附和，有时甚至参与了对反对者的镇压。

## 六、“阿尔弗雷德”在西班牙

1929年到1934年是意共地位最脆弱的时期，陶里亚蒂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是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而这时陶里亚蒂则宣布：意共不参加1927年由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等组织的反法西斯联盟；他还谴责1929年罗赛利兄弟组织的“正义与自由”组织是“法西斯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严酷的事实是，由于这种极左政策，1934年意大利的法西斯警察几乎把意共的活动全部平息下去了。

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了西班牙内战，接着法西斯意大利和希特勒德国援助叛军，使西班牙战争越出了民族范围。8月，反法西斯的外国志愿部队陆续到达西班牙，其中有罗赛利组织的约有500名意大利人的“罗赛利纵队”，早已在加泰罗尼亚前线作战。后来外国志愿部队编成5个国际旅，共有二、三万人。

1937年1月，叛军从西北方对马德里发动了第二次攻势，遭到了失败，于是意大利军团被调到西班牙。3月8日，开始对马德里展开第三次攻击。共产国际意识到西班牙形势艰危以及奈格林政府面临了一大堆新问题，于是作出决议，派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助手去西班牙担任顾问。6月，陶里亚蒂化名“阿尔弗雷德”，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西班牙。由于是“顾问”，他不公开抛头露面，而是悄悄地在幕后进行工作。从1937年夏到1939年春西班牙共和国失败，他在这里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把西班牙的情况及

时反映给共产国际。如到西班牙不久（8月3日），他在一封给曼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的密件中，对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作了评述。他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发展太快，缺乏有经验的干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织得很差，政策经常朝令夕改。（二）帮助国际旅做组织工作。在这些战士中，有来自欧美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员，他们各自为政，很难领导。在陶里亚蒂建议下，让这些共产党人都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这样就把他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起来。（三）帮助西共同社会党进行协调的工作。著名内战史学家休·托马斯说：“西班牙共产党不是由何塞·迪亚斯或拉·佩西诺纳丽（即伊巴露丽），而是由更有手腕的政治策略家陶里亚蒂领导的”。<sup>①</sup>

当时陶里亚蒂向西共提出了军队改革：组织一支统一指挥的正规人民军，成立后备队，肃清前后方的敌特；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以保证前线粮食供应等建议。他设法使西共同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取得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他认为，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的革命仍然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阶段必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

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被很好地落实，一是陶里亚蒂早就发现的西共发展太快，干部素质差，做不好人民阵线的工作；二是社会党对西共的发展怀有戒心，后期不同西共合作，最后由投降主义的领袖占了上风；三是西班牙的各种党派成分复杂，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中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搞分裂活动，使继续抵抗无法进行下去。1938年9月21日，奈格林政府在得不到苏联增加军援的情况下提

<sup>①</sup>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217页。

议：政府和叛军双方在国际监督下把外国志愿部队从西班牙撤出，意、德当局对此提议不予理睬，于是奈格林政府开始单方面遣散国际旅中服役的志愿军。11月15日，国际旅的1万名志愿人员在巴塞罗那举行告别仪式。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叛乱和意、德武装干涉的战争一共延续32个月，1939年3月，卡萨多上校和右翼社会党头子胡里安·贝斯泰罗在马德里成立了所谓防御委员会，公开反对奈格林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并在3月5—6日夺取了政权，3月18日向佛朗哥投降。

陶里亚蒂在西班牙一直呆到最危险的时刻。1939年3月6日，他从马德里转移到埃尔达。是日，西共政治局决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立即从西班牙撤离。陶里亚蒂在去穆里卡途中曾被卡萨多上校的巡逻队拘留，幸亏有一支共产党的部队把他救了出来，否则，他作为共产党“顾问”，必然被枪毙无疑。

3月24日，陶里亚蒂一恢复自由，就同其他一些人搭最后一班航机经法属北非到达法国马赛，然后登上一艘苏联船，于5月抵达列宁格勒，同船的有伊巴露丽和从巴黎来的其他西共党员。

## 七、从意大利的实际情况出发

1939年7月，陶里亚蒂重新领导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工作。8月上半月，他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党的中央领导人和地方干部会议，研讨开展党在国内的工作，决定在国外只留少数领导人，把大多数领导人和全部力量集中到国内，为万一

战争爆发作好准备工作。9月1日，法国政府鉴于和平无望就发布动员令，同时，巴黎警察当局大肆搜捕外国人，陶里亚蒂以使用伪造护照罪被捕，幸而他没有被审问出是意共的第一号人物，他被拘留了6个月，在接受外事调查局的审查以前，利用一个官员的迂腐麻木，设法逃跑了。此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用马里奥·考伦坦的化名，通过莫斯科电台每周播放三次“对意大利人讲话”，这对于被法西斯独裁政权拖入战争和被奴役的意大利全体人民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1943年年底，意大利南部大陆已被盟军解放，四大国组成一个咨询委员会来解决意大利问题；陶里亚蒂经咨询委员会的同意前往意大利解放区。1944年3月，他绕道波斯湾、埃及、阿尔及利亚到达了那不勒斯，重新落脚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屈指算来，他前一次离开故国去苏联，至今已过了18个春秋了。

到达那不勒斯的那一天，陶里亚蒂穿着一套苏联裁制的不合身的兰西服，立即召见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指示他们把“制度问题”（即君主政体问题）延缓到大战结束以后去解决；实行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走向社会主义；把意共改造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这些指示被称为“萨莱诺转折”（萨莱诺是陶里亚蒂登陆的南部小镇）。

1944年3月30—31日，意共在那不勒斯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陶里亚蒂在会上提出把团结一切政治派别共同参加对德战争放在第一位，因此要求马上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全国委员会在会后发表了意共加入政府的四点声明：（一）维护民主、反法西斯自由力量阵线的巩固和团结；（二）保

证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普遍、直接和秘密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解决国家的体制问题；（三）成立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过渡性质的新政府，从事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缓和群众疾苦以及有效地制止反革命复辟；（四）意共保证它的斗争目的是把国家从德国侵略者和祖国叛徒手中解放出来；同时保证凡是愿意参加解放意大利战斗的人，在将来都会有自己的一份工作。<sup>①</sup>

全国委员会会议过后没有几天，接着便举行各党派，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民主劳动党、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代表以及知名人士的协商会议；4月21日组成了所有反法西斯党派都参加的第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1944—1947年，陶里亚蒂成功地恢复了同南尼的社会党于1934年订立的统一行动公约；由于提出了“新党”的理论，把党建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现代政党，1945年党员约42万人，而1946年则增到177万人；1946年6月大选中，意共获选票数居第三位；意共党员在政府中担任副总理、部长、大使等要职，在成千地方政府中担任领导工作。

陶里亚蒂采取这条新的策略路线，这是因为他深知要在意大利武装夺取政权当时是不可能的，首先，英、美军队占领了意大利，绝不会坐视意大利的起义；第二，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中只是少数。只有明智的政策，才能把大多数劳动群众赢到自己一边，从而同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使共产党人成为意大利民主化的旗手。

1947年5月，加斯佩里政府发生了危机，使它有可能会结

<sup>①</sup> 安·列普莱：《萨莱诺转折》，1966年罗马意文版第97—98页。

束同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作。从这时起，不论是中派、中右或中左政府，意共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9月，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会议上，意共的政策受到猛烈的攻击，被指责为“机会主义和议会主义”。1948年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由于美国政府公开警告意大利人，如果他们投票赞成意共，一切经济援助就会被取消，同时教会也对意共和社会党采取好战态度，结果两党联合提名的候选人被击败了。1948年的冷战开始，欧洲被人为地分成两个阵营，两种文明，人和国家被迫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但这期间最糟糕的要算意共和社会党的再次分裂。原因是：1947年春天和秋天，议会讨论共和国宪法第7条，内容是把梵蒂冈同法西斯政权缔结的“拉特兰公约”和1929年达成的“协议”写入意大利新宪法。意共仍希望同天民党合作，投了赞成票，而社会党坚决反对，投了反对票，这样，“统一行动公约”失效，从此两党就各奔东西了。当时陶里亚蒂考虑的是，如果投反对票，就会加剧宗教战争的危险，而且也会加深意大利民族的分裂。

## 八、同群众在一起

1948年4月大选以后，天民党和右派政客的言论和行动中攻击意共和陶里亚蒂越来越疯狂。加斯佩里的竞选演说词中竟把陶里亚蒂描绘成“魔鬼的化身”。7月初，下议院讨论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协定时，陶里亚蒂进行了反击。他说，如果通过这些协定，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就会无限期地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约。这样，意大利就是赞同美国分裂欧



洲的政策和准备战争的所作所为了。陶里亚蒂在发言的结论中指出，那种想用战争威胁或制止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是疯狂透顶的做法。这篇讲演在7月10日发表三天之后，受到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社论的攻击，说陶里亚蒂是在大言不惭地谈反抗，共和国政府和大多数意大利人将有勇气、力量和充分的决心来惩处陶里亚蒂和他的同谋们的叛乱罪行。

7月14日，上午11点40分，陶里亚蒂同他后来的妻子尼尔德·约蒂一起走出传道街蒙特奇托里奥议会大厦出口的小门前面，一个25岁的西西里大学生安东尼奥·帕兰特站在进门的台阶上，距陶里亚蒂只有两步远，向他开了四枪，第一颗子弹掠过陶里亚蒂的头顶；第二颗子弹打中他的脖子；第三颗子弹打中他的背部，凶手正想逼近他的胸口开枪，尼尔德·约蒂一面呼喊，一面掩护陶里亚蒂，于是第四颗子弹打在他的左胸上。这时好些人闻声赶来，凶手想夺路逃走被抓获。

虽然陶里亚蒂的伤势很严重，几天内处于死亡的边缘，但四颗子弹都没有击中要害部位，其中最危险的第二颗子弹击中脖子，但颈椎未破，否则会立刻丧命。

事后，罗马和意大利各地人民自发起来举行抗议集会，甚至于发展成罢工，来表达对这次谋杀事件的强烈愤慨。陶里亚蒂在动手术一周后已脱离危险，他告诫共产党员不要鲁莽行事。意共竭尽全力掌握这个运动，使它不至于发展成为过火的行动。7月16日，总工会命令立即复工，有些工厂到18日才完全复工。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陶里亚蒂伤势减轻，抱病出席了9

月22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并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纠正了选举前后所犯的机会主义、宿命论和极端行为的错误。9月26日，在罗马举行全国性的《团结报》节日，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广场发表讲演，聚观的群众有50万人。他除了说明自己已经康复，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外，还说，他的真正生活是从那天重新开始的，因为共产党人是习惯于同意大利人民群众一起生活、同甘共苦、一起进行斗争的，所以他的真正生活只有在能同人民群众有了充分的接触才重新开始。

1948年7月事件以后，意共成了议会中的反对党，但它仍然尽量避免同政府进行任何正面冲突，因为形势很可能使意共成为非法，而陶里亚蒂追求的目标是使意共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民主力量。

## 九、立足于意大利

1950—1951年这个冬季，陶里亚蒂由于车祸在苏联养伤。斯大林在一次接见中向他提到，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困难时期，共产党情报局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领导，建议陶里亚蒂来担任此职，住在布拉格或莫斯科都可以。斯大林还说，这一方案是为了提高共产党情报局的声望，也为了陶里亚蒂本身的安全。陶里亚蒂没有同意。随后斯大林召见塞基亚和隆哥，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塞基亚一回到罗马，就把斯大林的建议正式转给意共领导机关，并提议尽管陶里亚蒂本人反对也要接受这个建议。大多数领导人都附和总书记塞基亚的提议，只有隆哥和巴叶塔弃权，以及特拉契尼等

人投反对票。<sup>①</sup>决议通过后，塞基亚同考隆比专程到莫斯科把这一决定通知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听了非常恼火说，他要先回意大利参加意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然后再考虑接受职务问题。斯大林经这两名使者的转达意见，只得勉强同意。1951年2月底，陶里亚蒂回到意大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总书记。此后，这位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再也没有去过莫斯科。

陶里亚蒂为什么要拒绝这项任命呢？他对他的私人秘书卢易吉·阿玛岱西透露过，他的理想是创建一个“新党”，从此他就无意离开这个目标去担任一个空架子组织的领导人了。<sup>②</sup>此外，陶里亚蒂有宁愿在本国党内工作的习惯，1928年共产国际想把他从意共政治局调到国际西欧局去工作，当时他的抵触情绪也有点类似。

## 十、独立自主的立场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这给意共提供了重新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机会。陶里亚蒂再次强调战后初期提出的“新党”理论，并批评了塞基亚在40年代以“干部网络领导基层”取代“新党”的做法<sup>③</sup>。也由于后者继续支持斯大林路线，1955年1月被免去副总书记的职务，由乔治·阿门多拉继任。这一调动使陶里亚蒂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

---

① 乔治·博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973年巴里意文版第550页。

② 同上书，第546页。

③ 基层党员10人为一组，每组由干部网络的一个成员来直接领导。

位，并继续执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大利道路。

1956年2月，陶里亚蒂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有些观点他是同意的，如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核大战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和平共处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等。由于外国党的代表都没有被邀请参加“特别的闭幕会议”<sup>①</sup>，因此他回国后对斯大林问题没有专门提出来。只是在6月4日“秘密报告”被美国国务院披露后，他才于6月17日对《新议论》杂志提出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作了答复。中心意思是：谴责斯大林犯的错误是不够的，必须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做了坏事而不被发觉。斯大林的擅取权力使苏维埃制度已部分“退化了”。他的结论是：“对斯大林的批评暴露一个对整个运动说来是共同的普遍问题……官僚主义退化、民主生活的窒息、建设性革命力量与革命法治的破坏之间的混乱状态、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脱离，脱离群众的生活、积极性、批评和创造性活动。”<sup>②</sup>

苏联领导人对陶里亚蒂的这种立场是不满的。1956年6月末，莫洛托夫在会见巴叶塔时态度粗暴地说：“不，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sup>③</sup>稍后，苏共中央为此作出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我们不能同意陶里亚蒂同志提出的关于苏维埃社会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退化’……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sup>④</sup>

1956年6月发生了波兰事件，陶里亚蒂认为，这是苏共

① 赫鲁晓夫在此会上宣读“秘密报告”。

② 《陶里亚蒂言论集》，1966年中文版第2卷第90页。

③ 巴叶塔，《已经存在的危机》1982年罗马意文版第68页。

④ 参看1956年7月2日《真理报》。

二十大的决议和文件推动了人民去思考问题，却没有促使领导采取行动的结果。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决议，除了把波茨南工人示威运动解释为美国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还指责了陶里亚蒂及其答《新议论》杂志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观点。不久，陶里亚蒂显然修订了自己的立场：（一）他坚持认为，原则上意共有采取独立自主立场的权利；（二）他支持苏联对波兰危机的解释。<sup>①</sup>更清楚的是后来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意共的立场没有象对波兰事件那样激进，它多少同意了苏联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和做法。

过去，赫鲁晓夫在苏联政界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陶里亚蒂同他没有打过交道。这位苏联新领导人一上台，陶里亚蒂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讲演比作“一只走在蛋上的象”。此后三年，他每天早上见到助手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农哥’方面有什么消息？”，这里“农哥”就是指赫鲁晓夫。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再一次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甚至建议给斯大林格勒改名，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陵墓迁出。陶里亚蒂为此专门召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新立场。11月11日，他在《团结报》发表《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一文，其中对斯大林的遗体的处理问题要求“苏联同志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情绪的敏感，不应当要求做那些不是绝对必要的事情。”<sup>②</sup>此外还强调说：“在目前完全谈不上可能重新出现集中的国际组织问题，而且我们也反对出现这种组织……在我们看来，共产党之间奉行冷静

<sup>①</sup> 参看1956年7月3、4日《团结报》社论。

<sup>②</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1963年中文版第139页。

的和客观的讨论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sup>①</sup>他这里批评了苏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

## 十一、《雅尔塔备忘录》

陶里亚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体弱多病，而且国际上的风暴迭起，使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忧心忡忡。1963年年中，苏共企图在其他共产党中间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想把中苏两党的决裂用合法形式固定下来，因此建议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会议，指望在会上集体谴责中国共产党。10月，陶里亚蒂宣布意共不同意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会议。尽管意共拥护苏联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非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它明确地反对苏共对中共采取论战的方式。

1964年8月9日，陶里亚蒂去莫斯科，打算陈述意共对于苏共拟于是年12月召开国际会议的意见。赫鲁晓夫故意对他冷落，不予接见，他深感屈辱。8月12日，他去雅尔塔等待会见，当晚写下那份成为他的政治遗嘱的《雅尔塔备忘录》。《备忘录》是陶里亚蒂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的一个全面表态。他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性”同必要的独立自主之间的联系强调得非常明确。他认为，探索团结的方法不能依靠革出教门、行政措施或者回到旧概念的国际主义去解决，因此，1948年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铸成大错。共产党不论大党小党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活动，不

<sup>①</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1963年中文版第145—146页。

该从属于某个国际组织，或者需要得到它的批准。

他认为，当时国际形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美国政界的右派势力抬头，而欧洲的许多共产党缺乏群众基础，因此迫切需要对下列主要问题进行再思考；（一）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实现不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化的民主计划化的可能性；（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没有迅速实现较大的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三）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要性。

因此，陶里亚蒂主张不采取以前国际会议的方式，而主张采取不同地区的集会，也就是西欧、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和人民民主国家，分头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他坚决主张同共产党交换意见，在“没有刺激语言”和没有谴责口吻的情况下，对具体的问题以客观和说服的态度来处理。同某方面是对手的一方，始终要采取这种态度。

由于思绪万千，熬夜通宵，8月13日，陶里亚蒂患脑溢血，数日后逝世，雅尔塔之行的不幸在于他没有会见到赫鲁晓夫，没有实现他想在政治上教训“农哥”一顿的念头。他的逝世也是共产国际时代最后一个重要人物的陨落。不久，他的葬礼在罗马举行，参加的人民群众足有100万。

## 十二、坚定、灵活的策略思想

陶里亚蒂为意共的壮大奋斗了40多年，既参加过共产国际活动的全过程，又是战后意共“新党”理论的创始人。他意识到共产国际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局限性，但他没有放弃有些传统，而是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意大利的实践中去，因此，他的策略中存在着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如果说葛兰西

为意共奠定了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家，那么陶里亚蒂是把这些思想应用到斗争实践中去的策略设计师。他的主要策略简述如下：

（一）“新党”。陶里亚蒂考虑到战争后期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是按照老框框办事，意共的发展势必跟不上形势，于是他在1944年4月11日在那不勒斯的第一个重要报告中就向党员干部提出“新党”的问题。“新党”的性质包括全部放弃过去的宗派主义立场；批判把党看作是一个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由少数革命家组成的集团；在吸收党员方面采取新的跃进，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

他说，意共应当成为一个“新党”，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凡是“善良和诚实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可批准入党。“这个新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政党，它不局限于只是批评和宣传，而是通过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活动干预国家生活。”<sup>①</sup>

不久，陶里亚蒂指示把接纳党员的权力下放给当地的支部，而传统的程序是每一个申请人要由联合会这一级作出评议。他还批准由于贫穷而加入法西斯的工人，例如铁路员工加入共产党。<sup>②</sup>1945年4月，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把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入党的条件之一。”<sup>③</sup>

归纳起来，陶里亚蒂提出的“新党”有三个基本特征：（1）意共是个民族的政党；（2）意共取消纯宣传的职能，而要成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党；（3）意共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要成为现代群众性的政党。<sup>④</sup>

① 陶里亚蒂：《共产党的政策》，1945年罗马意文版第51页。

② 陶里亚蒂：《共产党的政策》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253页。

④ 参看1944年10—11—12月号《再生》月刊。



1945年末,意共在罗马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陶里亚蒂在报告中指出,意共的主要组织目标是“在制宪议会以前”,在每个村子和街坊建立共产党支部。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夺取政权的方法改变了,陶里亚蒂建立新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选举机器,而不是一个少数职业革命家的组织。

由于“新党”的方针的贯彻,1945年3月,意大利北部占领区的党员约有10万人,中部和南部地区在战争后期发展到31万人。1945年年底,意共五大时,党员总数达到175万人。根据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凡年满18岁的诚实劳动者,不论其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和哲学倾向,都欢迎加入意大利共产党。”<sup>①</sup>

(二) 结构改革。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使这种制度立即崩溃,因为它有自我调整的能力。陶里亚蒂有鉴于此认为,意共不仅要采取防卫性策略,也要采取进攻性策略,“结构改革”的概念就是这种策略的第一步。

1945年末,意共在五大提出:在打败纳粹和法西斯以后,党的直接将来的目标是消除法西斯主义的根基、垄断资本和大地主阶级;农业和工业要一起进行改革,把大垄断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以及扩大大战时期的工人委员会,作为计划经济的手段。这些结构改革的措施,其目的是加强工人阶级及其联盟体系,并削弱它的敌人。这样,结构改革的概念解决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两脱离的状态。

---

<sup>①</sup> 《意共党章(意共第5次代表大会通过)》,1946年罗马意大利文版第5—6页。

1956年12月9日,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结构改革”的问题,他说,意大利总的情况是经济制度不能保证生产力持续地合理发展,不能保证全体公民有工作做,不能克服根深蒂固的矛盾和落后,因此改变这种制度的结构是当务之急。其中垄断资本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力量最反动的,要把它作为重点打击的目标。当前的结构改革是:(1)土地改革;(2)垄断企业国有化;(3)对价格、利润、关税、不动产的买卖采取民主监督;(4)改革税收制度。

陶里亚蒂认为,结构改革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经济结构的变革,这是对今天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首要敌人的斗争措施。<sup>①</sup>,党的反垄断企业的政策,同时建立了结构改革的形式,也就必然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联合体,这一历史联合体由不同的非垄断的阶级和阶层所组成,因此结构改革也同党的联盟策略挂起钩来。

(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陶里亚蒂关于新型民主制的思想总的体现在意共参与制订的战后共和国的宪法上面:“国家以劳动为基础、劳动权、实现此项权利之条件、保护劳动、保证每个公民过自由的和象样的生活、男女同工同酬、社会保险权、财产的社会职能、土地改革、没收垄断企业……劳动者参加企业管理。”<sup>②</sup>

陶里亚蒂在1960—1963年对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少见解,归纳起来有:(1)政治改革和结构改革措施同遥远目

<sup>①</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1966年中文版第21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35页。

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经济的合理发展而实行国有化由国家进行干预,或者扩大政治的独立自主权,或者提高劳动者的福利,都不足以改变政权和社会的性质。但是这些东西的实现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只有更换了社会 and 国家的领导阶级,社会的性质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2) 意共主张通过民主运动,而不是暴力方式,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些民主运动如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的巨大运动、经济和政治的罢工、人民愿望的自由表达等。意共希望通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和平方式走向自己的目标;(3) 意共绝对不在西方民主中除去任何东西,而是相反会给民主增加许多东西:劳动者进行监督和直接参加生产组织的新形式应该实行;国家的强制机构大部分应该消亡,让位给自由的互助组织和对公民生活各方面的集体监督;(4) 民主斗争同社会主义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主不是什么形式,而是实际的新东西。光是经常举行选举并不足以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如希特勒也是通过公民投票上台的。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所讲的民主在于“要使人民的意志成为真正决定政治发展的因素,使它深入到经济生活、从而深入到整个文明社会的组织中去,同时改变这个组织。”<sup>①</sup>

(四) 多中心主义。陶里亚蒂关于“多中心主义”的理论是对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了重新审查之后得出的理论。根据列宁关于任何革命原则都必须适应每个国家的特殊历史经历的原理,他提出,由于各国党出现不同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就产生了不同

<sup>①</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1963年中文版第33页。

的中心，这样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就被建立起来了，这是符合新形势下世界结构和工人运动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

陶里亚蒂第一次应用“多中心主义”的名词是在1956年6月17日《答〈新议论〉杂志》一文中：“整个体系正在变成多中心的，而在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也不能谈论唯一的领导，而应该谈论遵循往往是不同的道路而实现的进展。”<sup>①</sup>

实际上，“多中心主义”的理论是由“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概念引伸出来的。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历来强调意大利环境的特殊性，但是没有明确自认意大利有走向社会主义的独创性道路的可能性，而是在苏共20大，陶里亚蒂才明说：“苏共遵循的获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条道路并非所有方面是各国所应履行的，因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不同的国家中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sup>②</sup>这些话的含意十分清楚：既然有民族的道路，就不可能由一个中心去解决不同道路的问题。可是“多中心主义”“曲高和寡”，很多党的代表尽管口头上也说各国的社会主义有特殊性，但更强调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许多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基本规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56年12月，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重申“多中心主义”，“因为不再有单独一个组织，从而不再有单独一个指导中心，所以有人曾经想到一种多集团和多中心的体系，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发现也是同每个党的充分自主不相容的……双

---

①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第90页。

② 陶里亚蒂：《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意大利道路》（《再生》月刊1956年2月号）

边关系的体系是符合自主的需要的。”<sup>①</sup>

1957年1月，法共就猛烈攻击陶里亚蒂提出的理论；12月末，12个执政的共产党（不包括南斯拉夫）签署了一项直接针对陶里亚蒂立场的“联合声明”。此后，意共暂时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多中心主义”，直到1961年11月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上，发言者异口同声地认为“多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个事实。这是指当时由于中苏分裂出现的新形势。当然“多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雅尔塔备忘录》中才得到充分的发展。

总之，陶里亚蒂的策略名堂不少，但它们是一个整体，归结为一条总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实际上，这条路线可以追溯到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策略，所不同的是，陶里亚蒂对这一策略的概念已作了数十年的修订，已成为意大利的类型了。

---

<sup>①</sup> 《陶里亚蒂言论集》第2卷，第197页。

## 参 考 书 目

1. 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983年中文版。
2. 葛兰西：《政治论文选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伦敦)。
3.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1960年中文版。
4. 克罗齐：《历史编纂学的理论》1954年意大利文版。
5. 《陶里亚蒂言论集》1966年中文版。
6. 保·比柯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1983年英文版(伦敦)。
7. 安·列普莱：《萨莱诺转折》1966年意大利文版(罗马)。
8. 乔治·博卡：《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973年意大利文版(巴里)。
9. 陶里亚蒂：《共产党的政策》1945年意大利文版(罗马)。
10. 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1960年英文版(纽约)。



# 贝林格

田时纲 撰



## 篇 目

一、贝林格战斗的一生.....	236
(一) 富有造反精神的“贵族”青年.....	236
(二) 加入意共、领导面包运动.....	237
(三) 从青年运动领袖到中央党校校长.....	239
(四) 从中央书记到副书记.....	243
(五) 意共总书记.....	249
二、历史性妥协 .....	253
三、欧洲共产主义 .....	261
四、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他 .....	267
参考书目 .....	276



貝林格(1922年—1984年)



---

# 贝 林 格

田 时 纲

恩里科·贝林格(1922—1984)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

贝林格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意大利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光荣事业。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意大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思想，为探索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意大利共产党(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贝林格坚持国际主义相互声援必须同尊重各国共产党主权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党与党关系中独立自主、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准则，为建立党与党之间的正确关系和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②

作为欧洲议会议员和左派政治活动家，他为欧洲左派的团结，为世界和平事业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贝林格的正直、热忱和献身精神，受到人们的普遍赞

---

①② 参见《中共中央致意共中央唁电》，刊于198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扬。

## 一、贝林格战斗的一生

### (一) 富有造反精神的“贵族”青年

1922年5月25日，恩里科·贝林格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萨萨里市一个律师家庭。贝林格家族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恩里科早在都灵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就成了忠诚的马志尼主义者。毕业后回撒丁创办了具有反教权主义倾向的《新撒丁报》。其父马里奥继承父业，接办《新撒丁报》，又是当地著名律师。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成为自由民主联盟的议员，后又参加了阿文蒂诺<sup>①</sup>抵抗议会。在一次反法西斯集会上，曾被法西斯匪徒用刺刀扎伤。外祖父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忠实信徒，贝林格从小就受到他的强烈影响。总之，贝林格属于资产阶级的、但又富于革命精神的家庭。

少年的贝林格就喜欢玩“法国革命”式的游戏。他常扮演罗伯斯庇尔，和孩子们互称“公民”。一次，他成功地组织了当地少年反对在街道上乱倒垃圾的游行。

母亲的病重和早逝，法西斯势力对其家庭的敌视，使贝林格从小就具有反抗精神。十几岁时，他就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置于“无畏的客观的批判”之下。但家庭遭到的不幸也影响了贝林格内向的性格和在中学的学习。中学学习成绩一般，只是历史和哲学成绩优异。多年后。当法拉奇<sup>②</sup>问他，如果

<sup>①</sup> 阿文蒂诺为罗马七座山丘之一，古罗马的平民反对贵族曾退守此地。1922年意共等反对党在此聚会，与墨索里尼法西斯议会分庭抗礼。

<sup>②</sup> 法拉奇为意大利著名女记者。

不投身政治的话，你乐于从事什么事业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做个哲学家。

1940年11月5日，贝林格到萨萨里大学法律系注册。但他仍然喜欢阅读哲学书籍。他最欣赏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其次是康德和黑格尔左派的著作。夏季避暑时他常将柏拉图和克罗齐的著作带到船上阅读。随后，他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兴趣。

在通过各科考试后，他为毕业论文《从黑格尔到克罗齐、金蒂莱的法哲学》搜集资料。此时开始与反法西斯青年进行接触。

## （二）加入意共，领导面包运动

1943年11月，21岁的贝林格秘密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并很快成为意共萨萨里青年委员会委员，之后又升任书记。

贝林格负责青年集会和讨论会的组织工作。此外，他还为青年们主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道德课。最后一节课的结束语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所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彻底解放劳工的理论正在迅速地 and 胜利地传播。所有这一切在战后不久就导致了体现整个劳动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加强。但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预感到全体劳动者的愿望和团结将给他们的利益带来的危险，他们把国家政权毫不犹豫地交给了资产者和剥削者的政党，也就是说交给了法西斯党。这个党反对劳工权利，维护压迫阶级的特权。但是，由于全世界道德和物质力量的觉醒，法西斯主义已是日薄西山。今天，我们应当感到有权利和义务团结起来，防止在战后出现任何形式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压迫，也

就是说防止意大利再次落入一小撮企图阻止无产阶级前进步伐的大资本家和暴君之手。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此时，贝林格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立场。

1943年7月25日，法西斯政权垮台。贝林格认识到党扎根于群众的重要性。很快，他组织起萨萨里第一个党支部。晚上他和同志们开完会从党部出来，沿街高唱国际歌、红旗歌和反法西斯歌曲。

1944年冬，萨萨里形势十分严峻：面包、煤、食油、糖等严重短缺，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1月21日晚，贝林格召集革命青年开会决定第二天游行。头一天贝林格和他的战友带领妇女和少年到市政府示威。翌日，男人们在党旗的指引下，将面包店洗劫一空，把成口袋的面包发给饥饿的群众。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贝林格率领青年用石子还击。在军队和坦克介入后，警察在党部逮捕了30多人。三天后，贝林格在家中被捕。当天夜里贝林格被提审，他的回答是“我声明信仰共产主义理论”。警察局指控他是“骚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审查报告中称他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理论学者、共产党在萨萨里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要求释放年青共产党人的呼声响彻全国，贝林格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意共机关报《团结报》上。1944年4月25日，全国解放日那天，贝林格在经过100天的监禁后，和战友们一起被释放。

在狱中，贝林格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大量的列

---

<sup>①</sup> 转引自吉利奥：《贝林格》中文版第13页。

宁著作和葛兰西论南方问题的文章。他非常崇敬葛兰西这个撒丁出生的英雄。在狱中他还每天坚持做祖父传授的德国体操。面包运动使贝林格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多年后他谈过“牢房教育人、锻炼人”。正是在狱中他作出了抉择：离开大学，做个职业革命家。

### （三）从青年运动领袖到中央党校校长

1944年6月底，贝林格到萨莱诺看望在民族团结政府任职的父亲。应他的要求，其父把他介绍给回国才3个月的陶里亚蒂，陶里亚蒂是其父中学时代的同学。第一次会见时间很短；几天后，贝林格同陶里亚蒂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见。

盟军进入罗马后，贝林格的父亲随政府迁移来到罗马。1944年秋，贝林格被陶里亚蒂召到罗马，做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全国书记处成员。1945年贝林格调到米兰，担任意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办公条件十分艰苦，晚上室内寒气逼人，贝林格常常冻得发抖。

1946年贝林格又调回罗马，先做全国青委会负责人，后担任全国青年联盟的书记。

1948年1月召开的意共六大上，26岁的贝林格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领导机构候补委员。

1950年3月29日—4月2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里窝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贝林格当选为总书记。在大会主席台上，陶里亚蒂将共青盟旗帜交给贝林格，对他说：“贝林格同志，请从意大利共产党手中接过这面旗帜，你们青年人要学会永远忠于它。”

贝林格把陶里亚蒂看作自己的良师，他对陶里亚蒂的敏



锐的洞察力，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十分尊崇。他忠实地执行陶里亚蒂的团结大多数青年的政策，使共青盟很快成为拥有50万成员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贝林格任共青盟总书记达7年之久。他是共青盟同意共的官方联系人，有机会参加意共领导机构的重大讨论，这使他能直接了解意共的重大决策过程和党内斗争情况。

作为共青盟总书记，贝林格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每月只领取5千里拉的工资，生活很清苦。贝林格一贯反对奢华铺张的作风。一次，他率意大利共青盟代表团参加法国共青盟代表大会，晚上不住旅馆而是睡在帐篷里。他因只有一件外衣，有时为了洗熨，不得不在帐篷内待上半天。还有一次他到恩波利视察工作，听完汇报后当地共青盟干部在饭店为他预定了丰盛的晚餐，他见后生气地说：“我只要一碗汤和一小块奶酪就足够了。”以后，贝林格作为党的总书记参加欧洲议会竞选时，曾用上整天时间计算由助手预定的私人飞机的费用是否超过乘火车和汽车所需费用。

在冷战年代，贝林格领导的共青盟成为和平运动的先锋。他组织募集到450万反对核战争的签名。共青盟中央还发动了制做和平旗帜运动。女盟员将五颜六色的布条缝制成旗帜，作为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象征。短短几个月，就制成了8千多面和平旗帜。登山运动员贝吉奥利甚至把它插到欧洲第一峰——勃朗峰上，当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往朝鲜扔原子弹时，书记处决定把和平旗帜插到意大利总理府——比基宫的屋顶。

贝林格在青年工作中，注意将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他牢记着陶里亚蒂的教诲：不能让天民党和

右派垄断爱国的情感。”为此，贝林格组织了保卫的里雅斯特大游行。

贝林格还注意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性道德教育。他认为，资产阶级性自由不能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同日而语。针对天民党的反动宣传，贝林格指出，两性关系是严肃的社会关系，应建立在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基础之上。夫妻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忠贞不渝的终身伴侣。贝林格在这方面以身作则。一次，他去利古里亚区女盟员夏令营作报告，爱上了一位16岁的理发员，但他没有表露真情。回到罗马后他派一名女干部将爱慕之情转告那位姑娘。姑娘的回答是：“我对他的建议不胜荣幸，我十分敬重和欣赏他。但我爱我的未婚夫——我们的支部书记。”当贝林格得悉这一回音时，表现出惯常的平静，但一段时间变得更加内向。

从1950年至1952年，贝林格还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这是个包括74个国家和7200万会员的大组织。这期间他同社会主义国家共青团领导人建立了友谊。各代表团之间无休止的会谈和文件的起草，使贝林格增强了对国际问题的认识。

当苏联人坚持将南斯拉夫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清除出去时，贝林格同苏联人发生了最初的冲突。尽管他同意批判南斯拉夫人，但他主张青年组织应有相对独立性，不赞成开除南斯拉夫人。

1952年，贝林格在布拉格被苏联人逮捕，并被解往莫斯科。

青年在领导反对大西洋联盟的联欢节非常恼火。柏林胜利之后，贝林格的护照被吊销，有3年未能出席国际会议。

贝林格在意大利共青盟工作的最后几年困难重重。为了加强同天主教青年组织的竞争，共青盟降低了入盟年龄（13岁）。基层组织出现非政治化倾向，很多支部成了俱乐部，严重丧失了独特性和战斗力。苏共二十大后，形势更加严峻，盟员人数大大下降。贝林格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陶里亚蒂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任命特利韦里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新的总书记。1956年，贝林格挥泪离开了战斗多年的共青盟总部。

1956年4月，在罗马召开意共八大，这是意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大会制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总路线。陶里亚蒂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执政的共产党应防止“官僚主义蜕化”和“窒息民主生活”等危险。贝林格在会上既肯定了对修正主义危险的谴责，又批判了宗派主义倾向。但贝林格为共青盟工作的失误付出了代价：他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机构，而是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

在党校的10个月里，贝林格根据意共八大精神对教学进行改革。首先，他取消了学员到苏联马列学院受训的规定。接着，他删去大量关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教材，增加有关中国革命和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内容，重点学习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贝林格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教员和学员都乐于同他谈心。他亲自给学员们讲授有关国际政策的课程。

在党校期间，贝林格对共青盟后期工作的失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感到有必要重新学习，开始从事真正的理论研

究，并同教条主义决裂。他同时认识到自己“平步青云”，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决定到地方工作一个时期。

1957年9月26日，贝林格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同表妹的同学莱蒂齐娅结婚。莱蒂齐娅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一个不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活泼、外向、爱动感情。信仰上的差异，性格、气质的不同并没影响他们相爱。

几天后，应贝林格本人的要求，党中央派他到家乡撒丁任大区副书记。

#### （四）从中央书记到总书记

1958年7月的大选中，意共在撒丁大区的选票上升了几个百分点。由于贝林格工作出色，很快被召回罗马，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意共九大上，贝林格当选为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并接替阿门多拉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实际上，贝林格是在党内矛盾和争论日益激烈的时刻返回中央领导机构的。当时意大利政局正在向右转，警察枪杀罢工工农，新法西斯分子袭击游行群众。另一方面，意大利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工人人数减少，中间阶层人数增加。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贝林格在组织部工作的3年中，广泛吸收中间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

1961年苏共派波洛马廖夫来意大利，他看到艾米利亚大区只有40%的工人党员，就指责意共队伍不纯，敌人渗透进来了。贝林格回答说这是意共的独特性。波洛马廖夫反驳说：“今天你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了。”贝林格平静地点燃一支香烟，说：“亲爱的波洛马廖夫同志，在你周围的这些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是中央委员，只有一个不

是工人出身，那就是我。”<sup>①</sup>

由于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党变得更开放，更富有群众性，使得意共在1961年的大选中选票上升了三个百分点，达到25%，这是苏共二十大后首次回升。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再一次引起意共内部的争论与斗争。在阿门多拉右派和英格拉奥新左派的冲击下，陶里亚蒂的权威首次开始动摇。贝林格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这时，陶里亚蒂决定由贝林格和布法利尼起草一个文件，以统一全党认识。任务是星期五下达的，星期一必须完成。他俩整整干了一天两夜，星期一上午交稿。陶里亚蒂阅后表示满意，并做了一些修改。这个文件对意共在斯大林时代的政策作了大胆的自我批评，阐明西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批评苏联如不改变现有模式就不会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文件在意共总部举行的有200多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对外界的影响远超过意共八大。

与此同时，党内又一次掀起关于苏联、民主和社会主义讨论的新浪潮。资产阶级政客范范尼<sup>②</sup>利用这种形势污蔑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危机”。在阿莱佐举行的讨论会上，贝林格痛斥这种论调，他说：“由于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坦率而大胆的自我批评，显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教会当局何时会有此种勇气谴责对异教徒的迫害、火刑、严刑拷打和审讯呢？”<sup>③</sup>

<sup>①</sup> 转引自C·瓦伦蒂尼：《贝林格同志》，意文版第137—138页。

<sup>②</sup> 范范尼：(1908—)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当时任意大利政府总理。

<sup>③</sup> C·瓦伦蒂尼：《贝林格同志》第141—142页。

由于贝林格有丰富的外事活动经验和善于使对手屈服的谈判能力，他常作为意共出席国际会议的首席代表和国际问题发言人出访。

1964年5月，陶里亚蒂派贝林格率意共代表团访苏，劝说赫鲁晓夫不要召开谴责中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从此，每当对苏联人说“不”字时，意共就派贝林格去莫斯科。

1964年8月，相当长时间受到赫鲁晓夫冷遇的陶里亚蒂，突然收到苏斯洛夫通过秘密渠道发出的邀请——要他尽快去苏联“度假”。陶里亚蒂到雅尔塔一周后，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陶里亚蒂逝世后，原游击队总司令隆哥接任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坚决支持隆哥公开发表陶里亚蒂的《雅尔塔备忘录》。

同年10月，贝林格率意共代表团到莫斯科，要求苏共解释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贝林格、布法利尼和塞列尼会见了苏斯洛夫、波洛马廖夫和波德戈尔内。会谈时贝林格首先发言：你们难道不懂得这样会损害你们的威信。”苏联人解释说赫鲁晓夫是个随心所欲者，他的一系列政策引起了混乱。他们并指责意共公开发表陶里亚蒂的备忘录破坏了团结。

代表团回到罗马后不久，发表了意共领导机构的文件，指出意共与苏共在赫鲁晓夫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此时，贝林格已认识到应首先思考的是西方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

1966年1月在罗马召开意共十一大，贝林格退出书记处，当选为政治局委员，2月被任命为拉齐奥大区书记。对这次降职有种种解释：其一是说他在意共十一大上没有坚决批判英格拉奥新左派；其二是说隆哥已选定他当接班人，有意让他

避开斗争激烈的书记处，取得地方抓全面工作的经验。

在任拉齐奥大区书记期间，贝林格仍要负责一些重要的外事工作。1966年11月，他率意共代表团访问越南。1968年3月，率意共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参加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召开旨在谴责中国、恢复苏共权威的国际会议。贝林格坚持隆哥的“多样化中求团结”的原则，主张意共应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扩大影响，在国际共运中组织耐心认真的讨论，弄清是非，求同存异。

在1968年3月的大选中，贝林格当选为参议员，并成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1968年8月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共谴责苏联等国对捷内政的干涉。隆哥又派贝林格率代表团与苏联人会谈。在会谈中，基里连柯和波洛马廖夫不断地说：“如果你们希望杜布切克前进的话，应该对捷共的成就发布一个一般性祝贺的文件。”贝林格坚决反对：“不。这不可能，那将是对干涉的辩解词。”<sup>①</sup>由于贝林格的坚定态度，苏联人不得不让步。在告别晚宴上，基里连柯说他因缺少对杜布切克的祝贺已有两夜未眠，贝林格听后没有开口，只是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就在意共谴责华约军队侵捷两个月后，隆哥患了脑出血症，这时他已意识到选定接班人的紧迫性。在意共十二大召开之前，隆哥建议由贝林格担任副书记，但他拒绝接受。贝林格认为自己缺乏经验，不能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提议由其他贡献更大的同志担任。隆哥一再劝说，他仍不同意；只

<sup>①</sup> C·瓦伦蒂尼《贝林格同志》第200页。

是意共领导机构作出决定以后，他才同意。

1969年2月8日—15日在波伦亚召开意共十二大，贝林格当选为意共副书记。这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党内意见严重分歧的时刻召开的。纳波里塔诺主张议会斗争，阿门多拉对学生运动持否定态度，罗桑达与平托尔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资本主义西方革命”的问题，此外还有不少亲苏派。在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贝林格努力消除党内分歧，统一认识，加强团结。

关于苏联问题，贝林格指出苏联东欧的可怕的官僚主义，窒息了来自下层的言论自由，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学生运动，他既反对阿门多拉派断然拒绝的态度，也不赞成英格拉奥派放弃领导、让其独立发展的主张。他认为意共应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正确指导。

贝林格指出，意共向往的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保证宗教信仰、文化和新闻自由。而且，意共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可以使大部分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欧同实行苏维埃制度的东欧找到汇合点。

关于国际主义，他主张应具有同社会民主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这种新形式。为此，意共对北约解体不感兴趣，也不要求意大利退出该组织。

贝林格的总结报告赢得全体代表长达数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主席团成员离开座位站在他的周围，意共新的领导核心形成了。

1969年6月7日，贝林格首次以意共副书记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75国共产党国际会议。贝林格向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出有力挑战，他说：“我们拒绝接受这



样一种观念，即似乎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实际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来没有以纯粹状态存在着，而总是并仅仅是在历史地决定和不可重复的个别事件中存在着。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就是公式化和学究气，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sup>①</sup>

贝林格结合侵捷事件深刻批判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他说：“那些事件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不能把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行动仅仅看作是一个错误，而应看成是在诸如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文化自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的结果。”<sup>②</sup>

贝林格重申“对持不同观点的人乱扣意识形态帽子的倾向应当结束了”。因为，“在真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力图以离经叛道来解释所有分歧，实际上这不仅会使分歧更趋尖锐，而且还封锁了理解产生这些分歧的客观原因和现实利益的途径”。<sup>③</sup>

当大会即将结束时，苏联人将包括四个部分的最后文件送交贝林格。他拒绝签字，声明“意大利代表团只同意第三章”。

贝林格回国后不久，宣言派事件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支持中国“文化革命”的罗桑达和平托尔创办了《宣言》杂志，每期印行5万份。他们要求意共实现同苏联的真正彻底的决裂，反对意共同天民党接触。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召开会议审理这一事件。贝林格提请大家从

① C·瓦伦蒂尼：《贝林格同志》第203—204页。

② 吉利奥：《贝林格》第92—93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积极方面看待宣言派最近的立场，应考虑他们的美好愿望，不要给予纪律处分，至少应让基层讨论。基层讨论的结果加剧了分歧：党内元老派、阿门多拉右派、英格拉奥左派、甚至中间派都主张对宣言派采取组织措施。1969年10月17日，中央全会做出决定清除宣言派。

一段时间内，宣言派严厉批评贝林格；但多年后，该派首领也不得不承认贝林格处理“离经叛道者”的方式与众不同：他把全部争论都公布于众，继续保持同他们的私人关系，没使他们心灰意冷。这标志着贝林格成为意共的一位新式领袖。

#### （五）意共总书记

贝林格担任了3年的副书记，于1972年3月在米兰召开的意共十三大上当选为意共总书记。作为党的领袖，贝林格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陶里亚蒂的思想，努力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的特点和道路。

1973年9月，贝林格就智利人民阵线政府被右派军人政变推翻事件撰写了长文——《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思考》，首次提出了“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思想。

贝林格的文章在党内引起广泛争论，历史性妥协思想没有得到基层的理解和支持。连退居二线的意共主席隆哥也认为尽管政策本身正确，但历史性妥协的提法欠妥。

贝林格指出，“妥协”这个概念不一定是贬义的。列宁也说过，在某些历史关键时刻，实行妥协还可能带来革命的结果。

1975年是贝林格内外政策取得进展和成功的一年。

在3月召开的意共十四大上，贝林格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性妥协路线及其世界意义。正是由于贝林格的调解，两个德国才接近起来，也正是意共建议勃兰特实行同东欧国家寻求谅解的政策，才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气候。

贝林格还说，历史性妥协实质上是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有共产党人进政府才能改变意大利的社会环境。

在6月15日的地方选举中，意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获得33.5%的选票。意共在许多城市获得相对多数，开始了左派在大区和市执政的历史。

7月12日，贝林格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在里窝那会晤，并诞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第一个正式文件——会谈公报。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赞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主张西欧社会主义力量、社会民主党力量和天主教力量达成谅解。

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莫过于法共转变到意共立场上了。11月，贝林格到巴黎会晤了法共总书记罗歇，从而结束了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对立。在贝林格的劝说下，法共终于解除了同苏共的特殊关系，两位领导人承认西方有它们自己的问题，西欧必须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此时，意共、法共和西共这三个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协调了政治路线，欧洲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思潮和政治力量已经形成。

贝林格奉行独立于苏联的路线，但他注意避免两党关系破裂。1976年2月末，苏共召开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歇和卡里略拒绝参加，而贝林格却前往莫斯科。他在苏共二十五大的讲坛上强调意共的自主性——实行独立的、多元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

这年6月3日，贝林格前往巴黎对马歇进行回访。在群众大会上，贝林格首次正式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6月30日在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柏林会议上，他再次提到“欧洲共产主义”，并指出它的广泛传播恰恰反映出西欧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强烈要求。

由于意共实行独立自主的路线，对马克思主义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得到知识界和中间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在6月的大选中意共获得空前的胜利，取得34.4%的选票，议员席位增至227人，还获得众议院议长、7个有立法权的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位。一个月后，贝林格为组织政府同天民党领导人频繁接触。从此意共开始以弃权方式支持政府，实行民族团结政策。

1978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贝林格转而提出意共直接参加政府的要求。接着，在就组成政府的一系列会晤中再次强调这一立场。

3月16日天民党总书记莫罗被红色旅绑架，5月被杀害。贝林格多次声明意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指出“恐怖主义是民主的敌人”。

8月1日，针对社会党对意共的攻击，贝林格在答《共和国报》社长问时，高度评价列宁的理论贡献。

1979年3月30日—4月3日在罗马召开意共十五大，贝林格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他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阶段论。在总结报告中他重申了意共的“新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两个月后的大选中，意共的选票下降了，只达30%，几天后的欧洲议会选举也只得29%的选票。这反映了历史性妥

协政策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意共工作中的失误而受挫。

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贝林格已认识到“同今天这种状况的天民党是不可能达成政治协议的，近三年来尝试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sup>①</sup>

1980年11月南方的伊比尼亚发生地震，贝林格赶到萨莱诺谈民主代替政策。

11月27日下午，意共领导机构举行会议，建议成立一个没有天民党参加的政府，意共实行“民主代替”的新的政治路线。这一决定受到意共广大党员的欢迎。

1980年是贝林格外事活动频繁的一年。

3月，贝林格会见勃兰特和密特朗。

4月6日，他率领意共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会见铁托。

4月13日，贝林格率领意共中央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使中意两党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党领导人遵循相互尊重和增进相互了解的原则，还无拘束地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1年12月，贝林格表示了对波兰事件的关注。第二年1月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做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意共的立场。在报告中贝林格指出“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已经失去推动力”。<sup>②</sup>他重申意共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些观点在中央全会上遭到科苏塔的反驳，他指责贝林

---

<sup>①</sup> 吉利奥：《贝林格》第185页。

<sup>②</sup> 《现实社会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罗马1982年意文版第17页。

格已堕入社会民主党立场。

苏共《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同意共《团结报》和《再生》周刊就贝林格的报告展开激烈论战。

1983年3月2日—6日，在米兰召开意共十六大。贝林格再次当选为总书记，他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民主替代”的政治报告，号召全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为代替天民党政权体系而奋斗。

1984年6月7日晚，贝林格在帕多瓦的群众大会上为欧洲议会选举代表发表竞选演说即将结束时，突发脑溢血。6月11日，他不幸逝世。贝林格的逝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

6月13日下午4时举行葬礼，上百万群众从意大利各地汇集罗马圣乔万尼广场，沉痛悼念人民的儿子，向敬爱的领袖告别。

## 二、历史性妥协

早在1973年3月召开的意共十三大上，意共就宣布现在到了“民主的转折点”，提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合作的新的政治路线。

1973年9月，智利发生推翻以阿连德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反动政变。在9月28日、10月5日和9日的《再生》周刊上连载的《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的长文中，贝林格首次明确提出“历史性妥协”思想。

1975年3月召开的意共十四大上，“历史性妥协”作为党的长期战略被正式确定下来。

这一战略的实施经历了准备阶段（1975年3月至1976年6

月)、实施阶段(1976年6月至1978年3月)和受挫阶段(1978年3月至1979年11月)。<sup>①</sup>1980年11月,贝林格和意共领导机构决定实行“民主代替”的新的政治路线。

应该说,“历史性妥协”战略从一开始就在意共党内引起激烈争论;直至今日,对这一战略思想的讨论仍未停止,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实际上,“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葛兰西。早在二、三十年代,葛兰西就深入探讨过法西斯成功的深刻原因,指出意大利无产阶级必须解决好同天主教运动的关系问题,否则革命就不会成功。后来这一思想又为陶里亚蒂所继承。1944年3月,陶里亚蒂返回意大利。他注意到国内基本力量不仅有工人运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还有天主教运动。他将天主教运动放到革命整体观中考察,对左派传统战略作了修改,即“萨莱诺转折”——同天主教民主党搞统一战线。结果促成了共和国的建立和民主宪法的制定。在1947年冷战爆发后,意共采取了只同左翼政党结盟的“左翼选择”的新路线。但到60年代,随着中左政府成立、左翼队伍分化而难以执行。这之后意共一直就战略思想展开广泛的讨论,直到贝林格提出“历史性妥协”思想才告一段落。

什么是“历史性妥协”?贝林格在《智利事件后对意大利问题的考虑》一文的结尾写道:由于我国的问题严重,由于反动派的冒险迫在眉睫,由于需要最终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革新和民主进步打开一条可靠的出路,实现妥协——可以

<sup>①</sup> 参阅苏瑞林:《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战略》。

称之为团结和代表意大利人民大多数的各种力量之间新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就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成熟了。”<sup>①</sup> 1978年8月1日，他在答《共和国报》社长斯卡尔法里问时进一步阐明：“我们确信，意大利是一个需要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国家，这就是说，对结构、公共道德和社会组织来一次深刻革新。而没有各种大的社会力量（工人、从事生产的资产阶级、农民、青年群众、妇女群众）和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世俗力量）协同一致，就不可能开始和推进这些变革。共同肩负这一历史性责任并不是必然地要约束所有力量都得参加议会多数和政府。不同的政治协议形式、政府联盟和议会多数可以轮番地形成，只要始终共同负起责任，只要始终保持全国团结，始终为互相谅解而努力，特别是共同致力于变革国家。这就是历史性妥协。”<sup>②</sup>

那么，为什么在意大利不能实行左翼代替，而应搞历史性妥协呢？

贝林格指出以下原因，

1. “在意大利，存在着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的天主教问题，同时存在着具有同样特殊性质的共产党问题”。<sup>③</sup> 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有着世界天主教中心和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这就要求意大利无产阶级必须解决好天主教同国家、同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要解决的另一问题是同那些人数越来越多地投入劳工运动，并且具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

<sup>①</sup>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6页。

<sup>②③</sup>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73页。



意向的天主教运动和派别寻求一种更加广泛的相互了解和真正的一致。正是从天主教问题及其在意大利的特殊意义出发，贝林格来处理同天主教民主党的关系问题。

天主教民主党是一个与教会的各种各样非政治性天主教组织保持联系的群众性政党，又是一种与国家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贝林格认为，天民党是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群众性政党。它既有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联系并受其影响的一面，又有接受工农群众和广大中间阶层影响并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一面。<sup>①</sup>因为，其党员成份，工农群众（包括手工业者、农业短工）占到40%，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足10%，其他为广大中间阶层。其次，除了天民党的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社会成分以外，天民党内派别林立，既存在反动的、保守和温和的派别，也存在民主和进步的派别。贝林格告诫全党，在处理天民党问题时，所有这些派别都应加以考虑。最后，通过对天民党曲折历史的考察，贝林格指出，该党的政治路线“往往表现出相互敌对的态度”。天民党是作为人民的、民主的和世俗的政党而建立的，最初反对法西斯运动，后来转而支持并参加了第一届墨索里尼政府，接着又退出了政府，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全国解放后，同共产党、社会党合作，建立了共和国，制定了宪法。但1947年以后，天民党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推行同社会主义运动对立和正面冲突的路线。现在，尽管天民党仍保持其路线的反动、保守性质，但由于意共的顽强斗争，它已无法再使国家处于从上到下的分裂和正面冲突的局面，并在该党内造成了一种新形

<sup>①</sup> 参阅《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31页。

势。天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如政治书记莫罗认识到没有意共的合作，就不能解决国家的危机，从而赞成同意共对话。总之，“这个党不仅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而且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实体；这种变化不仅是由它内部的辩证情况所决定，而且更多的是由国际和国内事态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由各阶级之间和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由工人运动和意大利共产党对形势的影响所决定，由它们的力量、政治路线和活动所决定。”<sup>①</sup>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又是意大利第二大党，拥有170多万党员。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大选中能获得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意共同其他左翼力量一起，在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大区、几十个省份和各主要大城市执政。这就为实现历史性妥协创造了条件。

2. “在意大利，存在着同德国或英国或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sup>②</sup> 意大利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战后风起云涌，其规模之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首位。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不能靠自己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别人的”的思想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这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3. “意大利宪法是各种力量团结一致地制定出来的，这些力量使这一宪法过去和现在同资本主义现行宪法相比，都有不同，都比它们先进。”<sup>③</sup>

---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35页。

②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73页。

4. “在意大利，拥有群众基础的温和派、保守派和反动右翼相互勾结的危险，始终是迫在眉睫的。”<sup>①</sup>

贝林格从智利事件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只有劳动者和左翼政党的团结还不足以保证民主和改革的进程，他写道：“如果认为左翼政党和左翼力量只要能获得51%的选票和议席，就能够保证代表这个51%的政府的生存和活动，那完全是幻想。”<sup>②</sup>他担心“在人民中有基础的那些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对抗，都会导致分裂，并且使国家真正地分裂为二；这对民主是极为有害的，而且会毁掉民主国家继续生存的基础。”<sup>③</sup>这样，“在意大利，中心的政治问题过去是、现在更加是这样的问题：即避免中间派和右派在组织上牢固地勾结到一起，避免形成一个广泛的教权法西斯式阵线；相反要能够使那些处在中间状态的社会政治力量转到始终如一的民主立场上来”。<sup>④</sup>“因此，我们不说，左翼代替’，而说，民主代替’，这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民力量同信仰天主教的人民力量以及具有其他民主倾向的力量合作和一致的政治前景。”<sup>⑤</sup>

历史性妥协战略由于意共1976—1979年民族团结政府政策的失败而受到非议，不少人还将历史性妥协歪曲成民族团结政府政策，甚至说成就是意共同天民党的联盟。意共学者、葛兰西研究所所长瓦卡教授指出，1976—1979年意共参加民族团结政府的经验是失败的，意共成为议会多数派，放弃了对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73页。

②③④⑤ 同上书第30—31页。

天民党的批评。但当时的政府并不是历史性妥协的政府。他认为，民族团结政府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作为历史性妥协战略核心的代替因素中立化，使这一战略的对立和替代因素消失，从而使意共严重地丧失了自主性。<sup>①</sup>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sup>②</sup>

贝林格本人坚决反对将历史性妥协说成是民族团结政府政策，或意共和天民党的和解。也正是贝林格首先分析1976—1979年意共失利的原因，并及时调整了路线。1980年以后，意共不再提历史性妥协，而改提民主代替，但这不是对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放弃，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战略的调整和修正，强调对立与替代的因素，主张建立一个新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民主政府，以代替以天民党为核心的政府。

但我们不能不指出，1976—1979年民族团结政府政策是对历史性妥协战略的实施的一次尝试，它的受挫不能说和战略本身没有丝毫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反映了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某些局限性。苏联学者认为，这一战略实施“最困难的任務是从内部改造天民党——意大利垄断资本主义的骨干政党”。<sup>③</sup>此外，这一战略没有将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发展进步势力统一起来。

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贝林格和意共领导层注重同天民党上层的谈判，忽视了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开展经济和政治斗争。为支持政府克服经济危机的紧缩政策，贝

<sup>①</sup> 参阅《贝林格在今日》罗马团结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42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sup>③</sup> 瓦西利科夫等，《意大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林格还号召劳动群众作出“牺牲”，这不能不影响广大劳动群众对历史性妥协战略的态度。

意共领导没有及时、正确地把握莫罗被害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因为莫罗是天民党内坚决主张同意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它的去世使天民党内右翼势力抬头。另外，右翼反动势力利用莫罗事件污蔑意共是恐怖主义后台，破坏意共声誉，削弱了意共影响。

历史性妥协战略实施受挫除了战略本身的局限性和意共工作中的失误，还有着国内、国际的原因。从国内看，作为左翼力量重要成分的社会党政治上左右摇摆，尤其在克拉克西任总书记后，同意共关系紧张，并加紧同天民党右派勾结，企图重建把意共排斥在外的中左政府。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坚决反对意共参政，从而支持天民党同社会党组成中左政府。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历史性妥协战略的实施。

人们对历史性妥协的估价存有分歧。意大利学者乔治·博斗认为，“历史性妥协绝非是为建设一个新意大利而搞的长期联盟，而是尽量维持政体的一种法律形式的联盟，可以认为只是一个小插曲，最后决战前修筑阵地的一次间歇”。<sup>①</sup>美国学者戈德森、哈斯勒则说，“历史性妥协作为意共的中期战略的中心目标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它是西方共产党最有雄心、实际上是最大胆的夺权战略”。<sup>②</sup>意共前总书记纳塔在1986年强调指出：“历史性妥协的思想暗示着某些更深刻

<sup>①</sup> 乔治·博斗：《意大利共和国史话》，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sup>②</sup> 戈德森、哈斯勒：《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影响》，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的东西。那就是，它概括了我们仍旧面临的现实：如何实现不产生最极端反动派（智利教训是鲜明的）的政策、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的重大改变；在发达社会中，如何在社会斗争加剧时避免反动的转折，而实现真正的进步。”<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以见出：贝林格的历史性妥协战略思想，是对意大利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意共长期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之一。尽管在1976—1979年具体实施时遭受挫折，也暴露了理论上的某些不完备之处，但这一“战略就其实质性的基本内容来说，仍是有效的”<sup>②</sup>，并将对西方共产党产生影响。

### 三、欧洲共产主义

1976年6月，贝林格在巴黎群众大会上首次正式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但由于这一概念并不准确，<sup>③</sup>到1979年改称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提出国际工人运动三阶段论。

贝林格指出：对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应探索一条与其他国家走过的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既完全符合各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又完全符合

---

① 《意大利共产党人》（意共周刊），1986年第2期第12—13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138页。

③ 因为，并非所有西欧共产党都赞成这一理论。另外，赞成这一理论的又不局限于西欧共产党，如日本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和一些拉美国家共产党都拥护这一理论。

欧洲大陆这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即“通过民主道路对欧洲发达工业国家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变革为目的的战略”。<sup>①</sup>

贝林格后将欧洲共产主义改称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为了说明第三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贝林格提出国际工人运动三阶段论。

贝林格指出，“最初，我们有过第二国际的经验：工人运动为摆脱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这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阶段。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在19世纪末产生的，它们曾是唤醒千百万被剥削者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争取解放的主角。但这一经验陷于可悲的危机，最后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主义作了让步”。<sup>②</sup>今天，社会民主党的试验“没有一个战胜了资本主义，也没有一个真正克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问题，即大经济和金融垄断集团的统治……这就是说，这些试验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仍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内”。<sup>③</sup>因此，不能再走社会民主党的老路。

“第二阶段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十月革命、列宁的思想和活动标志着当代历史和人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sup>④</sup>“正是苏维埃俄国通过十月革命第一次在全世界打碎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锁链”，我们不会忘记，苏联在反法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84页。

②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1页。

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48页。

④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1页。

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分困难的时间和条件下，在社会、文化和科学等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此外，也不能否认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执行彻底而坚定的和平政策。”<sup>①</sup>

“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些经验中也有缺点和可批评的消极面，特别是在有关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上，因为这种政治制度限制一系列的自由。我们认为，这是同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充分实现一切自由的观点相矛盾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西方各国，亦即在经济和工业发达、又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国家，在工人阶级成为民主、捍卫和发展民主、扩大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支持者和宣传者的国家（意大利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这种经验是不适用的，不可行的。”<sup>②</sup>

贝林格进一步指出，现实社会主义是“从特别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出发的，是从以稀少的自由和民主传统为特点的政治和文明条件出发的”。<sup>③</sup>因此，“至今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是不能沿用的”。<sup>④</sup>

总之，第三条道路“是从历史上和文化上批判并发展以前那些道路的一条道路。因此，这条道路有别于以前的道路，并且要超越以前的道路”。<sup>⑤</sup>今天，“西欧工人运动所担负的任务恰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涉及到弥补过去和现在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全部发展的历史差距和迟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1973—1981）第49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49—50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⑤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17页。



缓”。<sup>①</sup>这也就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三阶段。

贝林格主张，意共为争取建立在民主、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这一社会，“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并予以保障；肯定国家的世俗化和非意识形态形式以及国家的民主结构等原则；肯定多党制和执政多数轮换的可能性；肯定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文化、艺术、科学自由”。<sup>②</sup>“经常鼓励公民及其团体和组织以民主方式日益广泛地参加那些涉及自己生活条件以及集体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决定的制定和执行”。<sup>③</sup>

“从经济制度上看，主张经济民主规划，也就是说这一规划除规定国营企业的存在和承认其作用外，也规定私营企业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承认其作用；但这一规划也应当指出，据以活动的新的明确的范围，也就是说，应当保证不再依照资本主义逻辑(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逻辑)来经营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巨大需要，满足全国集体的巨大需要而经营和生产。”<sup>④</sup>

贝林格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当然不是放弃革命任务的机会主义道路”，<sup>⑤</sup>也不能把“民主道路简单地说成议会道路”，<sup>⑥</sup>“这是一条斗争的道路，是需要顽强的战斗和持续的革命紧张的道路”，<sup>⑦</sup>“并不意味着幻想社会平稳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2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0页。

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1页。

④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0页。

⑤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33页。

⑥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22页。

⑦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3页。

地、毫无动荡地从资本主义进化到社会主义”。<sup>①</sup>

贝林格还指出，“为了能够走通这条道路，就需要有这样一种谅解：这种谅解使所有真正代表西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管信仰如何，都能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sup>②</sup>这一思想同上文探讨的历史性妥协战略是一致的，并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这里不再赘叙。

在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贝林格重申陶里亚蒂的“多中心论”，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存在、而且也不再可能存在领导党和领导国”。<sup>③</sup>“我们各党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承认每一个党都自主地制定和充分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路线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在严格尊重权利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在变革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选择不同道路的自由这个基础之上”；<sup>④</sup>这并不排除“对别国党的理论观点或政治立场也有判断的自由”，各党可就工人运动当中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但“讨论要本着友好和理解的精神”，“也要采取最自由最坦率的方式”；<sup>⑤</sup>坚决反对“给任何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武断地扣上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的修正主义的帽子”。<sup>⑥</sup>

综上所述，贝林格的“第三条道路”源于陶里亚蒂在50年代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只限于意大利，后者扩展到西欧范围内了。

---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22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17页。

③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22页。

④⑤⑥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1、62、61页。

“这是考虑到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点，也是考虑到在目前这一历史时期有必要把西欧工人运动各种政治组织所创造出的经验统一起来”。<sup>①</sup>总之，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放弃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和民主地实现社会主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在不打碎旧国家机器情况下进行结构改革，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宣称自己掌权后即实行宪法保证的多党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盟，注意团结中间阶层，争取同社会民主党结盟，以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孤立垄断资产阶级。在处理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强调各党一律平等、独立自主和互不干涉内政，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存在“领导中心”。

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产生很大影响，引起东西方的广泛讨论，但对其评价相距甚远。

西方资产阶级右派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骗局。美国前总统福特说它是“戴上假面具的斯大林主义和伪装的暴政”；<sup>②</sup>基辛格也强调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对西欧联盟的危险性；西德总理科尔说，它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只有等它上台以后，看它采取什么态度，才能对它作出判断”。<sup>③</sup>

但也有一批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反对将欧洲共产主义当作“为夺权而使用的策略”加以否定。他们认为，应对欧洲共产主义作现实的估计，并准备同它继续对话。

<sup>①</sup>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49页。

<sup>②③</sup> 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第21—22页。

贝林格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苏共领导和学者的批判。他们批评意共领导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意大利在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实质上是对民主采取超阶级的观点。他们批评意共领导过分强调意大利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特殊性，从而使自己的战略同世界革命的经验相脱离。他们批评意共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量齐观。当把一般民主措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时，就会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引进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就会使劳动人民难以理解革命进程的发展实行质的飞跃的必要性。<sup>①</sup>

我们认为，贝林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意大利和西欧国家的社会现实出发，努力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是无可指摘的。但第三条道路的内涵还不够丰富、清晰；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充其量还是一种假说或设想，其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sup>②</sup>

#### 四、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他

葛兰西说过，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思想应到其政治

<sup>①</sup> 参阅瓦西利科夫等主编，《意大利》第287—288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思想中去寻找。贝林格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其哲学路线集中反映在政治思想中；其特征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他写道：“我们的努力不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社会和人们的实际问题出发。”<sup>①</sup>“我们主要以我国的独特条件为依据，不仅拒绝其他的模式，而且也拒绝那种认为可以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观点。”<sup>②</sup>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和将来都是到处一样的，这是不真实的，连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也不是这样。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建设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经验。合乎逻辑的是：能够有，也应当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经验，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新的经验”。<sup>③</sup>

贝林格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在马克思主义观、民主观、伦理观与时代观上提出独特见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

贝林格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他写道：“马克思的功绩是上一世纪任何一个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他之前都没有作出过的。的确，革命的前景今天仍然主要是同马克思的立场密切相联的。马克思是唯一能真正‘奠定’革命前景的人，是至今唯一能无论从定义上（即哲学上）还是从实践和行动上（即社会力量、经济政治目标）对革命概念本身作出特定而不是空泛的论述的人”；<sup>④</sup>

① 见1982年2月21日意共《团结报》。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03页。

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9页。

④ 见1983年2月27日意共《团结报》。

“马克思思想今天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在世界各地引起、推动和指导摆脱剥削、争取正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摆脱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同样难以否认的是，一百年来，全世界的文化（不仅是进步文化）都曾受到、并且仍在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留下它的痕迹，或是受到它的触动，它就象一把犁头，耕耘整个文化，以致于即使在当代，人们也不得不重视它”；<sup>①</sup> “马克思的观点通过伟大的解放运动和本世纪的革命发展而得到了证实，证明自己基本上是有用的”。<sup>②</sup>

贝林格同样高度评价列宁的杰出贡献。他写道：“列宁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完全有生命力的，是完全有效的，他建树了真正的革命理论。就是说，超越了改良主义进化论的‘正统学说’，提倡党采取自主行动的主观因素，反对实证论、‘庸俗唯物论’和等待救世主降临的做法（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固有的弊端），相反却为俄国和全世界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力量开辟了革新和解放的道路。列宁粉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统治和联合；列宁在欧洲每一个角落都为争取和平与反对战争而进行斗争；列宁揭示了工业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盟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早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几个月就曾‘在那战火纷飞的形势下，并不排除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和多党制的长期存在’（陶里亚蒂在1956年的讲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实现完全而充分的民主的社会。列宁在所有这方面的教导

<sup>①</sup> 见1983年2月27日意共《团结报》。

<sup>②</sup>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3页。

都是有效的。”<sup>①</sup>

针对资产阶级对列宁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攻击，贝林格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民主集中制，我们还是不要使用廉价的歪曲说法吧。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同它后来发生的那种‘组织集中制’和‘官僚集中制’的蜕化现象等同起来。这些蜕化现象同列宁所制定和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什么预先形成的一致性，而是一种能保证在党的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最后形成必不可少的团结一致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在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自由地、民主地得以表达之后，占多数的立场才正确地成为全党的立场。因此，民主集中制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压制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准则，而是应该被理解为这样的准则：它保证在内部民主讨论结束后能具备起码条件，使党能够有效地进行工作，也就是说，使党能够团结一致地、有纪律地进行工作。”<sup>②</sup>

其次，贝林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用批判的目光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认为它是“可以批判、发展和革新的遗产”。<sup>③</sup>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学院式的学说，而是应当发展的、生气勃勃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地点都应当运用的一套公式”。<sup>④</sup>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公式化和机械化的解释”，“把马克思的思想变成固步自封、静止不动的哲学体系，变为意识形态的禁区”，就是违反马克思的一贯教诲，因为他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7—68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8页。

③ 见1983年2月27日意共《团结报》。

④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0页。

彻底批判和破除那种把意识形态看成一种脱离实际历史过程，脱离了科学文化具体多样的发展的体系的观点。<sup>①</sup>同样，把列宁主义“理解为被一成不变规定下来的理论条文的某种教科书，理解为被固定成经院式定理的一大堆论点”，似乎这些条文和定理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就会是对列宁本身的最大损害。<sup>②</sup>

贝林格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赶不上当代世界现实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经验以及政治实践”。<sup>③</sup>他在充分肯定列宁主义的历史作用和有效性后，指出由于斗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发展，其中有些因素已经过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列宁在一定的时刻（不是在理论上）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了。我们完全反对这种党政合一的做法。其次，列宁始终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转折中的必要手段，我们也反对这种观点。第三，列宁始终坚持认为，革命转折必须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接着是社会主义阶段。与此相反，在我们看来，民主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sup>④</sup>

在民主问题上，贝林格既坚持了列宁主义，又超越了列宁主义。

像列宁一样，贝林格清楚地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有阶级

---

① 参阅《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3—4页。

②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6页。

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61页。

④ 《欧洲共产主义问题资料选编》第90页。



局限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局限性在于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sup>①</sup>“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或为他们效劳的各政党，一旦其特权和权力遭到打击或威胁，就随时都会破坏一切自由，践踏一切公民权利和人道原则”。<sup>②</sup>他深刻揭露以“最自由民主”自居的美国本身也存在着严重损害和侮辱基本人权的情况；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片面地、别有用心地煽动起来，专门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它既同缓和与和平政策相抵触，又无助于社会主义各国发展民主。<sup>③</sup>

贝林格还论述了民主与消灭资本主义的关系。他写道：“正是因为要拯救民主，使民主变得尽可能更为广泛、更为强大、更有秩序，才必须超脱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是从2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重新获得民主、保卫民主和发展民主，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工人阶级、劳动者和他们的阶级政党，首先是共产党为主人翁的斗争成果……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人，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sup>④</sup>

贝林格在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探索中超越了列宁主义。他认为，民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运动斗争的结果，因此，应把这些民主成果看成是开展争取实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变革斗争的一个条件。他举例说，把议会仅仅看作一个揭露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弊端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讲坛是不够的。因为议会制度的产生和革新在意大利是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0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参阅《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5页。

④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76页。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的胜利成果；因此，不仅今天，而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议会制度也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

不仅如此，“民主（包括起初作为资产阶级取得的成果的所谓‘形式上’的种种自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永久性的价值，所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把这种价值也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应该加以肯定”。<sup>①</sup>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如选举权、结社权、言论权）不应当受到限制；<sup>②</sup>总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各个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加以发展，但是，“这种关系的发展总是应该保障个人和集体的基本自由权利”。<sup>③</sup>

道德问题是贝林格最为关注的另一问题，他总是把伦理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考察。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未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倒倾向于亚里士多德。贝林格认为，政治就是在现实历史性中的伦理学；也就是说，伦理学是政治伦理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伦理学。他写道：“道德问题早就存在了。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首要的和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恢复对制度的信任、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制度的继续存在，都有赖于这个问题的解决。”<sup>④</sup>

不仅如此，贝林格的伦理学还是解放的伦理学，他不仅关注无产者和劳苦大众挣脱资本主义奴役的枷锁，而且关注争取全社会和全人类更加美好的前途。

---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77页。

② 参阅《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0页。

③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12页。

④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142页。

贝林格把阶级意识同人类意识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时代的特征。他首先指出，“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sup>①</sup>是劳动阶级继续并越来越广泛上升的时代。接着指出，“今天，世界由于所有国家和全人类所共同的一些生死攸关的根本点而比过去更加统一了。此外，今天的世界由于互相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新的联系而变得更加统一了；在经济领域，在能源和空间的科学研究和成果方面以及在医学方面；在具有新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通讯方面；在习惯方面，都是如此。”<sup>②</sup>“世界之所以比过去更加统一，是因为今天，各种思想——哲学和政治流派、宗教信仰、兴趣和感觉方式、思想表达和艺术的倾向——拥有新的工具来跨过障碍，在最广泛的地区迅速传播。”<sup>③</sup>“我们认为，其所以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也是由于大部分人类都感到不安；……人类在制度的危机和新式摧毁性武器的前所未闻的威力面前，还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sup>④</sup>因此，“驾凌和压倒一切问题的是维护和平和拯救人类的问题”。<sup>⑤</sup>

贝林格认为，随着核时代的来到，战争问题的性质改变了，变得绝对化了。战争的对象彻底改变了，不再是通过军事暴力来击败敌对的力量，而是消灭地球上的生命。因此，核冲突带来了新的、前提性的问题。各国、各阶级和一切社会制度都面临着这一问题。<sup>⑥</sup>

他还认为，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存在，

① 《贝林格言论选集》第58页。

②③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第9—10页。

④⑤ 同上书第10页。

⑥ 参阅1982年2月21日意共《团结报》。

但在原子时代阶级斗争的性质部分地改变了，阶级斗争应扩大理解为摆脱不发达、饥饿和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等要求，而不能归结为两大军事集团逻辑的冲突。因此，今天争取和平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与核时代以前不同，核时代也是世界北部和南部发展极端不平衡的时代。<sup>①</sup>

事实说明，贝林格主张我们要从现实和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出发，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各国党要以各国的不同的具体情况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世世代代的长青树。

---

<sup>①</sup> 参阅1982年2月21日意共《团结报》。

## 参 考 书 目

1. Chiara Valentini: Il compagno Berlinguer, Mondadori editore, Milano, 1985.
2. I. D. Rolandis: Enrico Berlinguer, Musumeci Editore, 1984.
3. B. Crimi e altri: Enrico Berlinguer, un'idea, Mondadori Editore, 1984.
4. Berlinguer: La "questione comunista",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5.
5. Berlinguer: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dei comunisti italiani,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6.
6. Berlinguer: Unità del popolo per salvare l'Italia,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5.
7. Teoria e politica della via italiana al socialismo, Editori Riuniti, Roma, 1979.
8. Socialismo reale e terza via, Editori Riuniti, Roma, 1982.
9. Berlinguer oggi, Editrice «l'Unità» S. p. A, Roma, 1987.
10. Gli anni di Berlinguer, Critica marxista, n 2-3, marzogiugno 1985, Roma.

11. L'alternativa democratica (Documento approvato dal 16° Congresso del Pci), Editrice "l' Unità" S. p. A. 1985.
12. 托马索·吉利奥：《贝林格》，新华出版社1987年。
13. 《贝林格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 《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15. 《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七局1979年。
16. 贝尔纳多·瓦里：《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7.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人民出版社1980年。
18. 戈德森·哈斯勒：《“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影响》，新华出版社1980年。
19. 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新华出版社1980年。
20. 黄瑞林：《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战略》，刊于《国际共运史参考资料》1988年第3期。
21. 乔治·博卡：《意大利共和国史话》，东方出版社1987年。
22. 黄安森主编：《国际共运名人传》，北京出版社1988年。
23. 汝信：《关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情况》，刊于《资料通讯》1988年第1期。
24. 张国祚：《“欧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刊于

《未定稿》1989年第2期。

25. 瓦西利科夫等主编：《意大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河上肇

宗山撰



## 篇 目

一、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攀登 .....	284
(一) 从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 .....	284
(二) 成长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287
(三) 新的旅程 .....	291
二、河上肇的哲学思想 .....	293
(一) 哲学研究的展开 .....	294
(二) 河上肇的主要哲学思想 .....	296
(三) 对河上肇哲学思想的评价 .....	312
三、河上肇与中国革命 .....	313
参考书目 .....	317



河上肇 (1879年—1946年)



---

# 河上肇

宗山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湛研究及向日本和中国传播的业绩是众所周知的。迄今为止，日本学术界对于河上肇的研究多集中于把他作为“求道者”<sup>①</sup>研究，或热衷于把他作为汉诗爱好者研究<sup>②</sup>；与之比较，研究河上的经济学思想尚有人在，而把他作为革命家研究的人却寥若晨星，至于深入到河上的哲学思想，即把他作为哲学家研究的人几乎没有。<sup>③</sup>本文旨在通过对河上肇从一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的客观描述，着重阐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① 参见古田光：《河上肇》第一章“求道的历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

② 参见一海知义：《河上肇诗注》，岩波书店1977年版。

③ 船山信一的《河上肇的哲学》(1987)是日本学者撰写的关于河上肇哲学思想研究的唯一著作，也是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一、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攀登

河上肇于明治12年(1879)10月20日出生在周防国(今山口县)锦见村一个下层士族之家。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学专业),190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讲师,并兼任学习院、专修学校、台湾协会专门学校讲师,1908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讲师,翌年晋升副教授,1913年留学欧洲,1915年归国后任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1928年被迫辞职。1933年1月,因他多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逮捕投狱5年,1946年1月30日病故于京都吉田山麓自宅。

河上肇一生著述丰硕,多达五十余种。他的著作不仅仅是普通的理论读物,而且是他自身思想的深刻写照。因此,从河上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思想演变的过程。

### (一) 从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

1902年河上肇大学毕业后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他一面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一面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时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日本也不例外。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国民主义的鼎立,成为当时的时代思潮。这种时代思潮也影响到日本经济学界。自明治维新以来,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一直是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现在,与之相对立的新的德国式国家保护主义经济学正在抬头。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河上肇早期的经济学研究,是沿着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即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学”这一条线出发的。他在大学毕业后自费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学的根本观念》（1905）中，已经把经济学解释为“国民经济学”乃至“国民经济政策学”。作为这种思想的发展，同年又出版了《经济学原论》。但是，最能体现当时河上经济学研究的国家主义立场的是《日本尊农论》（1905）。在这里，河上从“富国强兵论”出发，阐述农本主义的“尊农论”，认为农业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要素，农民是强兵之源泉。

值得注意的是，河上肇在翻译塞利格曼（1861—1939）的《历史的经济说明——新史观》中，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的思想，其时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1905年10月起，他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书信体长文《社会主义评论》。第1~4信是序言，提出社会主义“是今后一大问题”，对之进行研究是志者“一日也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抨击了当时日本学院派学者浅薄的“社会主义研究”。第5—12信，论述近代社会主义的起因；第13~17信，说明社会主义的三大主张；第18~21信，探讨其三大主张的起因，第22~31信进一步论述河上自身的现代社会观和社会主义观；第32~35信，阐释“理想的社会主义”。第36信突然转变，写了“搁笔之辞”。因为在河上看来，社会主义虽是理想社会，但要实现它，其最大障碍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作为社会成员诸个人的利己心，因此，实现由“利己之人”到“利他之人”的“精神革命”，才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基于这一认识，河上认为当时不可采用社会主义的主张，而应去创造“纯无我、纯爱他的人心之理想境

界。”于是，他辞去一切职务，一头扎进伊藤证信（真宗僧侣出身的宗教家）开设的教坛“无我苑”。

河上参加“无我苑”活动之后，逐渐发觉伊藤的所谓“绝对真理”即“无我爱”，与自己主张的“尽全力以爱他”，亦即“绝对的非利己主义”并不相同。时仅两个月，河上便脱离“无我苑”，继续研究经济学，去追求科学的真理。

1908年河上就任京都大学法科讲师，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1913年留学欧洲，目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的欧洲现实，更加关注社会贫困问题。1915年归国后升任教授，讲授“经济原论”，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这个时期，河上虽然经常对学生讲：“必须能够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不行”，<sup>①</sup>可是连他自己也啃不动《资本论》。此间他又出版许多著作，诸如《人类原始的生活》（1908）、《经济学的根本概念》（1910）、《时事之变》（1911）、《经济与人生》（1911）、《经济学研究》（1912）、《经济原论》（1913）和《贫乏物语》（1916）等，其代表作是《贫乏物语》。该书首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从而引起日本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深切关注。

《贫乏物语》一书由上、中、下三篇构成。上篇“多数人是怎么贫穷的”，河上在这里把贫穷的概念区分为“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依赖”和“经济上的不足”三种，本书的主题在于弄清第三种意义的贫穷，阐明这种贫穷人即使在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大多数，穷人增加的速度

<sup>①</sup> 《河上肇自传》上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130页。

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中篇“多数人为什么贫穷”中，河上认为只要维持现存经济组织，只要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差别，只要富人任意购买各种奢侈品，这种贫穷就难以根绝。据此，他在下篇“怎样才能根治贫穷”中，提出三种对策：①富人自己抑制过度的奢侈（改造人心），②想方设法匡正贫富差别（社会政策），③像军备和教育那样，把各种生产事业由私人经营转变为国家经营（改造社会）。在河上看来，改造人心是最容易、最根本的方策，以至错误地主张，只要改变人心，社会组织即使全然不动，问题也会马上得到解决。可见河上虽然认识到社会贫穷问题，并且从利他主义立场出发，决意根治贫穷，但他不是从经济学本身，而是从伦理学领域寻求解决贫穷的方法，换言之，他不是寻求穷人的经济自觉，而是期望富人的伦理自觉。显然，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经济学。”河上的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导致河上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向社会主义经济学转移，另一方面他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理解社会主义，从而妨碍他从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上把握社会主义。可以说，《贫乏物语》是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 （二）成长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写作《贫乏物语》前后，即从1917年至1919年，是河上肇经济学研究的转变时期。1918年他出版了论文集《社会问题管见》，1919年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这是他从人道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第一步。贫穷问题是生产还是分配引起的？解决贫穷问题是靠改造人心还是改造社会，



或者说是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作为经济学家，河上肇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此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日本爆发的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事件，成为河上肇思想转变的外部因素。河上站在利他主义立场上，把贫困问题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进而又把解决贫困的契机从资本家的“伦理自觉”转变到劳动者的“经济的、阶级的自觉”。认识的转变导致他逐渐抛弃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问题研究》的创刊，是他经济学研究新起点的标志。从1919年1月创刊到1930年11月停刊，共发行106期。河上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要利用大学教授的地位，宣传社会主义。”起初，该杂志主要发表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十年后，适应形势的变化，他把《社会问题研究》改变成吸取外稿的左翼刊物。因为他认识到，在“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共产党公然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今天，白色恐怖猖獗一时的今天，要靠我一个人来维护本刊的健全成长，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把自己辛勤耕耘、精心培育的这份刊物奉献给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说：“十年来只手培养大的像我爱儿一般的本刊，现在交托给了可靠的同志们，从此得以发挥它的能完成有意义的使命的作用，我是十分放心的。今后我甘心情愿地追随于同志们之后，为了使本刊继续成长，誓必竭尽我的最大努力。”<sup>①</sup>

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的主要论文，后被收录于《社会问题管见》（改订版、1920）、《唯物史观研究》（1921）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2）等书中，并且成为编写

<sup>①</sup> 《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83页。

《近代经济思想史论》（1920）、《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1943）的基础。这些著作不仅是河上个人、而且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里程碑。

探索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错误，深化认识的过程。河上肇并不掩饰自己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所产生的认识错误，坦诚地供认“自己写的书尽是错误”。堺利彦曾批评河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是新兴阶级的代表，而在道德观中，却依然囿于统治阶级的道德观；栉田民藏批评河上把唯物史观解释成经济史观的错误。对此，河上抱着“如果发现最初被当作真理的东西肯定地不是真理，那么我就立刻毫无顾惜，坚决地抛弃它”的态度，在论争中不断摒弃错误，向真理迈进。到20年代下半叶，河上肇已经完成了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转变，成为日本第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此间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28）、《经济学大纲》（192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1929）和《资本论入门》（1932），都是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其中，《经济学大纲》一书是他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标志。该书由上篇“资本家社会的解剖”，下篇“资本家经济学的发展”两部分构成。上篇是河上在《经济原论》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结构和内容几乎和《资本论》的解说完全一样。因为河上在京都大学讲授《经济原论》时，开始认真研读《资本论》，并把《资本论》的思想吸取到自己讲义中，但是，《经济原论》仍然同马克思的经济学相距甚远。从结构上看，第一篇是生产论，第二篇是交换论，第三篇是分配论，这和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篇名完全相同；从研究和叙述方法上看，也和《资本论》

毫不相干。在深入研究《资本论》之后，河上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顶好的经济原论”，从而把讲稿由篇名到内容完全改写成与《资本论》体系相同的著作。可以说，河上是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学习、思索和踌躇之后，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相信并且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尔后终生没有动摇。他在《经济学大纲》序中说：“总之，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寻求安身立命的真理，一步一步地靠拢马克思，到了最后，终于转化为和最初的出发点正相反的东西。为了完成这样的转化，我在京都帝国大学费了二十年的岁月。……回头看一下我的彻底转向马克思学说，乃是长期采取几乎值得唾弃的踌躇折衷态度以后，方才实现的。不过，正由于我经历了长期的研究思索才好容易达到今天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把我抛进火里去烧炙，我在学问上的信仰也是决不会动摇的”。<sup>①</sup>

为了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河上肇倾注全部心血研究并且翻译《资本论》，从1927年起开始分册出版《资本论》日译本（与宫川实合译），1931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翌年《资本论》第一卷下册译完，并着手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在翻译过程中，河上把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心得写成《资本论入门》，从1928年4月至1929年2月，分八册出版，1932年修订后出版合订本。这是河上公开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标志他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纪念丰碑。关于《资本论》的解说书不胜枚举，可以说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是世界上对《资本论》第一卷最详细的解说性著作，

<sup>①</sup> 转引自《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10页。

它成为日本研究《资本论》的奠基石，也成为中国千百万革命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响导。该书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它不是经院式的注释书，而是河上自己对革命实践满怀热情和期望而写的入门书。从内容上看，该书确实是河上学术研究的集大成，因为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不是单纯停留在经济学领域，而是追溯到其哲学基础上加以考察，因此对于《资本论》的方法论作了重点解说。该书虽然只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说，但确实起到对《资本论》整体的入门作用。

### （三）新的旅程

1924年6月，河上肇曾写下这样一首短歌：“来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尘，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sup>①</sup>从河上学术研究的旅程来看，1924年可谓是一个分界线。因为从这一年起，河上开始“打破二十年来的思想桎梏”，决意“今后必须拿出全副力量来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做到真正理解这个主义”，为此要从头学起哲学。也就是说，“新的旅行”意味着在学术研究方面，要突破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拓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研究领域；在世界观方面，要使自己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转变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踏上新的旅程后，河上以高昂的激情，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终于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诚如他自己所述：“从1924年前后开始了‘新的旅行’的我，后来到了1928年4

<sup>①</sup> 《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12页。

月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的时候，总算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系列的学问体系，做到了大致理解的程度”。至此，“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完成了从最初出发点——地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到它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全转化。在哲学的领域里完成了从掩盖着一层宗教的神秘云雾的最初出发点——唯心论到它的对立面——彻底唯物论的完全转化。”<sup>①</sup>

河上肇并不满足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愈深，就愈感到需要把自己锻造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说：“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归根到底也就意味着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从此，他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今天在自己解放的战斗中，正在百般镇压之下苦斗着。批判的武器固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然而科学也还是一种斗争的力量。今后如果幸而能拿着批判的武器排在战斗队伍的末尾，将是无上的光荣。”<sup>③</sup>河上不仅在理论战线上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参加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特别在1928年至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日本的险境下，他挤时间从书斋走向街头，参加会议，发表演说。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长期追求和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河上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于1932年（53岁）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入党时，他感慨万分地吟诗曰：“两鬓早生斑，宿愿幸得还。追忆往昔日，曾越万重山。”

<sup>①</sup> 《河上肇自传》上卷第124、12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58页。

入党前后，河上肇曾把自己的大部分稿酬捐助给党。他还以自己高超的翻译技能，为日本共产党及时翻译共产国际指导日共的重要文件《三二年斗争纲领》。1933年1月，河上肇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愈加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面对检查官的审问，他坚定地说：“我坚信无论怎样镇压，也扑灭不了我们的运动。只要有一百个党员存在，那么一旦遇上革命高潮，他们就能发挥一千、一万人的作用，所以决不能小看。关于这一层，我丝毫也没有悲观的想法。”<sup>①</sup> 5年的狱中生活漫长而痛苦，可河上却感到，“几年来的刑务所生活，反而使我的学术上的信心更加巩固了。”“我在监狱里实在是每天早晨和真理一道起身，每天晚上抱着真理一道睡觉。”<sup>②</sup> 因为河上肇始终坚信，“只要人类不灭亡，那么，出路就只有共产主义这一条，我们是永远不会失望的。”<sup>③</sup> 出狱后，尽管他隐退书斋，潜心写作“自传”，自号“闭户闲人”，但他一直关注日本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946年，河上肇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作为一名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 二、河上肇的哲学思想

河上肇是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哲学领域，河上肇称得上是一位哲学家吗？我认为，河上肇是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sup>①</sup> 《河上肇自传》下卷第25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77、279页。

<sup>③</sup> 转引自古田光：《河上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10页。

### (一) 哲学研究的展开

河上肇的哲学思想如同其经济学思想一样，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之中。人们在读他的著作时，往往只注重其经济学思想，而忽视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这里，我们首先按照他著作出版的时间顺序，来描绘一下他从事哲学研究的足迹。

早在青年时代，河上肇就通过与福田德三的争论开始研究逻辑学，1909年在《国民经济杂志》上连载《归纳真理价值的大小》、《真理的变化》、《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请教福田博士》；1910年在《京都法学会杂志》上又发表《学理皆立足于假定》，把演绎法分为三段论演绎法和假定演绎法，把归纳法分为枚举归纳法和比较归纳法。在争论中，福田重视演绎法，强调真理的不变性，反之，河上则重视归纳法，强调真理的变化亦即真理的相对性，从而表现出作为经济学家的河上肇的思想特征。与此同时，河上由对经济学史的研究而必然正面接触历史观问题。在《社会主义评论》中，河上首次述及马克思的“物质的社会观”、“物质的历史观”，旋即统称“物质史观”（1906）。他翻译了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说明——新史观》，受其影响而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在《时势之变》（1911）第33篇“物质主义的产生”一节中，他第一次表述了这种思想，“所谓唯物史观，详细说来就是经济的唯物史观”。<sup>①</sup>继之，他在《论经济的唯物史观》（1913）中，指出“经济史观”一般叫作“唯物史

<sup>①</sup> 《河上肇全集》第5卷第154—157页。

观”，又叫“历史唯物论”、“经济的唯物观”、“经济的宿命论”等，但他认为“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最妥。在河上看来，唯物史观本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的社会观”，而是“经济的社会变迁观”，“唯物史观”或“经济的唯物史观”中本来也包含“生理的唯物史观”、“地理的唯物史观”。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不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是否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生理条件、地理条件以及精神条件的东西的，因而是与哲学唯物论不同的东西。显然，河上对唯物史观的这种理解近似于塞利格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912年，关一在《法学士河上肇著〈时势之势〉》（《国民经济杂志》）一文中，对河上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提出质疑，因此引起二人之间的争论。河上接连发表《关于唯物史观答关博士》（1912）、《从唯物观到唯心观——弄清唯物史观的立脚地》（1912）。在争论中，关一批判河上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矛盾，即一方面主张社会的物质（经济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物质（经济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又承认观念性东西的作用，强调理想主义。此间，伦理学家藤井健治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都曾发表文章，讨论唯物史观问题，但河上肇对之未加评论。在《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1920）中，河上不仅叙述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而且辟专章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1923）中，则进而论述伦理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1921）的发表，标志河上从把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对象转变到把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立场。不过，在这里河上还没有把握哲学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从1924年河上开始“新的旅程”起，他才真正认识到必



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认识虽有来自栉田民藏和福本和夫的批判这一外因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河上自身经济学研究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新旅程”的起点路标，是河上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连载的论文《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改正过去发表的错误观点，兼答福本和夫氏的批评》（1927）。这篇长文的前三节，明显地受到三木清乃至海德格尔的影响，从第四节开始才逐步向列宁主义哲学、苏联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接近。继之发表的《第二贫乏物语》（1930）也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其立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哲学立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大纲》中也有简要说明，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1929）上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则被全面展开。《资本论入门》可以说是这一立场的应用。无论从立场还是从体系上看，河上在这些著作中所采取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或者说是苏联哲学。故而河上哲学的独自特点，个性色彩并不浓厚。

河上肇的哲学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他与许多著名哲学家有过交往，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曾给予河上以极大影响，三木清曾指导河上学习黑格尔辩证法，土田杏村曾对河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展开批判。此外，三枝博音、冈邦雄、福本和夫、佐伯峻平、堺利彦等都曾与河上有过交往，并就哲学问题展开过争论。这些交往，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和促进了河上哲学观的形成和发展。

## （二）河上肇的主要哲学思想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河上肇的哲学足迹是鲜明的。

下面仅以《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篇）为中心，选取河上肇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略加评述。

1. 唯物主义。河上肇在其后期的许多著作中，都明确表述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并且他不是停留在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而是前进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上。在坚持与贯彻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中，河上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更加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

①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河上首先阐述了实践是理论的根据，亦即理论的社会性（阶级性）乃至历史性问题。他说：“我认为对于拥有社会力量（或能够拥有）的所有理论来说，都先行存在或潜在着具有社会意义的某种实践意志，它对理论起着导向作用。”<sup>①</sup>可见河上所持有的基本观点是，理论从实践产生，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并受实践制约，因此对于理论来说，实践占据主导地位。他用马克思的话作论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是只作解释，恐怕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而以改变世界为课题时，其中便规定了必然的唯一的立场，这一定的立场带有必然性和现实性。这就是现代唯物史观的立场。因此，唯物史观排除了其它一切史观的可能性。现代一切历史运营都应该从这一立场出发。在采取它种立场的人们看来，这也许是过于排它的、党派的、独断的见解，但是，道路只能有一条。我相信，通过这唯一的道路，应该统一目前关于过去及现在社会诸现象的一切研究。”<sup>②</sup>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77册第3页。

② 同上书第77册第14—15页。

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且是唯一的必然的历史观，至少在现代如此。那么，对于现代来说，唯物史观怎样才能成为真实的历史观，且是现代唯一的必然的历史观呢？关于这个问题，河上认为，唯物史观之所以代表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要以之对抗资产阶级的独断与偏见，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人类社会历史一大飞跃的阶级，是承担这种历史使命的阶级，因此，它是能够站在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唯一阶级。无产阶级虽然站在特殊的阶级立场上，但却代表了普遍的人类的立场，是能够担负起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新阶段这一人类事业的唯一阶级。人类的立场即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即是人类的立场。普遍只能存在于同特殊的统一之中。可见在河上看来，唯物史观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或至少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才能够理解和掌握这样的历史观。所以他指出：“马克思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而不是大学教授的科学。”“无论多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都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学说，相反，它却很容易为无产阶级所理解。”<sup>①</sup>由此可见，河上是坚决主张唯物史观的无产阶级性的。河上进而对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们充满敬意，并且认为理论家也应该为实际的社会运动作出贡献。河上的这一认识是接受福本和夫从理论的非阶级性和非实践性两个方面对自己的中间派历史观的批判，清算以往的错误之后获得的。他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第二节“理论的实践根源（补遗）”中，详细论述了理论家必须同时是实践家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77册第23页。

的问题，指出：“勿庸置疑，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为了‘被忘却的人类大众’的热情斗士。假若没有这种热情，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产生，列宁主义也不会得到发展。但是，假若因此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那才是地道的傻瓜。……正是这种热情，才是打开人类真理宝库的钥匙。”<sup>①</sup>河上因此放弃了自己关于“作为科学的科学，作为事实的事实，纯粹的理论”等错误认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实践性。

② 理论的实践标准。河上认为，从理论方面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除了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之外，还有一个理论的实践标准问题，亦即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河上主要依据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曾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②</sup>列宁也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78册第12—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sup>①</sup>

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观点出发，河上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都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如果人们从思想本身寻求真理标准，那么，作为标准的思想的真理性又必将成为新的问题，这样反复追寻以至无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正是从这里产生的。河上进而论述相对真理和客观真理的关系，认为所有人的知识总是相对的。任何时代中的客观真理，不外乎是由那个时代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所规定的真理。随着历史的推移，理论成为实践，反之实践又成为理论，客观真理也不断发展。一定的理论，是迄今为人类总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之一。任何理论都只不过代表了向客观真理接近了一步。但是，真理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他说：“客观的外在世界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意味着我们的知识都是相对的，并且它又是绝对的认识，客观的认识。”<sup>②</sup>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客观真理呢？河上指出：“对于人们说来，客观真理无疑要通过人的实践、实验和经验被认识。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累积，意识的发达，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跨进一步，同时向客观真理接近。”<sup>③</sup>尽管河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论述得还不透彻，但是他已经把握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意义。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

<sup>②</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78册第22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1页。

③ 理论是实践的根据。河上肇根据列宁的思想，还阐明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实践中尊重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要想变革世界，就必须理解世界的自我运动规律，尊重并且服从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世界是正在进行自我运动的物质。当然，这种运动是离开人的一切意志、意识和意图而独立进行的。人们唯有通过自己的感觉方能认识世界的运动法则。这种认识决不是完全的，但是，只要我们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地修正谬误，就能愈益接近完全的认识。”认识世界不是目的，但要改造世界又必须以认识世界为前提。故而河上断言：“总之，只要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能依之自觉地参加天地的运行。并且对于人们的实践来说，在这里存在着理论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人们支配自然，也就是人们自觉地服从自然的法则。”<sup>①</sup>认识并且服从自然规律，人们便能完成从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河上进而根据恩格斯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论断，指出“在这一意义上，自由是以对必然的认识为前提。只有在这种必然的认识下所进行的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其主体意识的目的。而且在这种主体意识的目的的实现之中，人的自由才能存在。”<sup>②</sup>

基于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上述认识，河上进而阐释了理论与政策、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已经知道，自由是以必然的认识为前提（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制定政策的余地），因此，一切政策也是以必然的认识为前提的。”

“不认识必然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自觉的政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78册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8—29页。

策的余地。”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政策、认识与实践是辩证地结合在一个完整体系中的因素。”<sup>①</sup>

在对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具体阐述的基础上，河上最后对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了综合性的概括，指出：“以上我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逐项作了分析性地叙述。起初首先叙述了理论是从人们的实践要求中产生的，然后叙述了这样产生的理论的真理性标准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最后叙述了只有立足于这种被证明了的理论——客观上真实而正确的理论——人们才能以其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最初我们从人的实践出发，并且最后再次回到其出发点的人类实践上。但是，最后所说的实践，其本身已经表现为同理论辩证地结合在一个完整体系中的因素。这样，我们就明确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综合。”<sup>②</sup>而且，在这种辩证综合中，河上强调了实践是更本源性的一方。因此，倘若理论与实践相矛盾，那就应修改理论。我们说，在半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刚刚东渐之时，河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种理解，不能不说是相当精辟的。

2. 实践唯物主义。河上肇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阐释之后，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第五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他依据德波林在《战斗的唯物主义》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包括自然及社会的首尾一贯的世界观”的论述，指出：“我在这里首先把这一世界观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sup>③</sup>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78册第29—30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③ 《社会问题研究》第79册第2页。

河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主要包含着下述几个要点：

首先，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哲学路线为前提与基础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承认外部世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我们认为正在进行自我运动的外部世界不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外部世界成为人的所有物时，那只是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sup>①</sup>这就是说，我们强调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但不能以之取代哲学的最高问题，把它说成是世界本体，仿佛没有实践也就没有自然界。

其次，实践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在实践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木清和费尔巴哈对河上肇的影响。三木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把实践的存在理解为“实用的存在”（Pragmatisches Sein）。河上不仅把“实用的存在”理解为实践性存在，而且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由此他进而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具体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去理解，不是从实践的主体——即人的方面去理解，解释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河上还把普列汉诺夫从存在或物质问题上阐释的费尔巴哈认识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同一性扩展到实践领域，把作为费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78册第21页。



尔巴哈思想起端的“现实性东西”、“非哲学”理解为“实用的存在”、实践性存在，试图把它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结合起来。河上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关于“哲学不是以自身为起点，而应以其相反的、非哲学为起点”的见解，认为这是一种把由人的实践产生的经验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见解，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这一思想，并以天才的方式深化了这一思想。因此，在河上看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站在这样一种共同基础上的，即具体事物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又是直观及表象的出发点，并且这些表象是先行于我们思维的，是思维的出发点。但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区别何在呢？河上认为主要有二点：其一是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世界，而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上去理解；其二是费尔巴哈没有把感性作为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马克思却认为，通过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世界才把自身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据此，河上得出结论说：“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世界，这种世界的本来面貌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初的且是最本源的出发点。”<sup>①</sup>显然，河上把实践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河上认为，“把世界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把握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把世界作为人与自然的斗争过程把握的斗争的唯物主义”，亦即意味着“在对立物斗争的自我变化中把握世界。”<sup>②</sup>从这个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79册第2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2页。

角度，他把实践唯物主义规定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这里，河上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河上只谈到自然与人的对立统一，而没有论述自然辩证法；虽然强调了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但没有展开论述实践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总体，它体现着人和自然界的统一，自然界、人和历史的统一。这就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是三者同一的科学世界观。

总之，河上肇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起，就一下子抓住了实质和核心，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尽管他在理解上还不充分，但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

3. 辩证唯物主义。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第7至第11节中，河上肇专门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批判了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首先，河上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比较，阐述了从唯心辩证法向唯物辩证法的转变。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就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深化、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说：“费尔巴哈的非革命的唯物论由马克思、恩格斯深化，使之转化为辩证唯物论；同时，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由他们颠倒，使之转化为唯物辩证法。”<sup>①</sup>一般说来，河上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在这里只是评价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而全然没有评价其方法；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二者间的区别，他也几乎未加阐释。

河上是从逻辑学的视角把辩证唯物论理解为辩证逻辑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80册第3页。

的。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在于把世界的一切运动都作为对立物斗争的自我运动来把握。这里所说的对立物，决不单纯依凭思辨从思维本身导出，而应该是在对一切思维材料的经验事实的分析中被发现。譬如把世界作为人与自然间的对立物的斗争过程来认识时，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逻辑上，那么就始终难以理解自然为何是人的对立物。”<sup>①</sup>确实，唯物史观是把人类历史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物的斗争过程来把握的，立足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看作为包含于商品中的对立物——使用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的斗争过程。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力的对立物为何是生产关系，使用价值的对立物为何是商品价值，单纯以形式逻辑是不能予以说明的，它主要根据“事实的逻辑”。因此河上指出：“人的意识忠实地反映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外部世界时，在这里产生了从单纯的形式逻辑不能产生的辩证逻辑。”<sup>②</sup>

河上进而依据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具体说明辩证逻辑的产生。作为对立物斗争的事例，他举出数学中的正数与负数、微分与积分，力学中作用与反作用，物理学中阳电与阴电，化学中原子的结合与分解，社会科学中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是独立于人的头脑（意识）的外部世界的运动过程，它反映于人的意识，才形成作为客观逻辑的辩证逻辑。河上站在这一立场上，明确指出：“在这里逻辑不是首先存在的东西，不是先有逻辑，从逻辑中产生事实；而是事实先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80册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于逻辑存在，从事实中产生逻辑。”<sup>①</sup>

河上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对辩证法只是叙述了初步的、一般的、公式化的见解，但是，这同他起初对辩证法的理解相比较，已是一个颇大的进步。他在《第二贫乏物语》中谈到辩证法的实例时，曾举出孩子起初穿着合身的衣服，后来长大了抛弃不合身的衣服，再穿合身的新衣服。还举出日本人及西欧人人种优劣问题，认为不能绝对地认为西欧人是优于日本人的种族。从辩证法立场看，西欧人有些方面优于日本人，而日本人也有优于西欧人之处。所以只有综合比较，才能得出符合辩证法的结论。这时河上对辩证法的理解显然是肤浅的，三木清和土田杏村都批判他把辩证法庸俗化了。实际上，在此之前河上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存在。通过学习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著，才认识到并且初步理解了辩证法。依据列宁的思想，河上把辩证法的本质规定为：“统一性东西的分解与对充满其矛盾的构成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又指出：“世界的一切过程都是在自我运动、自发发展、活生生的实在中进行的。达到这一认识的条件，是把这些作为对立物的统一来认识。”基于这一认识，他对哲学基本问题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说：“主张精神（思维）是自然（物质）的本源的是唯心主义，而把自然视为本源的是唯物主义。”<sup>②</sup>河上还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了福本和夫的《唯物辩证法》是缺少唯物论的辩证法，指出：“依我之见，福本自己没有理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80册第9—1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4—35页。

解自己所说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他不仅没有理解历史唯物论，也没有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根本特征。”<sup>①</sup>

河上肇对唯物辩证法的系统阐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中。在这里他着重论述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指出，辩证法就是唯物地——用正确方法——把握事物。如果我们真正用唯物的方法彻底把握事物，那就必然形成辩证的认识。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就在于对事物的全面观察和对对立物的同一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进而论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诸如向对立面的转化、对立物的斗争（矛盾是发展的原动力）、由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等。

河上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则，他从费尔巴哈的以感觉为认识的唯一源泉的立场出发，明确前进到以物质为认识的唯一源泉的立场。指出：“即使从同样的感觉出发，依据对其感觉源泉的客观实在承认与否，从而产生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倾向。就是说，我们若是把外物看作在我们的感觉之外独立存在的，从而把感觉的源泉看成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外物的刺激，那我们就是唯物论者。与此相反，即使也从同样的感觉出发，不承认在感觉之外作为其源泉的客观存在，反而把外物看作是依存于我们的感觉的东西，那我们就成了颠倒唯物论的观念论者。”<sup>②</sup>因此，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还是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或不可知论，其根本界线在于承认不承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80册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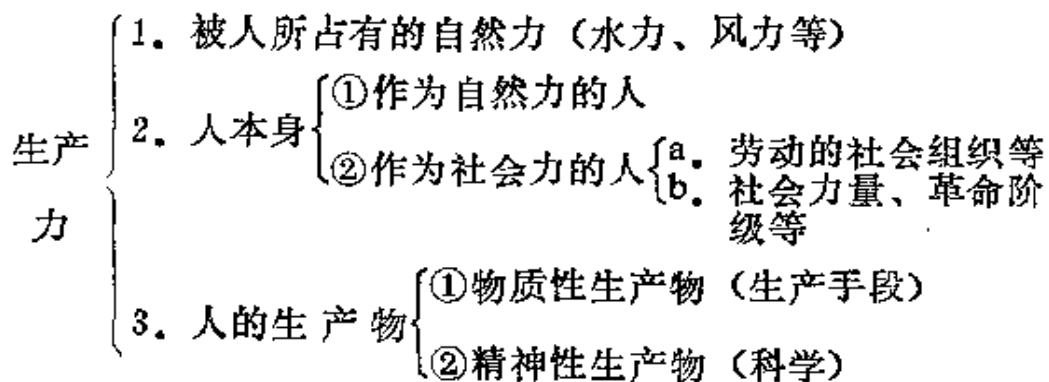
<sup>②</sup> 同上书第27页。

认客观实在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4.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河上肇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截止1924年河上踏上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旅程”，《唯物史观研究》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概言之，这个时期河上肇不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把握唯物史观，而是停留在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

从执笔《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起，河上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进入第二期。此间的代表作除了《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篇和《资本论入门》。何谓唯物史观，河上认为，用唯物论的观点阐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就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河上进而认识到，任何社会的运动都是由包含在该社会本身内的基本矛盾来说明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关于生产力，河上认为有二种含义。其一是有助于使用价值（财、富）的生产的力；其二是劳动的生产力，即生产性的力；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在人们活动于自然中直接间接起作用的、属于人们支配之下的各种力。河上以下图表示：



另一方面河上又指出，当人们利用这种生产力作用于自

然时，一定形成人们相互的共同活动，从而在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社会生产这一自我运动的统一物的两个对立的侧面，二者处于辩证统一之中。他指出：“生产关系，它只要是一种生产力，就和其他生产力同一，共同被统一于社会生产力之中。但是，这种统一分裂时，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便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破坏力，与对立的其它生产诸力相对抗”。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它“重又转化为一种生产力，同其他生产诸力保持联系协调，又恢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sup>①</sup>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是同一→分裂→同一的恢复；与生产力同一或分裂时的生产关系则成为生产力→破坏力→新的生产力。

在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后，河上又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众所周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河上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由纯经济的诸关系和政治经济的诸关系构成。或者说，在现实中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诸关系都是政治经济的诸关系，纯经济关系只不过是其中舍去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②</sup>对于马克思的这句话，河上加以说明：“作为经济结构的必然的直接的副产物”，其一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其二是社会意识诸形态。另外还有其他非直接性的副产物。河上认为，“物

<sup>①</sup> 《社会问题研究》第85册第24、2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一般生活过程”。<sup>①</sup>也就是说，除了物质的社会生活及其直接反映到头脑中的意识形态之外，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过程虽然不是直接的，但终究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河上感到这样解说未免烦琐，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中，便采取人们共识的见解，即构成社会诸要素中的经济结构是基础，竖立其上的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

最后，河上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指出：“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一般命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这个见解仅仅局限于自然界，而把它彻底推广到社会时，我们从中就会得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个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根本命题。这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观念论从其最后一个避难所里被驱逐出去，才完成了唯物史观，才发现了不是从前那样由人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而是由他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的道路’。”<sup>②</sup>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河上说：“如果社会未分裂为阶级，我们的社会存在就是我们居住社会的经济结构；如果社会分裂为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派生的政治结构就构成我们的社会存在。”<sup>③</sup>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个命题中，社会存在包括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而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则是这二者的反映。中国学者李秀林等人在谈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时也指出：“它作为社会的观

① 《社会问题研究》第87册第23页。

② 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256页。

③ 同上书第255—256页。



念(或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sup>①</sup>

### (三) 对河上肇哲学思想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河上的哲学思想没有得到充分地评价,更未获得确定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一般都把视线集中于河上肇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把他高度评价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而他的哲学思想却鲜为人知,问津者颇少。另一方面,若从作为方法论、逻辑学、认识论这一严密意义上的哲学来看,河上哲学思想本身很难说是内在的、连续地表现,只是在若干机会中基于外部契机的非连续性的表现。但是,我们若因此而完全无视河上的哲学却是不公正的。因为河上在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确实对哲学寄予莫大的关心,并且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缺乏内在的连续性,但对于河上肇这个特定人物以及对于日本当时的特定社会来说,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早在明治初期就传播到日本,片山潜、幸德秋水、堺利彦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开拓了向日本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先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卞崇道在概述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被作为重要的课题提出来,是在大正末期到昭和前期(20至30年代)。主要是由河上肇、栉田民藏等人力求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提出其哲学基础

<sup>①</sup>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4页。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问题，河上肇与福本和夫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促进了它的传播，而唯物论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战前日本的最高水平。”<sup>①</sup>这就明确地肯定了河上肇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先驱者地位。贾纯也指出：“河上肇一生的最大贡献，是他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一个正式地、系统地、比较全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介绍给日本，并传播到其他国家。”<sup>②</sup>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当然，在河上肇的思想和理论中仍然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因素，这是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剔除的。但是，他在日本正式提出并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正确地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理论上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他还躬行实践，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日本社会和人民大众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大内兵卫曾号召日本社会科学研究者向河上肇博士学习，他说：“理解博士、学习博士，超越博士，这是从事日本社会科学研究的后继学者的正道（《〈自传〉的价值》）。”<sup>③</sup>

### 三、河上肇与中国革命

河上肇其人和著作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从河上肇的著作中受到启蒙，

①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40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

③ 转引自古田光：《河上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17页。

从而促进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河上肇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曾受到河上肇思想的深刻影响。早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他就热衷于谈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著作，从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6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购进许多包括河上肇著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日文书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一年，李大钊在其所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马克思研究”专栏中，就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尤其是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中，李大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整本的译成中文的情况下，就是根据河上肇的日译本，集中介绍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是在五四运动前留学日本的。当时，“他特别热心阅读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sup>①</sup>周恩来为了亲自听河上肇的课，写了申请入京都大学学习的志愿书。后因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他急于归国投入运动，而未能实现入学愿望。回国后周恩来曾因参加革命被当时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向难友宣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有些理论内容，就是从河上肇的著作

<sup>①</sup> 胡华、王建初：《五四前后的周恩来》。收录于《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中吸取的。

在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最早，承担着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其主要成员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都是留日学生。李汉俊在留日期间，“与河上肇氏以师生关系往来，他信仰共产主义得河上肇之启发甚多。”<sup>①</sup>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党的创始人和最初负责人之一。他在1921年翻译出版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中，根据河上肇的译著，重译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重要论述，并加译了发现唯物史观经过的一段说明。后来，他在30年代也曾翻译河上肇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1922年河上肇所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在中国也得到了传播。这是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于1924年春夏之交，花费50天时间所翻译的一部约20多万字的著作。他认为这部书是日本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它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在《创造十年续篇》中，郭沫若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这就是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必然的历史的蝉变。1950年秋，郭沫若在此书再版序文中又说了大意相同的话，他说：“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于1929年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译者陈启修（又名陈豹隐）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是河上肇的学生，回国后在大学任教。30年代初，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就是以他翻译的《经济学大纲》作为教

<sup>①</sup> 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载《党史资料》1980年第1辑第138页。

材，学生们都非常喜爱听这门课。据说，毛泽东也曾仔细阅读过《经济学大纲》中译本。

据统计，从五四运动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社会科学文献被译成中文的有374部(篇)。其中河上肇的著作就占18部(篇)，居于首位。<sup>①</sup>可见，河上肇的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是何等广泛。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传入的，以日本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著作，现在也是我们的参考书。1962年宫川实在回忆二年前访问中国时说：“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时，他高度评价了河上先生，还说他自己也读过先生的论文。”1967年，他在文章中又一次忆及此事说：“与毛主席谈话一个小时。他高度评价河上先生，赞扬其变革精神，把他评价为革命家，忧国的学者。《贫乏物语》及其之前的著作，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在从唯心论到达唯物论的历程中也贯穿着这种精神。先生的好书应该译成中文”。<sup>②</sup>

河上肇不仅以他的著作影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了无数中国革命者，而且以他对于中国革命的鲜明立场和态度，积极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河上肇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却的朋友。1961年河上肇逝世十五周年时，郭沫若曾写诗以表敬仰和怀念之情：

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煅成铁愈铮。  
流水高山心向往，遥遥海外听钟鸣。

<sup>①</sup> 小野信尔，《河上肇与中国革命》，收录于河上肇诞辰百年纪念文集，1979年。

<sup>②</sup> 转引自一海知义的《河上肇与中国革命》，岩波书店1982年版。

## 参 考 书 目

1. 《河上肇著作集》（共12卷），筑摩书房1964~1965年。
2. 《河上肇全集》（共36卷），岩波书店，1982~1986年。
3. 《河上肇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 船山信一：《河上肇的哲学》，1987年。
5. 古田光：《河上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
6. 一海知义：《河上肇与中国革命》，岩波书店1982年版。
7. 岩崎允胤：《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序说》，未来社1976年第5次重印版。
8. 贾纯：《河上肇及其唯物史观》，《外国问题研究》杂志1984年第4期、1985年第1期。
9. 赵春暘：《河上肇的思想发展及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1984年中华全国日本哲学会年会论文。



# 户坂润

刘及辰 撰



## 篇 目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	323
二、户坂润走向唯物论的动力空间论 .....	326
三、户坂润的处女作《科学方法论》 .....	330
四、户坂润与日本唯物论研究会 .....	340
五、户坂润的《模写论》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 建立 .....	344
六、户坂润的《科学论》（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完成 .....	349
（一）唯物论的范畴组织 .....	349
（二）科学与实在 .....	352
（三）科学方法 .....	353
（四）科学与社会 .....	357
七、户坂润的《科学论》（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完成 .....	363
（五）科学世界 .....	363
八、户坂润高举马列旗帜坚守阵地一直战斗到最后 一息 .....	372
参考书目 .....	378



户坂润（1900年—1945年）



---

---

# 户坂润

刘及辰

##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户坂润（1900～1945），近代日本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生于东京。他生而无父，跟母亲度日。母亲是一位有教养的聪明女性，持家有道，生活井井有条；户坂深受其影响，养成一种凡事必有计划的性格，这种性格自然也充分贯彻到他的学习与研究方面。

户坂于1913年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这时他所关心的是自然科学。

当时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是理想主义、人格主义。日本自从日俄战争（1905年）以后很快就由资本主义走到帝国主义，此时日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是把个性的实现寄托在“理想”上，把现实的各种矛盾加以观念化，并妄想用个人主义的道德观点作为“人生问题”而在自己内部主观心情中求得解决。由此产生的哲学不外是一种道德的乃至宗教的哲学，诸如西田哲学、田边哲学以及三木哲学都是属于此类哲学，但是户坂这位少年却与之完全不同，他不仅未被当时

那种气氛所卷入，而且还能抱着同他们正相反的一种健康精神，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形成自己的思想，从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走到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据说他在中学五年级时就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进化论上的国家观》文章。

1918年户坂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他所以选择理科，是为了进一步学习哲学打好基础；因为他认为要学哲学就必先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个精密的研究。

1921年户坂继三木清之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在西田几多郎及田边元的指导下学习哲学。此时日本思想界正是为新康德派的哲学和以西田为首的理想主义、神秘主义的空气所笼罩，为所谓教养主义、文化主义、人格主义的空气所笼罩，因而使学问、艺术、文化完全脱离了日本人民实际生活的要求和科学的发展；尽管如此，但户坂心里却有一定之规，即：要从科学探索中求得哲学解释的计划，却始终坚持不变。

户坂在大学时期专攻数理哲学，特别热衷于空间论的研究，1924年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空间论》。这篇论文是由康德立场出发的，其中已含有合理主义的倾向，所以和以西田哲学为首的非合理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完全不同。户坂通过空间论的不断研究，逐步走到唯物论的立场；他走到唯物论立场的里程碑，乃是1929年出版的《科学方法论》及1930年的《意识形态的逻辑学》。正如后来他在《现代唯物论讲话》（1936年）的序文中所说：“它（指空间论而言——作者注）是引导我走到了唯物论的动力之一”。

1930年户坂同日本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有了接触，因留宿一位在逃的田中清玄而被检举；1931年以后他继三木清之后

任东京法政大学讲师；1932年他和冈邦雄、三枝博音等人共同筹备出版《唯物论研究》杂志工作。

1935年法政大学发生动荡，户坂以所谓思想不稳问题为理由而被迫辞职；此后他便专门从事《唯物论研究》杂志的组织工作及著述活动。1938年该杂志被解散，户坂亦因此事件而被检举，一直被拘留到1940年。在被拘留期间他依然意气轩昂，理直气壮地说：研究唯物论绝对无罪，并对审判官及检察官宣扬唯物论的正确性。1940年户坂曾被保释过一次，但到第二年竟被判了4年徒刑；经过几次上诉，终于判了3年，于1944年下狱执行。由于遭受法西斯主义虐待，营养失调，他于1945年在酷热的牢狱中与世长辞，时年仅46岁。

户坂一生的理论活动，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1930年或1931年以前，此时期他从学生时期到新康德主义并通过对李凯尔特等的批判而在科学基础上接近了唯物论；第二个时期是从1931年到1934年，此一时期他形成了唯物论的基础理论；第三个时期是从1935年到1938年，此时期他运用唯物论哲学这支武器，本着科学精神，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广大文化领域内活跃地展开了一场有力的丰富多采的斗争。

户坂的理论活动这三个时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下述三个阶段：一、经济危机发展和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年代；二、对中国开始进行进一步侵略和国内反动派对进步思想加强镇压的年代；三、全面准备及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并发生了大批“转变”的年代。

户坂的唯物论特点主要有二：一，它和从来日本学院哲

学多为德国哲学的翻版完全不同，而是同日本社会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它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同大众化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的。因此，户坂的哲学便得以健康发展，以至成立了独具风格的唯物论哲学。

## 二、户坂润走向唯物论的 动力空间论

为了研究哲学打好基础而学习自然科学的户坂润，在学习、研究自然科学过程中首先抓住了“空间”这一具体问题，并由此出发逐步深入达到了唯物论。他在《空间论》中说：“空间问题，是同唯物论的浮沉共浮沉的问题”。<sup>①</sup>

户坂研究空间问题的论文计有：1924年发表的《物理空间的成立》、《物理空间的实现》，翌年发表的《几何学和空间》、《作为范畴的空间》、1927年发表的《作为性格的空间》、翌年发表的《空间概念的分析》。这些论文于1931年集成《空间论》一书出版。前三篇论文，可以说是户坂初期的空间论。

户坂初期的空间研究是由康德出发的，康德的空间本是一种直观形态，但户坂所追求的却是一种物理的空间。在爱因斯坦的《几何学和经验》的影响下，户坂发现了“物理空间对于物理学是个重大基础”。<sup>②</sup>

<sup>①</sup> 《户坂润全集》第3卷第24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卷第387页。

户坂当时在空间问题上所处理的理论材料，主要是几何学特别是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他想由此追求几何学和空间的关系，用以证明几何学的客观性据点是在空间。他在《几何学和空间》论文中说：“如果说数及群是一种思想体系，那末几何学一般就要含有思惟因而也就必须允许用数及群的概念来进行几何学的分类。数学者着想的自由，这里有其根据，但这决不能成为几何学是属于其他思想体系的理由。几何学是基于空间的，它之所以同其他一切数学有所区别，即在于此；几何学作为数学而有其特征，亦即在此。”<sup>①</sup>这即是说，几何学所持有的直观是空间的，因而它是基于空间的。在基于空间直观的这个根据上通过思惟的作用即数学的作用，几何学始能成立。

从此户坂便由康德把空间考虑为纯粹数学的纯粹几何学而逐渐地走到了经验几何学。这即是他所强调的“计量几何学”。该计量几何学，在户坂看来是个坐标几何学，坐标表现着最精密的东西，科学的精密性是由空间给与的；所以坐标是可以代表空间的。

户坂并未停止在该计量几何学的坐标上，他进一步又走到了“测量坐标”，认为计量不是根据计量几何学上坐标的计量，而是一种真正经验上的计量。他在《物理空间的实现》一文里说：“物理学的对象只有根据经验上的测定才是存在着的。……在经验上决定对象的量的标准，不外是力学坐标。”“力学坐标的原点是意味着用尺度测定的观测者的立脚点。法则相当于由这个立脚点测定的一定关系。”<sup>②</sup>

① 《户坂润全集》第1卷第427—428页。

② 《户坂润全集》第1卷第392页。



由计量到测定的这个推移，户坂认为“只有包含空间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应把物理的空间同几何学的空间加以区分，而称之为“测定坐标”<sup>①</sup>。所谓坐标乃是指物理的测定坐标而言的。户坂认为事物的测定除去这种坐标以外是没有方法的，坐标实际上不外即是测量物理的方法同时又是它的对象。何以呢？因为坐标是基于坐标的性质本身，而在这一场合也必然意味着被测量的量的本身。这样，所谓测定坐标也就必然意味着被测定的物理对象。因此户坂认为，作为测定坐标的空间乃是“物理的方法同时也是物理的对象”。

这里讲的这个“物理的对象”，正是闵可夫斯基所谓的“世界”，该“世界”概念就意味着方法和对象；因此，户坂的最后目标，正如三枝博音所说。乃是“只有世界空间才能最具体地表现出物理空间的特色——方法—对象”。<sup>②</sup>

户坂的这个方法和对象的统一或对象的方法，以后就成了他的处女作《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了。

上面所述的户坂的初期空间论，明快地概括了康德的空间论，同时指出了康德将空间把握为形式的直观并将该直观空间和几何学的直观同一看待的错觉。批判了康德的直观空间并不是纯粹的直观而是一种已经同思惟相结合的直观。但同时他却认为：“为了了解空间的根本性，无论如何也有必要达到空间直观”。<sup>③</sup>由此不难看出，户坂这时的空间论基本上还是康德的、观念论的；因为在那里科学的世界和现实的自然仍然是分离的，空间直观的这个“直观”和认识上的

<sup>①</sup> 《户坂润全集》第1卷第392页。

<sup>②</sup> 三枝博音，《日本的唯物论者》第327页。

<sup>③</sup> 《户坂润全集》第1卷第422页。

感情还是没有有一个合理的联系。户坂的这一主观性，以后到了他把空间问题全部处理为统一体时，把各种科学理论材料整理为单一的组织时，才被克服从而达到了唯物论。

户坂在《现代唯物论讲话》中说：“所谓空间或空间概念，几乎在一切科学乃至理论中都作为问题表现出来。例如甚至就绘画、雕刻、演剧及电影来讲，在其理论中空间也是表现颇为重要的问题吧。原来我们的视、触、听的这个世界——实在界——都不能离开空间的规定。我们把每日的生活完全送在这个空间支配下，因此，我们把空间问题用为一切理论或科学的问题，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它是浸润到一切领域里的问题。”<sup>①</sup>

要把“浸润到一切领域里”的这个空间作为科学来说明的时候，当然就得由哲学来做。可见户坂后来之由物理学转到哲学的研究、由空间的具体研究出发逐步深入到唯物论，不是偶然的。哲学同单纯科学不一样，它不是停留在分科的观点上，而是必须用个统一观点来把握科学的各种问题将它们组织在一个立体上。

户坂把空间分为四个形态，他认为：直观空间（心理的空间乃至空间表象）、几何学空间（数学空间）、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空间乃至事实空间），都是空间的各个现象形态；然而它们哪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上常识所谓的、已非专门的——日常的、常识的空间概念系在一个东西上的。基于这种日常的、常识的概念之空间——日常空间——是作为空间本身的直接形态的一个抽象。”上面四种各自把握的空间都

<sup>①</sup> 《户坂润全集》第3卷第239页。

是空间的现象形态，而不是“空间自体”。这样，追根到底，结果就探索到物质，即“空间归结为物质”，换言之，即表现物质的客观存在性本身的就是空间。因此，“空间问题——空间论——便归结为物质问题，也就是归结为唯物论问题。”<sup>①</sup>

这里应当指出：户坂在这个空间问题的探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有关认识论问题，即他已认识到感觉是表示着主观和外界对象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乃是反映关系；然而感觉自身并不是唯一绝对的，由于它是相对的，所以就要在感觉自身所具有的实在性和直观的观念性的结合上严密进行一种抽象思惟活动的分析。<sup>②</sup>户坂对于这个认识问题的意识，可以说是贯串他的理论展开的一条红线；他沿着这条红线继续探索下去，将空间把握为一种存在的从而是物质所固有的客观的特质，接近了独特的唯物论。到了1927年他便达到了将空间论把握为唯物论。

### 三、户坂润的处女作 《科学方法论》

#### ——过渡到唯物论哲学的转折点——

《科学方法论》（1929年）一书可以说是真正能代表户坂观点的第一部著作。此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阐明方法概念；后一部分说明方法论的四个“兵站”，即（1）学向

<sup>①</sup> 《户坂润全集》第3卷第260—265页。

<sup>②</sup> 《户坂润全集》第1卷第422—423页。

分类、(2) 科学论、(3) 科学世界考察的方法论、(4) 学问性考察的方法论。该书是以“方法”为中心而对它加以分析和整理、并通过它把学问组织成为一个统一体。可以说这是一个广义上的认识论。

《科学方法论》一开始就提出方法之在生活及学问上的重要性，说：“生活既不是空虚的兴奋，也不是呆板的行事，而是一种有计划的经营，它总是要有一定的出发点和一定的目的步骤。在这个意味上，步骤应是沿途而进。一切生活上的这种特色，恰好是要由所谓方法这句话来代表。在我们的任何工作上方法都具有根本的意义……特别对于学问的研究，方法应当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并确信在某一学问的特征上而有用的，不是那些杂乱、零星的渊博知识，而正是要掌握以方法为中心的这个中枢。只有这样去理解被掌握的方法才能对我们表示出其在学问上所具有头等意义的优越特色——性格。我们只有抓住这一性格才能批判学问。……不管构思如何严密，如果打不中目标——或性格——那末这里所处理的问题就不能成其为批判。只有理解方法才能说明学问的性格，并使批判成为可能。”<sup>①</sup>这段话，有人说是“户坂完全成为一位新的独立思想家的宣言”。

《科学方法论》前一部分对于方法概念的分析，是从与方法相对的对象开始的。这部分的内容，户坂自己把它概括为四部分：一、“方法概念是和对象概念对立的”；二、“方法概念因为它本身具有实践性，所以在实践上就必然优越于对象概念”；三、“现在通过对于方法概念的实践动机的追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2页。

踪，而追溯到学问性概念的分析，看到作为学问性，方法概念是与体系概念对立的”；四、“而且方法概念又因其实践的原故——但这次和以前不同，因为学问概念是被媒介了的实践性的原故——所以优越于体系概念”。最后户坂指出，

“这就必然是方法概念的运动。这里须要注意，这一概念，这一运动的分析，只是开始于并终于实践的世界构造——它是个存在论的。”<sup>①</sup>

兹因篇幅所限，难以进行详细说明，故只好作一次概括评介如下：

在户坂看来，一切生活都必然是方法，在学问的研究上方法尤其重要。学问之有学问性主要是在真理性的获得。真理性的获得是个实践问题，因为第一要考虑问题的“解决”、第二要考虑“批判”，而且“批判”比“解决”更为重要，更是实践的。学问性之具有此实践性——批判性——是属于方法的，所以在学问的研究上方法是最重要的，它比“对象”和“体系”都优越；因此，“学问性就是方法”，而“方法问题就是实践问题”。

试先从方法问题就是实践问题来讲。事实确是如此；因为方法乃是现实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的反映，而这个反映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但是现实事物本身乃是一个对象问题，户坂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讲方法时首先就由“对象”开始，并正确地指出：“方法必要发现在对象内”、“没有单纯独立的方法”、“对于某特定的对象而有某特定的方法”、“方法是对象的方法”等等关于对象和方法之间的关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52页。

系<sup>①</sup>。但是由户坂的整个理论来看，我认为他是集中在方法概念的分析上，特别重视方法的优越性。以致忽略了“对象”的根本性；因此，他虽然自始至终一贯重视实践，但尚未能在实践上把握由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论的复杂发展过程；从而使他的方法在批判问题上偏重了“反省”，认为“批判概念作为反省”，比“根本的理解是更为实践的规定”。<sup>②</sup>这一偏重使他陷于观念论。尽管如此，但又因为他通过实践、生活而使自我批判的“反省”含有社会的因素，以致把“学问性”考虑为“作为生活原理、生活方法的一种社会的自我批判”。这样一来，户坂的“反省”就同日本思想界根深蒂固的那种反省异其性格，即：户坂的反省是排斥独断、要求科学的创造，并未表现出道德主义的反省及人格主义的内省。例如他说：“生活的指导原理，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情绪上，而正是在学问上(或科学上)。人们不可把它和为了要求主知的那种合理主义、启蒙主义的倾向相混同。”“今日的学问性不是为了主知的，而是为了实践的。”“自我批判的学问性，恐怕不是发自对学殖的崇拜和对教育或对功利主义的关心吧。”“现代的学问性是哲学的，而不是诡辩的”。<sup>③</sup>

户坂之强调生活、实践而认为“学问是生活的方法”，是意味着科学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他却把实践主要限定在学问上，把关于社会实践总体的生活世界代以学问世界，这是同他忽略了对象的根本性分不开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页、10—1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卷第44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卷第49—50页。

的。这意味着户坂还未完全脱离知识分子的教养主义倾向；尽管如此，但他却通过生活、实践这个观点的不断追求和贯彻，使他终于走到了唯物论。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sup>①</sup>

同时，户坂在学问性上、在实践上特别强调了“批判”，认为学问上的自由必须存在一种“批判气魄”，只有批判才能保证“学问的神圣”；指出只有通过批判才能获得“真理性”，才能求得“问题的解决”，并强调了“自我批判”的重要性。户坂的这个“批判”思想，已于前面指出，由于他过于偏重“反省”的作用而不免陷于观念论；但后来经过他不断的钻研也由内部的批判逐渐探索到现实的地盘，最后结实为“批判主义”，并通过认识论的批判机能和哲学的批判机能而把它扩大为整个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武器。

以上讲的是《科学方法论》的前一部分，以下接着介绍它的后一部分，即前面所指出的所谓“四个兵站”。

第一个兵站是“学问的分类”。这里同前一部分一样也是从“对象”开始的。户坂认为学问是现实的、历史社会的存在，故在学问的分类上就不能不考虑到客观的对象，但由方法概念的实践优越性上来考虑，学问分类就不是在对象上而是在方法上了。所以他说：“学问分类，为了是个更加根柢的、性格的，所以它就不能不由对象的分类移行到方法的分类。”<sup>②</sup>户坂认为方法概念是运动的，这个运动最后必然达到对象和方法的一致，即对象的方法。学问分类即由它来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sup>②</sup> 《户坂潜选集》第1卷第74页。

进行的。户坂举例说：“对象和方法的一致——对象的方法，它给科学世界以基础。这个世界基础的不同必然成为学问分类的原理，这就是现在的场合。作为科学世界基础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前所提供的物理空间概念吧。这个空间作为基础可以科学地成立物理学世界，基于这一成立的方法概念和其他方法的不同，物理学是会同其他许多科学有所区别吧。同样，例如历史世界的构造关联着使历史世界成立，这个成立的特性是会给与区分历史学和其他诸科学的原理吧。例如说，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就是基于每个科学世界的不同来区别的吧。……一般所行的自然和精神的区别，并由这一区别而给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分类；但这种区别一般被考虑为两个对象的区别。尽管如此，可是从根本上来看，恐怕它必然是由世界区别给与的吧。不外就是这个世界科学表现的科学世界之基础，不仅是对象，正好必然是对象的方法。——这样，科学世界的区别及其成为学问分类原理的场合便是可能的吧。”<sup>①</sup>

第二个兵站是“科学论”。户坂认为，学问不能停留在“学问分类”上，还要移行到作为学问形态的理论特别是“科学论”上。这里户坂主要是由“对象的方法”——存在论——这个立场批判了对当时日本哲学界有巨大影响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方法，指出他的方法不是同对象合一的方法，而是和对象对立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主要是在“方法没有渗透到科学的现实内容里去即科学所处理的对象里去”，以致在历史科学上陷于神秘化；同时户坂又由社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76页。



会存在上承认了历史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种“法则科学”。他说：“历史的法则，必然是只有在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上才能看出的一种作为历史运动原动力的历史法则。”“它当然和自然科学的法则不能完全相同，但它毕竟也是个法则，也允许主张为一种法则科学。”<sup>①</sup>这样，户坂就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都是一种法则科学这一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第三个兵站是“科学世界考察的方法论”。这里户坂对于“方法和对象的一致”这一概念又作了一番充分的、彻底的阐明。他认为，在自然科学世界中物理学是个“正规科学”，是代表其他自然科学的典型，是“最有权威的”；它所以具有这种优越资格乃是由于它有一种包括及支配一切自然事物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含有数学而具有一种“精密性”。在这个精密性上表现出物理学的“方法和对象的一致”。但是这种精密性却是由空间给与的，因而物理学的权威也就必然是由空间给与的。因此，科学的精密性最后就必须由世界空间来保证。如户坂说：“它（科学的精密性——作者注）必须要由数学，更加精密的要由几何学的应用、物理的空间、最后由世界空间来保证。”又说：“事实上世界空间的形成是被考虑为一种精密科学的理想吧，而这个世界空间又在理想上表达着方法和对象的一致，这个方法和对象的一致正是决定科学世界的基础。”<sup>②</sup>

户坂对于科学的精密性追踪及分析的结果，最后总结说：“因此，世界空间就必然是精密地代表着自然科学世界的一种表现，世界空间是表现自然科学的世界形象。这样，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15页。

<sup>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37—138页。

我们才能通过追求精密概念而现出自然科学世界的概念。研究世界要和精密结成一体才能保证物理学在自然科学内所占的王位，而物理学的这一王位是由世界空间——在相对性理论上——给它加上了一顶王冠。”<sup>①</sup>

最后，第四个兵站是“学问性考察的方法论”。前在第二个兵站即“科学论”中户坂已经正确肯定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种“法则科学”。但是到了这里他却把学问性区分为“论证的和透察的”两种，追求论证的学问性的代表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而追求透察的学问性的代表则是历史科学。这两种学问性的区别，户坂是由真理性的两个典型来说明的。他认为论证的学问性是基于“事实决定的真理”，而透察的学问性则是基于“事实解释的真理”。

于是户坂便提出了透察的学问性的特色，首先是在它是一种“性格的乃至个性的”。因为“这个学问性是基于事实解释的真理来说明的，这个真理作为其特征是保留着事实对于我们（人们）而有的关系（意味）……首先要意味着个人，只要如此，从而又必然是个性的、性格的……。”但同时户坂并未因此而否定某种普遍性，透察所以要求有某种普遍性，因为“个人在透察时，个人首先必须是个历史社会的存在”，而且“个人甚至常对时代的错误及地方的错误……有加以警惕的必要吧。”<sup>②</sup>这种普遍性虽具有“包括性、多面性”及“正面性”等“客观性”，但是却和论证的普遍性不同，它只是由个性的、性格的一般求出来的普遍性。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3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47页。

户坂还认为，透察的学问性具有一种“意味关系”。这个意味关系就是历史科学所要求的事实选择的原理，此原理亦即“价值”。他说：“价值关系只能作为个别化的方法而具有特殊的意味。从而历史的事实只有在其对于我们的意味关系上，在其价值关系上，作为个别的東西而有意味。”<sup>①</sup>这样，历史科学乃至历史事实及历史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都要在“个别化”上来考虑了。

尽管户坂认为作为历史事实选择的原理——价值、价值关系是意味的、个别的、性格的，但他并未因此而在价值评价上完全否定外部的客观要素。户坂说：“价值的评价必然同经验一起变化的”，“价值评价是同个人或他者，结局是同时代一起变化的”；因此，“历史事实的选择，结局也必然是同时代一起变化的”，“历史事实的因果也就必然是同时代一起变化的”。这样一来，历史的记述也就可以说是同时代一起变化的了。”因为事实的选择乃是历史记述的准备，而因果则是历史记述的目的。”在这个意味上历史常有应当加以“改写的命运”。历史的这个性质不外是表达历史只应理解为关系“现代”的。这也即是说，历史怎样也不能离开“社会”。<sup>②</sup>

最后户坂就由历史改写的命运这个性质来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学问性上的根本不同。他说：“假使把常常改写的历史命运也了解在自然科学上，那除了破坏自然科学的学问性以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使把某种自然科学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5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53页。

的业绩作为可以改写的东西来看，那末其业绩作为自然科学的真理……就是意味着一种否定。反之，历史学在上述意味上必须改写时，那应改写的东西就不是否定历史学的真理，这不过是作为过去历史记述而进行的一种待遇而已。这里会在学问性上看到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根本不同吧。而且，这不外就是论证的学问性和透察的学问性二者的区别。”<sup>①</sup>

我们已在前面讲过，由于户坂忽视了“对象”的根本性，并把“实践”狭窄地限定在“方法”方面，以至使他不能把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这一复杂过程，不能通过实践把事物（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反映出来；因而在方法概念上还不免存在着不少的主观要素。这些主观要素，在前一部分中特别表现于“反省”问题上，而在这部分里特别表现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上。户坂虽然未像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而主张也是一种“法则科学”；但是最后他终于使历史科学脱离了“精密、严正”的轨道而滑到了以“个别、性格”为特色的“透察的学问性”这个歧途上来，以至成为一种“个性记述的科学”。然而同时由于户坂的方法毕竟还是一种“对象的方法”，时刻不忘联系对象，所以他又时常强调了“历史社会的存在”、“普遍性”、“客观性”等等的必要。这些客观要素后来终于克服了那些主观要素，而使他对于历史科学之为法则科学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 \* \* \*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54页。

户坂的《科学方法论》可以说是对他读书时期学院哲学的一个总清算和他过渡到唯物主义哲学的转折点。从全书来看,虽然还未能完全跳出学院哲学的旧框框,但在旧框框里已经有了许多新思想即唯物论要素。这些新思想正是说明了户坂正在试图要把自然置于哲学范畴里,并探索模写论即反映论的过程中。在方法论中虽然还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但其中的新思想后来却终于克服了主观性,以至在唯物论基础上建立起来模写论,最后完成了唯物论的一大完整体系。

#### 四、户坂润与日本唯物论研究会

户坂润之由《科学方法论》逐步走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时期大概是在1931—1934年,“唯物论研究会”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户坂是该会组织上和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户坂这个名子是和唯物论研究会分不开的,提起前者不能不想到后者,反之亦如此。

在户坂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时期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乃是1930年到1931年苏联“哲学论争”的成就立即通过《哲学论争的总决算和反宗教的宣传》一文的翻译而介绍到日本来了,从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掌握上便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者都确认了“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把应如何使之得到具体的创造性发展一事作为自己的课题。所谓“哲学上的列宁阶段”这一课题就是“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问题。户坂始终以此问题自课,不断进行研究,终于达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1930——1931年），日本国内的阶级斗争走到了更加尖锐的阶段，到处发生激烈的罢工运动及佃农抗议斗争，特别是1931年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又引起了反战斗争。为了反战，政党和工会统一起来，文化方面为了统一而把“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同盟”改组为“日本普罗文化联盟”。这时日本的阶级斗争和反战运动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国内进步力量的镇压也就大大加强了，在文化方面解散和封闭了许多进步的团体及刊物，其中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心力量的“普罗科学研究所哲学部”和“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前后皆被镇压破坏。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进步的科学家认为此时更有广泛扩大斗争战线的必要；于是便在1932年10月成立了“唯物论研究会”，11月开始出版了《唯物论研究》机关杂志。

“唯物论研究会”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理论斗争的最后一个组织。从1932年10月创立到1938年2月被迫解散的五年零几个月，再加上它的后身《学艺》发行所的活动，足有六年的历史。户坂作为干事，始终是该会的组织和指导的中心人物。

“唯物论研究会”的规章第一条规定为：“本会的目的是要不脱离现实的各种课题，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哲学上的唯物论，并将有助于启蒙。”果然不错，它后来根据现实需要的问题而在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上、在启蒙上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唯物论研究会”是以合法形式严密地把自己限定在理论领域，一时组织了颇为广泛的知识阶层，会员竟达150名

之多，其中许多成员是能干的理论家。他们吸取了苏联的“哲学论争”的成果，确认“哲学上的列宁阶段”，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这次钻研中他们进一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武器，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批判。例如1933年他们展开了关于哲学（理论）党派性的论争，1934年又把理论党派性论争进一步具体化到对于西田、田边哲学、对于法西斯主义哲学及日本主义哲学的批判。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倾向在内的文化运动的镇压，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唯物论研究会”。这时有些会员退会或停止活动，同时也有的人如山田铁夫（古在由重）出现在《唯物论研究》杂志上，从此“唯物论研究会”便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转变，即由一些关心唯物论的广泛研究者的团体转变为一个唯物论者的团体。也就是由于有了这一转变，所以到了1936年军人叛变（2.26事件）事态紧急时候，该研究会仍能根据当时迫切需要、立即将活动方向转移到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战线的文化活动方面，它还是和过去一样，在政治上极力保持其“独立的研究团体”的性质。对此问题，户坂这样讲：“现在人民战线上的这个文化运动，说句老实话，不外是现下文化运动上的人民战线。这即是说，作为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要抱有也必须要抱有从政治活动上独立出来的人民战线的统一。这是关于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乃至反法西斯的统一的一个运动形态问题，同时当然也是关于抱有自由主义的乃至反法西斯的方式的一个文化内容问题。”<sup>①</sup>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5卷第67页。

上面户坂所谓的“从政治活动上独立出来”的“文化运动”，不待言就是要用自由主义形式来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统一运动，这是脱离了人民战线基本队伍工人阶级的一种知识分子运动，正是表示当时日本文化运动处于混乱和退却的状态。但是此后在“唯物论研究会”里却提出了人生论、文学论以及人道主义论等文化问题并发表了个别的研究论文的同时，又提出了“科学精神”、“合理精神”及“批判精神”用以抵抗文化破坏主义的气氛。那末何谓“科学精神”？户坂解释说：“科学精神，首先要有一种去抓住目前现实的机能。……科学精神在日本首先必要去抓住日本的现实。”“日本的现实，正是通过日本的社会机构、生产机构而在政治上活动着的东西。”<sup>①</sup>由此可知，“唯物论研究会”虽然穿着“文化团体”的外衣，但实际上却对“政治”的反动进行了“文化”上的强烈攻击。

唯物论研究会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颇大的成果，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和启蒙上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唯物论研究》杂志和《唯物论全书》中所涉及的领域颇为广泛，由哲学、自然科学、经济学到教育学、性科学及电影戏剧论等等。每个领域在唯物论上都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普遍地渗透到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阶层。总之，“唯物论研究会”时代，在日本唯物论史上可以说是个最充实的时代。

后来，森宏一回忆唯物论研究会时曾指出其缺点说：“‘唯研’上哲学理论的展开，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列宁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2卷第193—194页。



阶段——三者的同一上……但实践是要把其集中点真正放在政治实践上，这是唯物论的要求；然而‘唯研’论列宁阶段，在我国社会上所占的地位是缺乏这个能力的……这样一来，‘唯研’的活动及其影响也就只有局限在文化领域了。”然而实际上“唯物论研究会”对于列宁的命题是忠实的。尤其在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疯狂镇压下竟能取得上述的那些成果，可谓难能可贵。那始终不渝地成为该会组织和指导中心而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任务且同其共命运的，就是户坂润。

## 五、户坂润的《模写论》 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建立

从《科学方法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户坂业已开始同过去的自己告别而出现了一个新面貌；但那里所探索的问题如同“模写论”相比则尚有很大距离。后来他一旦接触到了“哲学上的列宁阶段”便考虑到有进一步探讨唯物论范畴的必要；因为列宁主张的“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问题必须建立在一个切切实实的地盘上即唯物论上。如户坂说：“我们的问题是要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内容而把作为它的——作为形式契机的——逻辑的乃至辩证法的契机特别提出、加以研究。”这样，“首先必要的和中心的工作将必然是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上的各种根本概念吧。”<sup>①</sup>

户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上的各种根本概念的探讨是在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70页。

1933年发表的《物质与模写》论文中进行的。该文所探讨的首先是“哲学的物质”及“物质和意识”问题。

在“哲学的物质”问题上，户坂首先确认哲学的物质是个存在的概念，而此存在的范畴就是“物质”；物质是运动的，是个“辩证法的运动、自己运动”；同时他又认识到物质的运动是在内容产生形式上自己展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物质必然意味着基于自己的发展创造出自己的形式而进行的运动本身”，“物质基于它所固有的运动而给自己一个形式的内容”，由是在物质上便产生了两个问题：(1) “物质的自己运动”，(2) “由物质的内容产生形式。”<sup>①</sup>

对于上面两个问题，户坂作了个概括说明如下：“物质所固有的辩证法的运动是物质自己展开，它不外是在由内容产生形式的构造上自己展开，而且所具有的这种力学构造乃是一种现实性的一般表征。”因此，户坂便把物质自己运动和物质内容产生形式这两个问题概括为“物质的辩证法性（展开性、活动性）和现实性（内容性）”问题。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户坂认为人们常作了随心所欲的考虑，他举例说：“费希特考察了自我的纯粹活动性，黑格尔主张了理性的现实性。在这样一种意识上的活动性和现实性，不待言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何以如此，这是因为存在的规定尚不够完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把存在和存在者、存在物分开。”因此，为了保证物质的最根本规定性，从而保证物质的辩证法性和现实性的客观性，那就必须“使它（存在—作者注）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75页

和存在者、存在物联系起来而加以分析。”<sup>①</sup>

户坂进行分析的结果得出：“存在的代表是物质”，“存在物、存在者的代表是客观”。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场合，存在才会具有具体的存在性，才能保证物质的客观性。他说：“物质不仅意味着辩证法性（展开性、活动性）和现实性（内容性），而且又必然要作为更根本的、具体的规定而是客观性的。所谓物质首先必须是客观的。”<sup>②</sup>只有认识到物质的客观性这点，才能保证得到如下的物质定义：“所谓物质就是客观地即结局同主观独立地亦即与被意识与否无关地且决不是按照观念主体的自由意志那样地存在着的东西。”<sup>③</sup>

总观上述可知，户坂为了保证物质的客观性、辩证法的客观性而特别重视了存在者、存在物，而由存在物上得到了客观，把客观视为存在物的代表；因而存在也就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具体内容的，而作为存在的代表即物质也就必然是客观的了。物质是客观的，物质的辩证法当然也是客观的了，所以户坂说：“真正现实的东西只有是客观的东西，同时真正辩证法的东西也只有是客观的东西。”<sup>④</sup>要之，辩证法是和物质、客观分不开的。户坂根据这一认识，批判了那种否定物质、客观本身具有辩证法的思想说：“哲学家们通常不能理解客观的存在（物质）何以是辩证法的？谈起辩证法来，就只是认为在意识或意识和（客观的）存在之间或意识和无之间而成立的。认为客观本身具有辩证法，那似乎是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77页。

<sup>②③</sup> 同上书第82页。

<sup>④</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81页。

一种神秘的託词。这样的‘神秘’现在被解释清楚了。”<sup>①</sup>

由上可知，户坂通过物质的辩证法已把自然同社会一道儿纳入到哲学范畴中去，所以他最后说：“这个哲学范畴是存在于一切自然科学体系的根柢上，而且也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上。作为物理学范畴的所谓‘物质’及经济学上所谓的社会物质、历史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要以这个范畴为准则才能获得物质之名。”<sup>②</sup>

户坂讲完了哲学范畴的物质问题后，接着讲到“物质和意识”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个“最广义上的认识问题”，并明确指出是个“物质和模写关系”上的问题，复又进而肯定了存在、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思想的第二性的问题，如说：“观念……是存在的分枝，是存在的自然史发展某时期作为具有特别高度法则的一个新的存在而发生、并发展到独得的存在方法（自我意识、自我感）的东西。”存在和意识的对立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因此“在这个对立上是具有一定的物质、存在的历史和必然性。”<sup>③</sup>

但是，只在主观和客观对立的场合是不能成立认识的，故户坂指出，认识是要成立在它们的“同一性”上，“因为事实上主观是客观的分枝、派生物，所以在二者之间就必然具有一种存在上某种意味上的同一性。”<sup>④</sup>

在主客同一性上成立的认识，其根本特点就是“模写”。那末“模写”应如何进行呢？户坂认为这首先要“以感性的知觉和经验为媒介”，并指出了模写的两个阶段：“物本身——物质——决不可能是直接、一次即知的，现象是模写的

<sup>①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82页。

<sup>③④</sup>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83——84页。

第一个阶段。模写并不是写在一块镜面上，而是要通过具有几个镜面的道具（感官）来模写的。……然而这个道具只有在自己运动上才能把物加以模写。感性是主体的——自由的——运动、实践的第一个阶段。模写、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以下则是通过实践本身——实验、产业、政治活动——的阶段。这是同作为意识形态乃至一个意识形态的理论阶段相对照的。”<sup>①</sup>因此，“模写、认识……乃是通过各种阶段而在实践上构成的。”<sup>②</sup>

最后户坂明确指出：“物自体即物质及其认识即模写，唯一能够正当提出和正当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外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sup>③</sup>

以上所述就是户坂1933年发表的《物质和模写》一文的内容概要，如把它同1929年出版的《科学方法论》一书相比，显然出现了一个新面貌。户坂几年来通过列宁哲学的启发和实际生活的深入体会，此时已探索到认识的物质基础、自然和社会的共同物质地盘，从而完全克服了《科学方法论》中给历史科学所加的那些主观要素；同时他又打破了学问性的界限而把实践展开到实验、产业、政治方面，掌握住认识的关键，探索到认识的两个阶段，从而克服了《科学方法论》中未能从感性到理性这个认识过程的缺点；因而此时的户坂得以走到了模写论，建立了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诸如户坂此时所探讨的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的自己运动、自然辩证法以及存在（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本性、意识之为物质的反映（模写），认识（模写）的两个阶段、认识过程中

①②③ 《户坂润选集》第3卷第85——86页。

实践的重要性等都是建立唯物主义哲学所必要的根本概念及重要概念。但这里我们也应指出，这时户坂对于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这个认识过程还是停留在一个纲目的阶段上，对于实践在模写的真理性、客观性上的检证作用也还是缺少充分、具体的说明。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在他后来的著作诸如《意识形态论》、《认识论》、《科学论》等书中都作了充实和克服。

## 六、户坂润的《科学论》（一）

###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成

自1933年《物质和模写》一文发表后二年左右即1935年户坂作为《唯物论全书》的一种而出版了《科学论》一书。该书是以唯物论哲学为中心，有条理地进行了体系完整的科学论述，这里用了唯物论阐明科学、科学成立的基础，批判、清算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科学论上的反映，并指明了真正的统一、体系化只有是唯物论的统一、体系化的观点。

户坂的《科学论》分为五部分：（一）唯物论的范畴组织，（二）科学与实在，（三）科学方法，（四）科学与社会，（五）科学世界。这里是沿着“实在”、“方法”、“科学世界”这条路线把模写论一杆子插到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现在就把这五部分内容大概介绍于下吧。

#### （一）唯物论的范畴组织

户坂把哲学视为“范畴组织”，实际亦即“技术组织”。

他认为，自然科学不待言，就是社会科学、历史科学也必要通过这个“技术组织”才能获得“唯一性”、“单一性”、即“科学性”；由是他便得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同哲学之间的一种“共轭关系”，认为只有通过它才能把一切科学统一起来而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唯一的和单一的东西。能担当起这个任务的户坂明确指出：“不能是资产阶级的观念论，而必然是唯物论。”<sup>①</sup>

那末，哲学何以是个“范畴组织”又是个“技术组织”呢？先从前者谈起吧。户坂认为，“哲学的生命存在于它的方法和体系上，一般把方法称为逻辑，把体系称为范畴组织。这即是说，逻辑即范畴组织是哲学的方法、体系，是哲学的真髓；所以哲学的不同，一般是起因于它的体系的不同、它的方法的不同、它的逻辑即范畴组织的不同。”<sup>②</sup>然而户坂却又认为，实际上组织体系和方法二者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句话”而已，故他最后归结为“哲学必然是个范畴组织”。

哲学既然是个范畴组织，何以又是个“技术组织”呢？户坂认为，范畴组织不是主观的，而是技术的，其理由是：虽然“范畴本是一种根本概念”，但“范畴其实只有把事物本身性质加以抽象、要约、普遍化，才会具有其存在的理由”；“概念其实不是单纯的概念，而只限于是适应把握事物的观念”。因此，“由根本概念相互间的必然性而结合成的范畴组织，也就决不能只是随意依据主观要求而作成的”，乃是“为了认识现实事物的实际所必要的一种认识方法”。<sup>③</sup>这

<sup>①②③</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78页。

样，范畴组织就必然见于“实验”之中，认识必然具有“实验”的特色。如从社会上看，它就是个“技术”的特色，何以故？“因为实验和技术乃是实践的两个项目，而人们对自然的能动的直接活动的社会部面不外就是在技术的领域内”。从这个意味上来讲，“真正意味上的范畴组织必然是技术的范畴组织。”<sup>①</sup>

户坂指出，这种“技术的范畴组织”只有唯物论才能具有，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组织都不过是一种“无政府的任意乱造”而已。由于唯物论本身具有技术的范畴组织，具有实验的技术的特质，具有实际的实践的特色，所以也就只有它才能具有“唯一性和单一性”即“科学性”。户坂由此便得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范畴之间的一种“共扼关系”。并通过它把一切科学统一起来使之体系化而成为一个“唯一的单一物”。

户坂最后把哲学归结为“范畴体系——方法、逻辑”，他对此解释说：“所谓科学讲的是特定的认识内容，所谓哲学是意味着它的特定形式和扩大它的一般形式，方法及逻辑应当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形式。”但是这种形式不是由内容以外来的，而是“内容本身的产物”，是“内容所分泌出来的胶质物”。总之，把哲学限定在逻辑上，这并未抛弃哲学的丰富内容；因为“方法乃至逻辑实际上是作为世界观的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要约而结晶的东西。”<sup>②</sup>

这第一节讲的还是“科学的预备概念。从下面第二节起便正式进入模写问题。

<sup>①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80、184页。



## (二) 科学与实在

这一节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即“实在的模写”和“科学的认识构成”。这里户坂首先给“模写”下了一个定义：“我们的意识是把客观存在本身随时间的经过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加以认识”，“所谓认识这句话的意味不外即是模写实在”。一句话，“认识即模写”。<sup>①</sup>

那末“模写”是怎样进行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户坂首先确认了认识即模写是由感觉、知觉开始及发展的，并指出了感觉、知觉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因为“感觉乃至知觉本身尽管是由客观事物自体来的印象，但实际上也得要靠那使其印象发生的反射能力的这种积极能动性”。因为具有这种积极能动性，所以也就不免潜在着反映、模写上的“错误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它，那错误的存在也就不可能说明，而订正错误、订正错误的逻辑学及方法论也就不得不完全失去了意义。”<sup>②</sup>

因此，“作为模写第一阶段的感觉乃至知觉本身实际上不只是被动的，而是要靠从事认识、模写的社会人类主体的主体而活动的最初阶段”。由于感觉、知觉是人的活动、实践的“最初形态”，所以人的活动、实践当然不能停止在感觉、知觉、实验或实证的阶段，而更要把它作为社会上的社会人的人间活动即“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所谓实践这个概念在这个意味上不能失去历史及社会的内容”。这种具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91—192页。

<sup>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96—197页。

有历史及社会的内容的实践，同时又是个“知识构成手续”；为了保证检查这个知识构成手续（或过程）的客观性，那也必要归到人的实践活动而使前者成为后者的部分。这样，“认识的客观性就不会只求于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同实践相独立的孤城之主的知识）之中，而只能求于作为人类社会的（及历史的）实践活动一部分的知识之中。由是户坂便得出一个结语：“知识模写，如果不在某种方法上介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而构成之，事实上就不会成立。”<sup>①</sup>

户坂最后总结实践在认识、模写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时说：“实践总是深入到认识的里和表，在这个意味上任何认识也都不外是实践的理论产物。”<sup>②</sup>

上面讲的是户坂就知识、认识方面而说明的模写及其构成的问题。他接着又就科学方面来谈了这个问题，同时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把科学的构成引到社会阶级方面。兹因篇幅所限就不介绍了。

我们记得，户坂已在《物质与模写》一文中确立了模写论，但其中还有些不足之处，尤其对于实践在模写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问题讲的不够。到了这里，户坂则对这一问题作了大量充实及深入细致的说明，使之抵于完善。

### （三）科学方法

这一节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通规定及特殊规定上进行了统一考察。户坂先从社会阶级方面说明了科学方法

---

①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199页。

② 同上书，第200页。

的重要性，确认真正的科学方法只有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方法。他认为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所用的方法亦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方法本身甚为分裂……难以具体掌握”，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却几乎是一义地踏着一条一致的道路发展下来的”。他说：“科学方法，无论在什么场合也不能同……科学内容及同它相表里的世界观离开而孤立起来”，那“最能忠实地尊重方法同科学内容——科学世界——及世界观相结合的这个统一关联关系的，就是历史唯物论（乃至辩证唯物论）的社会科学乃至科学一般的这个方法。”<sup>①</sup>

户坂由社会阶级方面明确了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后，接着就把问题正式移到逻辑方面，认为“方法的最后意味是在逻辑，是在逻辑意味上范畴组织”。对此问题，他是根据科学认识上的实在、反映构成的手续来说明的，是通过“方法的轮廓”和“方法的实体”来叙述的。

在“方法的轮廓”问题上，户坂是由经验出发，最后引出法则和原则来。他认为“经验是人类社会上最可信赖的出发点”，当然真正的经验是由知觉、感觉出发的，但它们被整理后才能成为经验。因此，经验本身就是个“已被整理出来的组织物”，所谓科学就是这样一个“经验的组织”。<sup>②</sup>

再由经验上组织本身来讲，它是基于“前此经验组织”的同时又必须是“今后经验的指导条件”。由此看来，经验是具有一种“自发的和自律的构成组织”；因此户坂明确指出，在经验以外没有任何所谓“先验”。而且经验又会通过本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38—23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42—243页。

身的组织性在“目的意识”上展开，成为所谓“组织科学”。这个“目的意识”发动的方向，是由“经验的整理”引出“一定的法则”来。法则是具有“普遍性的，为了成为经验的实地指导，它必然是个不可缺少的“认识形态”，同时又是个作为经验组织体的“科学的组织内容”。法则在科学的前进道路上所具有经验指导范围越广泛，那它也就越接近“原则”，几乎可以完全成为指导科学本身的东西，因此原则也可被视为它本身的方法。最后户坂指出：原则是一种“经验的法则突然升格为骨干的东西”。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不消说也是个经验的原则，它是（贯彻社会实践）从社会上大众乃至无产者所取得的最确实的经验的认识上而得出来的结论。”<sup>①</sup>

上面讲的是户坂所描述的“方法的轮廓”，下面谈谈他所谓的“方法的实体”吧。在这个问题上，户坂论述的是作为科学方法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所谓“研究方法”就是“从各种经验资料乃至认识材料引出一般关系”；而“叙述方法”则反之，它是“从已被抽出来的某一般关系出发而把它有体系地展开到每个事象上去”。

户坂进而又把“研究方法”分为“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或操作），并把研究手段细分为四种：1. 分析的操作，2. 解析的操作，3. 统计的操作，4. 实验的操作。户坂特别强调了最后的“实验”，如说：“实验不外是实践的最要素的形态，是发展到社会上的产业、政治活动上的要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42—246页。

素”，因此“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也就必然视为某种意味的实践操作”。但是仅有实验的操作是不够的，又必要有个研究方式来把研究手段加以组织及分析。户坂举例说：“就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看，……科学的研究方式，不仅要熟习材料并把它搜集到无微不至，而且还要把其各种发展形态加以分析并找出这些形态之间的内部存在的连络。这即是说，科学的方法不能不表现为法则、公式、原则的导出……因此，在研究手段上是君临研究方式的。”<sup>①</sup>

关于“研究方法”问题大致如此，至于“叙述方法”问题，户坂讲的则很少，只是说：“操作和研究方式在一定的科学形态上加以叙述的就是叙述方式、叙述方法”。

最后，户坂总结这一节说：“无论研究方式也好，叙述方式也好，它们总是要由辩证法的逻辑来贯彻的”，“一切科学方法的最后意味都应归于逻辑”，“作为这个方法的辩证法逻辑，就科学和实在的关系所述，其实只是适应着实在乃至对象本身的根本性质。唯有这样，依据这个方法的科学，才能取得并确保其真理性。——科学的一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sup>②</sup>

总上述可知，在户坂看来，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乃是属于逻辑方面的。但他又认为，这只是模写实在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科学上历史和社会的制约性、规定性亦即意识形态性。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讲的问题。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58—259页。

<sup>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59页。

#### （四）科学与社会

这里户坂首先自问自答说，谈到“科学与社会”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人要问：社会规定之成为科学上认识构成的一部分，是否同前面所讲的逻辑规定有所矛盾？他认为不然，理由是“科学的社会规定，既然是科学认识构成的条件，那末虽然是科学的社会规定也不应同其逻辑规定相独立。所谓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这句话，其实也必然是：科学认识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反映到科学认识的逻辑构成上去。”<sup>①</sup>

那末，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性”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呢？是如何反映到科学的认识组织构成上去的呢？这就是本节的内容，其中包括下列几个问题：1、通过生产力的技术性和生产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而指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性、社会性、阶级性问题；2、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范畴组织的社会性、阶级性问题；3、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大众化问题；4、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常识问题。兹将这四个问题逐次介绍于后。

其一，户坂指出，“意识形态”首先是由“生产力的技术性来规定的”。当然，技术性不是生产力的唯一规定而只是它的一个规定，然而“如由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来看，它却是个头等重要的。”<sup>②</sup>户坂对于生产力的技术性是这样分析、认识的：“生产力的技术规定（技术性），就劳动手段来讲，是表现为劳动手段的体系；其次，就劳动力来讲，是表现为劳动技能。所谓技能乃是人类劳动力所具有的一种资

<sup>①②</sup>《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

格，不待言它是适应着劳动手段乃至其体系才会成立的，因而第一次是由劳动手段决定；但第二次则相反，它却成为决定劳动手段所应有的各种条件的标准。……技能，事实上不外是社会上技术水平的一种主观的个人的反映；因此，结局它便是劳动体系的一种主观的人的反映。”象这样一种生产力的技术性，自然首先就对自然科学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因而户坂又说：“由生产力的技术性直接发生的乃是技术的知识（技能和智能），即技术学的（农学的、工学的、工艺学的及医学的）知识，而自然科学也正是按着这个技术学的要求和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促进并取得其课题的统制。这是个根本事实。”<sup>①</sup>

上面讲了生产力的技术性问题，那末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制约自然科学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户坂首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技术之被抑制甚至被抛弃这一事实加以揭露，他说：“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尽管是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一起发展的，但一旦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意味着自己本身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便不能不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其发展加以抑制，发明、发现的成果也就被故意地放弃掉”，甚至“所谓技术观念本身也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东西（技术文明的罪恶！）；因此，技术学的与件和要求，在此场合也就不得不大受限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形则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促进产业及科学的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唯一的原因”。户坂在概述了社会制度对于自然科学的制约后便指出：“只要自然科学是社会上的一个意识形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64—265页。

态”，<sup>①</sup>这就表示着社会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关系。

其二，户坂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个社会范畴，同时又是个逻辑范畴；因此“所谓意识形态性乃是使科学的社会性和其逻辑性齿牙交错的一种概念”。就范畴来说，它所持有的逻辑机能也是使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和其社会性交错在一起的。户坂说：“自然科学的各领域，各自都有一个特有方法、逻辑意味的根本概念（范畴），这就是物质、空间、时间、运动、力、场、生命、机能、法则、因果性以及其外，不待言，这些都指的是自然界的现实事物。尽管如此，可是它本身在各自的一般根本概念以外却无任何东西。因此，就各自概念作为一个概念而持有的意味来讲，历史的变迁总必然是个可能的；从而也就只有在同一般的文化、哲学及其他科学中所使用的根本概念的关联上它才能获得一定的意味。因此，这个根本概念（范畴）就是个表示着实在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的所有者。它本身原来所持有的逻辑机能是把自然科学的（一般科学的）逻辑性和社会性媒介起来并交错在一起。”户坂接着举例说：“虽然同是因果必然性这句话，但由于使用它的范畴组织不同，其内容也就完全有别；由机械论的（亦即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的）范畴得出的因果必然性，是意味着偶然性乃至可能性的绝对排除而成为机械的决定论或宿命论的一种用语；反之，由辩证法的逻辑得出的因果必然性却是一种只有通过偶然性乃至可能性才能实现的必然性。从这个例子上也可以判明，范畴组织的这个对立，若把它在哲学上加以换算，那结局就不外是观念论和唯物论的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68—270页。



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形式逻辑及机械论被呼为形而上学,这是观念论最一般的规定之一;而辩证法则必然归结到唯物论,这是哲学史的一个教导(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种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户坂指出,它是“直接归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可知“科学的实在模写的逻辑和认识构成方法上的逻辑是如何适应着社会的阶级对立这件事情”;因此,对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制约性,其实也可叫作“阶级性”。<sup>①</sup>

上面是专就自然科学而言的,那末在社会科学上如何呢?户坂说:“社会科学是一种关系生产关系内部而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科学。这种利害甚至可以说在和形成这一科学出发点的同时就给了这一目标。”因此,“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社会性、即阶级性乃至党派性,比起自然科学来更是无比显著,而其意义也是重大的。”但是,这种利害关系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社会科学之作为科学的客观性,户坂认为这是因为“现实的经济机构是个人间利害关系的组织……而把这种利害关系加以科学分析乃是社会科学的第一个阶段……利害的客观认识同主观的利害意识一致时,利害照样是同理论的真伪关系一致的。”因此,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种“作为自己本身持有的科学自律性”。<sup>②</sup>

户坂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制约上的差别问题也作了一番说明,指出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别是来自各自“研究对象的差别”,这是由“技术领域”说明的,认为技术领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sup>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74页。

域不仅是两种科学共同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具有成为两者的范畴组织间的媒介这一机能。他说：“一切范畴组织，为了能够现实地处理现实，它就必须具有技术范畴的性质，而提供这个地盘的正是所谓技术领域。”因此，技术领域不外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连络站，即两者的“交叉之处”。虽然如此，但是社会科学却可以随意离开“技术领域”而同自然科学中的范畴组织完全独立，在主观上自由成立一种“超技术的、反技术的、非技术的社会科学的范畴组织”。这里户坂特别指出：“这种现象，从社会本身的统一体来看，是个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在不幸的社会里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是不很惹人注意的。这种社会科学（？）是同自然科学完全绝缘。尽管社会本身不能同自然绝缘，但对它们的认识方法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sup>①</sup>

其三，在科学的社会规定这个问题上，户坂又提出了“科学的大众化”及“常识与科学”两个问题。对于“科学的大众化”问题，户坂是由科学之为社会财产的所有关系上开始说明的，他说：“科学是社会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的财产是持有社会所有的一种财产（亦称文化财产）的性质。”由这种财产所有关系上来看科学，科学当然是要大众化的。那末何谓“大众化”呢？户坂解释说：“所谓大众化，就是把群众加以组织化，通过把多数人组织化到大众方面，科学才会成为这些大众自己的东西而为他们所有、所利用。这是科学的大众化、大众性的唯一无二的意味”。他还指出，“唯一大众化的科学在无产阶级的科学以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76页。

外是不可能有的。”<sup>①</sup>

其四，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即“常识与科学”问题，这里户坂打破了从来把科学同常识对立的观点，打破了把常识单从消极方面来看的偏见，而主张它们乃是意识形态的两个不同的切断面。他说：“科学和常识不是单纯在同一平面上对立的東西，也不是放在上下体系关系上的东西，而是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切断面：科学把研究作为它的切断面；反之，常识则把批判作为它的切断面。一方着眼在结论，他方着眼在见识。”户坂认为，“所谓常识应是既有的各种知识之周到的、统一的、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上最现实的（时事的、时局的）综合吧。”因此，为了成为日常的、现实的，“科学就必须被常识化”；但是这个“科学的常识化，显然不是一般所谓的科学的大众化，也不是所谓的启蒙，更不是一般所谓的通俗化，而是“由批判的立场”即“由常识的立场”而“采取科学本身、科学的成果”。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意味的常识化，“科学才会明了由单纯的科学本身所不能判明的那个社会的机能”。而且，只有明了社会的机能也才会提出“科学同其他文化的关联”问题，才会有“科学的批判”。最后，户坂对那些不知通过“常识化”而企图直接由科学本身的切断面来议论什么社会及文化的科学专家提出告诫说：这样，你们的“哲学和世界观就不能不常常陷于胡说八道了”。<sup>②</sup>

在这一节里我们须要特别注意的是：户坂所谓的社会规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7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81页。

定同科学的逻辑规定是“齿牙交错的一个等价物”。它们两者并不是独立的两个规定，而是“对立的然而又是一个规定；因此，科学的社会规定也就不是同科学的方法（它代表科学的逻辑规定）相对立的，科学的社会规定和科学的方法也是对立的然而是一个规定”。户坂把它叫作“科学上的认识构成”。

## 七、户坂润的《科学论》（二）

###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成

#### （五）科学世界

前面第二节讲的是科学上的实在模写，第三第四两节是科学上的认识构成。这第五节是作为最后规定的“科学世界”。

这里首先用唯物的反映论观点，从“科学世界”引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来并阐述了二者间的关系。户坂认为，所谓“科学世界”就是科学认识（模写、反映）实在的最后阶段即“总结果”。它是“科学诸世界的统一”，是“科学世界观的客观内容”。它象实在本身必然是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一样也必然是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象存在必须由根本区别为自然和历史社会一样也必须由根本上区别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而科学世界从根本上可以大致区别为“自然科学世界和社会科学世界”，表达前者特征的是“自然辩证法”，表达后者特征的则是“历史唯物论”。那末，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二者间的关系如何呢？户坂认为，它们二者间的关系是由“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所

赋予的。这里当然存在着二者间的“关联问题”，这首先就得归到自然史贯串着自然和人类史贯串着社会的这个实在的关联上。户坂说：“进化论（博物学的自然史）是现象上最容易看到的，又是最含蓄的自然辩证法；但是历史唯物论，如果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也可以说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这个自然史（博物学）。……二者间的根本同一（贯串着对立的同一），现在是必要的。在辩证唯物论看来，这总是个不应忘记的根本命题。”<sup>①</sup>

这个根本命题，户坂指出首先就要确认“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表达“自然本身的一种根本的一般规定”，这是意味着“自然的最根本的普遍法则”，总之即所谓自然的“运动法则”；因此，自然本身就不能不持有“辩证法”，但“这决不是属于历史的社会，在存在上是属于它以先的那个自然本身的”。这里户坂曾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者给以有力的批判，他说：“假使自然本身没有辩证法而成为自然科学世界的根本特征，那末自然科学也就要成为以同自然科学本身完全个别的某种东西为特征的科学了，这样，自然科学还以什么权利来给自己本身一个自己本身的特征呢？这岂不是要去证明没有自然本身么？”同时他又指出：象这样的人不过是要“把辩证法变为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化”，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说”<sup>②</sup>而已。

上面既然说自然辩证法本来不是属于历史的社会，在存在上是属于它以先的那个自然本身的；那末怎么又说它是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87页。

<sup>②</sup> 同上书。

同历史唯物论有着关联的问题呢？这个关联究竟出自何处？户坂认为它是出自三方面，即有三个关联。第一个关联是出自意识形态的，何则？因为“那以自然辩证法为特征的自然科学世界乃是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社会规定”之为“人类史的所产”。这样，它就不能不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也就不能不是属于历史唯物论的，于是便出现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关联”。户坂说：“自然科学的(一般科学的)方法，第一次也是由自然现象本身来规定，而第二次则是由自然科学的社会规定来规定”；因此，“作为自然科学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也就要被纳入到作为其方法的规定的一部分而限定为意识形态。只要如此，那它就总得要保持着历史的社会的存在——属于社会的重大侧面。如果这样的话，那即是说，它明明是要把属于历史唯物论内容的侧面放在不能摆脱的约束之下；这里便存在着在自然辩证法本身内存在着同历史唯物论部分相一致的第一个关联。”<sup>①</sup>

其次，第二个关联是由技术内容而来的关联。户坂认为，“自然科学同技术学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但“这个技术——劳动手段的体系——恰好就是社会科学的对象，从而它不外是历史唯物论的内容。”<sup>②</sup>这即是说，作为自然科学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是以技术为媒介而有同历史唯物论一部分相一致的重大侧面。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第二个关联。

最后一个关联即第三个关联是由技术领域而来的关联，

---

①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 同上书，第290页。

户坂说：“属于历史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二者的共通领域这个技术，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以自然本身为主并把它加以变革的那个技术领域。这里必须考虑的是限于以技术为主的自然；它虽然仍是自然本身，但只要以技术为主，它就不会是单纯的自然，而必然是社会的物质基础，或是属于社会存在的自然。这明明是自然本身和社会的一个共通领域。”<sup>①</sup>要之，历史唯物论的一部分是属于自然辩证法，同时自然本身辩证法的一部分又是属于历史唯物论。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第三个关联。

上面讲的由社会规定即意识形态而来的、由技术内容而来的、由技术领域而来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这三个关联，户坂认为乃是自然和社会所特有的自然史一贯下来的关联的必然结果。他阐明了这个关联问题以后接着就对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作了一番分析说明。

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户坂首先从它的哲学部分开始，指出“自然即客观存在——不依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存在——是哲学意味上的物质”，“这是唯物论的根本命题”。但是，自然的这一根本规定却是“辩证法的”；因为“物质是以运动为根本特色的”，“物质本身的变化、发展、转化乃是意味着物质固有的运动”。那末物质是怎样运动的呢？户坂认为，物质现在存在于空间而在时间上运动，空间是矛盾的统一、时间是矛盾的统一、而空间和时间也是矛盾的统一，空间和时间的矛盾是在空间的运动上统一起来的。户坂说：“空间这个范畴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空间在某种意味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91页。

上是无，我们不能抓住空间，它可以由一切物体自由占据；但是如果说那里是完全的无，那末物的形就是空间的。”时间呢，也是如此，“尽管时间通常被考虑为流动的，但物是在时间的静止上流动的。时间尽管是对永久的一个对立面，但它本身则必须被考虑为永久的静止。”而且“这样的空间和时间也相互地是个对立面，也永久地是个抵触的东西；尽管如此，可是却在空间的运动上现实地被统一起来。”①

以上所讲是自然辩证法的哲学部分，即自然上的哲学范畴的辩证法。这以后户坂接着又讲到它（自然上的哲学范畴的辩证法）是如何更具体地表现在自然上的自然科学范畴上的问题。

这里户坂首先把问题具体到“物理学的范畴”上。他说：“具体化、特殊化到物理学范畴的物质是物，物一般被考虑为物体。”这样，就不能不考虑到物质的第一个根本规定是“运动”，是“变化、发展、转化的”；因此，这也就必然是“物质本身的辩证法”，是“自然本身的辩证法”。户坂举例说：“宇宙由天体包含着地球、地球上的许多物质及生物（又有人类社会），并且是时间的过程。宇宙、物质、自然是把这个历史运动作为根本法则的。自然的历史运动不外是自然辩证法的最根本且有代表性的场合。”因而“时间”是有特别意味的，由于“给与一切存在以秩序的就是宇宙的时间”，时间相当于“自然辩证法的骨髓”；因此，“由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自然法则，没有不是在宇宙的时间中进行的。”②

①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94—295页。

② 同上书，第197—198页。



户坂认为，表达宇宙时间上根本关系的根本法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因果性”，一个是宇宙的“进化理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因果性”问题，户坂说：“宇宙的时间是连续着的，站在这个过程、变化、连续上，一切的现状维持、静止、切断都是可能的，它们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靠着以宇宙时间为引线的历史关联。这一前后连续的（不连续也只有在它上面才能成立）关系，一般叫作因果性。”这个因果性应当说是“历史存在不可缺少的内部构造。”自然科学上因果性的观念，必然要达到“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何则？因为“因果性不外是由唯物辩证法一般所说明的必然性（它是贯串着偶然性乃至可能性的一种本质的且现实的契机的一个物理的场合。”其次，讲到第二个问题即“宇宙进化论”问题时，户坂特别指出下面的一个事实：“只有在地球上的动物进化达到形成人类社会的阶段，……才是自然本身辩证法的领域。”而且诸如“栽培植物、饲养动物都是以技术为主的自然本身的自然辩证法的实证”。“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的世界）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的世界）统一的关联环节，就在这里。”<sup>①</sup>由是户坂便把问题引伸到“历史唯物论”上来了。

在“历史唯物论”问题上，户坂又把它分为“定说”（体系）和“方法”两个问题。在“定说”中他首先确认：“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由“物质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这个命题。他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和法律”，其他诸如“道德、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等也都是意识形态。总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298—299页。

之，“凡存在于社会上的意识、观念的形态都要理解为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地来理解相互的关系”。他并指出，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文化都必要理解为一种上层建筑，而结局是要由社会的基础构造、物质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而且，“实际上各种文化不仅要直接由生产机构来决定，并且许多的还要通过政治、法律或以一定的政治思想、一定的法律精神为媒介来决定其形态。”一句话，即“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户坂认为，这是“由历史唯物论得出的社会阶层构造”，相当于“静力学的构造”。这表示着“历史唯物论定说中的唯物论契机”。<sup>①</sup>

但是，社会本是历史的社会，所以这个“静力学”就不能不同“动力学”结合起来，即历史唯物论定说中的唯物论契机就不能不同辩证法契机结合起来。那末户坂是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呢？他说：“所谓社会的基础构造决定上层建筑，这决不仅是说前者的地位在后者之上”，而是说“当社会全体进行历史的运动时首先就要考虑这个运动是由基础构成而发生、并引起上层建筑的运动。通过这个考虑才能对于这一运动全体进行统一的分析。”“作为辩证唯物论一部分的历史唯物论定说，不仅要把社会视为物质的本质，而且也要把物质的社会视为持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本质。历史唯物论定说中的唯物论契机，现在不能不同这个辩证法契机结合起来，而且我们不能不由此而把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纳入历史唯物论定说（体系）中去。”<sup>②</sup>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304页。

<sup>②</sup> 同上。

户坂从历史唯物论定说和方法二者结合或统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唯物论作为方法来看，一方是辩证法的方法，他方是唯物论的方法。”这两项规定可以作为历史唯物论根本概念的一种“决定的、规定的概念”。他又由此引出一个“因果关系”来，如说：“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那个决定的、规定的概念就是历史的决定概念、历史的规定概念；因此，这在实际上不能不是一个因果关系。”<sup>①</sup>

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问题，户坂是沿着方法的辩证法契机和方法的唯物论契机来说明的。这里他首先指出：“社会的基础构造，不仅是基础的东西，是上层建筑的规定者，而且又必定是上层建筑的历史原因；从而，上层建筑在与此同一的意味上也必定是基础构造的历史结果。”户坂把社会的这个动的因果关系的横断面，称为“社会的静止构造”，这相当于方法的辩证法契机。同时他又沿着方法的唯物论契机，把社会的历史原因追溯到最终的决定者，即物质的生产关系这个基础。户坂认为，就现象来看，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这两部分的决定或规定的关系，乃是一种“交互关系”或“双关关系”。现象虽然如此，但“社会科学问题却是在如何统一地去分析这种现象，即如何由其本质去说明这种现象。因此，为了发现这一本质，我们就必须找出区别于各种现象的那个现象形态，即必须发见形态上决定或规定各种现象的那个本质。这样，那被发见的本质不外就是所谓社会的物质基础构造——生产关系。”总之，这即是说，“意识形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305页。

态，最终是要由社会的基础构造来规定或决定的”。<sup>①</sup> 这相当于历史唯物论方法的唯物论契机。

户坂分析到这里后便进一步深入到历史唯物论的核心问题，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这里他指出：“社会的历史是以矛盾为动力的”，而作为历史动力的这个矛盾，“正是潜在于作为社会上历史原因的这个物质基础构造里，也正是潜在于生产关系内部。”对于这个问题，户坂作了如下的说明：“物质的生产关系本来是由物质的生产力构成的一定形态的关系，但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一旦被客观化、被具体化为同它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时，尽管生产力本身后来是自然的长成，但生产关系方面却仍然是停滞的；曾经为了适应生产力而成为其形式的一定生产关系却完全转化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形式。物质的生产力和这一定的生产关系便构成为矛盾，而这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不在其内部孕育着必然长成到可能的新生产关系这个否定的契机。这就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物质矛盾。”<sup>②</sup>

要之，一切社会的历史发展都不外是“物质生产关系的矛盾之扬弃和再分裂的辩证法过程”。户坂认为，这个过程的叙述就是所谓“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科学世界的内容”。

最后，户坂复从根本上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并由此得出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达到“科学世界”。他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待言是存在的自然史发展到了高度的东西”。因此，“人类史就现有着这种意味上的自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305—30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07页。

然史(博物学)的基础,而社会历史本身也就把自然史作为时间上的先行条件”。他举例说:“一般所谓的达尔文主义的优秀进化论,在这个基础和先史的时间点上同历史唯物论交错着的。但是,历史唯物论本身问题却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条件和其发展的研究才开始的。那里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人种学的、土俗学的诸多条件——这有待于现在的原始民族的研究甚多——都必要由历史唯物论的根本方法来贯彻。”<sup>①</sup>

这里户坂达到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总体的统一”,达到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世界”。他最后指出:“只有科学的世界、科学的对象才是实在反映的最高阶段——科学的真理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sup>②</sup>

## 八、户坂润高举马列旗帜

### 坚守阵地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

自1935年至1937年,户坂一方面写了《科学论》、《认识论》、《技术论》等关于原理的著作,同时另一方面又发表了许多关于时局的评论文章。双方相得益彰,在理论上进行了原理和评论的一贯联系,发挥了哲学的批判机能。这是户坂的一个无比卓越的特色。

这个时期户坂评论中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正在猖狂一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支持者日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1卷第307—30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12页。

日本法西斯主义，自1930年东京车站狙击浜口首相事件发生起，便为准备对外侵略寻找借口，接连不断地制造事端，一直到了1937年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中日战争。同时它对日本国内知识界、思想界也日益横加干涉，进行镇压，以封闭知识分子之口、窒息批评。在这样一种暗无天日的恐怖日子里，慢说共产主义，就连自由主义也都成了镇压的对象。其中有的保持沉默，有的以至失去思想性、放弃理性而堕落为日本主义；因而发生了大批的“转变”现象。

就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户坂还是依然不屈不挠、大胆直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准日益猖狂、暴横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有计划地进行了多方面的活跃的斗争；仅在两年多（1935—1937年）的时间里，他作为一位社会评论家、文化评论家而在各种报纸及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论评，普及到了政治、社会、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的各种领域；对于其中有关批判日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特别以哲学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20篇论文加以整理，汇集成为《日本意识形态》一书（1935年出版）。此书有人谓之为“哲学上的一本奋斗记录”。这里户坂运用了唯物主义哲学武器，分析批判了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本主义和日本自由主义，揭露了它们的本质及性格。

在这次批判斗争中，户坂首先抓住了“日本主义”，对之进行了颇为详细的、精辟的分析，分析出日本主义既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会成为自由主义的最终归宿。户坂说：“日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在某一特殊场合上发生的一种观念形态”，是“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是日本军部“侵略的军国意识”。他接着又说：“就法西斯军国意识来

说，必然是世界现象之一”；但同时“在日本主义上它却又表现为由日本的特殊、特权的将校集团这个军部的存在及其意识来限定的所谓侵略的军国意识。”因此，日本主义这一特有的军国意识，不外就是“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且又是军部的排外主义”。这就是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本国主义所具有的一种“决定性的特色”。<sup>①</sup>

户坂对于这个军国意识的地盘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以及日本法西斯主义为了压迫人民、统治思想而在意识形态上所玩弄的骗人把戏，所谓的“道德”、“伦理”问题，均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对于第一个问题，户坂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军国意识的地盘乃是封建残余及二者间的关系，他说：“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作为法西斯主义来看，是以利用日本的封建条件为地盘始能成立的法西斯主义；……再由封建残余要素来说，这种要素也不能不采用法西斯主义。”<sup>②</sup>这里所谓的封建残余要素，户坂指出的有农本主义、封建主义、复古主义、家族主义、精神主义及皇道主义等，他详细地说明了其间的密切关系，最后断言：“日本皇道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最终归结点”。<sup>③</sup>对于第二个问题，户坂直率地揭破了法西斯主义所玩弄的“道德”、“伦理”的骗人把戏，他说：“在法西斯主义看来，一切的思想、科学、哲学、艺术以及其他都是道德的。结果，在思想上只有好思想和坏思想之分。思想的科学批判已不成为问题，而成为问题的只有善或恶。就是这样地通过舞弄道德、大喊伦理而随心所欲地去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6卷第141页。

<sup>②</sup> 《户坂润选集》第5卷第6页。

<sup>③</sup> 《户坂润选集》第6卷第140—141页。

统治国民的风俗及思想。接着，户坂嘲笑地说：“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sup>①</sup>

尽管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压力和统治如此凶恶，但战斗的户坂润却未因此而悲观。他坚信对法西斯主义的这场斗争终究是要获得胜利，因为他深知人民反抗力量的伟大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必胜。他断定“压力越大而反抗也相应地越大”，这是个“社会的力学”。<sup>②</sup>马克思主义，“它越是表面退潮，它的普及、深入的程度越是增加”，持久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却正在形成”，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退潮思想的本质”。<sup>③</sup>

此外，户坂又结合了当时的思想“转变”问题批判了文献主义及自由主义，揭破了它们各种各样的伪装，暴露了它们各种各样的非合理主义的本质。他指出了文献主义及自由主义通过“解释哲学的方法”均堕落为复古主义、绝对主义、日本主义。

户坂并不反对哲学的解释，他所反对的乃是“解释哲学”的解释。他认为，任何哲学不通过解释也都不能研究事物。解释应当是“事实的解释”，“事实的解释本是事实所具有的意味的解释”，而“事实所具有的意味不外指的就是事实本身的活路和发展过程”。这种“事实的解释不外是为了实际处理事实和实现改革事实而在这种目标下进行的”。但是，所谓“解释哲学”的解释则不然，它的解释是为了解释而解释的一种解释，是脱离了事实而把事实所具有的意味

① 《户坂润选集》第5卷第181—182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76页。

③ 同上书，第181—182页。



变成“单纯的意味”，然后“专靠意味自己的连络”随心所欲地构成一个“意味的世界”。这就是解释哲学的解释结构。户坂最后批判说：“这看来像是天才的(?)想像力、警策、深思、洞察，其实不过是一种观念的狂奔、贱价的观念联合及安易而肤浅的推论而已。”<sup>①</sup>

户坂把当时日本的“解释哲学”分为三种类型：一、文献学主义类型的解释哲学；二、西田哲学类型的解释哲学；三、文学主义类型的解释哲学。这里对文献主义、自由主义及日本资产阶级最大的唯心主义者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西田哲学)均作了尖锐的批判，揭破了它们各种各样的伪装，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非合理主义的本质，指出它们通过“解释哲学”均堕落后为复古主义、绝对主义、日本主义。(兹因篇幅所限，恕不能作详细介绍)

此外，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保持其纯洁性，户坂又对各种各式的歪曲或篡改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人们进行了严格的批判。他批判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把唯物论曲解为单纯“客观主义”的大森义太郎及向坂逸郎，批判了把辩证法唯物论曲解为历史唯物论而把马克思主义转换为“历史哲学”的三木清，且特别提出警告说：“不持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及不真正感到哲学必要的社会主义者是容易变节的。”<sup>②</sup>

户坂在同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唯物论这一思想武器是无比优越的，是有无比威力的。例如他说，对于各种日本主义、自由主义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能够进行一种科学批判的，“必然正是唯物论”。由于唯物论从一

<sup>①</sup> 《户坂润选集》第6卷第155—15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10页。

开始就具有一种“最善于作为‘思想’根本特色的思想”，由于它是一种“最能包括一切的、统一的、客观的世界观”，又是一种“最实际的组织的逻辑”；所以只有它才具有一种“科学的批判能力”，才是“科学的批判武器”亦即“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家不外就是这样一位“科学批判家”。他接着即批判唯心主义说：“这种意味上的思想家，在唯心主义阵营里几乎一个也没有见过”。<sup>①</sup>因此，他认为唯心主义是没有“思想”的，他说：唯心主义“像万花镜一样，在多采的目色纷纭的光景中简直不足以称之为思想。”<sup>②</sup>

正在日本法西斯主义残暴的镇压下，户坂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科学精神，敢于触犯权威，敢于突破自由主义重围，并使修正主义也不得漏网。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已经成了日本的宝贵遗产。户坂是坚守马克思主义堡垒到最后一息的一位顽强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统帅，堪称唯物主义者典范。户坂之死是日本的一大损失，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所造下的重大罪孽之一。户坂本人虽死，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永远活在日本人民中间。

---

① 《户坂润选集》第6卷第293页。

② 同上书第265页。

## 参 考 书 目

1. 平林康之著《户坂润》（近代日本の思想家），东京大学1960年。
2. 田边元等著《回想の户坂润》，劲草书房1976年。
3. 三枝博音著《日本の唯物者》，第319—349页，英宝社1956年。
4. 竹内良知编《昭和思想史》，第335—393页ネルウア书房1958年。
5. 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第420—437页三联书店1964年。
6. 《户坂润选集》（六卷），伊藤书店，1947年。
7. 《户坂润全集》（五卷），劲草书房，1966—1967年。
8. 宫川透著《西田、三木、户坂之哲学》，讲谈社，1967年。

# 永田广志

王守华 撰

## 篇 目

一、生平及著作 .....	383
二、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	391
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398
四、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 .....	405
五、结束语：永田广志的哲学贡献.....	415
参考书目 .....	419



水田广志 (1904年—1947年)



---

# 永田广志

王守华

永田广志是战前日本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提倡哲学的列宁阶段，在日本开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永田广志和户坂润同被作为战前最有代表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著作被视作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永田也是一位为大家所熟知、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 一、生平及著作

1904年4月1日，在日俄战争的烽烟里，永田出生于长野县筑摩郡山形村小坂的地主家庭。父亲永田八郎，母亲永田静，生养他们兄弟姊妹10人（3男、7女），广志为次子。永田家从德川时代起，世代为小坂“名主”（村代表），属名门豪农。祖父辈起与老家分家。明治初年废藩置县后，小坂与周围的大池、竹田三村合并为山形村，祖父（永田久吉）



与父亲历任数任山形村副户长及村长。

永田6岁入本村小学。小学时代的永田是个温厚、腼腆、内向型的优等生，课余几乎从不参加一般孩子们喜爱的打棒球等活动，以读书读报为乐趣。12岁小学毕业，升入长野县县立松本中学（今松本深志高中）。他是该校校史上唯一一次实行推荐免试入学的24名优等生中的一个。中学时代，永田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出众。课余开始关心哲学问题，经常阅读西田几多郎、中泽临川的著作，康德、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等的译本及介绍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中学五年级时（1920年），得到了一本东京大学出版的《经济学研究》（创刊号），上载有《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研究》一文，读后感到要批判地看待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遂开始关心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关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时，父亲强令他作松本著名大地主、高利贷资本家永田兵太郎的养子，还要他毕业后报考第一高等学校，然后进东京大学农学部。在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永田，把学习哲学、关心社会和人生问题，反对父亲的命令，自己选择志愿和择友交往作为自我确立的锻炼。中学毕业以后，毅然解除了与永田兵太郎的养子关系，并不顾父亲的反对和断绝经济援助的威胁，考入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俄文部学习俄语。

在东京外专期间，通过山川均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献。之后，即利用懂得俄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阅读原文文献，致力于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在校中，永田参加了“东京外国语学校社会问题研究会”，经常出席有关社会、世界历史事件、俄国革命等的讨论会。

1924年（20岁）从东京外专毕业后即去朝鲜工作。在赴朝之前，与小泽喜美子结婚。6月到朝鲜，在平安北道警察部队任俄语翻译，从事有关苏联文献的检查工作。因妻子赴朝后患肺结核，自己也得了肋膜炎。1926年底，以“妻病恶化，自己的病也要休养”为由，辞去职务回到松本。次年妻结核病不治身亡。

永田在外专学习期间及毕业后在朝鲜工作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兴起的时期。经历了日本共产党成立（1922年7月）、第一次解散（1924年3月）、重建（1926年12月）的过程，及山川均提出“无产阶级运动方向转换”、福本和夫提出“分离结合论”的时期。以山川均主义与福本主义的争论为背景，永田开始了他的文笔活动。1927年底永田出版了他的处女译作，阿克赛洛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以后又翻译了丘梅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根本概念》、德波林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等。在其后的5年间，永田主要从事德波林学派及苏联哲学文献的翻译介绍工作，翻译出版了德波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29）、《费尔巴哈及其哲学》（1929）、《唯物论史》（1929）、《战斗的唯物论》（1930）。还翻译出版了列宁的《议会斗争的战术》、《无产阶级国会选举》（1930）。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日本蓬勃兴起，日本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残酷的“3·15”镇压和“4·16”镇压，日共的主要领导人惨遭杀害，全体共产党员被搜捕，两次共有1700多人被起诉。正是在革命惨遭镇压的情况下，永田经川内唯彦的介绍，参加了“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简称“无科”），为

该所第一部附设的“苏联科学研究会”的研究员，并兼任“无科”举办的“外国语讲座”的俄语讲师，还经常在“苏联文化讲习会”作讲演。年底又参加该所下属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会”。“无科”是多学科性的研究组织，在它之下还有“日本资本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农业问题研究会”等研究组织，有条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通过上述的活动，对提高永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帮助。“无科”在哲学领域，曾与三木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斗争，还介绍了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情况。永田在“无科”机关杂志《无产阶级科学》上发表的《德波林为何被批判》（1931年），是日本最早介绍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情况的文章。以后又翻译了米丁的《哲学论战的总结和反宗教宣传》（1932年）。永田成为在日本介绍这场论战的中心人物。“无科”的“苏联科学研究会”还出版了日文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永田的工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永田又参加了“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简称“战无”或“IPE日本支部”）及“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并任“战无”的教育部长和中央常委。这一年10月，与北川百合子结婚。婚后一周，“战无”被宣布为“非法”，永田第一次遭拘捕。次年政府对“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进行镇压时，永田又第二次被拘捕。

由于“战无”陷于“非法”，无法开展正常的理论活动。冈邦雄、三枝博音、户坂润、服部之总等人筹备成立新的理论组织，1932年10月“唯物论研究会”（简称“唯研”）正式成立。从“唯研”成立当初起，永田就是它的成员，并

是它的下属组织“唯物辩证法研究会”的负责人。次年又担任“唯研”干事，兼任资料部部员和计划部部员。

“唯研”聚集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理论家，面对日益疯狂的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不畏强暴，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巨大的业绩：出版《唯物论研究》杂志65册、《学艺》杂志8册、《唯物论全书》及《三笠全书》50卷。在哲学理论方面，永田在“唯研”哲学部首先提出了“哲学的列宁阶段”的提法。针对三木清等人对辩证法作存在论的解释，和加藤正提出“在辩证唯物论中没有必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错误观点，展开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的争论，和“哲学的党性原则”的争论。在前一场争论中，永田首先以“君岛慎一”的笔名，连续在《唯物论研究》（简称《唯研》）上发表《作为运动逻辑的辩证法的特点》、《作为反映论的逻辑的唯物辩证法》、《关于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性的片断》等6篇论文，比较完整地宣传了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理论的内容，对在日本传播唯物辩证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一场争论中，永田连续发表《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与客观主义》等文章，正确地介绍了列宁的有关理论。

此时，永田还参加了“无产阶级科学同盟”，任中央委员、东京支部委员及机关刊物《无产阶级科学研究》编委，并参加了对劳农派哲学家大森义太郎的批判。大森出版过《史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读本》等哲学著作，在理论上与日本共产党持对立立场。汲取了苏联哲学论战成果的日本青年理论家们，根据共产国际的“三二年提纲”精神，展开了对大森的批判。这场斗争首先是由永田在《唯研》上发

表文章，批判大森对辩证法思想的错误理解揭开的，接着他又在《无产阶级科学》和《读什么》上发表《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哲学扩张》等文章，批判了大森的《唯物辩证法读本》及其“社会法西斯主义”。通过这些争论和批判，永田立足于哲学的列宁阶段，对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哲学的党性原则等问题的研究和普及作了许多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先驱性的贡献。这个时期永田的代表作是：《唯物辩证法讲话》（1933年）、《唯物史观讲话》（1935年）、《现代唯物论》（1935年）。

1935年3月，日本共产党最后一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入狱，日共中央机构彻底被破坏。在此前后，几乎所有的进步团体全部被摧垮。“唯研”成了唯一还能公开活动的进步团体，在白色恐怖下，独挡一面地在思想战线上坚持着艰难的斗争。1935年6月，永田因“贯彻共产党目的”的嫌疑第三次被逮捕（保留处分）。在法西斯主义白色恐怖面前，一些理论家离开了“唯研”，宣布“转向”。永田与户坂等中坚分子，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斗争。在不能公开正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下，永田转入哲学思想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古代思想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古为今用地坚持斗争。永田在这方面的杰出成果是：《日本唯物论史》（1936年）、《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1938年）、《日本哲学思想史》（1938年）。

1936年7月，永田又因“贯彻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目的”的嫌疑，及因计划举办“日本封建制讲座”并为其执笔

人等理由，第四次遭逮捕，并被起诉，受延期处分（1937年3月）。后因在拘押中病情恶化，被保释回山形村养病。1938年2月，“唯研”最终被迫解散，3月《唯研》被迫停刊。11月27日发生了所谓“唯研事件”，永田、冈邦雄、户坂润、森宏一、新岛繁一等再度被逮捕，当局以“用意识形态的词来研究日本思想是明显地侮辱国体”为理由，将他们关押在东京巢鸭拘留所。这是永田第五次被逮捕。第二年因病情恶化，永田被保释在外就医。“唯研事件”全体成员，以“违反维持治安法”为理由被起诉，1940年6月东京地方刑事法院开始预审，次年6月预审结束。1941年12月第一审结束，被判处徒刑3年。永田等不服，立即提出上诉。1942年12月第二审结束，被判处徒刑2年零6个月。永田等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但未等高等法院审理，即撤回上诉，以肠结核恶化为理由，采取缓期执行手续。这一年，因日本侵略战争战况恶化，永田被疏散到山形村老家，一直住到逝世的前一年。从1938年底被捕起，永田就被禁止执笔。在这段时期里，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及论文。但他继续用昆野和七、东健太郎、中野弘、中野研二等笔名发表译著，直至战争结束。

战后，1945年底日共重建。永田参加日本共产党，并重新开始理论活动，成为战后最早起来活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永田再次着手批判西田、田边哲学。1946年1月“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简称“民科”）成立，永田参加并担任哲学部干事。因为病重不能到东京工作，他在松本创建了“民科松本支部”。此时他从山形村老家迁到松本市分铜町暂住，领导松本支部开展理论活

动。在疾病缠身，几乎是卧床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版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马克思及其学说》等书籍，还发表了18篇论文。正当永田大有作为之时，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1947年9月7日傍晚，永田在松本市分铜町临时寓所逝世，终年43岁。9日举行葬礼。根据永田遗愿，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葬礼免去一切宗教仪式。并以“对党没有贡献”为理由，拒绝党葬。“战无”和“唯研”时代的战友秋泽修二、冈邦雄、山田坂仁等参加了葬礼。东京的理论工作者在东京神田日本大学法学部讲堂，为他举行了“永田广志追悼讲演会”。1953年7月，为了满足永田生前“即使死后也要到东京”的愿望，百合子夫人将其遗骨携至东京，葬于多磨墓地。墓碑由平野义太郎题写。

永田在短暂的一生中出版著作、译著53种（单行本），发表论文、译文140篇。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为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功绩，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永田逝世后不久，即出版了《永田广志选集》（全7卷，白扬社，1947年~1948年）。《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日本唯物论史》、《日本哲学思想史》被作为《永田广志日本思想史研究》（1~3卷，法政大学出版社，1967~1969年）出版。《日本唯物论史》还被收入《新日本文库》（新日本出版社，1983年）。其它著作和论文也被多次再版、重印。在永田逝世33周年时，成立了“永田广志研究会”和“永田广志文库”，出版了《永田广志研究资料》。在新形势下，对永田广志思想正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 二、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

从永田的经历，我们知道他是从接触、学习苏联哲学开始其哲学生涯的。具体地说，他是从介绍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为契机，在日本宣传哲学的列宁阶段开始其哲学活动的。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过程中，米丁等人提出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在理论上发展了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一环，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所以三者同一是“哲学的列宁阶段”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永田很快地将苏联哲学界这一新成果介绍到日本，并在“唯研”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的争论。<sup>①</sup>这场争论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这场争论首先是由永田在《唯研》创刊号上发表《作为运动逻辑的辩证法的特点》（1933年11月）一文开始的。永田论文的中心思想是：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是分别适用于静止和运动两种不同领域的逻辑学。三木清也把形式逻辑作为“本质存在”的逻辑学，把辩证法作为“现实存在”的逻辑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对辩证法的本质的理解错误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从不同的对象范围，而是从对于对象的“把握方法”中来探索两者之差异。即形式逻辑是片面地、抽象地把握对象，而辩证法更全面、更具体地把握对象。永田认为辩证法首先是客

<sup>①</sup> 也有人将这场争论称为“‘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的讨论”，见《昭和思想史》第397页。



观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其次是这种客观规律在思维中的反映。因此自觉地运用它，“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必须是“阐明客观世界及它在思维中的反映的一般运动规律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辩证法是“唯物论的逻辑学、辩证法以及认识论的同一”。这样，弄清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性质，是哲学的列宁阶段的一个特点。<sup>①</sup>永田的这篇论文，在当时不少人还没有摆脱普列汉诺夫、德波林、三木清的影响，甚至把辩证唯物论与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的情况下，起到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特别是提出“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这一点具有先驱性意义。但是永田在这篇论文中，把认识论看作是思维方法的科学，表现出想以辩证法限定思维方法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受到了原田武（松村一人）的反对。原田在同一杂志的第10号上发表《关于君岛氏论文的备忘录》，批判永田的论文“与客观的根据结合成一体而提出思维方法问题是相当令人可怕的，还具有把思维方法机械地与认识论看作同一的倾向，是极端危险的，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sup>②</sup>永田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连续发表了《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及《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两篇文章，<sup>③</sup>进行了自我批评。在文章中，他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是根据认识论的反映论的逻辑学，同时在反映论的基础上，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来把握。另外，秋

<sup>①</sup> 参见《作为运动逻辑的辩证法的特点》，载于《唯研》创刊号，1933年11月，第111~121页。

<sup>②</sup> 《关于君岛氏论文的备忘录》，《唯研》第10号，第34页。

<sup>③</sup> 见《唯研》第6号及第9号。

田徹(真下信一)发表了《哲学的真理性和党派性》(《唯研》第10号),在主张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时,重点放在认识论方面。这是争论第一阶段的大体情况。

第二阶段,船山信一首先发表了《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唯研》第11号),从正面揭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问题。船山在文章中认为,有人从列宁说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话,得出列宁认为三者完全是相包含、相等的观点。然而,这是错误的。船山指出:“列宁并不是把同一性作为抽象的形式逻辑的同一性,而是辩证的同一性,即看作在统一性中有差别性,在差别性中有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同一物时,并不是把三者作为同等份量并列的。……重点在认识论,他要求把辩证法、逻辑学作为认识论来看。”<sup>①</sup>在引用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sup>②</sup>的话以后,船山接着说:“列宁的意思是‘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本质。”<sup>③</sup>这里,船山强调了认识论的因素。

但是,船山的“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本质”的观点,在“唯研”内部引起了争论。石浜哲夫(沼田秀

---

① 《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唯研》1933年9月第11号，第67～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0页。

③ 《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唯研》第11号第68页。

乡)、吉田歙(本多修郎)、小西荣治分别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船山进行了补充和批判。虽然石浜认为船山的论文“为在我国确立辩证唯物论哲学前进了一步”,“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是使我国的哲学界混乱和倒退,而是前进。”但是他指责船山有把“辩证法主观化”或“把辩证法还原为认识论”的危险性。石浜认为列宁是对抗“康德主义认识论的统治和辩证法同认识论相分离”的,所以“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论,把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提到了前面”。<sup>①</sup>吉田歙认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是重要的,为了不使三者简单地在紧密联系上结束,在探讨“同一性”时,有必要研究它们的“区别性”。他还论述了“认识论、逻辑学和(客观的)辩证法的关系”,指责船山把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当做辩证法的本质,直接是一种“政治主义的主观主义”。<sup>②</sup>小西则对三者同一持否定态度,认为三者起初是各自独立地存在的,把它统一起来是列宁的课题,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唯心论的”。指责船山“把‘重点’放在认识论上,由认识论来统一其它两者,和所谓认识主义仅差分毫。”<sup>③</sup>对此,船山又发表了《答“认识主义”的责难》(《唯研》第14号)进行反驳。重申“我们说‘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本质’,主张‘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同一性’,是为了提出对反映论(及

<sup>①</sup> 《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唯研》第13号第68~69页。

<sup>②</sup>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联系》，《唯研》第13号；《客观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同上志第12号，第61~62页。

<sup>③</sup> 《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唯研》第13号，第93页。

向具体知识方向转变)、实践的优先地位(特别是理论对实践的依赖)以及发展的观点。”<sup>①</sup>

永田在这一阶段虽然没有介入与船山、石浜等人的正面争论,但他在《唯研》第15号上发表了《现代唯物论的认识问题——列宁是如何发展辩证唯物论的》,在该文的最后部分涉及到了三者同一问题。永田说:“从认识论上来考察人类世界认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诸逻辑范畴和诸辩证法范畴,得出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或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的结论。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在列宁那里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正好就是认识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不能理解为像把辩证法应用于其它科学那样的同样意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不单纯是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辩证法应用于一个特殊场合,而是作为哲学科学本身的辩证法。辩证法正好就是认识论这一命题,不外乎是从辩证法与反映论的关系上总结出来的。辩证法是‘关于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恩格斯),‘不是关于思维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一切物质的、自然的以及精神的东西的发展规律,即是关于全部世界的具体内容及其认识发展的规律’(列宁),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和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是‘本质上同一’的(恩格斯),根据反映论的原理,认识研究的诸范畴、认识的诸因素同时也是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表现,从而不能把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和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割裂开来考虑。为了理解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这一哲学列宁阶段最重要的内容,必须从研究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

<sup>①</sup> 《答“认识主义”的责难》,《唯研》第14号第129页。

论》里极其详尽地解明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sup>①</sup>从而，从正面在理论上说明了三者同一的基本道理。

第三阶段，永田认为通过上两个阶段的争论，从外表看来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所争论的内容并没有全面展开，不同的意见也没有取得一致，尚待解决。于是，他发表了《作为认识论的若干问题》（《唯研》第32号）、《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唯研》第36号），在对苏联哲学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对三者同一作了理论上的补充和发挥。药袋俊二（山田坂仁）的《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唯研》第39号）、鹤饲隆夫的《反对反映论的主观主义歪曲》（《社会》1936年1月）则对永田在强调“本质上同一”时，却模糊了它们在形式上的区别进行了批判。对此，永田又以《为了钻研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研》第40号）作了回答，从而结束了这场延续了3年的争论。但是对此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结束，后来古在由重在《学艺》杂志<sup>②</sup>上发表的《逻辑学和认识论》（1938年）、《关于现代认识论的意义》（1938年），是这场争论之余音。

纵观这场争论，焦点在于：三者果真是同一的吗？在何种意义上同一？对于前者绝大部分的意见是肯定的，对于后者则有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意见又几乎不是排它性的，而是互补的。其中永田和船山的意见尤其值得引起重视。由于船山被捕和宣布“转向”的原因，没有参加后一阶

<sup>①</sup> 《现代唯物论的认识论问题》，《唯研》第15号第88～89页。

<sup>②</sup> 1938年2月“唯研”被迫解散，改为“学艺发行所”。3月《唯研》被迫停刊，从4月起发行《学艺》杂志，直到同年12月为止。

段的讨论，永田自始至终的观点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永田认为，因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的一般规律的学问，所以在辩证法中必然包含阐明它同逻辑范畴的内容和获得逻辑范畴的认识过程的问题。从而，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同一性是不言自明的。这些被资产阶级哲学割裂的因素，在辩证唯物论中统一于一个整体，所以“辩证法、逻辑学以及认识论是完全同一的，在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完全是互相包含的”<sup>①</sup>永田的论文强调三者本质上的同一性，在当时比谁都更正确地介绍了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要点，对于宣传哲学的列宁阶段，提高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在日本确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体系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也不可忽视永田的论文中也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首先，在争论的一开始，他有把认识论看作是思维方法的科学，以辩证法限定思维方法的主观主义倾向。关于这一点，如上所述，永田自己在争论的过程中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其次，在具体解释列宁的命题时，有混淆三者本质上的同一和内容、形式上的同一的倾向。例如他曾说“逻辑学不单是关于思维技术的学问，只要它是研究外部世界一般运动规律的认识范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自明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同一性也因此而明确了。可以说在内容上是同一的这三者表明了辩证法的各个特性。”<sup>②</sup>这里永田没有从本质上来理解，而只是从外部来理解同一性，混淆了本质上的同一和内容、形式上的同一。第三，永田在强调本质上同

<sup>①</sup> 《为了钻研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研》第40号，第104页。

<sup>②</sup> 《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唯研》第6号第31页。

一时，完全否定了三者各自在对象范围里相对的独立性。例如他说：“外界的一般运动规律和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是‘本质上同一’的，根据反映论的原理，认识论研究的诸范畴、认识的诸因素同时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表现，从而不能把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和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割裂开来考虑。”<sup>①</sup> 这里永田强调在认识论领域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对立，肯定唯物论的反映论本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若不肯定三者还具有各自的对象范围与形式的区别，否定思维规律或认识规律的相对独立性，则是否定了逻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论敌们将永田的主张指责为“认识主义”并非完全没有原因的。到争论的最后阶段，永田甚至说：“不管动机如何，试图在三者之间找出内容上的差别，把它们看做互相独立的科学，很明白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让步。”<sup>②</sup> 则更是片面的。造成上述缺点和不足的原因较为复杂，与当时的形势和批判对象也有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永田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还比较朴素，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尽管如此，但忠实地将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理论内容介绍到日本，提高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应该首先归功于永田。

### 三、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

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是永田忠实地宣传哲学的列宁阶

<sup>①</sup> 《现代唯物论的认识论问题》，《唯研》第15号第88页。

<sup>②</sup> 《为了钻研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研》第40号第150页。

段的另一重要方面。这场争论是由加藤正引起的。1930年加藤发表《对三木哲学的备忘录》（《无产阶级科学》1930年8月）、《通向辩证唯物论的道路》（《思想》1930年12月）两篇文章，在批判“福本主义”和三木清主观主义错误的同时，走向了客观主义的另一极端。他参加“唯研”后，1933年在《唯研》上发表了《我的辩证唯物论的回顾和展望——致唯物论研究会的备忘录》，进一步发展了客观主义的倾向，导致否认哲学中的党性原则。加藤正的观点马上受到了永田广志、船山信一、三枝博音、梯明秀、秋田徹等人的反对，<sup>①</sup>在“唯研”内部形成了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争论。经过争论，“唯研”于1933年11月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否定了加藤的错误观点，肯定了永田等人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正确观点，并指出这是哲学列宁阶段的发展。在《唯研》第14号上，发表由山岸辰三（山田坂仁）执笔的文章《为关于理论党派性讨论的〈总结〉》，作为这场争论的理论总结。

加藤正在批判福本和夫和三木清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唯物论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在广泛意义上承认世界的各种现象是在自然本身内在的必然的展开过程，即在辩证的展开过程上成立的”。换言之，它是对上述过程的认识。这样它的优越性和正确性就“必须由人类对于世界秩序的认识成果，即把哲学和科学成果包括于自己之中而决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根据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指明了作

<sup>①</sup> 见君岛慎一（永田广志），《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唯研》第6号）；船山信一《必须读什么？》（《唯研》第11号）；三枝博音：《资本论的唯物论基础》（《唯研》第8号）；秋田徹（真下慎一），《哲学的真理性和党派性》（《唯研》第10号）等。



为新的世界历史承担者无产阶级的使命和方向，……成为无产者取得自身解放的理论。”<sup>①</sup>但是加藤正接着认为一些“哲学的追随者”与此相反，“从无产者的立场理解世界而把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集中于自己的领袖身上”，出现了福本主义和三木哲学。他们把辩证唯物论看作是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基础经验”，换句话说，“他们只把辩证唯物论看作是无产者自己意识的表现，实际上这是卢卡奇的观点。”加藤认为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把它看作在其自身的联系上对现实世界（自然和历史）如实地把握，这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的观点。也就是说，必须在“把辩证唯物论规定为无产阶级意识，或者规定为对世界如实的认识”二者之间选择一个，而加藤选择的是后者。所以他认为“在辩证唯物论中没有必须维护的无产阶级党性。那么，拥护党派性是荒唐可笑的宗派主义。”<sup>②</sup>

永田在《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中，对加藤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永田认为：“当我们观察认识时，不只是看到它受社会历史的制约方面，而还必须经常把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一方面放在心头”。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在阶级社会里则受到阶级的制约，无产阶级的实践和资产阶级的实践不可调和地对立着，“保守偏狭的实践把片面的认识作为真理，相反进步的实践全面地发展了认识”。“我所说的主观认识被社会历史所制约，不外乎就是把实践作为决定主观认识的东西。如果主观认识不是先验的，那么它也不是居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的认识。

<sup>①</sup> 《辩证法的探究》，三一书房1949年，第37—38页。

<sup>②</sup> 《辩证法的探究》，三一书房1949年第59—60页。

它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这样，它在阶级社会里就带有阶级性。从而实践的、主观认识的党派性便不可避免地归结为理论的党派性。”<sup>①</sup>并且永田进一步以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来说明一定的理论的阶级性（党派性）和真理性（科学性）是不矛盾的，而是一致的。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和阶级性统一的基础。<sup>②</sup>此外，永田还在《唯物史观和客观主义》<sup>③</sup>一文中，批判了加藤正的客观主义倾向。

在“唯研”内部，参加这场争论的人很多，他们的观点和入手角度虽略有不同，但共同批判加藤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客观主义的倾向，成了“唯研”内部的主流派。这里，永田所坚持的在哲学中始终存在着党性原则；在阶级社会中即是阶级性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等等观点，较正确地反映了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学说的基本内容。他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并被写进了这场争论的《总结》中：“理论的党派性是列宁对理论的阶级性的发展和规定。在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非常尖锐的今天，强调理论的党派性是理所当然的”。“与‘客观主义者’相反，把实践引入认识发展的内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大特点。”<sup>④</sup>这场争论，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永田在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

<sup>①</sup> 《作为反映论的逻辑学的唯物辩证法》，《唯研》第6号，第26—27页。

<sup>②</sup> 见同上书，第28—29页。

<sup>③</sup> 载于《历史科学》1933年5月。

<sup>④</sup> 《为关于理论党派性讨论的〈总结〉》，《唯研》第14号，第120—121页。

论三者同一”和“党性原则”争论中所做的工作，为在日本系统地介绍哲学的列宁阶段，并使其成为唯物论哲学发展的基础，作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永田宣传哲学的列宁阶段理论纲领的具体化，则是他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做的宣传。具体表现于他的《唯物辩证法讲话》（1933）和《唯物史观讲话》（1935）两本著作中。这两本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苏联哲学的新内容，同时也反映了永田自己的创造，是他为在日本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作的努力，也是他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贡献。这两本书反映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当时“最优秀的教科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本书的内容。《唯物辩证法》的写作目的，诚如永田所说，“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基础，概括地研究辩证唯物论的主要问题”。<sup>①</sup>在本书的一开头，永田就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说：“所有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意识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说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等关系问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心物关系问题。”<sup>②</sup>接着在第一至第四章中叙述了哲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斗争作为贯穿以往哲学的主线索，并把以往的哲学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第五至第七章叙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地论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物质、运动、时间与空间、意识、反映、观念、实践及实践在认识中

<sup>①</sup> 《唯物辩证法讲话》序，白扬社1933年第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页。

的作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无神论等等。其中特别详细地论述了“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它不仅是“客观世界运动的普遍规律”，而且是“人类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而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是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所以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sup>①</sup> 突出了哲学列宁阶段的主要命题。永田详细地论述了辩证法三大规律，进而阐述了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逻辑范畴，并通过与均衡论、诡辩论、机械论等形而上学思维相对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如何贯彻于现实之中，反映于思维之中。这是列宁命题的生动具体的表述。“这大概是该教程最优秀的部分。”<sup>②</sup>

永田和当时的其它唯物论哲学家一样，把形式逻辑作为“主观主义的逻辑学”加以排斥。在该书的第八章中，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但永田不只是加以简单的排斥，而进一步考虑如何加以克服。永田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为了不陷入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必须坚持辩证法，排除主观主义的形式逻辑。所以批判地克服形式逻辑，掌握唯物辩证法是十分重要的。”<sup>③</sup> 于是，他在该书的体系中增添了第九章“概念论”的内容，对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归纳与演绎等思维形式进行了考察，叙述了辩证法如何贯彻于从概念到一般规律的思维过程之中。虽然论述得尚不系统和浅近，但这却是永田创造性的表现。不管永田主观上是否明确他所做工

① 《唯物辩证法讲话》第160页。

② 永井清明语，见《昭和思想史》，米涅尔瓦书房1958年第316页。

③ 《唯物辩证法讲话》第267页。

作的意义，客观上表明他在推进辩证逻辑体系化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工作。该书最后以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第十章）、“列宁与辩证唯物论”（第十一章）为结束。

《唯物史观讲话》一书的目的是“企图说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它的第一至第四章概括了《唯物辩证法讲话》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为本书的序说。<sup>①</sup>第五章开始论述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永田认为：“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的一般理论即是自然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发展的观察即是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与自然辩证法并立为唯物辩证法的基础”，所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密切、不可分的联系着的，”<sup>②</sup>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接着永田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国家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虽然在此之前，唯物史观已经福本和夫、河上肇等人的介绍，但在当时同类书籍中，永田的《唯物史观讲话》是最优秀的著作。

永田的这两部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反映了哲学列宁阶段的特点和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的情况。这个特点在永田死后至50年代初，几乎被作为一致肯定的方面。而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这个特点又成了被否定的方面。永田被称为“30年代日本输入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代理店”，把永田斥之为“日本的米丁=斯大林型哲学家的典型”，<sup>③</sup>简单地加

① 参见《唯物史观讲话》代序第1页。

② 同上书第131—132页。

③ 转引自《永田广志研究资料集》第4集第36页，外山书店1982年2月。持简单否定态度的人有三浦逸六、山田宗睦、田中吉六、清水多吉、菅孝行等。

以否定。当然如梅本克己那样，认为永田对“苏联哲学的移植本身具有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意义”，持全面恰当评价的人也为数不少。<sup>①</sup>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从正反两方面都反映了永田这两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战斗性。在这两本书中，永田不但对新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西田一田边哲学等等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进行了批判，还与德波林、布哈林、三木清、福本和夫、大森义太郎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进行了斗争。这个特点不但贯彻于这两本书中，而且贯彻于永田一生。在今天看来永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不免还显得幼稚，具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国际上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体系化工作也尚处于摸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永田对体系化所做的普及和尝试，不能不说是具有先驱性的意义，其影响是深远的。

#### 四、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

1934年，永田发表了《日本资产阶级唯物论者》，这是他第一篇关于哲学思想史研究的论文。接着又发表了《明治时代宗教批判的特点》、《关于福泽谕吉》，标志着永田开始转入哲学思想史研究阶段。关于永田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入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原因，虽然他自己也曾说过由于在这个领域“不大容易招风险，容易保持理论的纯洁性”，所以才转向此领域之类的话，<sup>②</sup>但决不能仅仅把

<sup>①</sup> 参见梅本克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科学》，三一书房1964年第289—290页。

<sup>②</sup> 参见《永田广志选集》第3卷，白扬社1948年第111页。

它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退让、妥协和软弱的表现，更不能把他与“转向派”等同看待。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地认识其意义。

第一，永田转向哲学思想史研究是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坚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进入30年代，日本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这种进程更为加速。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神道、日本主义等超国家主义思潮急激膨胀。为了阻止或延缓这种进程，批判法西斯主义（永田当时称之为“现代主要思潮”）及清算其渊源（神道、佛教、儒学唯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及一切进步思想家责无旁贷的义务。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开拓日本哲学思想史领域的研究，阐明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思想的关系，并加以批判，是进步理论阵营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历史要求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及进步史学家转入思想史研究，永田便是众多研究者中最优秀的一员。

第二，永田前一阶段致力于介绍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是从外国传入的先进思想，对于日本传统思想来说是一种“异质”的思想。永田转入思想史研究的初期，重点研究了日本唯物论史。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日本古代和近代唯物论的局限性，以对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并且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前史”，从而最终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必然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扎根。尽管永田这种追寻“前史”的方式并非很有说服力或最为有效，但是他的动机无疑是合理的，并且也确实对进一步传播和深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第三，永田转向思想史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各个领域渗透的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福本和夫、河上肇及永田等人的努力，逐渐体系化后，需要向经济、历史、法律、文化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渗透和普及，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说明问题，占领各学科的阵地，指导各学科的发展，同时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是当时日本进步理论家所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永田转入思想史研究，应当视作这种需要的表现。

永田转入思想史研究后，在短短的五年内，出版了《日本唯物论史》（1936）、《日本哲学史》（1937）、《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1938）、《日本哲学思想史》（1938）等四部著作及17篇哲学思想史论文。特别是《日本唯物论史》、《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和《日本哲学思想史》被称为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三部力作。这些著作和论文所论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即对神、儒、佛的研究和批判。如上所述，这是永田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现实出发点。

关于佛教思想，是永田研究所注目的课题。《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一书以论述佛教为主，在《日本哲学思想史》、《日本唯物论史》及《日莲主义与现代》（1935）中都有论及。作为哲学家的永田的佛教研究，与一般佛学家和宗教学家有明显的不同，着重于研究佛教的世界观、泛神论、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在研究佛教的历史时，着重研究佛教的护国主义、佛教的民族化（镰仓新佛教）、排佛论、废佛毁释、佛教再生（明治佛教）、佛教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同其



它思想的斗争等问题。永田重视佛教思辩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主张“日本人的哲学思维应该说是与在儒教之后传入的佛教同时开始的。”<sup>①</sup>这种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同时，永田又把他在参加“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期间所从事的无神论宣传与对宗教的批判贯彻于哲学思想史研究，认为宗教批判是唯物论哲学产生的前题，把哲学同宗教的对立具体看作是同佛教的对立。对佛教进行社会根源、阶级性质的分析，同现实联系起来，揭露其“用国民主义、爱国主义的色彩加以修饰，显示出与其本来形态完全不同的姿态”的伪善面貌，指出明治以后的佛教，是“僧侣们使佛教适应了新时代的各种情况，开始试图以从属于官僚政府的方式重建，从那时候起佛教大体上是作为反动的政治潮流的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sup>②</sup>即指出了战前的佛教是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者而被重建的。这样对佛教本质的分析虽然有点简单化，但从后来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佛教的13宗28派参加“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令”，最终被纳入战争体制的事实来看，永田的分析倒是一针见血的。

神道思想是永田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几乎在他所有的思想史著作中都有论及，集中表现于《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日本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和《作为思想体系的国学》（1935）、《国学的社会作用》（1936）、《关于国学的再考察》（1936）等论文中。主要是通过通过对集神道

---

<sup>①</sup> 《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永田广志思想史研究”第2卷），法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53页。

<sup>②</sup> 《日莲主义与现代》，载于1935年3月《历史科学》第4卷第3号第148页。

思想大成和国家神道思想的直接渊源者——复古神道(国学)的神学世界观的研究和批判,来批判法西斯主义。他说:“今天研究国学,决非搬弄死物,国学研究意味着阐明‘日本主义’的思想源泉之一,意味着说明从神社崇拜到教派神道的思想是国教(国家神道——引注)的重要意识形态的先驱。国学现时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宗教反映的存在,决不能无视其现实意义。国学及与国学精神融合了的儒教,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绝对主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哲学的重要因素。”<sup>①</sup>永田对神道思想的研究和批判,除了宗教批判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把国学作为天皇绝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历史渊源加以猛烈的批判,充分体现了永田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战斗性和现实意义。

儒学是永田研究和批判的另一主要对象。关于儒学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日本哲学史》<sup>②</sup>、《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和《日本哲学思想史》三部著作中。在永田思想史研究中,儒学所占篇幅、份量最大。其所论内容和范围大致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将最终摆脱了禅学影响而独立成为“大致自由的哲学思想”的儒学的发展分为如下阶段:幕藩制确立时期的儒学(重点论述日本朱子学的产生);幕藩制稳定时期儒学的繁荣(朱子学派的发展、前期阳明学和古学的掘起);封建制开始衰落时期的儒学(徂徕学、大阪朱子学派等);

<sup>①</sup> 《作为思想体系的国学》,载于1935年6月。《历史科学》第4卷第8号,第2页。

<sup>②</sup> 《日本哲学史》作为“唯物论全书”发行于1937年(三笠书房),该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观点后来发展为1938年发行的《日本哲学思想史》。以后的《永田广志选集》(全7卷)和《永田广志日本思想史研究》(全3卷)均未收《日本哲学史》。

儒学的最后阶段（宽政以后的朱子学、后期阳明学的复兴）。这种分期方法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较科学地描述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并对儒学各派分别进行了论述。这在日本尚属首次，为以后的研究作了铺垫性工作。其次，对儒学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以高度评价。把日本儒学的产生视作“脱离了宗教的独立的哲学思想”<sup>①</sup>的产生，“确立了理论对于信仰的自主性”，<sup>②</sup>“不失为日本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sup>③</sup>对于儒学的理性主义与现世主义给以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正因为这样，为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准备了条件。永田还对儒学的“排佛论”给以肯定，虽然儒学与宗教在阶级本质上并非对立，但它为合理地解释世界和思维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三，永田指出了儒学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深入到认识自然问题，而是突出地作为道学世界观发展起来的”，“其必然结果便不是自由研究，而是墨守古典思想或者继承古典中的权威思想”，从而内容“不过是中国种种学说令人生倦的重复而已”，甚至出现“复活古代迷信的现象”。<sup>④</sup>并且指出了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根本时代局限性。第四，永田联系当时的思潮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作为天皇绝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儒学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比国学逊色，例如“在宣传和确立尊皇思想方面，水户学的作用是最主要的。”<sup>⑤</sup>并指出明治维新之后，

① 《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第66页。

④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12~13页。

⑤ 《作为思想体系的国学》，载于《历史科学》第4卷第8号第2页。

完成了复活和变形的儒学思想，与神、佛思想结合，成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哲学因素。

第二方面是对日本唯物论史的研究。它是永田转入思想史研究以后最初几年的工作，集中反映于《日本唯物论史》和《关于福泽谕吉》等5篇论文中。

永田研究日本唯物论史的目的，“主要是究明日本现代唯物论的前史。”<sup>①</sup>这里“现代唯物论”即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永田为了追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而探索日本唯物论史。于是他为我们勾勒了一条日本唯物论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日本唯物论产生于德川末期，安藤昌益的唯物论和山片蟠桃的无神论、地动说为代表的“洋学”思想影响及“废佛毁释”是此时唯物论哲学的内容，它是“资产阶级唯物论的历史准备”阶段；明治启蒙时期，西周的实证主义、津田真道的唯物论、特别是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是倾向于唯物论的，帮助了唯物论哲学的成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加藤弘之的“自然科学唯物论”和中江兆民的唯物论是明治唯物论的主流；明治30年代以后，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唯物论登场；最后又被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扬弃和发展。这样一条由安藤昌益、山片蟠桃——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堺利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前者被作为后者的“前史”。

<sup>①</sup> 《日本唯物论史》（新日本文库本），新日本出版社，1983年，第5页。

尽管这条线索勾勒得尚不够完全，但在日本尚为首次，使得永田在当时众多的唯物论史研究者中<sup>①</sup>成为独具特色的皎皎者。这种特色表现于：第一，永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唯物论的各种形态所反映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他说：“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但是在哲学上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的背后具有相互对立的社会因素。”<sup>②</sup>根据这个原则，他把安藤昌益唯物主义的性质规定为“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反封建倾向的典型意识。”<sup>③</sup>并且还以此原则分析了加藤弘之和中江兆民虽然同为唯物论，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而决定了“他们的唯物论的历史作用不同”。<sup>④</sup>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原理在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永田与众不同的第一个特色。第二，强调宗教批判在唯物论史研究中的地位是永田的又一特点。他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唯物论哲学产生的前提及其主要任务”，<sup>⑤</sup>他把无神论作为每一个唯物论者必须具备的因素和条件，几乎夸大到了过分的地步。其原因之一是与他的经历和所受影响有关，永田是从介绍苏联哲学开始其哲学生涯的，而当时苏联也过分强调宗教批判。原因之二是与日本传统哲学和宗教联系密切有关。

对于《日本唯物论史》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甚至持否

---

① 如学文路圭的《中江兆民及其唯物论》、丸山时夫的《明治时代的唯物论》、鸟井博郎的《明治思想史》等。

② 《日本唯物论史》（新日本文库本）第5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④ 《日本资产阶级唯物论者》，载于1934年9月《历史科学》第3卷第10号第10页。

⑤ 《日本唯物论史》（新日本文库本）第30页。

定态度，如有人认为该书“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正确的，但客观上还是应该看作是一部失败之作。”<sup>①</sup> 大多数的研究者则认为该书是日本最早的概述日本唯物论的通史性著作，对于概观日本唯物论史，弄清一些问题，在该领域中起了先驱性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过分强调宗教批判，批判多于理论分析，有简单化倾向等等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点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苏联哲学的影响。

第三方面是哲学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永田的哲学思想史研究，并没有停留于对神、儒、佛各派哲学和唯物论史的实证研究上，而是努力探索日本哲学思想的内在发展规律，上升到哲学思想史一般方法研究。永田的哲学史方法论除了反映在几部专著的序论中之外，还有专门论文《关于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sup>②</sup> 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原理运用于思想史研究，把日本哲学史看作世界哲学史的组成部分，是思想史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具体地论述了日本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永田指出日本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不发达”，靠“移植”，“缺乏创造性和独创性”；“长时期没有从宗教分离开来，又缺乏足以使它充分发展的科学支柱，这也决定了哲学思想发展的软弱性。”<sup>③</sup> 他所概括的这些特点，至今仍被日本哲学史研究工作者所接受。

关于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目的，永田指出，“目的在

① 永井清明，《昭和思想史》第331页。

② 该文载于《历史科学》第5卷第2号，后收入《永田广志选集》第3卷。

③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10~11页。

于阐明以某种方式同现代思想有着活的联系的各种思潮的发展。”<sup>①</sup>即是阐明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哪些应当被批判继承，哪些应当被批判否定。对于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即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永田说：“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唾弃它，而它是同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最重要的是要把过去具有重要性的各种思潮，从它们同现代的主要思潮，特别是有发展前途的思潮的历史联系上加以阐明。”<sup>②</sup>鉴于当时处于法西斯高压之下，永田被迫使用“奴隶式的措词”，这里“现代主要思潮”是指当时占统地位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和西田、田边等唯心主义哲学；“有发展前途的思潮”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永田的意思是要通过哲学思想史的研究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发展的必然性，批判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等反动思潮，即使对于历史上的进步思想也应该是批判地吸收，不能一味赞美；对于被法西斯主义歪曲的历史，应从历史上和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评价。永田的这种态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永田指出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意义在于“第一，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本身如何反映在它的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哲学历史上，前者的特点如何影响后者，如何贯彻到后者的领域，是全面了解日本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任务。”“第二，理解现代日本思想状况是如何形成的，从而理解现代思想中所

<sup>①</sup>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8行。

<sup>②</sup>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8页。

凝结乃至被扬弃的历史过去，换言之，即全面地把握现代思想本身——因为对一切现象如果不进行历史的考察就不能全面地把握其本质——是为了理解与批判现代思想所必需的工作之一。”“第三，阐明意识形态变迁的一般规律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形而贯彻下去的。”<sup>①</sup>

纵观永田的哲学思想史研究，具有通史性质、方法论性质及强烈的批判性等特点。可以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也是永田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虽然也具有过分强调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从理论及内容上分析不够，有过于简单化等方面的缺陷，但是这些不足之处反映了永田所处时代的特殊要求，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恰当地进行评价。

## 五、结束语：永田广志的哲学贡献

目前学术界对永田广志的贡献褒贬不一。我们认为永田生活战斗于三、四十年代的日本，评价永田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及时代对他的要求，只有从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出发，才能认识到永田所做工作的意义和创造性。永田的理论工作在哲学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并使之在日本扎根。永田是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进入东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后来又通过直接接触俄文原典的有利条件，开始走上学习和研究苏联哲学的道路。永田与当

<sup>①</sup>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13~14页。



时极大多数哲学家的经历不同，相对于科班出身的“学院派”哲学家而言，永田是“在野”（民间）的哲学家，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永田未经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一开始走上哲学的道路，就从唯物主义出发，对他以后的哲学经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永田是通过翻译和介绍苏联哲学登上哲学论坛的。他通过处女作《德波林为何被批判》和译作《哲学论战的总结和反宗教宣传》（米丁著），第一个在日本介绍苏联30年代初的“哲学论战”和苏联哲学。永田很快地吸收了论战的成果，系统地在日本介绍；对立面斗争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一；哲学的党性原则等哲学列宁阶段的理论内容，并且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前文所述，永田的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对苏联哲学的简单移植和介绍，而且是当时日本理论斗争之需要。虽然在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的同一及哲学的党性原则等争论中，永田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前后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整个争论中永田是比较忠实地、系统地介绍了列宁理论的内容，对在日本宣传辩证唯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为日本当时理论界所接受，使之成为日本唯物论哲学发展的基础。

第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和普及化作出了贡献。在系统阐述哲学列宁阶段的基础上，永田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为在日本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了努力。他的《唯物辩证法讲话》和《唯物史观讲话》是日本最早的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著作。当时的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也处于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

程之中。永田的这两本书突破了苏联体系的框框，增添了“概念论”等章节，解释了各种思维形式，论述了辩证法如何贯彻于从概念到一般规律的思维过程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永田的发挥和创造性。这两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批判性，通过对三木清、田边元、大森义太郎、福本和夫等人的批判，维护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原则，这是永田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但是他只是把他们作为唯心主义及修正主义加以摈弃，没有挖出它们的思想根源加以克服，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永田这两部著作还是两部教科书，对在日本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重大的作用。《唯物史观讲话》出版一年零四个月后，就被译成中文出版（阮均石译，新知书店，1937年1月），对造就中国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起过积极的影响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永田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创造性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员，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和普及作出了先驱性的贡献。

第三，对哲学思想史研究所作的贡献。关于永田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如果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可列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理论成果之一的話，<sup>①</sup>那么，在这个领域里应当首推永田。他的《日本唯物论史》、《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日本哲学思想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拓日本哲学思想史这块处女地最早最优秀的成果，起到了先驱性的作用。永田对日本哲学思想史的

<sup>①</sup> 岩崎允胤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序说》（未来社，1976年）中，将它列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七大成果之一。见该书第26~27、509~514页。

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对意识形态变迁的一般规律的概括和阐述；对复古神道、佛教、儒学的批判及对古代唯物论、明治唯物论的阐述，不仅在当时有现实意义，至今仍有影响。尽管永田关于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对具体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认识上的差距今后还会拉大。但是永田在总的方面的贡献是无可非议的，他的日本哲学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具有恒久性和里程碑意义。这三部书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

永田的哲学贡献不只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他在为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宣传无神论及批判宗教、研究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批判西田——田边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 参 考 书 目

1. (日文) 《永田广志选集》(全7卷), 白扬社, 1947~1948年。
2. (日文) 《永田广志日本思想史研究》(全3卷), 法政大学出版社, 1967~1969年。
3. (中文) 《日本哲学思想史》(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 商务印书馆, 1978年。
4. (日文) 永田广志文库编: 《永田广志研究资料集》(1~5), 外山书店, 1980~1984年。
5. (日文) 森宏一: 《永田广志》, 见《唯物论者》第2卷第10号, 学艺社, 1952年10月。
6. (日文) 永井清明: 《永田广志》, 见竹内良知编《昭和思想史》所收, 米涅鲁瓦书房, 1958年。
7. (日文) 中村盘根: 《永田广志》, 见《深志百年》所收, 深志百年刊行委员会, 1978年。
8. (日文) 船山信一: 《昭和唯物论史》, 福村出版社, 1969年。
9. (日文) 岩崎允胤: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序说》, 未来社, 1976年。
10. (日文) 坂本令太郎: 《永田广志——唯物论哲学的开拓者》, 《构筑近代的人们·3》所收, 信浓路, 1980年10月。
11. (日文) 古在由重: 《永田广志》, 《现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事典(下)》所收, 社会思想社, 1981年。



# 铁 托

柴方国 吴仕康 撰

## 篇 目

一、铁托生平 .....	426
二、发展自治社会主义 .....	434
(一) 具体国情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	434
(二) 劳动者自治 .....	439
(三) 实践中的国家消亡 .....	446
(四) 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中心地位 .....	451
三、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 .....	457
四、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 .....	463
五、铁托哲学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469
参考书目 .....	473



铁托（1892年—1980年）





---

# 铁 托

柴方国、吴仕康撰

铁托（1892—1980），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共联盟主席，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铁托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南斯拉夫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建立起新型的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建了体现民主、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被人称为“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铁托还关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进步事业，按照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必须同尊重各党、各国的主权相一致的原则，发展同各党、各国的关系。同时，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铁托坚持不结盟运动独立、自主、非集团化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的宗旨，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壮大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扼要评介人们称之为“铁托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 一、铁托生平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1892年5月7日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村。父亲弗兰约·布罗兹是克罗地亚农民，母亲玛丽亚是斯洛文尼亚人。当时的克罗地亚是奥匈帝国所属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统治者担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就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削弱克罗地亚的政策，使当地的发展极为缓慢。这些政策引起了克罗地亚人的不满。他们不断地举行暴动。这种反对异族压迫的传统，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幼年的铁托进入当地一所初级小学受教育，学习语言、数学和宗教知识。5年后，因没有机会进入中学，铁托辍学，帮助父亲劳动。由于落后的生产，少量的土地无法养活大量增长的人口，当时许多年轻的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加入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行列。铁托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离开库姆罗维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铁托先是在萨格勒布东南的小城锡萨克的一家饭馆做工，不久就到一家手工工场当学徒。此后，他还在萨格勒布、维也纳等地工作过，成了一名熟练的技术工人。在这期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影响开始波及城市，城市中的社会民主运动也发展起来。铁托在产业工人的行列中，更倾向于社会民主运动。他参加了工人运动，感受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铁托正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兵役。1915年，他所在的团队开往加利西亚前线，同俄国军

队对峙。在一次战斗中，铁托受伤被俘，被送往俄国。在俄国期间，铁托学会了俄语，阅读了俄国作家的许多经典作品，也经历了俄国工人、士兵的示威运动，受其影响。铁托赞同俄国的革命，开始同布尔什维克有所接触，并大量阅读了宣传革命的文章和小册子。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就是在这期间阅读的。十月革命以后，铁托参加了国际赤卫队，进一步接近了布尔什维克。1920年9月，铁托历尽艰难返回南斯拉夫，并于同年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从1923年起，铁托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表现出领导的智慧和才能。他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鼓励工人阅读进步书籍特别是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写文章揭露工厂主对工人的压榨，认为工人阶级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无法摆脱受压迫的地位。他号召工人参加战斗的工会组织，为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积极斗争。

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被统治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共产党人的活动一直受到恐怖政策的压制。铁托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在审判中，铁托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宣称为了自己的信仰，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铁托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不能长期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必然起来造反、革命，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正是基于一种强烈的人性感。判刑和监狱没有阻止铁托的活动。当时的监狱中关押了许多革命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如莫·皮雅杰等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理论修养铁托很快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组织起来，举办共产主义学习班，研究、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有关论述。铁托从学习班中获益匪浅。铁托谈到，在监狱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有足够的闲暇从事理论学习、研究最长的一段时间。出狱以后的铁托无论在实践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更加成熟。他很快找到了南共的地下组织，受南共萨格勒布委员会的委派，前往设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国内形势，并从中央委员会那里接受任务，筹备斯洛文尼亚地区的党代表会议，促使共产党在该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1935年，铁托被派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巴尔干地区书记处负责南斯拉夫工作，并时常给列宁主义学校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讲课，讲解工会工作问题以及干部问题，介绍南斯拉夫的局势。铁托看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相当弱小，尤其是由于党的国内组织受到破坏和党的领导中间的派别活动，南共的力量以及南共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都大为削弱。在现有状况下，南共是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的。恰好在这时候，铁托受命返回南斯拉夫，直接负责、领导党的国内工作。铁托立即着手实行党的改组。据杰吉耶尔的回忆，铁托规定了改组工作的九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必须把党建立在人民中间。铁托认为，党的主要领导机关置身于国外，远离实际斗争，难以了解国内形势和人民的愿望，容易盲从他人的指示。这是南共的一大弊端，实际上意味着政治上的毁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国内，接近革命运动，接近人民。这样，可以使党与人民一起奋斗，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比使党的领导流亡国外，与运动和人民相脱离的状况要好得多。

同时，必须结束党在财政上接受外国援助的状况。在此之前，南共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这样做的消极后果就

是党的领导的腐化和分裂,不注意党与其群众基础的关系,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铁托回忆说,使一个运动情绪低落的莫过于从外界得到钱,这样的资助只会使干部堕落。

铁托强调,在当时的环境中,党的团结一致是至为重要的。在党内搞派别活动,把精力都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中,必然影响党的力量。因此,必须清除派别分子,吸收一批年轻的革命者,并对党的成员进行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意识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各样的落后思想,使他们真正成为劳动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些原则的实施,意味着南共摆脱了对外界势力的盲从,开始独立地领导革命。也正是由于实施了这些原则,南斯拉夫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担负起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并经受住战后国际斗争的考验。

1941年,德、意法西斯侵略军大举入侵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统治者在战前实行妥协政策,根本没有料到德、意军队的入侵,对战争没有丝毫准备。因此,战争开始以后无力组织抵抗。很快,南斯拉夫就被德、意、保、匈等国的军队占领。在民族危难的形势下,铁托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铁托分析了南斯拉夫民族悲剧的主要原因,确定了武装反对侵略者的方针。铁托指出,南共的任务就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团结人民群众,同占领者及其国内帮凶作斗争,“必须全力以赴支持人民捍卫独立的努力,在帝国主义攻打我国时,派遣其所有的党员、服役军人同人民一道捍卫自己的独立。”<sup>①</sup>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领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导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斗争。

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之际，铁托认为武装起义的时刻已经来临，立即发布起义宣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毫不犹豫地、有纪律地履行无产阶级的义务，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为争取自由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接着，南共组织了以铁托为首的人民解放游击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游击队破坏桥梁、铁路、工厂，埋藏粮食，牵制了侵略者的大量兵力，同时也使侵略者企图把南斯拉夫当作战争物资供应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

铁托强调，为保证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战争一开始，铁托就指出，游击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的战斗组织。所有爱国者，不论其观点如何，只要抗击侵略者，都可以加入该组织。在战争期间，盟国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援助，如空降物资，派遣军事使团。但南斯拉夫的人民群众一直是这片战场上的主要抗击力量。在盟国还不知道游击队存在的时候，南共已经事实上在领导人民抗击着强大的敌人。他们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妇女阵线和青年组织，建立了根据地。

在民族问题上，铁托特别注意各民族的团结。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民族矛盾由来已久。侵略者懂得如何利用民族矛盾来瓦解整个南斯拉夫，他们找到一些卖国分子，在克罗地亚组织起一个傀儡政府，把它当作附庸和侵略工具对付其他民族，并把这样的国家宣布为“自由的国家”和欧洲新秩序的盟国。在铁托看来，反法西斯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它涉及各个民族的利益。只有

取得战争的胜利，才会有各个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保证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必须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如果人民解放战争不具备那种真正把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带给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含义，那么人民解放战争这个词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欺人之谈。同样地，如果没有各民族团结，共同投入战争，那么就不可能使每一个民族都获得彻底解放。

铁托还特别强调军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才能“使南斯拉夫人民从占领下解放出来，打击那些帮助占领者对我们人民进行压迫和恐怖统治的占领者代理人。”<sup>①</sup> 1941年12月，南共中央决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随后，又组建了第二旅、第三旅……随着战争的进行，这支坚强的部队发展成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中坚力量。

经过4年的艰苦战争，南斯拉夫人民赶走了侵略者，消灭了乌斯塔什、切特尼克及其他反动分子，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并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战争局势明朗化以后，铁托开始主持建立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并争取使这一国家得到世界上的承认。铁托认为，南共在建党之初，就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战争爆发促使南共把争取民族独立当作首要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步进行的。

首先，战争冲击了旧南斯拉夫的社会结构。旧政权机构及主要统治者在战争开始时便逃往国外，失去统治意义。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承担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军事领导职能。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新的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130页。



领导力量出现的。在战争中许多大工厂主、企业主同占领者勾结，他们在战后被剥夺了财产；旧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土地丧失主人而为国家所有。这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说，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无力恢复自己的统治。

其次，民族关系发生了改变。铁托强调人民解放是每一个民族的事业，他们将在共同的武装斗争中建立相互信任、团结的关系，并自己决定他们所希望的国家形式。在战争中代表塞尔维亚霸权主义的反动势力和克罗地亚分裂主义势力被消灭，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障碍被消除了。各个民族由于战争胜利建立起平等的民族关系，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组织。这些政治组织从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的。

重要的是，参加解放战争使南斯拉夫人民从落后的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许多人成为自觉的革命者，认识到旧的社会制度的腐败，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南共一度受到他国的干扰，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纲领。铁托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我们通过新的道路走向自己的目标，这是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赋予我们的另一条道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并未明显分开。”“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下一个阶段。”<sup>①</sup>

1945年3月，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人民政府成立，铁托当选为主席。同年11月，南斯拉夫立宪会议通过宣言，宣告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社会主义的南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236页。

斯拉夫的诞生。

建国之初，南斯拉夫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严重的。战争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医治战争创伤是当时的迫切任务。铁托首先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着手恢复经济。在农业方面，制订政策，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分给农民或用来建设农场，向富饶的农业区移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工业方面，对所有矿山、工厂、企业、交通运输等通过剥夺的方式或逐渐接收的方式实行国有化，并立即进行修复、开始生产；同时，向联合国善后救济中心要求必要的援助以解决饥饿问题。这些措施，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

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铁托主持制订并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重点是保证重工业的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灭经济和技术的落后状态，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巩固社会主义关系，提高人民福利。这一计划的实施是有成效的，南斯拉夫的国民经济连续几年都以很高的速率增长。

经济发展需要国际间的合作。铁托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南斯拉夫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因缺少必要的开发设施，无法充分利用。由于战后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采取不信任或敌对的态度，南斯拉夫首先同苏联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签订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大批苏联专家进入南斯拉夫，在军事、运输和工业等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但是，铁托一直认为，南斯拉夫的利益主要地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实现，南共应当象它独立地领导人民解放战争那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盲从他人的意志或服从外国的利益。出于这种考虑，铁托探讨了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论述了自治社会主义的基本

思想。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军事集团，世界和平面临新的威胁的局势，铁托萌发了不结盟的思想，他与埃及总统纳塞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并于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此后，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到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为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宗旨，促进不结盟运动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铁托在建国后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1980年5月4日，铁托病逝于卢布尔雅那。

## 二、发展自治社会主义

自治社会主义思想是铁托社会哲学的基石。铁托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多方面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 （一）具体国情决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sup>①</sup>

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尖锐冲突。情报局决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议指责南共“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因而南共中央“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兄弟的共产党大家庭和共产主义统一阵线中开除出去了。”<sup>①</sup>在铁托看来，“冲突的原因是简单的。那是因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咄咄逼人的趋势。”<sup>②</sup>早在南斯拉夫革命开始的时候，苏联就流露出指挥整个南斯拉夫革命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是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利益和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利益，而是为了使南斯拉夫最好地适应苏联的利益。南斯拉夫独立以后，苏联仍然试图控制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发展，这不能不同铁托关于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发生冲突。对南斯拉夫来说，冲突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政党之间的分歧转化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南斯拉夫受到苏联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封锁，生产发展受到干扰，还因为面临军事威胁而保持较高的军事费用，南斯拉夫的发展遇上了极大的障碍。

实质上，南苏冲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教条主义的冲突。毋庸否认，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是从苏联的经验出发的。这不仅是由于南斯拉夫当时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尚处于敌对状态，也是由于他们信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经验。南斯拉夫最初实行的一些措施都是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如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国家以集权主义的、行政式的方法管理生产和分配，逐步限制并尽快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等等。冲突发生以前，南共曾广泛地宣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斯大林的理论体

<sup>①</sup>《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56页。

<sup>②</sup>《铁托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页。

系,许多人对此产生了信赖感,而对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的和新的道路、方法及条件注意不够。同共产党情报局的冲突无疑使这种信赖失掉了根据。重新探讨南斯拉夫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成了摆在南共面前的首要问题。

在当时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铁托首先对此提出了疑义,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的形式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根据的中心便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问题,它涉及:1.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作用及其消亡;2.党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3.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问题;4.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铁托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他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铁托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转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和丰富多样的形式实现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多种过程、形式和道路相互交织的结果,它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应该受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要保障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其根本条件就是充分保障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的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如果把某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形式和经验当作普遍的规律、不变的教条强加于其他国家人民,那在实践上是不能接受的。俄国革命也并非在马克思最初设想的情形下爆发的。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当时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提出并解决了

在相对落后的俄国进行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必然是有特殊性的。由于这种特殊性，俄国革命的经验并不一定是其他国家所必须采用的样板。这种经验只有在当时的环境或类似的情形下，才是成功的、有效的，在另外的场合则不一定完全适用。可以肯定，列宁并不认为苏联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相反，他强调社会主义是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使其前进的道路大放异彩的。把某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宣称为唯一正确的形式，实质上是阻碍社会主义的进程。依据辩证法的观点，“不必要、也不可能所有国家都象伟大十月革命中所记载的那样。教条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它们的道路可以有而且也确实有共同的相吻合之处，但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sup>①</sup>

南斯拉夫革命有许多不同于俄国革命之处，它一开始就既具有争取南斯拉夫独立的性质，又具有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性质。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始阶段，新型的人民政权，即人民解放委员会，在选举、罢免直到公民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方面，体现出直接民主的特点。这种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是劳动者直接管理社会生活的最初萌芽，也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萌芽。

发展经济是南斯拉夫的重要问题，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相距甚远的。南斯拉夫同样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与苏联相比，它是一个小国，

<sup>①</sup>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第117页。

并且处在世界经济普遍得到发展的环境中，其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甚至落后于邻国，发展经济的任务就更为迫切、艰巨。南斯拉夫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即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保证各种社会力量团结一致，有意识地、自觉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并且在生产发展中为劳动者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社会条件。

民族问题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密切相关，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象南斯拉夫那样面临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各个民族得到解放，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不能在保障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最有效地促进各族人民的自决，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改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就无法实现。

这些具体特点，都是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所必须考虑的。铁托指出，在解放初期，由于经济落后，各部门、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严重失调，实行国家主义的管理方式以图迅速恢复经济是必要的，但这不是通常状况下所应采取的方法。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被冲淡了，代之以许多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国家逐渐变成社会的主体，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这种现象，在建国初期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段时间内，其弊端尚未暴露。伴随群众热情的消失，社会关系中的冲突、矛盾开始显现。国家对政治、经济生活实行全面控制，无法保障生产、交换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国家掌握对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分配，也产生了抹杀各民族的利益的可能。

铁托认为，在这里不存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应用于现

阶段的实践，把它同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sup>①</sup>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同于苏联的或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但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思想引导南斯拉夫走向自治社会主义。但由于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公认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想不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为此，南斯拉夫还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围攻。

## （二）劳动者自治

自治的思想并不是铁托的发明，它出现于工人运动的开始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想建立一种联合组织，在该组织中，所有的人，工人、专家和资本占有者都参加生产和管理，并按照劳动、才能和资本分得财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虚幻的构想，在当时的社会基础上这种构想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同劳动者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赋予自治以确切的含义，认为自治的基本思想是，相信工人阶级自己能够解放自己，实现劳动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由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并且认为，要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实现自治……不受任何来自上层的监督。”<sup>②</sup>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思想并没有彻底地付诸社会主义实践中。

铁托从这些思想中找到了论述社会主义劳动者自治的理论根据。铁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名义上都是公有制，但它

<sup>①</sup> 《铁托逸集》（1926—1951）第491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3—124页。



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国家所有制是国家通过掌握政权，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对国家经济实行行政式管理。国家通过强制性计划，控制对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建设、生产组织方面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劳动者只是名义上占有生产资料，实际上他们很少有可能直接参与经济方面的决策。工厂、企业由国家任命的经理人员管理，这些人体现和象征着国家在工厂、企业中的主权，为国家执行占有的职能和管理的职能。这种所有制形式必然造成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实际上处于分离状态，使他们成了国家经济运转机器上无生命的部件，以致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对国家采取依赖的态度。二是“中央集权主义的，即国家主义的管理，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最肥沃土壤。”<sup>①</sup>官僚主义并不是行政机构的特性，而是与国家所有制伴随而来的必然现象。由于官僚阶层掌握权力而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集团，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置起来，外在于自己的阶级，靠行政实施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又通过垄断剩余产品的集中和再分配，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剥削地位。这样，尽管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为法律确认，但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仍有被雇佣的感觉，这终将使社会主义发生变形，阻碍它继续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最低级形式”，<sup>②</sup>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和最初步骤，它还远远不能体现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

很显然，社会主义不能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要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52—1960），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sup>②</sup> 《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和所取得的社会产品的关系”，<sup>①</sup>否则，就无法实际上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人的地位。马克思说过，“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sup>②</sup>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被忽视了，国家集权主义的意识反倒强化了。

1950年，铁托主持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这标志着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开端。铁托认为：“国家接收了生产资料，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并不是抽象的宣传口号。它们包含着关于社会所有制、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想真正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一口号就能够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实现。”<sup>③</sup>

“工厂归工人”，意味着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转向社会所有，即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共事业和其它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劳动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社会统一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不同，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不再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由整个社会来进行管理。显然，在这里生产资料并不是属于某个人或某些劳动集体的，任何个人或劳动组织都不能把这些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但是，

① 《铁托选集》（1952—1960）第2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③ 《铁托选集》（1926—1951）第483页。

由于社会占有的生产资料又是劳动者在社会总劳动中从事个人劳动的手段，也是个人获得收入的手段，从而社会所有制又是任何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个人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类似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在劳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更高一级的个人所有制的形式。

社会所有制的实质在于劳动者创造并管理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所有制，意味着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全民所有的经济企业由劳动集体组织独立地进行管理，并由自由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实施管理权。工人委员会在统一的社会计划范围内，根据共同的社会利益，独立地管理企业的生产，从而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工人委员会既不是生产资料个体所有者的代表，也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它只是代表社会并为共同的社会利益和企业自己的利益来管理生产资料。工人委员会具有如下职能：批准企业的章程草案、业务政策，通过工作计划以及为实现该计划而实行的措施，选举、任命执行机构、业务机构及其成员，从事由自治协议、组织章程和其它自治条令所规定的所有其它事务。也就是说，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组织生产的职能让位于工人委员会。由于工人委员会由企业的工人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只是由工人自由选举产生的，在中小企业甚至所有的成员都是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因而劳动者的意志得到充分体现，劳动者对生产的直接管理在这里实现了。

生产成果的决定权也由工人委员会执行。在此之前，国家除了控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也都由国家计划来规定。这样，国家控制国民收入与劳动者直

接管理企业必然表现为矛盾，即高额税收或其它方式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和劳动者在决定扩大再生产和个人收入方面的活动余地变得很小。这同样是与社会所有制的经济关系不相容的，是社会所有制不完善的表现。在实行社会所有制的开始阶段，曾有人对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成果表示异议，认为在劳动者觉悟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时，让他们直接管理劳动成果，他们将会把全部生产成果甚至生产资料都吃掉，从而取消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铁托并不这样认为。铁托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在现阶段仍然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起作用的。由工人管理劳动成果，并不违背扩大再生产的规律。由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共同需要直接取决于所在劳动组织的生产状况、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决定于提供给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状况，这样，积累作为改善生产资料状况的条件，对劳动者来说，其意义与直接的个人消费同样重要。劳动者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劳动成果把企业收入分为个人收入和积累基金，即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个人收入的标准和供进一步扩大生产用的收入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自己所保证的积累要比国家控制下的积累要多。同时，每一劳动集体内的劳动者还会自主地把自己的劳动和收入同其它劳动集体联合，走向共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目标。

从此以后，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不再是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关系，不再是国家集权主义形式下的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更不再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购买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所有制意味着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主地支配其劳动成果

的劳动者之间在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协调的基础上的互相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其收入分配关系,是一种在其它国家还很少见的新型的关系,较国家所有制关系更为优越的关系。

很显然,这样一种所有制关系是一种与一定社会物质基础和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素质的较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所有制关系也并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的主观臆造的产物,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和唯一可能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无法实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而劳动者在它还没有意识到他能够管理生产资料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他也不会成为积极的社会自治的拥护者和体现者。因此,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所有制、劳动者自治,就不是突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南斯拉夫开始实行劳动者自治的时候,曾出现一种过激的观点,采取主观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的态度,对现有的社会计划、统一管理的职能一概否定,认为这些计划、职能不可避免地产生剥削、统治和新的统治阶级。铁托认为,这显然是不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不了解社会进程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所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逐渐展开、完善。南斯拉夫劳动者自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到1963年的工人自治阶段。劳动者自治制度开始在工厂、企业实行,主要目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市场经济。强调工人委员会的作用,政企分开,管理权下放,即工厂、企业的生产不直接纳入国家预算,只向国家交纳税金。在统一的社会计划范围内,工厂、企业可以独立地生产经营,并根据生产经营的状况决定个人收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家管理和工厂、企业的自主管理同时

起作用。一方面，国家机关、企业经理人员代表国家以统一的计划指导工厂、企业的生产经营，并部分地掌握企业积累的支配权以及对个人收入的一定控制；另一方面，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主地安排生产经营，部分地支配积累并确定积累和个人收入的比例关系。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所有制在经济部门中的初步否定。

第二阶段，从1963年到1971年，社会自治阶段。劳动者自治全面展开，国家机关、科研、教育等部门也实行自治，企业在扩大再生产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

第三阶段，即1971年以后，其特点是联合劳动制的完善。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如整个社会缺乏协调，盲目投资等。联合劳动制就是针对这些消极现象实行的。铁托指出，根据联合劳动制度，参加联合劳动组织的劳动者直接管理自己的劳动及劳动成果，并根据协调联合劳动的自治协议，协调同其它劳动组织及其劳动者的利益，实现劳动和资金的联合。自治协议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新形式（在社会自治过程中，有些关系只能由自治协议来协调）。此外，还成立了不同类型的自治利益共同体，如教育和科学、经济以及退休、社会福利方面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每一种形式的共同体都由生产部门和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他们通过协议自由地进行劳动交换，协调社会利益，扩大自治权利，并同时克服社会发展中已经表现出来的某些分散和盲目状态。

劳动者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自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动，使社会所有制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确立起来了。

### (三) 实践中的国家消亡

劳动者自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统治职能的逐渐消亡，二者是同一过程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经济以及政治、文化和其他生活领域的分散管理不仅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质，而且包含着中央集权制和作为强力机器的国家消亡的萌芽。”<sup>①</sup>

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是消亡着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力量、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民主的方法组织和加强劳动者经济、政治力量的工具。国家行使职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存和延续它作为社会代表者的职能，而是通过逐渐把自己的职能交付给社会的方法，使自己变为多余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

铁托分析了当时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统治职能不断强化的原因，认为，在残酷的政治恐怖条件下从事斗争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得不以极端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成为工人阶级胜利以后组织国家政权的依据，成了国家集权主义的组织基础。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都面临着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作为组织和发展经济、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力量不断得到强化。苏联式的国家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根据这种国家观，党的机关、国家机构，包括经济机关和其它管理社会事务的机关都是居于社会之上的，其作用也应该是不断加强

---

① 《铁托选集》(1926—1951) 第493页。

的。国家作为解决国际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尤其应该得到强化。这种国家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需要国家，但这个国家应该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是必要的，但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动停止下来。”<sup>①</sup>同时，国家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在国际关系相对缓和以后，也应该作为暴力机器受到限制。但是事实相反，在苏联及其周围的国家中，国家机器仍然向着与消亡相反的方向，即长期保存甚至不断扩大其职能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集权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障碍，国家所有制不是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国家职能不是让位于社会，而是相反，国家所有制巩固了，国家成了外在于社会的统治力量。

铁托认为，一个国家，除非它已经处在消亡过程中，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消亡是社会所有制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而“国家的这一消亡首先是从‘经济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向工人集体开始的。”<sup>②</sup>这一过程的起点就是经济的分散管理、工厂和企业的生产由劳动者自己组织。铁托在这里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看作是使国家职能转向社会、实现国家消亡的具体途径。

经济的分散化管理，表现为国家的经济职能逐渐缩小，即国家的经济措施日益减少其行政性质，而只具有经济调节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sup>②</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493页。



的性质。经济分散化管理以后，国家计划制度被取消，代之以确定基本比例关系的社会计划。社会计划与国家计划不同，它不再自上而下地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做过细的规定，而是依据各劳动组织的计划，在协调整个社会利益的基础上，规定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比例关系，把国民收入分为劳动者的消费基金、基本建设基金和满足社会共同体其它需要的基金，借助于经济政策、法令等手段，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实行社会计划以后，国家便无权对企业的生产作强制性的规定，企业可以在社会计划范围内，独立地组织生产，确定企业收入的分配。

国家经济职能的逐渐消亡，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每个劳动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它们内部的积累和发展以及劳动者个人的收入都直接取决于自己的生产状况。因而，各个工厂、企业都必然在统一社会市场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企业的积累和分配作强制性的规定，势必影响各企业间以及整个社会的劳动交换，使经济发展失去协调。因而，在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中，“必须真正尊重市场和市场规律，包括国家市场的行情，因为市场及市场规律是发展的协调者。”<sup>①</sup> 取消国家计划制度以后，各企业的劳动者在独立生产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规律，以劳动量为基础同其它劳动组织实行必要的分工协作、产品交换，从而合理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个人也从他所在的劳动组织获得属于自己的部分。社会计划的作用也就在于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管理经济，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促进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495页。

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继国家的经济职能缩小以后，铁托认为国家在其它领域中的职能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铁托主张国家民主化，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各社会基层机构都应由劳动者自由选举产生的人管理。全部社会生活的管理权都由从事生产的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实施。劳动以及他们的联合组织，在无需国家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对社会公共事业履行组织和监督职能。至此，在南斯拉夫，“自治走出了工厂，涉及整个社会组织。”<sup>①</sup>全体社会成员都来学习管理国家并真正管理国家。这时的“国家只是，或者只应该是治理其国民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现者和代表。”<sup>②</sup>

与国家消亡的观念相联系，铁托对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作用也作了论述。铁托认为，随着国家职能作用向社会的转让，政党的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原有的某些职能作用开始失去意义。

铁托不同意斯大林关于政党作用的有关论述，指出斯大林的失误在于“他把党的作用归结为领导依然打上阶级社会烙印的国家机器的地位。”<sup>③</sup>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政党参与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控制，变成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同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彼此职能不分，共同实行对社会的统治，并要求科学和思想为这种统治的合理性论证。教条主义的辩证法观念成为这种论证的思想基础。显然，这种政党的存在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sup>①②</sup> 《铁托选集》（1974—1980），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8页。

<sup>③</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495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奠定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它们几乎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影响社会发展。由于这些政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们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情形的长期存在也容易造成一些消极后果，最主要的就是形成潜在的独断主义。如果政党毫无顾忌地、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就可能将这种独断主义付诸实践。消除这种后果的出路，就是改变党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控制的状态，并且使政党受到劳动者的监督。铁托把南共与劳动者的密切联系看成是南共的最大优点，并认为正是依靠人民，南共才在多次危机中得以生存。所以，铁托并不顾忌南共“消失于人民阵线中”的指责，提议将南斯拉夫共产党改组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铁托看来，改组后的南共，事实上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思想一致的人们之间的联合，是社会主义力量中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一部分，是向更高的民主制过渡的形式。

改变政党作用的途径是其职能的逐渐分化，首先是政党同国家职能部门的分工，改变政党同国家机构职能不分的状况。随着劳动者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决定，政党不再作为全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控制者和干预者，而是通过思想引导社会发展。“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作用不可能是某种社会特权，而应该是在进行领导时给予思想影响并使这种影响对社会的正确发展产生效果。”<sup>①</sup>

同时，铁托也认为，国家消亡、政党作用方式的改变都是一个过程，它们取决于社会发展本身，取决于社会主义社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52—1960) 第61—62页。

会关系发展的快慢。因而，它们并“不是跳跃式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sup>①</sup>国家和政党作为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其消亡和作用方式的改变是同各种社会对抗现象以及由这些对抗现象历史地产生的各种强制形式的削弱同时并行的。在国家和政党作用方式改变的条件尚不充分，即在现有的社会物质、政治条件以及劳动者的觉悟水平还不足以使国家消亡和政党作用方式改变的情形下，主观地规定国家消亡和政党作用方式改变的时间，不仅不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反而会导致社会陷于极端分散状态的消极后果。

把国家消亡、政党作用方式的改变看作一个过程，一方面是针对那种在实践中日益强化、扩大国家和政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的作法，强调国家消亡的现实性，把国家消亡看作是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事实上，任何国家只要它不是在实践中实际上使自己趋向消亡，那么，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只能是空谈。另一方面，把国家消亡和政党作用方式的改变看作一个过程，也是要使这一过程适应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进程，与社会所有制、劳动者自治的发展相协调，使国家的存在和它消亡的趋势都能最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铁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 （四）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地位

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26—1951）第493页。

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并不能完全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人的地位。在国家集权主义统治下，劳动者往往不是作为生产的计划者、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出现，而是被计划、被管理。因而，从发展新型社会主义关系的角度看，国家集权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实行社会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劳动者自治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和劳动解放，造就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人作为生产者和自治者的权利以及人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sup>①</sup>

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劳动、劳动者的过程，是劳动者成为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主人的过程。马克思曾对未来的社会作过描述，指出在克服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状态以后，生产资料成为直接的社会财产，劳动者组织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使用，这些“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支配之下……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sup>②</sup>这里，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是人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必须符合人类本性、促进人类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向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理应逐步消除那种人在社会中被异化的现象，把人、人的发展确定为目标和出发点。

在铁托看来，社会主义本身不能作为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为了人，为了人类的美好前景，而不是为了什么抽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70—1980）第35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象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根本点是人，是对劳动者的关怀，除此而外，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那种把人仅仅作为手段去追求所谓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行动。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它在社会主义那里只看到了生产力，忽视了个人的发展、个人自由。铁托认为，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完善是一致的。苏联社会主义在教条主义理论统治时期是沿着危险的压抑个人自由的道路发展的。在那里，个人隶属于国家机器，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不断地剥夺着劳动者的权利。当全世界都在期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保障社会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作出榜样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在国家集权主义的统治下正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铁托明确提出发展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要求社会主义不能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贬低或损害劳动者个人的基础上，而是要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本身也蕴含着人道主义的内容。

发展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相信劳动者的创造性，并促进这种创造性的发挥。“加强生产力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承担者的作用和依靠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也就为顺利的和全面的社会发展创造条件。”<sup>①</sup>铁托关于劳动者自治的思想正是建立在相信劳动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的基础上的。铁托多次谈到南斯拉夫依靠劳动者的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163页。

创造精神和热情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度过了同共产党情报局冲突后的社会危机。在开始实行劳动者自治制度的时候，有人对劳动者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表示怀疑，不相信在工业化的时代，刚从农村涌入城市和工厂的年轻的工人阶级有能力担负起管理工厂和企业的复杂任务。铁托批判了这种观点，他相信工人阶级通过社会自治，能够成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成为扩大再生产和其它社会事务的直接体现者。在《论经济企业的工人管理》那篇著名报告中，铁托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劳动者自治法令实施得过早的观点，是不相信和看不到劳动者的创造力、管理社会的能力的结果。而事实上，劳动者每天都在表现出他们的成熟性和独创精神。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建设靠他们自己。他们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履行他们的责任。这样的阶级、劳动者是能够管理社会的，他们将在管理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经验和知识。因而，现在的任务，并不是期待工人阶级有朝一日具备管理社会的能力后，才把国家交付与它，而是必须立即实现工人阶级社会主人的地位和创造性，由他们自己来管理社会事务。

“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参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实质。”<sup>①</sup>

社会自治保证了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首先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和劳动成果的支配者，直接决定劳动组织的生产和收入分配，这时候，劳动将最大限度地符合劳动者的意愿。其次，把全部社会事务都交给劳动者直接管理，在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代表团制取代了传统的代表制。每一劳动组织都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74—1980) 第331页。

选举自己的代表团直接参加社会管理，代表团直接体现劳动组织的利益。由于代表团的成员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他们本身都是普通的劳动者，这样便保证了最大多数的人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劳动者通过直接干预社会生活，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意识，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致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的物质的和其它方面的可能性，提出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适合物质、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这些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利润，而是出于人道的愿望。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的自由发展和权利得到实现和表现。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对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关心，注意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不断加强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基础。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而逐渐得到全面的表现。在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社会发展与个人需要往往表现为矛盾。南斯拉夫有一段时间，过度投资、基本建设积累影响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铁托认为，这种现象是不能长久下去的，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不顾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必须找出促进经济发展和不断加强劳动者物质生活基础的合理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比以往的社会更能促进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在保障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证劳动者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加强劳动者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矛盾实际上是如何在保障劳动者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最好地实现他们的现实利益、个人利益。如果贬低劳动者的现实利益、个人利益，劳动者的生活基础得不到保障，就会削弱劳动者的自



治意识，从而也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因而，由劳动者自己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文化水平，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铁托意识到劳动者自治的最终实现，取决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年轻的工人阶级一直处在最低的文化水平，就其现在的状况来说，管理社会事务对于他们并不是轻松的任务。同时，科学的发展是加速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物质生活基础的重要条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发展科学文化事业都是当务之急。在这里，铁托强调的是，科学发展必须用于劳动解放和人的发展，认为“科学必须为劳动者服务，科学必须成为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推动力，科学必须为他们创造日益良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从而使劳动者日益成为自由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人。”<sup>①</sup>

“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建立日益美好和日益人道的关系……这是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所在。”<sup>②</sup>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其中劳动者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所有制关系，包括分配方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变化，都表明这种关系为劳动者展现了保障个人利益、发展个性的可能和条件。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是靠某些指示或强制性的监督实现的，它发展的动力产生于劳动者的社会利益。社会要取得进展，就必须首先关注人的发展，因而在这里社会机构不应该表现为统治，而应该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244页。

<sup>②</sup> 《铁托选集》（1974—1980）第50页。

同样地，劳动者在社会自治的过程中，也必然意识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完善。劳动组织及其劳动者要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必须通过协作、协议等形式建立相互关心的、平等的责任和义务关系。每一个劳动组织及其劳动者都由于自己的利益而自觉地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便可以表现出同样的人道主义特征。自治、民主、自由、劳动者之间的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关系都是这些特征的表现。

南斯拉夫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论述。

### 三、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

前面已经提到，民族问题是南斯拉夫的重要问题，它贯穿和影响南斯拉夫的整个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sup>①</sup>铁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色地解决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铁托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境内，生存着许多民族，其中较大的民族有黑山、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等，此外还有许多在总人口中占比重较小的其他民族。南斯拉夫旧政权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旧政权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6页。

基础上,实行大塞尔维亚政策,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的分裂、对抗。民族争端动摇了旧政权的基础,致使在南斯拉夫受到侵略时,统治者无法组织起捍卫民族独立的抵抗力量。新的政权要得到社会的信任,社会主义要取得进展,当然无法避开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关系包括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解放初期,南斯拉夫的民族状况是战争胜利后的民族解放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各个民族都组织了武装力量,建立了类似于政权的组织对解放区实行政治、经济管理。1943年亚伊策第二次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决定,把南斯拉夫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的民主联邦国家,它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等共和国。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民族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它们有较好的工业、文化基础,而波斯尼亚、马其顿和黑山等地则相当落后。

铁托认为,南斯拉夫的统一和发展只有在各民族自由发展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必要条件就是保证各个民族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列宁说过:“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国家建设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sup>①</sup>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指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以及脱离集体的国家分离,从那种集权主义、一元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组织成民族国家并自行决定国家事务。

这一点似乎在1945年以前就已经实现了,但由于建国初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6页。

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各个共和国实际上成了联邦的下属机构，因而产生了联邦与民族国家关系中的集权主义倾向。

铁托认为，各民族有权对自己的事务负责。铁托提出应该改变现有的联邦和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作为联邦的独立组织的各个共和国的职能和作用，由共和国直接管理许多以前由联邦管理的事务，充实它们的政治自主，扩大其立法权限和其它权限，以加强他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责任。各个共和国作为组成联邦的自治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可以直接参与制定和实施联邦的政策，提出解决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自治协议的原则，协调同其它共和国的关系。各个共和国作为主权代表，在联邦中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并要求自己的利益在共同利益中得到实现。这方面的实际措施是，联邦权力下放，扩大各个共和国的权限；在联邦议会中设立民族院，各个共和国的代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在修改宪法、改变联邦与共和国的关系、通过联邦的经济计划和支配国家收入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参加通过议会决议的活动。

在各个共和国内部，劳动者直接对国内的事务负责。劳动者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各劳动组织的代表共同决定政治事务，通过决议，制订发展计划。

各个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也由各个共和国自己决定。在集权主义时期，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由联邦统一征收并再分配给各个共和国，各共和国的生产也必须按照联邦计划进行。就是说，联邦控制了经济计划和经济发展方向，各个共和国的权力是很小的。改变联邦与共和国的关系以后，各个共和国在社会计划的比例范围内，自行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以

及实现这一计划的措施，在统一的社会商品市场上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并直接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

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保护和促进。铁托认为，南斯拉夫文化的发展就是由共同的利益、社会主义的统一社会制度以及自己文化创作的统一基础和重要内容而联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自由而全面的繁荣。虽然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容受到否定。应该从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发扬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和特点。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不会导致民族的闭关自守，相反，它会使各民族的文化由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丰富繁荣起来。因此，每个民族都有拥有自己的文化的权利，任何损害民族文化的行为都是同民族自决与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相违背的。

从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出发，铁托极力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观点，反对对某些少数民族的非人道的行为。铁托认为，承认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允许以自己的利益损害联邦或其它共和国的利益，甚至分裂联邦的活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把自己民族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民族，以自己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压抑或贬低其它民族的发展，抹杀其他民族的特点，使其同化于自己的民族。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利己主义，即为追求自己民族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如对其它民族的侵略、压迫和经济剥削；或表现为民族沙文主义，宣扬历史上消极的东西，制造民族仇恨，贬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南斯拉夫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势力是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克罗地亚在历史

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曾试图把波斯尼亚、部分塞尔维亚地区划归它的统治。极端民族主义者宣扬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的地位，夸大克罗地亚的独立性。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竭力强调塞尔维亚的历史和文化是至高无上的，不承认克罗地亚民族文化的特点，宣称克罗地亚的文化包括语言都是属于塞尔维亚的，并认为马其顿、黑山等民族不具备民族特性。

铁托认为，任何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各个民族相互协作。民族问题必须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在自愿并享有分离权的基础上解决。社会主义不否认任何民族的民族特性。民族间的差异、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不应该成为阻碍民族平等的借口。没有平等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自由独立地发展经济、文化的权利，社会自治就不会是彻底的。每一个民族，即使落后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先进之处。在相互协作的共同体中，一个民族离开了其他民族是无法发展的。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会影响其它民族的发展，也同样会影响自己民族的发展。

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与国家集权主义不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有关。社会自治将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抵抗力量。在劳动者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各共和国都与其它共和国根据自治协议，建立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并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在这种相互协作的关系中，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将被消除。

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基础是各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应保证各个民族有能力更全面、更迅速和更有效地

发展物质生产力。鉴于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有必要在保障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注意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除了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以外，还应该得到其他民族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铁托批判了那种认为向落后地区提供援助会损害发达地区民族利益的观点。铁托认为，在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中，各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每个劳动组织都试图增加劳动资料，形成扩大再生产，并在统一的社会市场上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每个民族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不发达地区由于购买力等原因而导致的持续落后状态，必然会影响发达地区的生产和经济运转。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除使落后地区持续落后以外，也会严重影响发达地区以致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存在，还会使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民族歧视的借口。马其顿、黑山等地区以前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歧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经济发展落后。因此，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应该把国民收入中发展再生产的部分较多地用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不仅能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也能保证发达地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铁托主张设立一定的基金，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议会也通过了联邦基金法，规定以信贷的形式向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基金，以帮助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归结起来，铁托的民族理论的要点就是：在劳动者自治的社会共同体中，各民族人民，不管属于大小民族，都享有

同样的待遇和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时，各个民族都有责任清除极端民族主义，协调社会的发展，为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实现各民族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特殊利益创造条件，不断地加强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民族关系。这些思想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 四、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都把争取世界和平与进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铁托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他倡导了不结盟运动，促进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铁托倡导不结盟运动，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摆脱了殖民主义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对这些民族来说，侵略和控制的威胁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势力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企图以新的形式重新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甚至不惜采用武装侵略的手段。面对这样的形势，这些刚刚摆脱奴役的弱小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同时，随着大战结束，世界上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双方都奉行战争政策，追求军事优势，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由于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加剧，世界面临新的战争的危險。各国进步力量都在寻求世界和平的出路，非集团化成为一种呼声。

另外，不结盟的思想，在铁托那里，也是与社会自治的



思想密切相关的。铁托明确谈到：“国内的自治与国际关系中的不结盟乃是独立的南斯拉夫的完整的政策。”<sup>①</sup>铁托在开始探索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指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应受到某种强权的干涉。集团化的政策实质上是把发展中国家强行拉入某一强权统治之下，否定了这些国家的自治权利。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各民族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独立、自由应该受到尊重和维护。

出于这样一些背景，铁托萌发了不结盟的思想，并在以后不结盟运动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这些思想。

首先，铁托明确论述了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目的。鉴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铁托认为，必须集中世界上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和力量，以便通过更坚决的行动促进和平的胜利。不结盟运动的实质在于，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反对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一切新旧形式的从属关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以及对其它国家和人民进行奴役、对其内政横加干涉的政策，以图“消除那种建立在武力和暴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制”，建立平等和民主的国际关系。从主权国家基本的关系原则出发，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主权国家内，各国人民直接对自己国内的事务负责，自主地选择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决定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最了解他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因而他们能够作出最好的选择。南斯拉夫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革命道路的独特性，走上了

<sup>①</sup> 《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

<sup>②</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391页。

不同于其它国家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根据平等的原则，发展经济和文化往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利益。铁托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不应附有任何政治条件或融入侵略性意识。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和践踏，是对社会主义和世界进步力量的沉重打击。铁托不同意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所谓“有限主权论”的主张，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上的进步力量，在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最全面、最充分的保障。在布拉迪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发展自治道路的权利，确认了平等合作和不干涉的原则。以任何形式削弱某一国家的主权，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不允许从实力地位出发指挥别人。就华约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铁托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认为华约军队必须立即撤出，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必要信任和发展平等合作创造条件。铁托也反对超级大国的对外干涉和侵略，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主张不结盟国家应该通过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压迫，来巩固它们的独立。

消除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关键在于裁减军备。军备竞赛不仅消耗大量物质资源（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于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而且构成对和平的威胁。两大军事集团掌握了足以毁灭人类的军备，任何一次军事冒险都会给人类造成无可估量的灾难。铁托在第一次不结盟会议上就谈到，裁减军备是唯一可能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国际关系进一步健康化以及世界上的主要争端的解决，实质上都

取决于裁军的进展状况，因为裁军过去和现在都是关键性问题。”<sup>①</sup>它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

铁托还对不结盟运动的性质作了说明。第一次不结盟会议结束以后，不结盟运动便受到攻击，被说成是“多数暴政论”、“第三集团”等等。铁托认为这是对不结盟运动性质的歪曲。不结盟运动的意图决不在于组织一个与两大军事集团势均力敌的新的势力集团。恰好相反，它是非集团化原则的结果，是在强权支配世界的形势下，各国人民和进步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国家主权的唯一可能的行动。不结盟运动不以形式上的结盟与否为其特征，而是基于和平共处原则、维护主权的积极努力。说它有某种结盟的意义，那也不是人为的或形式上的结盟，而是在利益一致和独立见解基础上的广泛合作，以图通过和平的手段，而不是暴力的手段，解决世界上一切冲突和争端。不结盟运动产生于世界局势紧张之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暂时现象，它不会因世界局势变得缓和而消失。相反，它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它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向和平与进步迈进。

其次，铁托把不结盟的精神贯穿于不结盟运动中，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参加不结盟的国家是多种类型的，它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社会性质、国家制度、地理及民族特点各不相同，这必然导致不结盟运动的复杂性。历史上包含如此复杂因素的运动还是不多见的。正因为这一点，不结盟运动被攻击为“五花八门”。这些因素都是在促进不结盟运动发展时必须考虑进去的。铁托认为，使不结盟运动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83页。

成员国团结在一起的是：“近似的观点、共同的向往和决心为加强和平政策和在世界上建立更美好和更公正的关系作出贡献”。<sup>①</sup>这是各成员国的一致之处。除此而外，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差异点。不结盟运动是有差异性的联盟。这种差异性正是不结盟运动的特点。从不结盟的原则出发，这些差异性不会成为否定不结盟运动的理由。在不结盟运动中，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成员国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特点和利益要求，但仍然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这样，在不结盟运动内部，贯穿了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多元性。由于各国人民面临的是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在不结盟运动中应该使这些国家的特点和利益得到体现。联合斗争与保持独立是不结盟运动中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间才能进行广泛的联合、合作。为真正实现国际间平等合作的关系，各成员国之间必须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

承认不结盟运动的多元性，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在不太长的几十年内，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由二十多个迅速增加到一百多个，并且还有许多国家由消极观望转向积极赞同这一运动。如果把各成员国用某种政治尺度或意识形态强求整齐划一，那既会侵害成员国的主权，也会削弱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和意义。

不结盟运动应尽力使自己总的目标同各成员国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满足各国的具体要求。由于各成员国以及世界形势的复杂性，可能会产生某些成员国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78页。

利益冲突或某成员国的具体利益与不结盟运动总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形。这时候就需要采取直接民主的方法。各成员国可以经过相互协商,找出解决共同利益和具体的民族利益相互冲突的办法。不结盟运动的敌对势力,或者破坏这一运动,企图消灭这支独立的国际和平力量,或者试图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性质,使它服从某个集团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分裂行为都是有害于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运动内部的争端和分歧可以经过各成员国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决不能人为地把各成员国划分为进步的或落后的,要防止敌对势力把不结盟运动内部的某些分歧用作分裂这一运动的手段。只有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共同的愿望并使每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保持独立。

最后,铁托认为,要使不结盟运动的宗旨不仅仅停留在一种美好的愿望上,而是变成实际的和平力量,那么,加强它的物质基础,即发展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必要的。铁托一直把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内容,认为必须消除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存的不平等状况。实现国际平等关系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或消除。经济解放是政治独立的基础。只有克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状态,才能最终促进世界的共同进步和经济繁荣。

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独立以前,由于受到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许多国家是单一经济,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势力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料供应地。独立以后,他们又受到垄断经济的剥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同时,

在发达国家方面，经济日益趋向集团化，如经济垄断、西方共同市场的建立以及共同体的形成。这一切，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阻碍，单一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世界市场上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其经济发展将困难得多。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每个国家，不管社会和经济制度如何，它的经济都有必要进行日益密切的和全面的合作。”<sup>①</sup>合作将保证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民族利益得到最好地实现。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潜力，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铁托确信，通过经济合作，每个国家的经济都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尽快结束那种由发达国家独自支配世界经济的局面，建立起国际间平等合作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这也就是不结盟运动的最终目的。

铁托有关国际关系和不结盟运动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理论。

## 五、铁托哲学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铁托的社会哲学思想形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非教条地理解和社会实践中。铁托思想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铁托的许多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经得到了明确的阐述。铁托思想的实质在于，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发展了实践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法，阐述并实践了如何为社会生活创造者造就自由而全面发

---

<sup>①</sup> 《铁托选集》（1961—1973）第46页。

展的条件的理论。因此，它一开始就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对立物产生的，并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完善和丰富。这样，与教条主义的思想相对立，铁托的社会哲学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批判的特点。任何一种进步的思想都是与批判联系在一起，包括对自身的批判。但在教条主义盛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受到扼制。辩证法在教条主义那里不再是社会批判的理论基础，反而成为论证社会现实、有时可能是包含一些弊端的社会现实的工具。而事实上，只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社会主义才能有所发展。南斯拉夫正是摆脱了那种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才实现了自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尤其是在它的初期阶段，其发展还是很不完美的。生产力水平、劳动者的觉悟都有待于提高。社会结构、管理制度都有待于改进。如果一味地以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论证和解释，在任何时候社会现实都会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样，国家集权主义、官僚主义、对劳动者的贬低就会无法遏止地生长起来。显然，这是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不相容的。铁托的批判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出发，反对对这些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如在国家观、劳动者社会自治、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等方面，铁托作了大量论述。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实践。铁托明确强调，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不同，各国的革命也不必都象伟大的十月革命所经历的那样进行。脱离具体的实践，把一种具体的革命或建设的理论当作普遍真理强加于其它国家，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二是实践的特点。思想的生命力表现于实践中。铁托不满足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叙述，也没有留下关于社会主义的长篇巨著。铁托的思想是作为具体的实践理论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贯穿于实践中，从实行工人自治、国家职能向社会转移、改革集权主义的管理方式，到发展平等的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教条主义的失误就在于借口现实条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那样，拒绝把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引向实践并在实践中作新的探索。

这些特点，连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一起，使铁托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劳动者自治制度实施之初，即铁托宣称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时候，南斯拉夫受到东方国家的猛烈抨击和西方国家的消极评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或一个小国在强大的东西方压力下谋求生存的实验。但是，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影响世界并不是靠单纯的理论说教甚至战争征服，而是在于它能为当代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长期以来，“南斯拉夫的实验”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关注。发展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课题。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不断产生。铁托关于民族关系的理论为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经验，促进民族自决，又不失整个国家的统一，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不结盟的思想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它从理论上阐明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进步力量的壮大可以使战争的威胁受到扼制。不结盟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国际间的政治、经



济关系中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诚然，无论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还是不结盟运动，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如在劳动者自治与社会统一计划的关系上，由于过于强调自治，已经使经济发展显示出过于分散的现象，并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不结盟运动也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变得日益复杂……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铁托曾说过，我们无意把自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铁托的思想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和不结盟运动的所有问题。但是，铁托关于劳动者直接管理社会事务、发展平等的国际关系、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思想的意义是不能磨灭的。历史发展将证明这些思想的生命力。人类社会终将由人对人的统治转向人对物的管理，实现人的全面的价值。

总而言之，铁托的社会哲学思想不是别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和自治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所谓铁托主义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世界、当今人类所面临一系列重大迫切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理论体系，是南斯拉夫基本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哲学概括。

## 参 考 书 目

1. 《铁托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
3. 《铁托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
4. 《铁托自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 卡 德 尔

邵滨红 柴方国 吴仕康撰

# 篇 目

一、革命家、理论家的一生 .....	480
(一) 卡德尔早期自治民主的思想和实践 .....	480
(二) 自治的一般理论基础和“工人自治”初期实践经验的 总结(从40年代末至1958年3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 大会) .....	485
(三) 工人自治—社会自治, 对社会自治的理论论证(50年 代末至60年代末) .....	492
(四) 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形成(60年代末至 1978年) .....	498
二、社会自治理论的若干问题 .....	504
(一) 社会所有制 .....	504
(二) 自治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	509
(三) 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 .....	514
(四)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519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524
参考书目 .....	530



卡德尔 (1910年—1979年)



---

---

# 卡 德 尔

邵滨红、柴方国、吴任康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是当代著名的南斯拉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德尔早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从1934年起一直是铁托最亲密的战友，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半个世纪以来，卡德尔坚持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以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南，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的人民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自治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卡德尔在总结当代南斯拉夫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为制定南共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拟定国家的宪法和重要法律，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社会革命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即革命的和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



宗旨。卡德尔以其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证明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卡德尔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他的自治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 一、革命家、理论家的一生

爱德华·卡德尔于1910年1月27日出生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市。他家庭成分是工人,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卡德尔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9岁时他就跟着妈妈上街,参加“争取自由,争取面包”的“五·一”节游行示威。卡德尔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团里的积极分子。1928年,卡德尔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立志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从此,卡德尔确立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 (一) 卡德尔早期自治民主的思想和实践

卡德尔青年时期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和当代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和自治民主中的核心地位。早在22岁时,卡德尔写了一本名为《跨越时代的漫游》的小册子,鲜明地表达了卡德尔相信革命的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和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的思想。卡德尔在这本小册子中强调指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的人在推动历史前进、

改造世界中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他歌颂人的伟大力量，写道：“……自古以来就是你——人——以自己的双手向大自然开战，……你的智慧的力量凿穿岩石，开拓出通向未来的道路，未来是属于你的……你培养教化了我们，我们是卓越智慧的胜利……我们正在改造社会。”<sup>①</sup>

1931年至1934年期间，反动政府当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实行反革命的独裁政策，使用暴力残酷镇压革命活动。卡德尔曾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刚出狱就肩负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的重任。卡德尔同基德里奇等人深入群众大力宣传党的主张，争取群众的支持，使党摆脱被禁锢、和人民群众隔绝的危急状态。当时许多党员被捕，组织被严重破坏。显然，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是困难和危险的。卡德尔在革命低潮时期就表现出他的革命家的政治坚定性、组织家的才能和革命战士的勇气。1934年9月，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卡德尔起草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宣言草案。在大会筹备期间，卡德尔第一次与铁托会见。他们很快就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铁托在后来回忆说，在许多人受到宗派主义腐蚀的时候，卡德尔仍然是一个忠实的革命者。

1934年底至1937年，卡德尔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卡德尔先是在列宁学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进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训练班，花了大量时间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这为卡德尔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来卡德尔在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当理论

---

<sup>①</sup> 参见亚耐兹：《爱·卡德尔》，塞文版第13页。

教员。在这期间，卡德尔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法西斯主义》，《民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等等，充分显示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华。1937年，卡德尔从莫斯科回到南斯拉夫。

1938年，卡德尔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领导党的工作。1939年，卡德尔再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指出民族解放的现实途径。卡德尔告诫人们“只有忠诚于进步、自由、人道、和平和尊严地生活的人的理想，斯洛文尼亚民族解放斗争才会获得胜利。人类曾经在自己最困难的时代和最艰苦的斗争中把这些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写道：“斯洛文尼亚民族的斗争只有依靠民主力量，才能保证斯洛文尼亚在进步力量同反动势力的伟大斗争中，在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不至于象1848年那样为没落的反动制度所埋葬。”<sup>①</sup>卡德尔在这里很成功地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把民族问题同人民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为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民族问题的解决，为实现民族解放指出一条现实的道路。把民族解放问题、人民民主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卡德尔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突出特点，这也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突出特点。

在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之前，铁托和卡德尔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看到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正在疯狂备战。他们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半岛视为

<sup>①</sup> 参见舍丁茨：《卡德尔的思想和著作》，格罗布斯出版社第6—7页。

自己的一块战略要地。德国着手从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一方面大量吸收南斯拉夫的出口产品，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孤立南斯拉夫的政策。南斯拉夫反动统治当局不敢触犯德、意的利益，一味采取妥协政策。这时，以铁托和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发表宣言，揭露德、意法西斯妄图奴役东欧、消灭民主力量的企图，揭露本国统治当局的卖国政策，表明共产党领导人民保卫南斯拉夫独立和领土完整、争取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决心和信心。

1941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卡德尔一直在党、政、军首脑机关作为铁托的最亲密战友担负领导工作。卡德尔对于解放区里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的人民解放委员会极为重视，把它们看作是自治的民主政治的萌芽形式。1941年，卡德尔在新创刊的党的机关刊物《战斗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委员会反映了人民的直接自主权，它将成为战后新政权的基础。”<sup>①</sup> 1942年，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南斯拉夫人民在获得彻底自由以后，将自己选出立宪机关，这将最终成为在人民的国家中人民共同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力的表现形式。”<sup>②</sup> 在1943年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卡德尔当选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被确定为临时最高人民政府机关。卡德尔在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为争取国际上承认新南斯拉夫而斗争。1945年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彻底胜利，这是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

<sup>①②</sup> 参见《爱·卡德尔》第32、52页

胜利，导致联邦制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的诞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直至1978年逝世，30多年来，卡德尔作为铁托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为建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事繁重的领导工作和理论工作。卡德尔在1945年5月发表了题为《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论文，表述了他要按照人民民主自治的原则来建构国家政权机关以避免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他写道：“我们按照自己的形式和根据民主的性质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必须保证我们的国家机器的充分民主化……民主的实质在于使每个公民都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新政权是新型的自治，但是自治并不是把国家租让给人民，而是国家赖以建设的基础。”<sup>①</sup>卡德尔要求人民的民主代表机构自下而上地支配、监督国家机器，以免官僚主义霉菌侵入它的国家机器。这是卡德尔在战后第一次在政权建设问题上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自治民主思想。在这里，卡德尔把自治当作民主政权的形式来论述，把新南斯拉夫的政权机关当作第二次大战时期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一自治“民主的”初始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毋庸讳言，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学习和搬用了苏联的一些经验，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实践模式和某些教条主义理论模式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思想的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就铁托、卡德尔等主要首脑人物来说，要坚持南

<sup>①</sup> 卡德尔：《人民群众的力量》，见《新南斯拉夫道路（1941—1945）》，原文版第136—146页。

斯拉夫独特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铁托和卡德尔等南共主要领导人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导致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冲突，以至在1948年—1949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彻底决裂。自治是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卡德尔在回忆录中在谈到他在战后初期的自治民主思想时说过：“诚然，自治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论点，但是，它已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并采用各种名称，正因为这样，我们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并经常受到压力。……自治在当时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民主的形式。”<sup>①</sup>

总的说来，在卡德尔早期著作中，在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决裂以前所写的文章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自治民主的思想，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的自治民主思想，并且把自治民主当作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构人民政权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 （二）自治的一般理论基础和“工人自治”初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从40年代末至1958年3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指责南共中央执行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公然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丧失命名

<sup>①</sup>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286页。

为共产党的权利，取消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此同时，苏联实行经济封锁，中断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陈兵边境，妄图进行武装干涉。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冲突的实质是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苏联搞大俄罗斯主义的冲突，是自治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同教条主义错误的冲突。在抵抗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压力的艰难日子里，铁托和卡德尔等南共领导人苦苦思索着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的问题，诸如，国家所有制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问题，作为过渡时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消亡的进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党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争取和平的途径等等问题。他们在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为在自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崭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制定了理论基础。卡德尔作为理论家在制定社会自治的理论基础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卡德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治是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时，他说他认真思考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会产生教条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南斯拉夫怎样才能避免犯这样一些严重的历史性错误的问题。为此，他重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多次指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危险，而避免官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实行自治。

卡德尔论述了自治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他指出：“自治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思想一样久远，特别是与国际工

人运动，与它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一样久远。自治是人永恒地向往自由和自由的创造，向往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向往更美好的生活的结果。在世界上，在工人阶级、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争取劳动自由和做人自由的斗争中，在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自由思想和愿望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sup>①</sup>在这里卡德尔把自治思想同人道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把它同自由，驾驭客观事态发展的自主权，对美好生活的理想看作是同一系列的东西，在人类历史进步运动中有着深远的渊源。卡德尔不是在说明南斯拉夫实行的自治民主形式的特殊性，而是在说明一般自治思想的现实的历史的和哲学理论的基础，突出强调了自治的普遍意义。卡德尔在论述自治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时指出它同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实践，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卡德尔说：“自治不是我们的某种特殊的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创造。它一向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巴黎公社，存在于列宁的苏维埃，存在于象我国革命这样的群众的一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而它的某些形式和因素也存在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自治，“是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以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正在经历或者必须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sup>②</sup>

1948年底，尤其是在1949年，卡德尔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开始形成。1948年他就写过关于工厂里自发产生的工人

<sup>①</sup> 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1976）》塞文版第9页。

<sup>②</sup>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299—300页。



委员会的问题的文章，认为必须研究这些自发的工人委员会，它真正指出了必须走的道路和方向。1949年春天，卡德尔和南共政治局的几名委员到斯普利特去探望铁托，建议铁托把自治定为社会制度。铁托完全同意他们的建议，认为自治是社会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他的出发点是：“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当时决定，应该准备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整个管理实行自治改革采取全面的行动。1949年，在劳动组织中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关于系统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的原则性决定，使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产生的那个自治的萌芽开始成长为完整的社会机体。1949年5月28日，卡德尔在国民议会上讨论人民委员会法时作了题为《论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的讲话，指出自治原则不只适用于人民委员会这样的政治机构，而且必须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组织单位，都越来越多地发展自治原则。卡德尔的讲话，为自治的发展成为“工人自治”、“社会自治，逐步变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开辟了道路。

经过1949年在一些工厂试行之后，在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基本法》，明令实行工人自治，后来逐渐发展成社会自治。该工人自治基本法规定：“工厂、矿场、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它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劳动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实行“工人自治”，这是在微观经济范围内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1950年“工人自治法”使得自治以法律正式确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形式。自治最初是工人参加经济企业劳动生产的直接管理。工人直

接选举工人委员会。由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任命经理管理企业的生产活动。

卡德尔在1951年写了《人民革命十年》一文，从理论上阐明实行工人自治的意义。他评述《工人自治法》时指出，《工人自治法》确认了生产资料是社会和全民的财产，而不是国家的垄断物，因而必须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劳动群众不仅通过自己的代表，而且首先是自己直接参加到所有的经济管理、贸易、社会政治、保险、教育组织中去，这是克服官僚主义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这一巨大危险的方式。在这里他把工人自治看作是逐渐实现国家消亡的具体途径。1953年，卡德尔主持起草了新宪法《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和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以宪法的形式把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新宪法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经济部门生产者的自治与市、县和区劳动人民的自治，构成全国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的基础。”卡德尔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他强调指出新宪法的出发点是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承担者。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要通过工人自治制度来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卡德尔在该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宪法性法律把社会自治，即把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自己的自治机构来管理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组织和机构这样一种权利，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sup>①</sup>

<sup>①</sup> 《卡德尔回忆1944—1957》第316页。

1954年8月,卡德尔在《劳动报》第13期至16期上发表了题为《四年经验》的文章,总结了实行工人自治制度四年来的初步经验。他高兴地指出,现在国内外人们普遍确认工人自治四年来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卡德尔得出结论,断言工人委员会不仅是南斯拉夫发展所特有的东西,而且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以这种或那样形式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卡德尔指出工人委员会的伟大历史意义,认为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不仅摆脱了资本家,而且还在自觉和自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确实充分地直接地把国家行政机关变成自己的工具。因而工人委员会是抵御反社会主义倾向——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还是从旧社会残余中产生的那些倾向——的最强大的屏障。

1954年10月8日,卡德尔在挪威奥斯陆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的讲演,从理论上广泛地阐述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践经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卡德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般性指导原则。马克思在《波拿巴政变记》这一著作中和在巴黎公社以后,预感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组织为国家的无产阶级”来代替,宣称巴黎公社这种自治公社共同体就是那种“最终找到的能实现劳动解放的政治形式”。卡德尔强调,生产者自治的原则是任何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任何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他提出两个经济民主的基本原理:(1)用社会计划取代指令性的计划,协调和指导个人的劳动活动;(2)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的利益,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主要刺激因素。生产者自治关心生产者的物质利益，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工人自治实践的成功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影响。许多人想效法南斯拉夫进行体制改革，纠正苏联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不良后果。1956年爆发了波匈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震动。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又一次被当作修正主义者来批判。但是，卡德尔和铁托都坚定地走南斯拉夫独特的道路。1957年，卡德尔负责领导《南共联盟纲领》的起草工作，从理论上分析总结七年来实行工人自治的新鲜经验，确定今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纲领和战略决策。

关于这一阶段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实践，铁托和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都作了很高的评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1957年6月25日，铁托在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自从通过工人自治法七年来的成就。工人自治法是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法令。其目的是实行经济民主化，在生产中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关系，使劳动人民广泛地参加管理生产，广泛地参加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和主动性。铁托认为，实践已证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正确性和它的非凡功效，它的丰富的价值。工人自治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它具有生命力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理论的正确性。生产者自己支配生产手段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 (三) 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对社会自治的理论论证(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

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的召开，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人自治发展为社会主义自治。卡德尔对社会自治作了全面的理论论证。随着社会自治实践的发展，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1958年4月南共联盟“七大”讨论并通过了卡德尔主持起草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在会上卡德尔作了题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报告。

“七大”通过的纲领和卡德尔关于南共联盟纲领的报告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人自治的实践经验，确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的纲领和战略方针，推进了政治经济改革，工人自治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自治。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生生的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权巩固以后，国家逐渐消亡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直接民主逐渐发展，各种社会自治机构的职能要不断加强。同时，《南共联盟纲领》又指出，国家消亡是一个过程，它包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消亡过程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继续存在并且在社会上起某种必要的积极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过渡时期的各个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自治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和新的发展阶段。

卡德尔在“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报告中

指出，南共联盟的这个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原理为依据，从本国和当代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得出的原则性结论，阐明今后实践的道路。“纲领的出发点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劳动者的具体物质利益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刺激因素，劳动者自觉的创造性活动首先取决于这个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使人们尽可能创造更多的东西，同时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sup>①</sup>。他肯定发展社会自治的方针是南斯拉夫一切民主趋势的出发点。社会自治日益扩大，社会自治在解决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的权限日益扩大，实质上就是作为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日益扩大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个人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减少国家强制措施的过程。今天所说的工人自治或者机关中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实质上也是自治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而已。今天属于“社会管理”方面的许多东西，明天就可能成为完全属于社会自治方面的东西。他指出，要在工人自治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公社基础上广泛发展作为社会自治之特点的社会自治机构。关于谁来掌握社会产品的分配权问题，卡德尔认为整个分配制度应当越来越少地依靠作为分配的行政代表的国家的力量，而应当越来越多地在国民收入整个计划分配的范围内成为生产者本身、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它社会自治机构的职能。从1959年起，南斯拉夫开始酝酿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1960年卡德尔等人提出具体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方案。卡德尔认为，企业获得分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47页。

配收入的权力，是朝国家进一步放权，体现工人自治的方向走出的根本一步。卡德尔1961年3月20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上的讲话，谈了“贯彻新分配制度中的问题和任务”。他指出：“在新的分配制度中、工人委员会将能在更大的程度上通过其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表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形式和体现者。”<sup>①</sup>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卡德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重大问题是使劳动者和公民在作出最重大的社会决策时能发挥直接的影响作用。为此，既要扩大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也要扩大自治因素在各级议会的作用。

从1963年起卡德尔担任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卡德尔领导制订的1963年新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自治原则，加强了议会中自治因素，将过去的生产者院改为经济院、文化院、教育院、社会保健院。从此，直接生产者和从事非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们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社会的各级管理工作，各级议会的职权也扩大了。新宪法肯定了卡德尔关于以建立新的分配制度为中心，深化自治和把工人自治发展成社会自治的思想。卡德尔1963年发表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自治的宪法基础”，强调指出，宪法为每一个人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内，在平等的条件下从事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为建立人与人之间日益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关系而斗争开辟广阔的道路。宪法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自治关系中的人的宪法，使人在劳动岗位上感到是主体，并作为经济关系中平等因素发挥作用。一部希望保证民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159页。

主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宪法，首先必须为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确定十分明确的原则和保证，规定和巩固人在劳动岗位、劳动组织的生产和分配中，在他们本组织和整个社会共同体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卡德尔坚持劳动是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和基础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任何人都不能在资本的私人所有权或国家所有权基础上，而只能在个人劳动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获取收入、生产资料或社会所需要的资料。“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必须根据社会为实现按劳分配原则而确定的统一标准，通过计划和法令，最大限度地调整劳动组织根据在市场上实现的产品价值所形成的收入。”<sup>①</sup> 1963年宪法把工人的自治权利扩大到支配剩余劳动的领域，实行劳动组织有权独立支配收入的原则。

1964年12月7日，卡德尔在南共联盟“八大”会上作了题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任务”的报告，说明实行社会自治思想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逻辑开辟道路，这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即在一个历史发展较高水平的基础上，使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他们的劳动成果重新结合，从而使人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和地位变成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卡德尔认为，今后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在自治的范围内，在从基层生产劳动单位中人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集体，到联合企业，业务联合组织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劳动和创造的整个链条上，建立统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度。”<sup>②</sup> 实现这一方针的出发点和手段应该是，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180页。

<sup>②</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221页。



努力使劳动者和由他们组成的劳动共同体，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处于能够影响自己的劳动条件，影响直接劳动过程的起码决定，一直到影响扩大再生产制度、社会计划以及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决定的地位。卡德尔还谈到自治原则在民族关系中的运用问题。

卡德尔在“八大”报告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说：“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有较多的面包。社会主义还意味着有较多的自由，较多的文化，较多的人道主义、较多的创造性方面的满足，等等。”<sup>①</sup>他要求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在目前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所允许的范围内，始终不渝地建立人们的一种使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他认为，在自治和按劳分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人们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条件。实践证明，在南斯拉夫建立这样的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卡德尔的“八大”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南斯拉夫实行社会自治的实践经验，明确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的观点。

1965年3月1日，卡德尔同《自治报》编辑部成员的谈话强调：“自治不仅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民主关系，而且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在回答为什么自治出现在南斯拉夫这个问题时，卡德尔说：“……自治在我国的出现，与希腊和拉丁的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与斯拉夫人的合作社和斯拉夫人的博爱精神以及其他任何东西也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向往美好的生活、创造、自由、进步、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永恒愿望有关系。自治作为一种倾向出现在一个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256页。

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中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自治是一个只有在深刻的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体现的社会改革的过程。而我国革命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

1965年南斯拉夫着手重大的经济改革，坚持扩大再生产的非国家集权化。取消社会投资基金，实行银行贷款。各共和国社会事业经费由各共和国自己负担。简化税收制度，减轻企业税务负担。实行集约经营，革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制度，积极参加国际分工。1965年关于社会服务部门法律地位基本法规定，在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福利事业各方面实行自治。1965年12月28日、30日，卡德尔答贝尔格莱德电视观众问，谈到“改革的经济目的”：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过改革来实现，使劳动组织可以为自己的发展得到较多的资金，使所有劳动组织都能在尽量平等的、经济上更健康 and 更有刺激性的条件下进行经营。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集体将更加独立自主和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自己劳动和经营管理的数量和质量，通过自己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斗争中采用经济发展的最新成就的能力，劳动集体自己就能保证相应的收入从而进一步发展本劳动组织，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在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中既要保持第纳尔的兑换能力，又要使劳动生产率能够达到参加国际经济竞赛的水平。

1967年6月10日，卡德尔在贝尔格莱德政治科学高等学校的讨论会上答听众问时谈到“自治发展与共盟改组”。他肯定共盟是生产者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思想，是自治的因素，

<sup>①</sup> 《卡德尔回忆录》第300—301页。

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觉悟的因素，在当代条件下，共盟仍然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历史社会利益的革命工具，仍然为劳动人民的政权承担直接的责任。卡德尔摒弃所有最终要导致建立多党制的主张和倾向。

由上所述，卡德尔的社会自治思想在这个阶段得到显著的发展。他对社会主义自治问题作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把工人自治思想开始发展成为社会自治的思想，推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从工厂企业扩大到社会领域。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社会所有制取代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人在生产劳动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物质利益问题，社会计划之取代指令性计划的问题，依据“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分配制度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市场问题，民族关系中自治和平等问题，国家和党在社会自治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展示了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丰富和深入发展。

#### （四）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形成（60年代末至1978年）

1969年举行的南共联盟“九大”坚持了经济改革的方针，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使社会自治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以联合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卡德尔提出了自治联邦制、联合劳动一体化和代表团制等构想，推进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发展成为完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总结概括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卡德尔的社会主义自治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1969年，卡德尔发表了题为《南斯拉夫—各平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的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自治联邦制的思想。他指出，今天的南斯拉夫作为各平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自治共同体而得到发展和加强，应该根据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发展民族关系，在联邦范围内以自治的方式协调各民族的利益，即通过直接进行协商和达成协议进行协调。联邦机构的仲裁作用主要局限在由统一经济制度和统一市场产生的各共和国的平等、互相依存和彼此负责等方面。1969年卡德尔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转折》一书中批判了改革中出现的唯技术垄断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指出：“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针对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同时也为反社会主义和反自治的倾向，为唯技术主义的垄断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分解化和类似倾向敞开了大门”。他认为，唯技术官僚主义是除国家占有剩余劳动之外的、对工人自治发展的第二大威胁。它意味着劳动者要绝对服从管理机构，听任管理机构为所欲为。这样以来就会首先在社会基础，然后在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的官僚化新浪潮鸣锣开道。事实上，发展下去，迟早会倒退到国家所有制关系，倒退到官僚主义——专家治国论垄断的统治。<sup>①</sup>

为了克服社会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卡德尔在1971年5月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联合劳动一体化思想。卡德尔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者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的论点为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争取自治的斗争，就是

<sup>①</sup> 卡德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转折》，1969年塞文版第70—75页。

争取劳动者的自由，争取他们劳动和创造的自由，争取他们决定性社会影响的最直接的斗争形式。卡德尔认为，在自治发展的目前阶段，决定性的环节是社会再生产领域，或者说是要通过社会收入，特别是社会金融资金的运动，保证自治渗透到整个管理领域，促进一切社会劳动领域的自治一体化，朝着加强共和国、尤其是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劳动一体化领域的自治一体化方向继续采取步骤。现阶段自治斗争的重点扩大到整个社会再生产、劳动和产品交换领域，即扩大到社会资本的一切领域，加速社会劳动一体化的进程。

1971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内容反映了卡德尔自治联邦制和联合劳动一体化的思想。1971年11月18日，卡德尔在斯洛文尼亚共盟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发言指出，1971年宪法修正案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工人和他们的过去的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修改的目的，首先是要逐步克服过去的劳动与劳动者脱离的现象。其次是工人的个人收入即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不仅取决于在直接的市场交换中的收入，而且也取决于一体化的整体收入，归根结蒂取决于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每次是借助社会所有制中工人和过去的劳动的新关系，开辟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自治一体化的途径、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途径，即企业自治和使用社会共同资本方面自治一体化的途径。实行劳动人民及其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相互权利和责任的制度。

1972年，卡德尔在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发言，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所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当年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广泛的兴趣，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卡德尔的《社会所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

盾》一书是他的社会主义自治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本书中卡德尔从理论上阐述了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为70年代以来实行联合劳动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卡德尔从理论上论述了（1）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发展的过程；（2）社会所有制关系的矛盾；（3）在工人监督下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4）收入的二重性；（5）联合劳动的收入与工人的个人收入；（6）社会主义的和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等问题，为1974年的新宪法和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卡德尔强调，要解决自治同社会资本集中过程中现有的专家治国论垄断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绝不能倒退，而要采取坚定的方针，在扩大再生产领域中建立保证在工人监督下实行劳动和社会资本一体化的经济关系。这就是要更坚决、更彻底地继续改革扩大再生产制度，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所有管理与支配社会资本的中心都服从于自治地组织在联合劳动基层单位中的工人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监督，服从于他们的利益、需要和相互责任。按联合劳动原则改组原有的自治组织，在社会分工和专业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依照已经形成的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把企业联合起来，联合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自愿结合。为了实现使基本决策权更接近于直接生产者，基本核算单位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各级联合劳动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各个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就有关计划、收入分配、价格、投资、就业及其它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在不同级别上签订相应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共同遵守，以此实现自治基础上的联合劳动一体化。在卡德尔看来，这是摆脱唯技术主义垄断主义的唯一

出路。

1973年，卡德尔《宪法修改的基本原因和方向》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与以联合劳动为中心的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即把1964年宪法确定的代表制发展为代表团制的思想。卡德尔认为，“在实现联合劳动一体化的同时，南斯拉夫的代表制应当相应地发展为代表团制”。<sup>①</sup>

1974年2月21日通过的联邦新宪法规定联合劳动作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南斯拉夫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力和自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所有制和自由的联合劳动之上。工人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实行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在联合劳动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中均实行自治。各级议会均实行代表团制。代表团成员由劳动者直接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联合劳动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1976年“联合劳动法”规定工人在联合劳动中有权支配社会资金。联合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基层联合劳动组织（车间或分厂），联合劳动组织（企业）和复合联合劳动组织（公司）。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协调关系的基本形式。

1977年卡德尔写的关于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的专著以《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为题在南斯拉夫出版。卡德尔在总结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有关在南斯拉夫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和问题，为今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它为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本书从理论

<sup>①</sup> 卡德尔：《宪法修改的基本原因和方向》，塞文版第92页。

和实践方面对30多年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发展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它是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科学的重要著作。

1978年卡德尔《自由的联合劳动——在布里俄尼的讨论》一书在贝尔格莱德工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卡德尔晚年从理论上概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经验的重要理论著作。他在书中就联合劳动这个命题专门作了精辟的论述。卡德尔指出，按自治方式联合劳动是社会劳动联合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实现自己在联合劳动中和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工人的个人地位是这样来决定的：他们自由地、直接地和平等地管理自己的劳动和整个社会劳动，但是这种管理是在客观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民主地负责和声援、自治地作出决定和各族人民平等的关系中进行的。工人并不因为从事劳动，支配资金和劳动成果而与其他人隔绝，而是处在相互依赖和对其他工人的同等权利互相负责的关系之中。这正是形成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自由的生产者共同体的条件。卡德尔说，现在，联合劳动中的自治与代表团制一起，正在成为自治和自治利益对国家权力制度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真正的物质基础。同样，自治也正在成为使工人发展成为既为个人劳动和切身利益，又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而使用整个社会资料的创造性人物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卡德尔晚年写成的《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自由的联合劳动——在布里俄尼的讨论》这两本阐述南斯拉夫30多年来社会主义自治建设经验的理论专著，标志着卡德尔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形成。卡德尔于1979年



2月10日因病逝世。南共联盟主席团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在卡德尔1979年逝世时联合发表的讣告中特别指出：“卡德尔同志的革命创造性工作还为我们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和物质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为1971年宪法修正案，1974年宪法、《联合劳动法》所作出的贡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

## 二、社会自治理论的若干问题

卡德尔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生。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的实践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就其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些简要说明。

### (一) 社会所有制

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基础。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自治，逐渐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和劳动者的解放，建设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乃是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精华。在卡德尔看来，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是一次革命的飞跃。它应该实现工人阶级、劳动者追求劳动解放的愿望，也就是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劳动者自己能够成功地消除使其脱离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的一切“劳动异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所

有的劳动者在支配共同劳动资料和从事创造的劳动方面，即在支配公有制生产资料方面拥有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关于社会所有制，卡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自治的宪法基础》一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卡德尔写道：“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作为劳动和根据劳动进行占有的基础，是适用于一切人的社会范畴。……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在劳动基础上的占有，但要以联合、平等和有计划地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和不断扩大这一劳动的共同基础为条件。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是变生产资料为自由联合劳动的工具的过程。”<sup>①</sup> 1963年宪法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社会经济关系，也是社会经济过程。卡德尔在阐发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思想时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废除个人所有制，而是在使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能共同支配个人劳动和共同劳动的条件和产品的意义上，建立个人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是在社会劳动条件下的个人所有制的特殊形式。社会所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克服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同劳动者脱节的现象的手段。只有在解决这一矛盾，消除劳动异化的过程中，才能为人的相对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要“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最终把生产资料和其他劳动条件“还给“生产者、劳动者和创造者本人的那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卡德尔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所有制看作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思想的运用和发展。1963年宪法认为，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是以工人自治为基础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192页。

的联合劳动的共同基础，是每个人都能在同等的—般条件下从事劳动，并按照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占有劳动成果的基础。这种所有制也是社会计划和中央调节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物质基础。宪法不承认任何对社会所有制进行垄断的代表。

1972年卡德尔在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在分析“社会所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社会所有制的涵义。他把社会所有制同消除劳动异化紧密联系起来，把它看作是能够使工人自己成功地克服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手段和成果相异化的一切形式。卡德尔批判了那种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对物的静止关系的旧的所有制观念，强调指出，应该把社会所有制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卡德尔批判了那种把社会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形式，即同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量齐观的保守主义观点。卡德尔指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国家所有制同社会所有制等同起来，虽然马克思肯定国家在使生产资料社会化方面的革命作用，国家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和手段。马克思认为，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生产者的社会职能，而不是某个表面上“代表”直接生产者行使职务，而实际上不受直接生产者影响的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的社会职能。

根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经验，卡德尔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工人不是在占有资本的基础上，而是在自己的劳动和共同占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在自治和相应的相互权利和

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原则上直接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卡德尔在说明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概念的时候说，只要存在占有，就存在所有制。问题只是在于这种占有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关于国家所有制，卡德尔指出，作为资本集体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的国家是在国家实行强制的基础上进行占有的。国家在行使这一职能时，可以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工具的作用，也可能成为使工人阶级与公有制生产资料发生新式异化的工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自治中找到出路。卡德尔论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的社会所有制的实质时指出：“自治的社会历史含义在于产生这样一种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形式，在这种生产关系形式中，存在着作为唯一占有方式的以劳动为基础的占有，并且这种占有应当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工人在自己劳动的基础上直接地占有，摆脱了对资本所有者或者对作为资本集体所有者的“职务行使者”的国家的各种形式的雇佣关系。……这就使社会所有制不再是工人与国家这个社会资本垄断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成为劳动人民本身之间的关系”。<sup>①</sup>卡德尔解释说，如果长期停留在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和关系上面，就有可能造成使劳动者同公有制生产资料相异化的一定形式再生产的条件。在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要使工人能成功地防止剩余劳动对他异化，防止他的官僚式专家治国论者变成为掌握他的剩余劳动的人。社会所有制的历史含义就是消除劳动同社会资本的异

<sup>①</sup>《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化，实现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

卡德尔提醒人们正确理解社会所有制含义时，强调要注意两点。一是，虽然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一切从事劳动的人所有，这是劳动者和创造者从事劳动和获得自由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但是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都不拥有任何私有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所有制既属于全社会的人，又不属于哪一个人。二是，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劳动者在社会总劳动中从事个人劳动的手段，也是他获取个人收入的手段。因此，社会所有制既是全体工人的共同所有制，同时又是任何从事劳动的人的个人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所有制不再意味着“所有者”同“非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指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共同支配生产资料，但是个人占有自己劳动果实的工人自己之间的关系。

卡德尔晚年在论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时进一步论述了社会所有制问题。他认为，社会所有制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总的生产和一般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在决定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的本质和特征方面，社会所有制自然占着中心地位。卡德尔说：“社会所有制既是社会主义自治的条件，又是它的基础和本质。”<sup>①</sup>社会主义自治意味着，工人们拥有同等的权利，可以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自由地、平等地进行劳动，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收入，支配扩大再生产资金以及掌握自己的劳动的其他一切条件、资金和成果。在联合劳动中，社会所有制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所有制，因而也是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不管在什么范围内和在什么方式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537页。

下，这种所有制都保证了劳动者拥有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同时保证他享有与其基本权利相联系的一切不可剥夺的其他权利。因此，“社会所有制真正成为——从这一术语的积极意义上说——既不是任何人的所有制，又是每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既成为共同的所有制，又成为个人的所有制。”<sup>①</sup>

卡德尔在谈到社会所有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把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规定为社会所有制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也就是从政治的角度说明社会所有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自治中，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既是社会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基础。在这些关系中，从事联合劳动的人们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相互结合，而这种结合是在支配这些资料、占有产品即占有通过自己劳动获取的收入方面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卡德尔把社会所有制规定为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民主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历史含义是要实现劳动和社会资本的一体化，逐渐消除劳动同社会资本的异化现象，这是把生产资料变成自由联合劳动的工具的历史过程。

## （二）自治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自治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内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计划制度同整个社会制度是紧密相联的。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539页。

民主制度时，实行自治社会计划制度，它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卡德尔在总结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社会计划制度的新鲜经验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自治社会计划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同时也发展了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卡德尔总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总体上来论述自治社会计划，而不是纠缠于有关计划的具体细节问题。所以探索他在自治社会计划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对于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卡德尔在其专门阐述《南斯拉夫计划制度》的专著中明确指出，自治社会计划直接反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和民主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自治的历史使命是使管理成为联合劳动者的职能，使社会计划成为劳动者管理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工具的手段。对于社会主义自治社会来说，不管是集中制的计划还是分散制订的计划，本身都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劳动者手中的工具。有关自治社会计划的最重要问题在于谁是计划的制订者。卡德尔在该专著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制订计划实质上首先是支配劳动、生产资料、收入和社会资金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一工作不能脱离对生产资料或社会资金拥有所有权的人。或者说脱离对这些资料 and 资金拥有垄断的政治权力的人。”<sup>①</sup>卡德尔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计划看作是保证劳动者运用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自由劳动的相应条件的共同工具。

卡德尔阐述马克思关于计划是劳动者对其自身的社会确

<sup>①</sup> 卡德尔：《南斯拉夫计划制度》，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认的手段的思想，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计划的含意就是“社会化的人”，共同结合的生产者，按照合理的方法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共同管理之下，不让自己受盲目的力量统治，并在耗能最小、最适合于人性的条件下加以实现。所以，卡德尔认为，计划是人在同自然的自发性进行斗争中的工具，是协调在这一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而不是使劳动者服从他们个人劳动和联合劳动之外的某个他们的总代表的意志的手段。计划的实质是在对客观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协调联合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义务，以保证最优化劳动条件所必需的物质比例，根据规定的物质比例和关系，所有社会劳动的诸多因素，制定和独立地实现自己的发展规划。

卡德尔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计划分为两类：自治计划和社会计划。自治计划，由联合劳动组织以及其他自治组织和共同体在其内部自由确定。它与集中的国家计划制度相反，不是由国家给联合劳动组织自上而下硬性指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以及按什么价格出售和在哪里投资等等，而是由联合劳动各级组织自下而上地制订计划。这样，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自治计划，就成为其它联合劳动组织和社会共同体共同制订计划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从而也是制定社会计划的整个过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自治计划是工人对生产资料、收入和整个社会再生产制度的自治监督的表现。社会计划，由社会管理机关以各方面的计划工作参加者的自由协商为前提，也以宪法规定的国家在制订计划的作用为前提来确定，其目的是按照联合劳动及整个社会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过程进行协调和指导。在这里，国家虽然



不再以指令性计划制订者身份出现，但就协调各地区、行业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说，仍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

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计划制度》一书中谈到实现自治社会计划的主要手段和组织形式。他写道：“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是计划制订、通过和实施过程中主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和组织形式。”<sup>①</sup>照卡德尔的说法，社会契约是指社会管理机关和自治联合组织就涉及普遍社会利益问题而签订的契约。自治协议则是指各级自治联合组织之间通过协商确定的协议。两者一旦签约，就具有法律似的约束力。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均包含着一定的国家强制因素。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是协调关系克服市场自发作用的主要手段。

卡德尔对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在目前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在坚持自治社会计划的同时，卡德尔认为必须充分发挥商品和市场的积极作用。自治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这是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卡德尔在批判否定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极左派观点时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卡德尔指出，自从人的生产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供给别人之时以来，一切社会制度均有形式不同的市场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市场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决定市场的性质。卡德尔在

<sup>①</sup> 卡德尔：《南斯拉夫计划制度》第79页。

197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市场是自治者之间，根据他们使用属于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自由地交换劳动的一种形式。同时，工人获得了机会和手段根据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来监督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包括社会资本的各种经济职能和联合劳动总收入的分配。因此，通过商品生产和自由的自治市场去进行劳动的自由交换，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乃是自治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条件。”<sup>①</sup>这种自治市场已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状态的那种自由市场，它接受社会计划的指导和调节。但它在下述意义上又是自由市场：联合劳动的自治组织可以自由地、在极少受到政府干涉的情况下订立自由交换劳动的合同。在分析社会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时，卡德尔也论述了市场和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产品直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应该能扩大工人和劳动集体在其劳动中的自由的范围，因为这种交换本身就是衡量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协调、投资的赢利性、劳动的经济性等等的尺度之一。”<sup>②</sup>谈到市场“消亡”问题时，卡德尔指出，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永恒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本身必然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因素。但市场“消亡”首先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产率发展的问题，而不只是主观愿望问题。市场的“消亡”只能是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地发展的结果，而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首先是联合

<sup>①</sup> 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sup>②</sup> 《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65页。

劳动进一步实现自治一体化的结果。市场的消亡不是国家的行政命令所能主观随意地办到的。

综上所述，卡德尔关于自治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统一的思想可以归纳为：自治社会计划是联合劳动者管理整个生产劳动和社会资本的工具，必须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的消极影响，同时必须尊重和肯定市场和商品生产的作用，把社会计划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

### (三) 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中创立的自治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和国家消亡的具体途径。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在其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中以人民解放委员会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治民主制是现在全面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萌芽和初始形式。而当今建立的表现为代表团制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完整的政治制度又是数十年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最丰硕的成果。卡德尔在总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有重要意义。

卡德尔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消亡着的国家”的理论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国家逐渐“消亡”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暴力职能不应该日益加强，而应该日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因此在卡德尔看来，社会主义自治不是什么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之它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的形式，同时也是国家消亡的具体途径。卡德尔把“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解释成为代表一种具有特定的理论和历史含义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是由国家机器或国家专政机关实施的一种专政，而是一种政体概念。在这个政体中，工人阶级根据自己当前和长远的历史利益，在社会中具有无可争辩的领导作用。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种保证社会民主并在社会主义自治范围内为民主化开辟广阔道路的政体。

在卡德尔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主要表现为广大劳动者阶层对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来实现，除此别无他途。而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只能诞生于不断地扩大和发展的社会主义自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1954年10月8日卡德尔在奥斯陆作的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的演讲中谈到自治民主问题，批判了官僚主义的国家集权制，主张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自治民主制保证每一个公民都能直接参加管理，保证每个人的首创精神和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广泛自由，归根到底它是国家消亡的形式和具体途径。1977年出版的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反映了南斯拉夫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所达到的水平，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30多年来在南斯拉夫的发展，着重探讨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为今后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卡德尔在《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中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具有深刻的革命民主传统，它保证千百万人民可以直接而积极地决定自己切身的

利益，以及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卡德尔在“前言”中说：“在政治制度方面，由于自治的生产关系已成为政权的来源和基础，因而宪法规定把自治共同体的代表团制度作为议会制度的基础，从而也就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sup>①</sup>接着他又指出：“代表议会制度原则上已成为、如今在实践上也必将成为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权制度的支柱。”<sup>②</sup>卡德尔在书中论述了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前提，指出私人资本家所有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所有制的政治制度的质的区别，批判了有关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若干错误观点，肯定自治利益的民主多元主义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卡德尔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体现的自治利益的民主多元主义乃是一种以自治利益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卡德尔强调，生产者自治的原则是任何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任何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出发点。卡德尔把真正的自治政治多元主义，即自治主体个别的和一般的真正自治利益的多元主义作为自治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上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①联合劳动的一切与农民、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种形式的个体劳动有联系的部门；②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者和公民的利益；③与公民居住地的生活条件有关的利益；④各民族的特殊利益；⑤各社会政治组织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的创造性活动；⑥范围广泛的共同的公众利益等领域。建立各种自治民主机构来保障各方面的自治利益。卡德尔说明了建立在自治利益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卡德尔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应采取使劳动者和公民依自治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

<sup>①②</sup>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第6、10页。

域的各个相关组织内，如代表团、自治利益共同体、地方自治共同体、议会联邦院、联合劳动院等组织机构，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代表和维护多元的利益。这就是卡德尔说的“自治利益民主多元主义的含义。”

卡德尔在第二章中谈到作为南斯拉夫自治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柱的代表团制。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代表团制。通过自治共同体的代表团，劳动人民直接参与民主决策。代表团制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及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并按照自治原则管理公众事务的工具和手段。在自治共同体中劳动者用直接的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是不脱产的，每四年选举一次，不得连任。所有代表团的代表组成议会的议院。根据代表团制组成的议会是社会自治机构，也是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政权机关。代表们保持着同劳动者和公民的密切联系，直接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在代表团制的基础上，人的真正自由和权利得以实现，按照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方式协调各自治共同体和劳动者的自治利益。

卡德尔充分肯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自治劳动群众觉悟的指导因素和他们的社会主义活动的倡导者。卡德尔反对多党制。卡德尔也反对由政党垄断地代表各种利益使之政治化并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传统做法。1978年6月21日，卡德尔在南共联盟“十一大”上发言专门谈到南共联盟的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引导作用问题。他明确肯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民主政治中，南共联盟的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引导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它有能力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进步力

量，在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原则和关系的基础上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斗争。同时卡德尔指出：“共盟只有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直接统治的所谓有机组成部分，即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内部推动力，共盟的引导作用才能以法律形式真正表现出来”。<sup>①</sup>

卡德尔认为，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卡德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任何国家都代表着权威，因而也是专政的一种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权威的形式，因而也是专政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中，卡德尔说：“在南斯拉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不是去建立一种由国家主办的民主，而是使国家的职能社会化，并促进自治和自治民主。这种努力同时也就创造着国家消亡的条件，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且是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包括目前的自治民主形式的国家。”<sup>②</sup>与此同时，卡德尔又肯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治民主的国家机器在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在逐渐“消亡”过程中仍然是维护社会主义自治的工具。他说：“在实行社会主义自治过程中，哪怕国家的一部分职能逐渐消亡，国家政权仍然是维护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因为社会主义自治要以政权为后盾，而工人如果不在政权里起领导作用，也就不能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起领导作用。”<sup>③</sup>

① 《卡德尔论文选》第519页。

② 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第74页。

③ 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第27页。

在协调社会的物质发展进程中，在保证社会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国家还要长期保持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治一体化的途径不仅不排除国家起一定的经济作用，而且还要以国家起一定的经济作用为前提条件。

#### （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思想中和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卡德尔不仅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看作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也把它当作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样也看作是南斯拉夫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优良的人道主义传统。1941年卡德尔在《战斗报》第2期上发表文章阐明反法西斯斗争不仅具有民族解放斗争、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性质，而且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其目的在于通过革命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人与人平等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社会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都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卡德尔一直把人道主义看作是人类进步的思想传统，同时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这是它区别于以往的人道主义思想之处。卡德尔既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同人类人道主义的进步思想的联系，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肯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卡德尔认为：“当代的人道主义在道



德上的含意，可以说早在古埃及的墓碑上就刻成了文字。人类追求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人道主义的关系的主观愿望，千百年来都是相同的。但是，对当代来讲，重要的是在考虑到事物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要认识如何能够切实改变事物的现状，如何能够前进一步，什么是这种变革事物的一定客观因素和体现。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必须是具体的、富有成效的。”<sup>①</sup>卡德尔一向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致力于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具体贯彻到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去，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

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卡德尔认为，自治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工人运动中，工人自治思想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是密不可分的。劳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依靠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也应由他们来享受。实行劳动者自治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作为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的作用。自治联合劳动的目的是尊重人，使人的才能能够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使人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卡德尔看来，作为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它体现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全人类、建设自由生产者联合体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187—188页。

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中。

卡德尔1958年在“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的报告中把人和人道主义说成是南共联盟纲领的出发点。南共联盟纲领强调必须把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人在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将要日益摆脱对物质发展过程的盲目服从，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本人物质状况的主人；在社会主义自治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必然会产生人道主义的品质。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设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

1971年5月5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第二次自治者代表大会上作题为“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报告，说明了自治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紧密联系。他指出：

“自治既不是抽象的理想，也不是教条。它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条件下工人最有力的武器，它使他们在自己的创造性努力和争取其今天与明天的切身利益的斗争中成为自由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地位，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其在改造我国社会中的历史作用，在这场改造中确立他们的引导影响和对自己的与社会的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的监督，确立对社会劳动的全过程和民主与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的监督。”<sup>①</sup>

卡德尔在谈到1974年南斯拉夫通过的新宪法的出发点时指出，它就是从人，从人的真正利益和需要出发，从人与人之间在其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出发的。在按自治方式支配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金的基础上，

<sup>①</sup> 《卡德尔论文选》第379页。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及其直接的和长期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利益，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目的和终点。

在卡德尔看来，在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的过程。70年代初，卡德尔以“社会所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为题，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异化，探索消除异化现象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者都力求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途径来消除异化现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种种异化形式。在卡德尔看来，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这些传统的公有制形式不足以成为消除异化的手段。所以，要推行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自治。只有在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关系中劳动者才能够逐渐克服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手段和成果相异化的一切异化形式。卡德尔肯定，现在南斯拉夫社会自治制度尚不完善，因而依然会产生各种异化现象。这要在发展社会自治一体化过程中加以消除。

卡德尔在其《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一书中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体现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政治制度中。代表团制作为南斯拉夫政治民主制的具体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也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劳动者和公民通过联合劳动管理经济事务，通过代表团制管理社会政治事务，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创造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将逐渐改变自己的被领导的意识，摆脱对物质发展过程的盲目服从，既培

养出自己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要求，也培养出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道主义品质。这就使他们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的物质和其它方面的可能性，提出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适合物质、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在这样的基础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权利得到实现和表现。

卡德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还包含着个性解放和关心个人的自由幸福的思想。各尽所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才能、聪明才智去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只有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自治，逐渐消除劳动异化和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个人在自由联合劳动基础上才能实现个性的全面解放。整个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不仅是全社会的进步，而且也要达到人们个人幸福。在社会主义自治条件下的社会所有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个人所有制。在联合劳动中每个人通过自由劳动来创造个人幸福，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范围内按个人的劳动的质量数量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保障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个人所有制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要日益扩大和发展。在卡德尔看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追求最高度地满足人的需要、企望、兴趣和希望等。对人的关心，对个人自由、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命运的关心是人道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改造自然、社会，而且是改造作为社会推动力的人，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自治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具有人道主义品德的人。卡德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资产阶级的

人道主义，而是同彻底唯物主义辩证统一的现实的具体的  
人道主义。它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的人和他们的真正利益和需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  
不仅意味着有更多的面包和钢铁，而且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  
更高的文化、更多的人道、更多的创造者的幸福快乐，建设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生产者  
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

###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卡德尔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半个多世纪的  
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他的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自治的理论体系，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卡德尔的哲学理论  
观点对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内容，确定  
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  
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吸取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的经验  
教训，避免走弯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  
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世  
界观，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通过革命实践改变事  
物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以彻底消灭剥  
削和压迫，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和被压  
迫人民谋求自身解放的精神武器。它“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实际解决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  
一重要哲学问题，通过实践来解决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实  
现人和自然的统一。马克思

主义哲学同以往一切哲学，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实践。卡德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恰恰在于纠正了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简单片面的解释，比较准确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及其内容。

卡德尔在论证社会自治时并不是从抽象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实践主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从南斯拉夫的具体实践出发的。他正视客观现实和它的辩证发展规律，依据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确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自治是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消除异化的手段和途径提出来在南斯拉夫推行和发展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建设的实践，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自治的理论体系本身就属于共产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自治实践中的矛盾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是属于社会主义辩证法在当代南斯拉夫的创造性发展，即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遍认为，它既是唯物辩证的又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说过，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全人类解放的立场来观察人类历史，马克思把几千年来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历史看作是史前史，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以人类能够进行自由创造的历史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时期。仅仅承认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崇拜自发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肯定客观规律性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的劳动人民的能动的革命的作用，通过实践去改造世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思想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的。几十年来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主义的解释的根本缺陷就在于离开人类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离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来谈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关于物质世界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本体论主义的哲学，见物不见人。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功绩就在于肯定人和人的解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把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起来。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强调人和人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肯定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统一，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创造性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卡德尔在《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方向》一书中指出，自治作为社会关系体制是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抉择的答案。自治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和民主的制度，可以使工人自由地争取他们真正的利益，同时又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协调彼此的利益，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调节公共福利。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解放劳动和工人阶级，解放个性的历史进程，是人成为自己生活和劳动的真正主人的进程。社会自治制度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人作为生产者和自治者的权利以及人的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使人从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这是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卡德尔长期致力于唯物辩证法人道化和当代人道主义唯物辩证法化，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是当代南斯拉夫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过多年争论趋于统一的认识。1960年布莱德会议上和以后20年间，是否承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曾经是实践派和辩证法派争论的焦点。卡德尔把社会实践概念的理论解释为统一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认识奠定了基础。1975年11月，卡德尔在“铁托政治学校”建校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对实践的错误认识，同时也肯定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一正确命题，从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卡德尔首先指出实践是“作为历史过程的实践”，是人对自然的能动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和精神观念的物质基础，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概念和实践概念的统一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和唯物主义理论不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是奠定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它无法说明人类历史和人的认识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的发展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但是，这只是共性的一面。两者之间还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和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够改造世界，在实践中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是社会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改造世界的能动的革命的创造性活动。根据卡德尔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和解释，现在南斯拉夫大多数哲学家达成的共识是把社会实践最广泛地理解为人改造世界的物质的感



性的能动活动。人和世界的物质的联系，是人创造自己历史的革命行动，因而也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现实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卡德尔和南斯拉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道批判那种把人类史归结为自然史，忽视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的本体论主义的历史观和否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直观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是有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

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他在指导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着重探索和阐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时代的社会主义辩证法，社会实践的辩证法和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人道化，使它成为人批判当代社会生活中现状的武器，批判地说明人的历史的工具。过去，苏联哲学界的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往往做了狭隘的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把它狭义地解释成为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及其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而忽视历史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卡德尔对人和人的东西的强调，使得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遍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东西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哲学一元论的问题，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人道主义化。卡德尔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设实践中。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自治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答案。卡德尔既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又反对对社会主义社会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非批

判态度，主要采取辩证批判的分析方法揭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并通过建设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正确解决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广大劳动人民造福。卡德尔关于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实践辩证发展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思想，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实践基础上产生和进行的。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实践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在发展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矛盾。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崭新的实践经验，不管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所作的理论探索肯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卡德尔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人们可以得到启迪，以便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新的贡献。

## 参 考 书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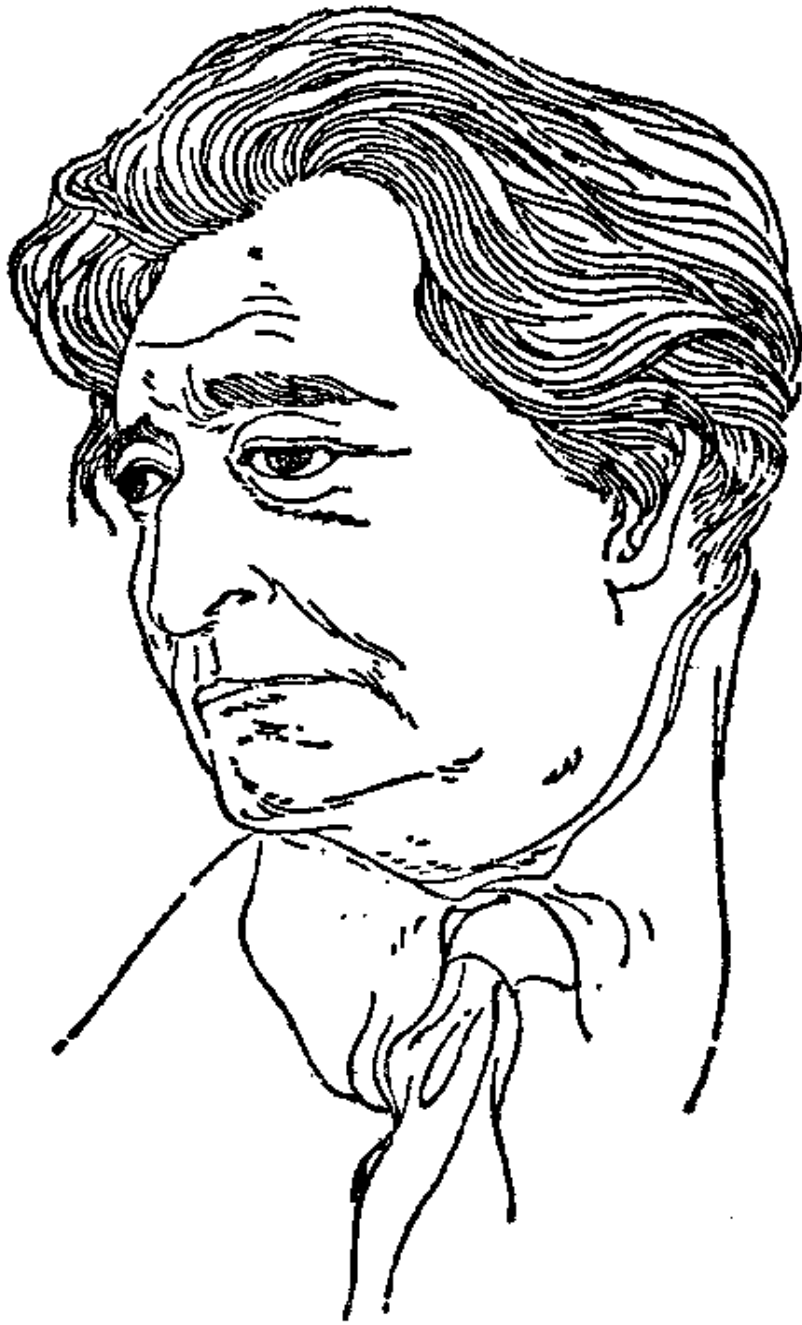
1. 亚耐兹：《爱·卡德尔》塞文版。
2. 舍丁茨：《卡德尔的思想和著作》，格罗布斯1986年版。
3. 卡德尔：《人民群众的力量》，载《新南斯拉夫道路（1941—1945）》塞文版。
4.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5. 卡德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自治（1950—1976）》塞文版。
6. 《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 卡德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转折》，塞文本1969年版。
8. 卡德尔：《宪法修改的基本原因和方向》，塞文本1973年版。
9. 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 卡德尔：《南斯拉夫计划制度》，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11. 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涅德里科维奇

吴仕康 撰

## 篇 目

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 .....	535
二、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培育一代新人 .....	542
三、两条战线作战方针，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 .....	549
四、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支持《辩证法》 .....	557
五、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 .....	564
六、人道和科学的统一，团结合作的基础 .....	571
参考书目 .....	580



涅德里科维奇 (1889年——1984年)



---

# 涅德里科维奇

吴仕康

## 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 反对法西斯主义

杜尚·涅德里科维奇（1899—1984），是著名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院士，“辩证法派”主要代表人物。

1899年5月18日，涅德里科维奇出生在伊萨科沃·朱普里耶。他早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大学哲学系当讲师。涅德里科维奇很早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在当时尚处于地下活动条件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下，立志把自己的命运和哲学研究工作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涅德里科维奇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宣传工人阶级的进步思想，认真研究自然辩证法、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史等哲学领域的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在20年代，涅德里科维奇发表了一批关于哲学史和辩证



法的著作,值得提到的主要著作有:《R.J.博斯科维奇的相对主义和自然哲学》,载《巴黎大学学报》,1922;《试论时间的范围》,1922;С·谢克曼诺维奇《认识的方向》,斯科普里,1923;《赫拉克利特》,贝尔格莱德Γ.康出版社,1924;《帕斯卡的创造性哲学思想》,巴黎阿尔库出版社,1925;《不死的不道德性和死的伦理功能》,贝尔格莱德Γ.康出版社,1928;《假言判断是逻辑思维》,1928;《抒情创作的心理学》,贝尔格莱德Γ.康出版社,1929;《F.彼特里奇》,贝尔格莱德,1929年,等等。涅德里科维奇在《赫拉克利特》一书中对赫拉克利特在古代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评价很高。他认为,在人类认识的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赫拉克利特不仅以其具体的辩证法为古代哲学及其后来的整个发展奠定了真正的普遍基础,而且较早地解决了很多无法解决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难题,从而以其辩证法研究的完整性,达到古代哲学思想的顶峰,而比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高出一筹,成为素朴的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涅德里科维奇《不死的不道德性和死的伦理功能》一书中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批判信仰来世生活之不道德性,肯定正常的死亡和对死的健全意识是合乎道德的。全书贯穿着哲学无神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涅德里科维奇在20年代的研究活动涉及到许多哲学学科,不仅研究本体论问题,而且研究人本学人道主义问题,伦理学、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和哲学史等领域。

在30年代,涅德里科维奇除了对哲学理论进行正面的探讨之外,还投身于对法西斯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批判。1932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Γ.康出版社出版了论劳动的伦理学功能的著作《劳动、意志、快乐——

劳动的伦理学功能初探》。在这里他从人类劳动起源理论出发来探讨伦理学问题。劳动作为人改变自然的基本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1934年，涅德里科维奇又出版了《南斯拉夫现代哲学概貌》一书，他力图全面地把握南斯拉夫当时哲学理论界的情况，并积极参加哲学理论战线的斗争。

涅德里科维奇作为进步哲学家，很敏锐地认识到法西斯的反动实质，并勇敢地起来和它作斗争。1934年，涅德里科维奇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哲学会，作了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揭露了法西斯的种族奴役和反民主的实质。1936年，斯科普里的斯拉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唯美主义和辩证法》。1937年，斯拉夫出版社又出版了涅德里科维奇的《种族和种族主义》一书。他在该书中证明种族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武器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社会是极其有害的。1938年，涅德里科维奇在斯科普里出版了《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冲突》一书，在政治思想上直接参加进步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书中，他指出法西斯主义世界观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和冲突，揭穿了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质。革命家奥格宁·普里查对他的《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冲突》一书评价很高，认为就其科学立场和现实意义来说，它是南斯拉夫当时的哲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书。正是因为涅德里科维奇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在1940年他被捕，关进集中营。

涅德里科维奇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对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流派——直觉主义、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展开尖锐的批判。在上面提到的《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冲突》一书中，涅德里科维奇把实证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论准备”来批判。1939年，涅德里科维奇在斯科普里的斯拉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反柏格森》一书。他在书中尖锐地批判直觉主义，指出：柏格森从根本上说同海德格尔、帕比尼、别尔嘉也夫、詹姆斯等人一样，对现代思想起着极坏的影响。他揭露了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理论的许多内在矛盾，指出它们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和对社会的危害性。1940年，涅德里科维奇在其《实用主义的涵义和危害性》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实用主义，指出它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急先锋的意识形态。涅德里科维奇认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根源，乃是黑格尔以后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卡尔纳普、石里克、路易·倍倍尔等人的新实证主义观点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无法解决关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在新实证主义那里，“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前提的检验。涅德里科维奇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中间立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中楼阁”。

涅德里科维奇引以自豪和对后来南斯拉夫哲学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1939年贝尔格莱德宇宙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译作《黑格尔辩证法》和他的“历史述评”。所谓《黑格尔辩证法》就是涅德里科维奇翻译的百科全书式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历史述评”就是涅德里科维奇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原文所作的注释。这是涅德里科维奇在战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化所作的重大贡献。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曾在其

《哲学笔记》中写下有名的警句：“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列宁还断言：“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sup>①</sup>涅德里科维奇由于认真钻研黑格尔《逻辑学》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解。由于翻译和评述黑格尔辩证法，涅德里科维奇使南斯拉夫的广大读者得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涅德里科维奇1939年写的《黑格尔辩证法》“历史述评”，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了一番广泛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的评论，分析辩证法思想从黑格尔到列宁的发展，并着重分析列宁对辩证法思想所作的最重要的发展。在“历史述评”中涅德里科维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贡献，首先涉及到对客观辩证法领域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阐释。在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七个“基本特征”的年代里，涅德里科维奇从根本上探讨了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辩证的统一性和过程性、规律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因果性、本源性和可能性、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否定、质量互变、一般、特殊和个别等辩证规律性，肯定与否定、本质、现象和假象、简单和复杂、整体和部分以及其他许多辩证法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涅德里科维奇对斯大林所忽视的否定的否定规律提出了独特见解，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因素是自己运动、自己发展以及一切新事物产生的创造性的因素。否定的否定规律是真正现实的创造性的规律，实质上是自己发展和自己运动的规律。此外，涅德里科维奇在这里还探讨了辩证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遵照列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宁的教导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作为统一的哲学科学。再次，他研究了实践和理论、主体和客体、辩证方法、真理和谬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感性、直觉和理性的认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概括等思维方法，并且对这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后，在“历史述评”中已经显露出涅德里科维奇早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从导论“能动性和能动性”直至正文他都肯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能动性、实践、异化、道德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观点在现代思想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述评”中，涅德里科维奇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哲学史、价值论、伦理学、美学、语义学等方面的问题。涅德里科维奇的“历史述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发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涅德里科维奇在《黑格尔辩证法》一书中所作的“历史述评”，既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当时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虽然书报检查官已从他的“历史述评”中删去许多重要论述，它还是比同时代的著名的苏联哲学家，例如Б.阿多拉茨基、М.米丁等人的著作高出一筹。1939年，著名的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托·巴甫洛夫承认，在涅德里科维奇的这一“历史述评”中包含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奠基人和他们的后继人，以至各种各样的黑格尔著作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迄今为止所说过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在这一“历史述评”中，涅德里科维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并且作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超出一般水平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答案。他

的“历史述评”扼要地如实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以涅德里科维奇这一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引为骄傲。在30年代末，涅德里科维奇还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涅德里科维奇当时的著作在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中以及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总之，涅德里科维奇在战前的著作理应得到高度评价。因为他的批判性的著作和正面解决哲学问题的著作，如同奥格宁·普里查和西马·马尔科维奇的著作一样，达到当时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虽然他的著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定的阶段的特定需要而写的，但是即使是在现在也并未丧失其现实性、科学上的正确性和价值。涅德里科维奇关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质和关系的见解，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观点，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理论宝库。因此，涅德里科维奇在60年代正确地决定重新出版他以前写的一些著作，以便当代南斯拉夫的广大读者能够掌握他长期研究的学术成果。

1941年，涅德里科维奇投身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斗争，并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从此，涅德里科维奇作为名符其实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战士和共产党人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为争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浴血奋战，并且在哲学理论战线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人

民解放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创造性发展而斗争。1941—19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党的机关刊物《战斗报》创办时，涅德里科维奇就任编辑，在铁托和卡德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战斗报》第1期上发表了铁托的文章，在《战斗报》第2期上刊登了卡德尔的文章，都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的基本思想。涅德里科维奇长期以来都把唯物辩证法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统一视为南斯拉夫优良的革命理论传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经过艰苦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涅德里科维奇写过许多哲学理论著作，为创立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可惜许多手稿丢失了。此外，涅德里科维奇编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6卷本中的《列宁文选》（1943—1944），为列宁哲学思想在南斯拉夫的传播作出自己的贡献。列宁著作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克敌制胜取得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斗争彻底胜利的思想武器，它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基础。

## 二、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培育一代新人

1945年南斯拉夫解放后直至1953年，涅德里科维奇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的哲学教授和哲学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培养出一

大批著名的当代南斯拉夫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1945年至1950年，南斯拉夫哲学史家一般称之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南斯拉夫人民刚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年，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在南斯拉夫影响很大。大量翻译出版苏联哲学理论著作。在苏联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在哲学教学和宣传上产生了片面的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的倾向。许多人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或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忽视对人和人类解放这一哲学的中心问题的研究。涅德里科维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从苏联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讲授逻辑学、认识论和哲学史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实践这一点注意得不够。一方面只看到自然和它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只看到作为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的思维，而忽视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思维的影响。

在战后初期，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忙于确证战争暴行的全国委员会的社会工作，很少有时间从事哲学理论研究。但是，他毕竟还是写了一些有影响的哲学论著，主要的是一些介绍列宁哲学思想和现代苏联哲学的文章。例如，他1945年1月在《呼声》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人民自由的战略家》的论文。在这里，他对列宁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在论文中他指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证方法，把它提高到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相适应的崭新的阶段，创建了新型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拓了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人民自由的广阔道路。因此，列宁被人们看作是当代人民解放的伟大的战略家。

1948年，涅德里科维奇写了《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哲学》一文，刊载在《哲学论文集》中。他在论文中尖锐批判了B. 彼特洛尼也维奇、A. 帕查尔、П. B. 帕弗洛维奇、B. 德沃尔尼科维奇以及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力图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影响。这是战后最初年代里批判战前旧南斯拉夫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有影响的好文章。

1948年和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错误决议，标志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彻底决裂。南斯拉夫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对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展开批判。这一点自然反映到涅德里科维奇后来的著作中。1949年1月24日，涅德里科维奇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列宁论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论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列宁那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一步发展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新的观点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力。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大地推进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等等。涅德里科维奇强调，列宁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具体地加深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辩证统一的理论。因此，

列宁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观点，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它加深了个别的事实同它们的一般规律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涅德里科维奇在其论文中阐发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观点。普遍本身就是和个别和特殊不可分割的具体的联系或规律性。所以，抽象地理解的普遍就将是毫无生气的教条。显然，涅德里科维奇抓住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作文章，矛头是指向教条主义的。

涅德里科维奇认为，列宁的创造性新思想在于把一般和特殊辩证地、具体地和有效地转变为个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现代的具体条件下。他特别着重说明列宁怎样在革命实践中具体运用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辩证统一的原理。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卓越的见解，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特殊地、独特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在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只有从客观的个别和特殊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理解和运用某些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才能实现具体的领导。

显而易见，涅德里科维奇抓住列宁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观点作文章，强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创造性的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这是有其重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众所周知，涅德里科维奇的论文《列宁论一般、特殊和个别》是在1948年南斯拉夫同共产党情报和苏联决裂后写成的。它试图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道

路是有科学理论根据的、站得住脚的,指出斯大林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公正的。在这里,涅德里科维奇从原则上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教条主义的界线。他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统一这一命题,后来成为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博士论文的题目,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1950年1月24日,涅德里科维奇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捍卫列宁的辩证逻辑》的论文。他在这里坚持列宁的辩证逻辑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在苏联流行的背弃辩证逻辑的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观点。在他看来,逻辑作为最一般的行动指南,应当由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构成。它们是辩证地紧密地相互联系的两门学科。一方面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科,它愈益深刻地揭示具体的真理,即自然和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并且越来越有力地掌握它们。另一方面是关于自然和社会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性的学科,即客观逻辑,它在实践基础上,并通过实践来检验思想的正确性、真理性。

涅德里科维奇强调指出,主观思维的逻辑如果脱离它的基础——客观事物的逻辑,就不可能存在,这正如没有主观思维的逻辑就不可能自觉地、能动地和革命地发现和利用客观事物的逻辑一样。主观思维的逻辑以其基本的一般辩证规律反映事物本身的基本的一般的客观规律。这两种逻辑紧密联结在一起,辩证地构成活生生的、客观的、实践的、合乎规律的、革命的、创造性的逻辑,即唯物辩证法,一般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没有内容也就没有形式。离开客观逻辑的坚实基础,纯粹的形式逻辑就变成最纯粹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涅德里科维奇明确表示,没有抽象的纯粹形式的逻辑,而只有具体的有内容的有实效的逻辑这一思维方法

论,它同实验、研究、检验和证实真理的方法论是不可分割的。

在涅德里科维奇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客观逻辑及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列宁又进一步发展了客观逻辑。所谓主观逻辑同客观逻辑是统一的,它建立在自然和社会中起作用的一般辩证规律的基础上。而研究、检验和证明具体真理的思维和实验的特殊规律尚未系统研究。

涅德里科维奇批判了苏联逻辑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指出: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数十年来,把思维逻辑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禁止。直至希特勒进攻苏联期间,才感到需要思维逻辑,开始编写包括关于概念、判断、三段论法和诡辩论的学说的初级逻辑教科书,而书中又根本不谈辩证法,导致编写工作未能成功。所以,只得重新出版革命前问世的切尔潘诺夫的形式逻辑参考书。这本书同许多类似的资产阶级逻辑学教科书没有什么区别。在战后,除了切尔潘诺夫的逻辑学一书之外,还出版过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维诺格拉多夫编写的中学逻辑教科书和阿斯穆斯的大学逻辑学教科书。这本书同切尔潘诺夫的逻辑教科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阿斯穆斯在其大部头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公开主张同“辩证逻辑”相分离、同任何辩证性相分离的“纯粹形式的”逻辑。这就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逻辑问题的思想。1947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阿斯穆斯编写的大学逻辑学教科书中写道,此书只探讨形式逻辑,不谈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因为研究这一问题,并不是形式逻辑的目标,而是辩证逻辑的目标。可见,这种纯粹的形式逻辑不是辩证的,辩证法在它那里没有地位。著名的逻辑学家斯特

洛科维奇和维诺格拉多夫等人的观点也同阿斯穆斯的观点相同。在涅德里科维奇看来,这就是苏联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

1941年出版的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把逻辑定义为纯粹的形式逻辑。涅德里科维奇认为,这是最纯粹的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简明哲学词典》中写道:“这种逻辑所感兴趣的不是物质的真理(思维对自然现象的正确反映),而是形式的真理(符合逻辑规则)”。这一苏联标准的哲学百科词典,得出最纯粹经院哲学的和唯心主义的结论:逻辑仅仅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则,同现实本身没有任何联系。它说:

“形式逻辑研究人的判断、推理的各种形式,仅仅对判断推理形式上是否符合逻辑规则感兴趣”,“形式逻辑所制定的规律和范畴并不符合客观现实”。在涅德里科维奇看来,这是赤裸裸的形式主义。苏联哲学家从阿斯穆斯到尤金在形式逻辑问题上都陷入最纯粹的形式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泥潭。因为他们完全把思维逻辑同自然和社会的逻辑、事物的逻辑、现实分割开来,形而上学地把它看作是某种纯粹的抽象思维的自我等同,同自己的规则的某种纯粹的符合。这样一来,尤金等人就背离辩证法。他们关于“思维逻辑研究某些纯粹形式”的不符合宏观现实的规律和范畴的说法,同天主教哲学家的说法同出一辙。涅德里科维奇认为,它是完全背离列宁关于辩证逻辑的思想的。

关于列宁的辩证逻辑思想,涅德里科维奇作了正面的说明。他指出,列宁要求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从叙述客观辩证法本身,事物的逻辑开始,同时叙述思维的逻辑。这是因为在思维逻辑中以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形式揭露客观逻辑的辩证规律本身,客观事物的最一般的辩证规

律本身。列宁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指明，叙述具体的辩证逻辑本身要求直接从辩证地叙述最简单、最常见的现象开始。这也是思维的逻辑本身，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本身。在批判苏联哲学界流行的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时，涅德里科维奇力图阐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一文和在后来论述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涅德里科维奇强调，要遵循列宁的教导来发展逻辑、辩证法，不可分割地辩证地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在逻辑学研究中坚持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在涅德里科维奇看来，正是列宁论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为辩证逻辑的研究和进一步发展指出光明大道。逻辑学研究只有沿着列宁指明的道路前进才不会迷失方向。而某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列宁指明的道路，从而在逻辑学和辩证法研究上就陷入新实用主义的泥坑。

涅德里科维奇高举“捍卫列宁的辩证逻辑”的旗帜，公开地尖锐批判苏联当代哲学家在逻辑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

涅德里科维奇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对后来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可以在他的助手和学生舍希奇的《逻辑学》系列著作，斯托伊科维奇《列宁论形式逻辑》中，和在马尔科维奇的博士论文中看到涅德里科维奇的思想影响。

### 三、两条战线作战方针，构建 唯物辩证法体系

50年代，这是南斯拉夫哲学史家称之为“返回到本来意

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制订新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时期”。经过1949年在一些工厂试行之后，在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基本法”，明令实行工人自治，后来逐渐发展成自治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51年是南斯拉夫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1951年3月，在涅德里科维奇教授首倡和直接领导下，举行了塞尔维亚哲学协会成立大会，会上确定了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反对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方针和构建唯物辩证法科学的任务，开创了反对苏联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创建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的新时期。

塞尔维亚哲学协会是新南斯拉夫所创立的第一个哲学协会。涅德里科维奇教授为筹建塞尔维亚哲学协会付出了大量劳动。他亲自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主旨报告。这个报告1952年在贝尔格莱德印成小册子问世。涅德里科维奇在这一报告中提出在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又反对苏联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方针。这是南斯拉夫哲学界第一次公开打出反对苏联哲学中的教条主义的旗帜。涅德里科维奇教授精心安排他的得意门生，年青的哲学助教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在塞尔维亚哲学协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正》的报告，同时安排德拉甘·耶连米奇作了题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具体体现了涅德里科维奇关于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方针。后来，米哈伊洛·

马尔科维奇和德拉甘·耶连米奇都成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实践派”即人道主义派的主将。有的人因此就说马尔科维奇他们的报告同涅德里科维奇当时的报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马尔科维奇和耶连米奇还是未成名的年青助教，如果没有得到涅德里科维奇这个哲学界的权威的嘉许是不可能上台作这种报告的。应该说这两位青年的报告是他所认可的。

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在其报告《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谈到列宁1904年在《工人日报》上“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当今哲学的任务”后，接着把建构具体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的任务提到南斯拉夫哲学工作者面前。这在当时和以后几十年都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涅德里科维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哲学家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哲学任务就是“建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sup>①</sup>。他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当由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其他革命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正在建构的科学，变成为已经建构成了的科学，有牢靠的事实根据的和全面系统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sup>②</sup>。涅德里科维奇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鲜明地显露出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的报告是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批判教条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没有谈到人和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

<sup>①②</sup> 杜尚·涅德里科维奇：《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贝尔格莱德1952年版第104、108页。



哲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

诚然，涅德里科维奇在自己的报告中，一如既往高度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他认为列宁特别重视辩证法，把它看作是万能的科学的方法，把唯物辩证法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列宁教导说，有必要考虑到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意识因素上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和实际的唯物辩证法。涅德里科维奇要求建构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结合当代具体条件加以创造性发展。这里他还停留在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之内，从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和解释唯物辩证法以及它的“创造性发展”。涅德里科维奇的报告尚未完全摆脱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正统派哲学家忽视人、人的实践和历史的辩证法，忽视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倾向。

应该肯定，涅德里科维奇在塞尔维亚哲学协会成立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打出批判苏联哲学中的教条主义的旗号，这对于推动南斯拉夫哲学家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探究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开拓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是有积极意义的。涅德里科维奇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很不幸，涅德里科维奇却遭到不公正的过火攻击，被当作苏联教条主义在南斯拉夫哲学界的代表人物来批。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理论宣传界首脑米洛凡·吉拉斯对涅德里科维奇的题为《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报告进行了猛烈攻击，认为涅德里科维奇这样提出方针任务是错误的、失策的。吉拉斯在1953年《新思想》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涅德里科维奇教授的两面“哲学”的

作用》的文章，指责涅德里科维奇对当前哲学界的任务提得不合适。关于这一点，他写道：“这样的任务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完成过，因为它本身是荒谬的——因为运动着的东西和承认矛盾是一切事物本身和它们自身的基本规律，是不可能成立的。我说过，这个任务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干过，除了斯大林和这位杜尚·涅德里科维奇之外”<sup>①</sup>。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在吉拉斯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53年离开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讲坛，转到贝尔格莱德大学电工系任教。历史证明，涅德里科维奇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的。吉拉斯在文章中不单单是批判斯大林和涅德里科维奇，而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大家知道，1954年1月，南共联盟清算了吉拉斯的错误，拨正了航向。

涅德里科维奇教授离开哲学系讲坛后继续致力于对“列宁和当代哲学”、“唯物辩证法”命题的研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1957年论述《列宁和文化革命》的文章和发表在贝尔格莱德《哲学评论》杂志上的论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经典著作，而且是指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成了他们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武器的学说。列宁对文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创建和发展起了杰出的作用。列宁教导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所创造的文化并对它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

<sup>①</sup> 米洛瓦·吉拉斯：《涅德里科维奇教授的两面“哲学”的作用》，《新思想》1953年第1期第61页。

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不应该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关于共产主义的浅薄小册子中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千百万劳苦大众创造性的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只有继承和发扬两千多年来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最坚决地反对那种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的错误倾向，反对与世隔绝、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涅德里科维奇给以很高的评价。

涅德里科维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从两千多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斗争史的高度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革命意义。涅德里科维奇在文中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全面性、具体性和彻底批判性，反对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直线性和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已成为人类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强有力的指南。列宁说过，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万能，就因为它正确。唯物辩证法成为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科学指南。

1958年4月22日至26日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为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明发展方向，《南共纲领》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生生的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彻底解放。

1959年，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在贝尔格莱德“弗拉查尔”人民大学讲授哲学课，作了题为《唯物辩证法——工人阶级世界观》的专题报告，大力宣传《南共纲领》的基本观点，扼要地讲述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涅德里科

维奇讲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作中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本质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的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同以往一切旧哲学根本区别的道理。涅德里科维奇援引马克思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以往旧哲学的根本之点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涅德里科维奇联系本国实际得出结论说，唯物辩证法也是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中“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

1959年，涅德里科维奇还在“科拉尔切夫”人民大学讲授哲学课，专题讲述《为揭示事实和创建唯物辩证法而斗争》的命题。他坚持一贯的看法，把唯物辩证法视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提法，谈到唯物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面渗透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总之，他坚持研究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问题，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尚未予以足够重视。

在50年代，涅德里科维奇在塞尔维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四本专著《艺术家伦理学家达·芬奇》（1956），《艺术家美学家达·芬奇》（1957），《贝尔热拉克和他的乌托邦“另一个世界”》（1957），《博希科维奇的“新世界”中的运动和相对性》（1958）。在涅德里科维奇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直接培养或思想影响下，新一代哲学家成长起来

并取得重大成果。1951年弗兰尼茨基通过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一般、特殊和个别》，斯托伊科维奇通过博士论文《列宁论形式逻辑》。维里科·科拉奇1952年通过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的社会学》。此外，拉德米拉·莎伊科维奇在1953年通过题为《笛卡儿的自然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以及辩证法在其中的发展》的博士论文。1953年，弗兰尼茨基出版了译著《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和专著《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发展》。1955年，博格丹·舍希奇通过博士论文《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通过博士论文《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1957年，加约·彼特洛维奇通过博士论文《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博格丹·舍希奇连年出版了《辩证逻辑导论》（1957），《逻辑学》第一册（1958），《逻辑学》第二册（1959）。1958年，弗兰尼茨基还出版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在50年代，南斯拉夫哲学界开始两极分化。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和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与正统的本体论主义派相对立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涅德里科维奇培养出来的许多高材生也成了人道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派由于受涅德里科维奇的影响，并没有抛弃对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他们同萨格勒布人道主义派的细微差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是涅德里科维奇的得意门生，成为贝尔格莱德大学人道主义派代表人物后也没有放弃对逻辑学认识论的研究。1955年他的博士论文《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正是涅德里科维奇研究的命题，其中也体现了涅德里科维奇

批判现代逻辑学中形式主义的思想。自然，马尔科维奇在论文中提出对“反映”范畴的怀疑，萌发了人道主义派的观点。关于“反映”范畴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他写道：“反映”这一术语不是特别幸运的，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它：

（一）不是指对现实的消极的、纯粹直观的反映……（二）不是指简单的摹写、复写、映象等等。只有这一术语能够摆脱自身庸俗的比喻的内容，即性质上是素朴实在论的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才可以谈到反映”<sup>①</sup>。

#### 四、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 支持《辩证法》

60年代，南斯拉夫哲学史家称之为人道主义时期，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占压倒优势。在1960年11月举行的题为《实践、主体、客体、反映问题》的著名的布莱德学术讨论会，标志着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在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战胜了本体论主义派，从此占据了统治地位。只有少数人仍旧维护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涅德里科维奇在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上坚持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捍卫唯物主义反映论，从而成为南斯拉夫“辩证法派”即本体论主义派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涅德里科维奇并没有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只是他在讨论时发言尖锐批判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对四个哲学范畴的排法。他声言，“把实践问题摆在第一位，而把主体摆在第二位”，然后，客体摆在第三位，把

<sup>①</sup> 《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文化出版社1957版第34页。

反映摆在第四位,这种排列顺序是不能接受的。马尔科维奇的主旨报告《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加约·彼特洛维奇的报告《真理和反映》,米兰·坎格尔加的报告《关于反映论的某些根本问题》,都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尖锐批评了直观静止的反映论观点。它们对于涅德里科维奇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涅德里科维奇说,“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甚至把实践当作基本范畴,在本体论上从实践中引申出其他一切,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立场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sup>①</sup>。涅德里科维奇坚定地宣称,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原理,这也是对待每一个问题所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即历史的——认识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方式。那些辩证法的普遍形式和规律象一根红线贯穿马克思对自然、社会、心理和经济等等事实本身的实际研究活动。涅德里科维奇在反对“实践派”的上述立场的同时,维护斯托伊科维奇的题为《反映问题》的报告中所持的基本观点,认为斯托伊科维奇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其他科学出发正确地说明了反映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其实,斯托伊科维奇在其题为《反映问题》的报告中把反映看作认识论的泉源、本质和界限的基本问题,见物不见人。诚然,在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上,涅德里科维奇在捍卫反映论时更多地注意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不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从而忽视了社会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础的作用,忽视了作为实

<sup>①</sup> 涅德里科维奇的发言:《反映论的若干问题》,布莱德1960年11月10—11日第100—102页。

践存在物的人和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从1963年起，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哲学家主办名为“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哲学年会，讨论当代社会政治哲学中的问题。1964年，人道主义派在萨格勒布创办了《实践》杂志，其宗旨是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以当代世界和今天的人为研究对象，因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人。主张对现存的一切毫不留情的进行批判。不仅是研究哲学，而且要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现实问题。从此，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派因《实践》杂志命名为实践派。

《实践》杂志发刊词成了实践派的纲领。1967年，南斯拉夫哲学协会机关刊物《哲学》杂志编委会改选后，也为实践派所掌握。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是该杂志编委。实践派在哲学理论界占据统治地位。本体论主义哲学家全部退出了哲学协会。他们在60年代期间在哲学界只起微小的作用。

在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以后，在60年代，经过长期研究和深入思考，涅德里科维奇的理论观点有很大变化，逐渐认识到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性。1960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实用主义和辩证法》一书，坚持唯物辩证法立场，批判实用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1961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卢切尔·博希科维奇在他那个时代和在现时代》，萨格勒布前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哲学史专著《拉美特利》一书。1963年，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涅德里科维奇的两本书《冯特涅尔》和《恩格斯在当今时代》。同年12月17日至21日，在贝



尔格莱德—阿兰哲洛瓦茨举行了《马克思和现时代》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涅德里科维奇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辩证法科学、怪影和现在对我们社会、人和世界的改造》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马克思辩证法科学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作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承担者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手中的解放斗争和创造活动的武器，也是今天对南斯拉夫社会、人和世界改造的创造性的指南。

1964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伦理学专著《苏捷斯卡伦理学》。1965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哲学史方面的著作《霍尔巴赫》。1965年12月21日至24日，在萨格勒布—奥帕迪耶举行的《马克思和现时代》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涅德里科维奇作了题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研究辩证规律的方法和它的意义》的报告。他在这个学术报告中指出，理论思维的最根本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改造。他在这里肯定，最广泛和最深刻地理解的人改造自然的“革命实践”，乃是一切人的认识的基础、出发点、源泉和归宿。这种观点已大大超出了他在1960年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上支持的斯托伊科维奇《反映问题》报告中的观点。显而易见，涅德里科维奇在这里开始注意到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的认识的决定意义，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辩证法的存在的一贯立场。

毫无疑问，1966年《辩证法》杂志的创办是得到涅德里科维奇支持的。这一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即本体论主义派哲学家创办了着重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杂志

《辩证法》，编辑部就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自然科学数学系。长期以来，安德列耶·斯托伊科维奇当责任编辑，布拉迪斯拉夫·彼特洛维奇任学术秘书。本体论主义派因《辩证法》杂志得名“辩证法派”。涅德里科维奇是辩证法派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为《辩证法》杂志的编委之一。在1966年《辩证法》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辩证法、现代自然科学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文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贯立场，既强调唯物辩证法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又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来证实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他在论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南斯拉夫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本质特点不仅在于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在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科学本身的根本的革命变革。涅德里科维奇力图引起人们注意创造性地发展具体辩证法的一个崭新的领域，为探索现代自然科学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辩证规律开拓前进的道路。1967年《辩证法》杂志上又发表了涅德里科维奇的一篇文章《论新的辩证的差别性和统一性》，进一步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涅德里科维奇在文章中介绍了1966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题为《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国际学术会议概况，对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哲学家和南斯拉夫哲学家学术观点的异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术论争有利于辩证法的创造性的发展。涅德里科维奇是一位哲学理论造诣很深的教授，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比起他的学生，《辩证法》杂志的责任编辑安德列耶·斯托伊科维奇来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所以，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著名的代表人物如弗兰尼茨基和马尔科维

奇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同他有一定的分歧，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总是抱着尊敬老师的心情提到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充分肯定他的学术成就。

在60年代后期，涅德里科维奇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都一再肯定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的现实基础，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人道主义性质的统一。1968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科学事业出版社出版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和当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的专著，致力于实现唯物辩证法人道主义化和当代人道主义辩证法化。在谈到统治着整个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时，涅德里科维奇列述了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最普遍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量变质变相互转化规律和否定的否定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揭示了“自己运动”及其“动力”、源泉和一切运动与发展的动因。量变质变规律说明对立面斗争引起的运动由量变的渐进过程进展到质变“飞跃”，向对立面转化和新东西的创造性的生成。最后他说明否定的否定规律：任何对象在它所具有的诸对立面中，已经包含着对自己的内部诸否定的否定，必然要超越自身达到新质的东西的发展这一自己运动发展的过程。涅德里科维奇在这里从唯物辩证法立场出发肯定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统一性的做法同马尔科维奇等人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出发致力于人道主义辩证法化和唯物辩证法人道主义化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1969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科学事业出版社出版了《列宁和哲学》一书。全书除“导论”之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宁和辩证法”；第二部分：“在我国革命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第三部分：“列宁和当代哲学”。这本书收集了他以往数十年哲学研究的精萃和新近的学术成果，很能反映涅德里科维奇哲学研究的大思路。在“导论”中他谈到列宁和哲学；列宁、十月革命和思想、行动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等问题以及列宁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关于列宁和辩证法，涅德里科维奇谈到一系列唯物辩证法问题，诸如：当今列宁和黑格尔辩证法问题；辩证过程和辩证方法；作为科学的辩证法；辩证法与进化；因果性、相互作用，发展，人的行动和创造性的意识；假象、现象，现实，存在和本质；规律；规律性、必然性和范畴；利益和意识；矛盾性、两极性和运动；多样性、矛盾性、否定和“自己运动的脉搏”；“自己运动”；自在世界，现象世界，本质世界和为我世界；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和理论与实践；扬弃和否定的否定；存在，非存在和定在；发生和存在；否定和作为某种创造性的和肯定的东西的否定的东西；辩证法，否定和终极性；理想和理想之变为现实；个别、特殊和一般；列宁和进一步发展辩证法的必要性。可见，涅德里科维奇对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思路是比较广泛，力图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论述的。他肯定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规律包含现象和世界本身、真理本身的本质的和具体的关系。涅德里科维奇肯定，“事物中最深刻和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作为具体确定的两极性的矛盾性”，这是一切运动和任何生命的源泉。他毫无保留地肯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的提法，肯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同时，涅德里科维奇在《列宁和哲

学》一书中也认为，有必要正确地评价技术因素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并从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问题。列宁认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正是问题的这个本质方面普列汉诺夫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等等。涅德里科维奇意识到，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作为辩证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要素提出来的，具有积极意义。

1969年，涅德里科维奇还在贝尔格莱德科学事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伦理学》第1卷。在该书中他强调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着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还谈到劳动的异化和消除异化的过程，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个性才能得到全面的解放和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出涅德里科维奇加强了对当代世界人类命运的研究，关心人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这是辩证法派哲学研究的新动向。只有克服本体论主义、认识论主义的片面性和实践主义、人道主义的片面性，朝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的方向发展，才能实现团结进步。涅德里科维奇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 五、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

在70年代，涅德里科维奇致力于巩固他在60年代中开始

形成的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统一的基本思想，超越“辩证法派”本体论主义的狭隘框框。在这一点上涅德里科维奇是比他的徒弟南斯拉夫“辩证法派”的主将安德列耶·斯托伊科维奇要高明的。1970年，为纪念布莱德会议10周年，斯托伊科维奇在《辩证法》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今日的反映论》和《反映和实践》，重弹他在10年以前的老调。他写道：“反映是反映和实践这两极中在起源因果关系上第一性的方面。……如果不是从反映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就不可能达到客观真理。”<sup>①</sup>和斯托伊科维奇的片面观点不同，涅德里科维奇在选择研究命题和形成理论结论上都努力克服本体论主义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在70年代上半期，涅德里科维奇就出版了一些探讨美学、伦理学、哲学史、辩证法和人、人道主义的著作。先后有：《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的美学原理和现代美学的前景》，《伦理学》第2卷和哲学史专著《斯多葛主义》，哲学史著作《从赫拉克利特到涅科希和斯维托查尔》，《论超越》，《涅科希——解放的人道主义哲学家》，《科斯塔·拉辛——革命诗人》，评述南斯拉夫理论家的《奥格宁·普里查、维塞林·马斯列沙、伊沃·洛拉·里巴尔》，哲学专著《直觉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和辩证法》，《在我们时代的文化革命中乌克和人民的创造性》等。仅就70年代上半期的研究命题和问题范围来看，涅德里科维奇的研究活动远远超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围，涉及到许多哲学领域和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自然，并不是说他不再支持“辩证法派”了。1971年，《辩证法》杂志成

<sup>①</sup> 斯托伊科维奇，《反映和实践》，载《辩证法》杂志1970年第3期第30—31页。

立了由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组成的44人的编委会，在1975年，编委会成员又扩大到48人。涅德里科维奇，鲍里斯·齐赫尔，博格丹·舍希奇，德·列科维奇，格·萨耶查兰诺维奇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是《辩证法》杂志编委会成员，基本观点上是接近斯托伊科维奇的。当然涅德里科维奇的理论水平是远比斯托伊科维奇高明的，他注意汲取人道主义派的理论上的长处和克服自身的弱点，力图在科学上达到认识的全面性的“逻辑要求”。

涅德里科维奇在其1974年问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和辩证法》中坚持认识和实践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的基本思想。除了“绪言”之外，他在书中论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科学和在1919年以前的塞尔维亚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前景；巴黎公社和斯维托查尔·马尔科维奇对塞尔维亚社会主义传统的发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规律性；能动的唯物辩证法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社会主义科学和20世纪的创造性预见；列宁——革命家和哲学家；约瑟普·布洛兹·铁托和事业中的辩证法，等等。涅德里科维奇在书中肯定，在实践中人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乃是人认识世界的能动活动的现实基础。在这一著作中，涅德里科维奇坚持认为思维和自然、观念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乃是任何哲学、科学和人的认识的基本问题。同时，他在书中又强调指出，正如迄今为止的一切唯心主义局限于意识那样，迄今为止的一切古典唯物主义本身局限于片面的

和抽象的自然主义关于自然界的一切的理论……。但是，人在实践中改变自然的本身每天都在实际地解决关于思维和自然的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科学的和一般认识论的问题。

1974年，涅德里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科学事业出版社出版的《直觉主义和辩证法》一书，是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著作。在书中他尖锐批判了昂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原理和揭露了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内在矛盾，指出直觉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和它对社会的危害性。

1975年，穆罕默德·菲利波维奇教授在萨拉热窝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一书，对最近10年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了恰如其份的介绍。他在这一著作中谈到1964年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直至1974年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当时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同当时南斯拉夫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进程是一致的。这表现在如下几个基本方面：1. 继续有系统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2. 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斗争；3. 为人道主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自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4. 对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批判；5. 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sup>①</sup>作者毫无疑问是肯定大多数“实践派”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是符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总进程的，实践派作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主流派的理论纲领是反映当时南斯拉夫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的。至于涅德里科维奇，虽然他所属的“辩证法派”即使在这10年间也并不占统治地位，但就涅德里科维奇本人在这10年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活动的大思路来看，



应该公平地说，是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一致的，和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实践的总进程是一致的。

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遭受重大挫折，这也并没有动摇涅德里科维奇哲学思想继续朝着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观点这个大方向发展。1975年1月，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解除了在6年半以前支持过学生闹事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8名实践派教授和职员的教学。不久之后，实践派的杂志《实践》和《哲学》相继停刊，实践派主办的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国际哲学年会也停止活动。实践派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就其人数和实际影响来说，依然占优势。实践派宣传的基本观点因为切中时弊而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涅德里科维奇教授也接受了实践派人道主义的某些观点，并且把它们同自己一贯坚持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协调起来，统一起来。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1975年涅德里科维奇还在贝尔格莱德科学事业出版社出版了他论述实践的辩证法的著作：《斯维托查尔·马尔科维奇在事业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马尔科·多米尼奇在事业上的科学和空想》、等等。

1975年11月，卡德尔在“铁托政治学校”建校典礼上发表题为《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讲话，在批评一些人对实践的错误看法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首先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作为历史过程的实践是人对自然的能动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和精神观念的物质基础。同时他又阐发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质。最后，卡德尔给理论研究指明方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南斯拉夫和当代一般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

来；不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也要对南斯拉夫日常的社会实践和一般的社会主义实践持批判的态度。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工人阶级及其政权所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卡德尔在这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无疑涅德里科维奇教授是完全接受的，并且努力把它贯彻到后来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去。

70年代下半期，涅德里科维奇教授加强了对当代世界、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他的实践观同大多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实践观进一步趋于一致。1976年，涅德里科维奇出版了他的专著《世界、人和人性》。在这里可以看出，他已把当代世界、人和人性这一命题当作主题来研究了。在这一专著中他强调指出，只有在实践中人改造世界的活动，才是解决世界和历史的一般哲学问题，或者人的本性和世界本身问题的出发点。为此，涅德里科维奇探讨了一系列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论题，诸如：人改变世界；统一规律问题；人民的经验和科学的经验；人和人的东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规律性；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规律来看当代世界和人民共同体和国家的建设；文明、文化和人性；现代的世界观和自治自由的人道主义，等等。涅德里科维奇在这里明确意识到，世界和历史、世界和人的本性问题的已作为一般哲学问题提到当代哲学家面前，作为实践的存在物的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心问题，而实践作为人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使哲学家得以超越自己特有的、常常是片面的和抽象的观点，形形色色的哲学上的“主义”的狭隘界限的根本出发点。他强调指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只有

在完整地理解任何人的创造性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通过把自在的客观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客观的东西，自在的客观的东西才是可以理解的。

1976年，涅德里科维奇出版了他的专门论述科学实践的辩证法，人的创造性科学事业发展的辩证法的大部头著作《科学家的科学创造和个性在科学事业中发展的辩证法》，用具体的事实阐明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和人的实践活动一致的主题。他谈到一系列著名的科学家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和他们事业的辩证法。在这里谈的完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而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辩证法。除了“绪言”之外，涅德里科维奇在书中列述了人的事业的辩证法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哥白尼在我们世界观发展中的革命活动和事业；伽利略，归纳分析和人的本质；约翰·凯卜勒的伦理学、方法论和哲学三方面的前景；马林·格达尔吉奇对现代方法论的革命性发展；莱布尼茨，哥斯波佳·吉·沙铁列和卢泽尔·博希科维奇论连续性；卢泽尔·博希科维奇——原子能专家和相对论的奠基人；卢泽尔·博希科维奇论哲学和科学中的矛盾性；卢泽尔·博希科维奇论归纳；米哈伊尔·彼特洛维奇自然哲学的各个阶段和发展前景；茨维伊奇的科学著作中基本的方法论转变；伊万·彼特洛维奇·巴甫洛夫的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研究自然规律性的方法和它的意义；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辩证法和物理学；关于新的创造性的辩证的统一性和差别性；关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泰斯拉的伦理学规范，等等。在这部专门论述革命实践和科学认识的辩证法的专著中，涅德里科维奇十分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同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实

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实用主义等等哲学流派的原则界限。在这里他坚持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概念和实践概念统一的基本立场。

1978年，铁托在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社会主义也就是解放劳动和工人阶级、解放个性的历史性进程，是人成为自己生活和劳动的真正主人的过程”。1979年，涅德里科维奇在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论述“同一、差别和矛盾在具体辩证法中的地位”时，也着重论述实践的辩证法，紧紧抓住人这一中心问题。他强调必须遵循通过具体的“扬弃”来解决具体的“难题和矛盾”的准则和方法，领会“扬弃”范畴，才能抓住当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创造性思想的辩证核心，抓住关于实现自由、进步、和平和所有人的幸福这个创造性思想的辩证核心。他完全肯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的卓越见解：人的思维之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而不单纯是自然本身。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在实践中，通过人类改造世界的主客观两方面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三个辩证法基本规律就是具体的和实践的辩证法的最一般规律。他强调“扬弃”范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重要性，以此说明人改造世界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过程。

## 六、人道和科学的统一， 团结合作的基础

8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自治建设

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当代世界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迫切问题的研究，这是铁托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时期的新动向。涅德里科维奇的学术研究活动自然也体现出这一新动向。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加强团结，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实现和解和合作，共同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寻求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这是80年代南斯拉夫哲学界出现的可喜的新局面。涅德里科维奇作为德高年迈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的团结合作、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费尽心血，作出积极的贡献。

涅德里科维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统一，这一基本思想成了南斯拉夫“辩证法派”即本体论主义派同“实践派”即人道主义派走向团结合作的思想基础。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11月3日，涅德里科维奇院士，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率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院士教授们在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同来访的第一个中国哲学工作者代表团会谈。在这次友好会谈中，涅德里科维奇首先发言，介绍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其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道主义性质的统一。他回顾了从斯维托查尔·马尔科维奇等革命先驱在南斯拉夫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直至现在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和科学的世界观，长期以来就是南斯拉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指南。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所

领导的人民解放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优良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指出，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当今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涅德里科维奇既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和科学的哲学的本质特点，又把它看作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良经验和自治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他遵照铁托的教导强调指出，实现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的目的是尊重人，谋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使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充分发挥创造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翁。在这次会谈中涉及知识分子政策和如何看待实践派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卢基奇强调指出：南共联盟纲领和宪法中明文规定科研自由，党和政府不干预哲学理论领域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卢基奇认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人类解放乃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他还批评了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哲学界某些人忽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的本体论主义的倾向。

给1975年1月解除教职的“实践派”教授重新安排工作，这是实现南斯拉夫哲学界的团结的重要步骤。1981年3月，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柳博米尔·达迪奇，米拉丁·日沃迪奇，斯维托查尔·斯托杨诺维奇，萨戈尔卡·戈鲁博维奇，德拉戈柳卜·米丘诺维奇等人被重新安排在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这是铁托在逝世前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的重要的决策。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正常开展创造了良好气氛和现实条件。马尔科维奇作为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通讯院士和世界上著名的哲学家，经

常随同涅德里科维奇院士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马尔科维奇的大部头的科学哲学巨著《科学的哲学基础》得到涅德里科维奇院士等人的肯定评价，并在1981年出版。书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实践是科学认识的基础的立场。他在书中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价值论三者辩证统一的观点。

1981年在察夫塔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圆桌会议上以“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和发展战略”为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同年，亚·格尔利契科夫根据讨论的成果出版了他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他在书中论述了当今时代的状况，作为世界性进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自治在世界性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地位，不结盟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基本问题。这些80年代初哲学界出现的大事，反映了8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和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界的新气象。

1982年，涅德里科维奇出版了他的两部哲学专著《辩证法》和《哲学史》，充分显示出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的研究上寻求人道和科学的统一性的理论和历史根据的努力。涅德里科维奇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有深远意义的方面就是他对中国和印度这些东方国家传统的哲学思想的关注和悉心钻研。在这两部著作中，涅德里科维奇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本质来阐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另一方面力图从古代东方哲学思想中寻找出唯物主义决定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统一的证据来。涅德里科维奇

和著名的逻辑学家舍希奇一样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是素有研究的。涅德里科维奇和现代许多西方哲学家一样,对老子的“道”和孔子的“仁”的观点以及它们的关系流露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对道家和儒家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的了解。涅德里科维奇和舍希奇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都谈到过,在古代东方哲学中,不论是在古代中国哲学还是古代印度哲学中,关于客观必然性规律性的哲学思想和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互相渗透的。他们两人作为有影响的辩证法派哲学家都试图利用古代东方哲学来佐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科学是能够和入道主义思想统一观念,从自身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本体论主义的理解的片面性。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人道主义化和当今入道主义辩证法化的思想基础上,涅德里科维奇和舍希奇这些“辩证法派”的代表人物同马尔科维奇和弗兰茨基这些“实践派”的代表人物的认识逐渐接近和趋于一致。这样一来,他们共同为8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82年,在涅德里科维奇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实践派”和“辩证法派”哲学家都明显地表示出和解和团结的愿望。马尔科维奇曾对中国进修学者说过,“实践派”和“辩证法派”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实践》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并不就排斥唯物辩证法,而在《辩证法》杂志周围的人也不都否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安德列耶·斯托伊科维奇和布拉迪斯拉夫·彼特洛维奇这两位“辩证法派”的代表人物在其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82年版)中也肯定:实践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在许多哲学



领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实践派”哲学家从1960年布莱德认识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以来长期享有声誉，在理论界占优势，对舆论有更大的影响。实践派哲学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没有同南共联盟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发生冲突。相反，实践派是以社会主义自治的承担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斯托伊科维奇和布·彼特洛维奇在书中承认，实践派有它的客观社会基础，不能指望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把它加以消灭。让实践派有正常从事哲学科学活动的条件，这对于社会主义自治建设将是具有意义的。另一位“辩证法派”哲学家博格丹·舍希奇也更多地强调两派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存在着解决学术争端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克服各自的本体论主义、认识论主义或实践主义、人道主义的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统一的理论基础上团结起来，合作共事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前进发展。无疑，舍希奇和斯托伊科维奇等“辩证法派”哲学家的这些看法也完全反映了杜尚·涅德里科维奇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的正确观点。1982年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改选，著名的社会学家拉多米拉·卢基奇院士接替了涅德里科维奇院士当选为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卢基奇院士对实践派教授们的科学成就是肯定的，对他们的科研工作积极支持的。这都有利于加强理论队伍的团结。

1982年6月召开的南共联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为8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次代表大会决议规定，科学研究工作应当更多地面向研究社会发展联合劳动生产关系中的规律性。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寻求解决发展自治、自治成果、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和传统的解决

办法，为社会和生产实践提供解决办法。这一决议精神为“辩证法派”和“实践派”两派哲学家的团结和统一提供了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为80年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开拓了美好的发展前景。

在涅德里科维奇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关怀下，南斯拉夫哲学理论队伍团结合作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了。1983年3月至4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南斯拉夫哲学社会科学家在各个共和国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杜布洛夫尼克“国际大学中心”举办哲学讲座。加约·彼特洛维奇主持“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讲座，萨戈尔卡·戈鲁博维奇主持“哲学与社会科学”讲座。10月8日—10日，两派哲学家在佩特洛瓦茨共同举办题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三个论题是：马克思与当今世界；当今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抉择；自治社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问题和前途。参加这次“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哲学家有：弗兰尼茨基，戴斯波特，斯托扬诺维奇，罗丁，戈阿特，帕比奇，日瓦丁诺维奇，塞克利，日沃迪奇，戈鲁博维奇，布霍夫斯基，哈季·瓦西里等人。这是1960年布莱德学术讨论会上分裂以来，两派哲学家第一次共同举办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是良好的。两派哲学家彼此平等相待，自由对话，共同探讨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问题。1983年，上百名南斯拉夫哲学家首倡，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名哲学家合作，着手编写《现代社会主义》百科全书。12月，在涅德里科维奇院士和卢基奇院士等著名学者支持下，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晋升为科学院院士。弗兰尼茨基在1983年出版了他的《革命与批判》一

书。

涅德里科维奇教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为加强中南两国哲学界的合作和学术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多次接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并且赠送了一大批图书资料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他对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进修的中国哲学工作者更是热情关怀，亲自指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撰写博士论文的工作，从草拟论文提纲、确定书目到修改原稿都一一过问。由中国哲学工作者写成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问题（1945—1981）》的博士论文，对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了客观的全面的科学评价，对两派哲学家的学术成就作了公正的肯定的评价。在涅德里科维奇的关怀下，在1983年10月，第二个中国哲学工作者代表团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并且在贝尔格莱德社会科学研究所会见了前面提到的六位实践派教授。涅德里科维奇为中南两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6月29日，涅德里科维奇院士不幸逝世，享年85岁。现在就任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的就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助手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院士。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包含许多具体的哲学学科的、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有机结构的哲学理论系统。当代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批判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颇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趋势和当代世界和人类实践中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杜尚·涅德里科维奇为建构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人道

主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南斯拉夫特色的开放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涅德里科维奇作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的老战士获得 1941 年游击战士纪念章”。他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自治建设，为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作出重大贡献，荣获为人民服务金星勋章，友谊和团结金环勋章以及其他奖章。他将载入南斯拉夫人民革命的史册，名垂千古！涅德里科维奇将作为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载入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册！涅德里科维奇在哲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参 考 书 目

1. 涅德里科维奇：《我们的哲学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贝尔格莱德1952年版。
2. 吉拉斯：《涅德里科维奇教授的两面“哲学”作用》，载《新思想》1953年第1期。
3. 涅德里科维奇：《现代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
4. 涅德里科维奇：《世界、人和人性》，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
5. 涅德里科维奇：《赫拉克利特》，贝尔格莱德1924年版。
6. 涅德里科维奇：《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冲突》，斯科普里，1938年版。
7. 涅德里科维奇：《黑格尔辩证法》历史述评，贝尔格莱德1939年版。
8. 涅德里科维奇：《列宁论一般、特殊和个别》，载《大学学报》1949年
9. 涅德里科维奇：《实用主义和辩证法》，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
10. 涅德里科维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和当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

- 
11. 涅德里科维奇：《列宁和哲学》，贝尔格莱德1969年版。
  12. 涅德里科维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和辩证法》，贝尔格莱德1974年版。
  13. 涅德里科维奇：《科学家的科学创造和个性在科学事业中发展的辩证法》，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



# 康福斯

涂纪亮 撰



## 篇 目

一、生平、著作和思想演变 .....	587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	595
三、对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的批判 .....	603
四、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	607
五、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评论 .....	616
六、对波普尔的社会哲学的批判 .....	622
参考书目 .....	627



康福斯 (1909年—1980年)



---

---

# 康 福 斯

涂纪亮

莫里斯·坎贝尔·康福斯（1909—1980），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英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工作。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探讨了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与科技革命，以及个性、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石里克、艾耶尔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以及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莫里斯的指号学，切斯的普通语义学等等。总之，无论在向英国公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还是在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方面，康福斯都作了大量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一、生平、著作和思想演变

莫里斯·坎贝尔·康福斯，1909年10月28日生于伦敦。少

年时期在伦敦大学院附属中学受教，1925年16岁时进入伦敦大学院接受哲学教育，跟随希克斯学习古代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在那里获得哲学优等学位。其后转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攻逻辑学，并通过了道德科学荣誉学位。在剑桥，他听了摩尔讲授的“逻辑分析”哲学课程，布雷斯韦特讲授的罗素的《数学原理》，还听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课程，从而接受了分析哲学的影响。他说：“我终于对现代的‘逻辑分析’哲学获得了较深的理解。这些哲学家主要关心于——几乎可以说是迷恋于——表达的明晰性……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sup>①</sup>

1931年，康福斯毕业于剑桥大学。他由于在学习逻辑方面成绩优异，因而获得一笔为期3年的奖学金，留在三一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不过，他当时的志趣已转向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并于1931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与其他几个入了党的研究生共同建立了剑桥大学的第一个党组织。在三一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这3年中，他以主要精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协助出售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还骑自行车到英国东部各州的村镇中协助组织工人党员的工作。1933年，他建立了东部各州的地区委员会，并担任这个地区党务工作的组织者。1939年，他在三一学院的研究教职期满后，离开了剑桥大学，以全部精力从事该地区的党务工作，一直到1945年离开该地区回到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身体原因免于服役，在一个农场里作了两年的农业劳动。

<sup>①</sup> 康福斯，《共产主义和哲学》，1979年英文版，第2—3页。

1945年回到伦敦后，康福斯一直致力于左翼出版工作和著述活动。他担任过英共主办的“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的负责人和英共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委，同时以大部分精力从事著述活动，写了一系列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著述活动成为康福斯后半生的主要内容，直到他于1980年12月31日病逝于伦敦，享年71岁。

康福斯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通俗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另一类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的主要流派。在前一类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卷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一书，其第一卷名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1952年出版；第二卷名为《历史唯物主义》，1953年出版；第三卷名为《知识论》，1954年出版。此书在英国出版后，迅速被译成俄文和中文分别在苏联和我国出版。这三卷书是康福斯根据他于1950年11—12月在英国共产党伦敦区委会主办的讲座上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写成的，目的在于对英国工人群众系统地、通俗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声明，这部书不是作为教科书写的，它是供不专门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劳动群众阅读的，它的目的只是向他们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与实际效用。

此外，康福斯还写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小册子。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1949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1949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写成的。他在修改讲稿的过程中

吸取了其他人在会上提出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本集体著作。此书讨论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危机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南》，1952年出版。这本书按经典作家人物评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在1924—1939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族解放运动八个专题，分别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其他还有《社会主义者的哲学》，1959年出版，以及与贝纳尔合写的《科学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他晚年时期，他还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如《共产主义和人的价值》，1972年；《哲学的逻辑基础》，1973年，以及在他逝世前夕出版的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共产主义和哲学》(1979年)。关于康福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导论》等著作中的观点，我们将在下面第二节中详述。

在批判现代西方哲学方面，康福斯也写了几本颇有份量的著作，它们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写成的。头一本著作是《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1946年出版，1955年再版时作者作了大量修改。这本书着重批判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不过他首先以相当多的篇幅概述了从培根到马赫这一历史进程中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的发展，认为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都不过是唯心论的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此书在50年代初出版了俄译本和中译本。第二本著作是《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1950年出版，其后不久也出版了俄译本和中译本。此书批判的流派很多，包括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

以及莫里斯的指号学、切斯的普通语义学等等。第三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65年出版，此本书主要批驳和评论英国的日常语言学派，特别是牛津学派。第四本著作是《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1968年出版。这本书主要是批驳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观点。关于这四本著作的内容和观点，我们将在下面第三至六节中分别评述。

在康福斯一生中，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或者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他的思想都经历了一个颇为剧烈的演变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面，特别在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对外政策的态度方面，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他加入英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到50年代初，他一直认为斯大林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是不会犯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任务仅在于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它们。这就是他在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南》等著作时期的基本看法。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大大改变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看法。他说：“与许多而且愈来愈多的英国共产党人一样，我发现自己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在苏联的国内政策中仅仅发生一些‘错误’。因为，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一些可怕的‘对人类的罪行’，其性质与我们英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sup>①</sup>他还由此

<sup>①</sup> 康福斯：《共产主义和哲学》，1979年英文版第8—9页。



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在以前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理解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一定有某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以致才有可能使某些人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名义干了那些坏事。其二，以前关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观念已不能再接受了，以前关于苏联的政策（除开那些纯属内政的政策）不能反对的观念也是不能再接受了<sup>①</sup>。

在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康福斯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在他看来，苏联在1956年处理匈牙利事件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那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政府击退反革命的进攻。而在布拉格事件中，则是打击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个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和放逐，只是因为他们在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执行一种与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同的政策。他说：“这次事件加深了这样一种理解，即不能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不论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远远不是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的监护人，还有必要公开地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怀疑。”<sup>②</sup>康福斯还由此进一步怀疑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是否是“开放的社会”，他们所奉行的哲学是否是“开放的哲学”。

在晚年时期，康福斯认为，他入党以后4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看法过于天真，以为这些著作已为一切时代和一切环境制定了一套普遍适用的教旨，这些教旨是不能怀疑的，只能正确地加以理解和应用。但是，他说：“事实上，

<sup>①</sup> 康福斯：《共产主义和哲学》，1979年英文版第9页。

<sup>②</sup> 《共产主义和哲学》第10页。

可以表明，许多误解和教条之所以产生，不是由于人们误解了这些‘经典著作’，而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自己对许多论题所作的易于引人误解的或者不清楚的表述，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sup>①</sup>因此，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作批判的考察，正如对其他任何人的著作也应作批判考察一样。

另一方面，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上，康福斯在前期和后期的观点也有显著变化。在40—50年代，他接受当时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对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且往往简单、武断地下一些不恰当的政治性结论。例如，在《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一书的结论部分中，康福斯提出，现代的“逻辑”学派本质上只是以往的主观主义理论的旧调重弹，无非是用一些新的词汇把以往的理论乔装打扮一下而已。现代的那种“逻辑的”和“科学的”哲学产生了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它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也是反对科学的和得不出什么积极成果的。这种哲学的社会意义，也和它的前驱者一样，在于蒙蔽和掩盖科学的真正革命性<sup>②</sup>。在《保卫哲学》一书的结论部分中，他认为实证主义“否定了科学作为一种文明和进步的武器的性质”，“使科学本身宣传蒙昧主义”，“它反映着科学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败和被歪曲”，“这些哲学家都站在反动的旗帜之下，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反抗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公然的走卒”<sup>③</sup>。

但是，到60年代，他转而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实事求是

① 《共产主义和哲学》第11页。

② 参见康福斯：《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译本第248—249页。

③ 参见康福斯：《保卫哲学》，中译本第315—316页。

的态度,强调要把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区分开,对糟粕要加以批判,对精华则可以吸取。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的前言中,他明确地表示这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流派,而且在于讨论从这种哲学中能学到什么东西。他还明确表示要纠正过去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错误看法,他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过去也有同感),即认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看法只有部分的真理。我们不应当通过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观念来冲淡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把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都斥之为彻底反动和完全错误的这种作法的理由。如果某种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证明它怎样是错误的,而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并不能构成那样一种证明。在对一些我们不愿接受观念进行正当的批评时,我们往往发现它们既不象起初想象的那样反动,也不象那样错误。”<sup>①</sup> 康福斯承认,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某些命题可能不大容易被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同道者接受,这是因为,首先,其中许多命题是新颖的,而新颖的东西容易引起争论,需要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其中有些命题是与传统上已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对立的。他说:“我目前也不认为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全部看法都是正确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认为这个讨论可以有助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把它应用于现时代的问题。”<sup>②</sup> 康福斯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新的看法,表现在他在60—70年代所写的全部著作中。

<sup>①</sup> 康福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英文版第9页。

<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14页。

##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导论》一书是康福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除第一卷阐述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第二卷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外，他还把知识论独立出来作为第三卷的主题。这个框架不仅出自于他打算由浅入深的教学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想法。他不是像人们通常所作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部分，而是特意把知识论部分独立出来，赋予它以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正确的或错误的认识都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知识发源于生产活动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因此适宜于在初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之后，进一步阐述人类知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他力求逐步探索这个由条件反射直到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即从纯粹的动物生活到人类达到高度文明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康福斯的这种看法有其新颖独特之处。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康福斯把它分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两个部分加以阐述。在唯物主义部分，他首先阐述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阐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再次阐述从机械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在辩证方法部分，他首先说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然后阐述辩证方法的各个方面，如变化和发展、新与旧、否定之否定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最后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关系。整个说来，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有充

分根据的理论，它的力量直接来自它试图解决我们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针对当前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提出一个适当的、用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概念。它的任务不是按照旧的方式制定一个哲学体系，并把它当作一种绝对真理的体系加以思考和赞赏，而是致力于探讨如何改造社会，使得庞大的社会生产力被用于为人类造福这个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正应致力于解决这个实际任务，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康福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性质和任务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康福斯首先讨论它的一般原理，其次讨论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上层建筑以及阶级统治等问题，最后讨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这一卷的单行本是在1953年出版的，1957年出版了中译本。当时，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种形势下，康福斯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原来出现在该书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第一，他认为该书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宿命论截然区别开来。他说，该书第一篇“一般原理”部分是他根据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写成的。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对于如何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一般原理是按照下述方式叙述的：

（一）社会是根据“客观规律”发展的，也就是说，有一种预先注定的经济发展；（二）这种经济发展又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及其发展；（三）这些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一般的社会发展。康福斯认为，这种叙述方式的缺点是：它仍然是在“作

用和反作用”这个机械概念的框子里打转，而把全部历史发展当作一种宿命的过程来叙述；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是被决定了的，思想是被决定了的，而最后这些思想的后果（反作用）也是被决定了的。按照这种叙述方式，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假使我们有了关于一切经济事实的充分知识，加上关于“经济事实决定思想”的规律的知识，再加上这些思想的作用规律的知识，我们就能够以预先注定的准确性来预测以后社会的全部发展。然而，康福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用以预测历史过程的体系，而是一种用以了解和控制历史过程的理论工具。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在讨论用“客观规律”来“控制”社会发展的问题时不会陷入宿命论的泥坑。

第二，关于社会意识问题。康福斯承认，他过去在此书中阐述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时对社会意识的表述，特别是关于“指导的社会意识”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和含有错误的，因为他把“社会意识”客观化了。社会意识本来是、并且应当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可是他把这种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个事物，一个对象，一种独立的力量，仿佛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出来，并且掌握了经济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他强调说，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作用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由一种完美无疵的“社会意识”来掌握，而只能由个人和他们的不完善的组织的活动来掌握。以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并没有以任何自动的方式用制造出一种超人的“指导的社会意识”来保证社会事务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社会存在所能作的不过是给社会成员提供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把事情办得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一种

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社会成员自己尽可能用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来发展这个组织。如果以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这一点仿佛是自动地通过“社会意识”的指导作用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想，使它们达到完善地步这样一个长期的斗争才得以实现，那么这种想法便是空想主义的。

康福斯还由此谈到“个人崇拜”的根源问题。在他看来，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俄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苏联当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这一历史局面，斯大林本人的个性等等。他说：“但是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隐含地认为（当然不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提出来，因为这样作就会和马克思主义发生明显的矛盾），一个领袖好象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意志’或‘指导的意识’的代表，他被群众当作这样一个人，受群众的崇拜，因此变成一个永不会错的超人。”<sup>①</sup>他指出，虽然个人崇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不过事实上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世界过程的问题。康福斯承认，他过去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看作一个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个事件，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仅仅看作是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一起推翻以前的剥削者的统治，夺取政权和建立自己的国家体系。但是，如果从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个

<sup>①</sup> 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页。

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就包括在世界范围内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取代以前的生产方式。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许多世代的工作，所以，它的历程虽然包括许多辉煌的成功，但也包括一些挫折。在某一阶段使人们大获成功的思想和方法由于执行者本身所造成的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混乱、教条和虚假现象，党派分裂也会发生，错误甚至犯罪行为也会产生。一切革命的历史都是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期待着社会主义革命有所不同。”<sup>①</sup> 康福斯在以上三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改变，不论改变后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它毕竟表现出他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勇于纠正错误、不停顿地探索真理的精神。

最后，对于知识论问题，康福斯用比前两部分更多的篇幅，详细阐述了他对精神的本性和起源、概念的发展过程以及真理与自由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概念问题是知识论的中心问题，知识论正是要研究概念的起源，概念如何反映现实，概念如何受到检验，概念如何演变和发展，以及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些什么作用等等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他对知识论的看法与资产阶级哲学家对知识论的看法之间的原则区别。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知识论问题占居首要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任何事物，我们在对它们作出哲学结论之前，首先必须确定什么是我们真正确实地认识的东西以及我们借以认识这个东西的根据。康福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家通常采取非常抽象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只承认个别的人的精神的存在，并且企图探索

<sup>①</sup> 《辩证唯物主义》第13页。



知识在这种精神中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然而，既然个别的人——更不必说他们的精神——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因而，这种脱离人类社会而孤立地、抽象地研究知识如何在个人精神中发生和发展的作法，是不能取得成效的。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概念在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条件下、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如何实际地发生、发展和接受检验，研究人类的认识如何从简单的条件反射（这是动物机体与外部世界发生能动的关系的基本方式）逐步发展到当前的高度水平。认识是人类赖以获得自由的有效手段。我们认为，康福斯强调要密切结合人类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生产活动来研究人类的认识发展过程，避免对这个问题进行脱离现实的思辨研究，这个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康福斯在晚年时期回忆自己过去的写作生涯时说，在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导论》的那段时期里，他认为斯大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哲学观点上受到后者的不少影响。不过，他没有接受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在方法上是辩证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把理论和方法这两者的区别讲清楚。在他看来，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两种关于世界的本性的对立理论，而是两种用于解释和理解一切问题的对立方式，它们表现为两种在实践中对立的作法，并在实际活动中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与此相关，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用以对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和运动”提出疑问的程序，或者，用列宁的话来说“真正的辩证法”意味着“对过程进行透彻而细致的分析”。

在完成《辩证唯物主义导论》一书之后，康福斯发现还需要探讨下列六个问题，它们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来的。第一，需要更多地探讨“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也就是需要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角度更深入地探讨思维的性质和功能。第二，需要更多地考察以往的一些哲学家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现代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观点。第三，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它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需要弄清楚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和联系。第四，需要更多地研究现代逻辑，研究传统的形式逻辑和现代的数理逻辑之间的区别，研究数理逻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它的内容和效用。第五，需要更深入地弄清楚“辩证法”的含义，不要把辩证法看作关于辩证规律的总和，也不要将辩证法看作是与逻辑对立的，而要看到只有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辩证法。第六，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和辩证法为依据，研究人的价值问题，这包括研究“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研究价值如何具有客观的基础，而不是仅仅立足于个人或阶级的偏爱之上。与此相关，不应把共产主义看作理想乐园或乌托邦，也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结束、阶级的消灭和人的一切需要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而且也应把它看作人的价值得到承认这一斗争的胜利。

在50—70年代，康福斯分别在不同的著作中探讨了以上这些问题的不同侧面。例如，在《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1955年出版的修订本中，他侧重于探讨上述第二、三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和人的价值》一书中，他侧重于探讨上述第六个

问题；在《哲学的逻辑基础》一书中，他侧重于探讨上述第四个问题；而在《共产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占居重要地位。

按照康福斯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说：“正如我曾经认为和今后继续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主要成就，或者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合作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为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制定了一些基本原理。”<sup>①</sup>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科学的”成就，它可以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或达尔文为自然科学制定的那些基本原理相并列；而他的“哲学”意义也是很大的，因为它为“理解人的实践”提供了基础。康福斯还认为，他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他所论述的主题是从马克思的这一主要成就中提出的，而且这也是哲学应当探讨的主题。他说，也许有人认为他后期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即使如此，他所要“修正”的也决不是这些基本原理，因为它们是不需要修正的。他明确表示，在《共产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他正是依据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科学成就，试图提出一种前后一贯的哲学观点，用以批驳当前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批驳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某些流派的观点，用以探讨科学方法、哲学方法和科学的功能问题，探讨知识论问题，逻辑和辩证法问题，以及人的价值问题等等。

---

<sup>①</sup> 《共产主义和哲学》第12页。

### 三、对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的批判

在《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一书中，康福斯以两章的篇幅来阐述和评论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还以一章的篇幅来评述维特根斯坦的与此有关的观点。其后，在《保卫哲学》等著作中，康福斯也对罗素有所评论。这是因为，在本世纪上半叶，罗素哲学不仅在英国哲学界，而且在整个西方分析哲学界，都有着重大影响，康福斯要评论当时英美流行的哲学思潮，当然首先需要评论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的罗素的哲学思想。

罗素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大部分分析哲学家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康福斯首先相当准确地转述了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他正确地指出，逻辑分析这个概念依据于罗素提出的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个基本论点。他把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为：实证的知识必须从经验中获得，其中有一部分还要借助于精密的自然科学技术。哲学的任务是对通过知觉和科学建立起来的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这种分析尽管不能建立任何新的真理，但是由于对早已知道的真理的逻辑形式进行分析，使之明确起来，就能给实证的知识以一种新的明确性，并能克服当已知的真理的逻辑形式本身没有被了解时所引起的混乱和“理智上的迷惑”。

按照康福斯的观点，逻辑分析方法可以说依据于这样两个设想：其一，它认为正常经验和科学方法所保证的一套命题是真的；其二，它认为这样的命题在其通常的表现形式中

没有显示出它们所涉及的终极的材料，因而需要加以逻辑分析，康福斯着重批驳后一个设想。他承认，我们通常所写出的或说出的话语，甚至科学理论中的话语，从逻辑的观点上说，有许多是不够明确的，甚至是含糊不清的。因此，使用分析方法，把比较复杂的事物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事物，从而使知识获得更大的明确性，这种作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如何进行分析？或者说，究竟依靠什么进行分析？在他看来，当我们对我们知识所涉及的事物的本性要求具有更深刻、更确切、更“终极”的知识时，我们应当根据科学的研究，根据实验，根据提出我们所能检验、证实以及使用的假说，一句话，依据继续运用千锤百炼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将愈来愈确切和“终极”，但永远不会绝对地确切和终极。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界限，不过，我们可以日益向它靠近。

康福斯认为，由此可以看出逻辑分析方法所犯的错误的根本性质，这就在于这种方法假定，我们对事物的本性所要求的更精确、更清楚以及更终极的知识，能够用一种纯粹逻辑的分析方法来获得，而不必依靠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说，要获得这种终极的知识，不需要通过科学研究，而可以撇开科学研究。在这里，逻辑在科学思想系统中的地位完全被歪曲了，逻辑没有被看作科学自身掌握的一种工具，有助于对科学成果的鉴定，而是被看作一种用以对科学作出超科学的批评的工具，也就是说，对正常经验和科学的命题作出一种哲学的解释，不是根据经验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是根据某种哲学的分析方法。总之，康福斯认为逻辑分析是一

种非科学的思考方法。他说：“逻辑分析的哲学家们，凭着他们对于某种超科学的、非经验的逻辑哲学的分析方法的设想，要求我们离开科学的道路——在那里一切假设和分析都根据观察并被经验所证实——而走入可疑的哲学的冒险。我们不去研究实在世界，却要以想象是逻辑上终极的元素，‘构造出一个世界’，这个‘分析方法’事实上根本不是分析方法，毋宁是一个玄想的方法。”<sup>①</sup>

我们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说，能在科学研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我们用一系列符号来表达问题的陈述、推理等过程，或者说，用一套形式化的语言来表示各种量的变化和关系，以及在量与量之间进行推导和演算。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大大简化和加速思维的进程，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逻辑证明，提高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目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康福斯把这种方法斥之为“非科学的”、“玄想的”方法，这种评价是不妥当的。罗素以及许多分析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采用这种方法，而在于过分抬高这种方法的作用，把它夸大为哲学研究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他们虽然没有由于强调这种分析方法而否定科学研究本身，但他们在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分析科学命题时，往往没有对各门具体科学所采用的各种有效的研究方法给予应有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康福斯对他们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

对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主张的逻辑原子论，康福斯也作

---

<sup>①</sup> 康福斯：《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译本第101—102页。

了详细的论述和批判。他从解释什么是逻辑形式着手,依次阐述基本命题、真值函项等基本概念,最后指出逻辑原子论是一个形而上学系统。在他看来,要检验逻辑原子论是否站得住脚,就需要看关于基本命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原子事实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按照罗素等人的观点,关于世界的全部真理是可以用基本命题来表示的,而基本命题在逻辑上独立于任何其他命题,它是关于一个原子事实的叙述。然而,康福斯正确地指出,基本命题和原子事实这两个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严格说来,既没有任何命题是基本的,也没有任何事实是原子的。例如,“这是一朵花”或“这是一块石头”,“这朵花是红色的”或“这块石头是沉重的”等等关于物质对象的命题,虽然都具有“S是P”这种基本形式,但它们并不是绝对基本的命题,而他们所叙述的事实也不是什么原子事实,因为花、石头等等事物和红色的、沉重的等等性质都不是绝对基本的,而是可以再加以分解。甚至象原子、电子这样的微观实体也不是绝对基本的。康福斯指出,逻辑原子论这种理论,像所有的形而上学理论一样,显然是对世界的本性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假定世界分成许多终极的原子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经验或任何科学使我们有根据接受这样一种对世界的简单化的观点。恰恰相反,实在的最一般的特征是变化和运动,所以不论分析如何深入,我们绝对达不到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所说的那种基本的、终极的原子事实,因而也不存在什么作为一切命题的基础的“基本命题”。他说:“一等到基本命题和原子事实被识破为原来是神话式的杜撰,逻辑原子论的系统就整个掉了底了。”<sup>①</sup>

<sup>①</sup>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第127页。

我们认为，康福斯对逻辑原子论的批评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由于世界上的事物是可以无限地分解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因此，要象罗素主张的那样分析出原子事实那样的“终极成分”，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象他那样分析出叙述原子事实的基本命题，同样是不可能的。按照我们的观点，罗素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首先在于他把世界的终极成分归结为颜色、声音、气味等等感觉，根本不讨论关于感性地感觉到的“事实”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用强调“事实”来抹煞事物的客观存在，这是他的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现。其次在于他把实在理解为许多零散的、互不依存的、固定在命题之中的感觉的组合，否认客观事物之间的多方面的联系，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也是一种静止直观的形而上学观点。

#### 四、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在康福斯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一书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在《保卫哲学》一书中，对这个流派的批判又占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

康福斯对逻辑实证主义作了全盘否定的评价。在《保卫哲学》一书的结论部分中，他对逻辑实证主义作出如下总的评价：它在一切本质上继承着二百年前由贝克莱所建立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传统，它的根本特征是对唯物主义的根本敌视，它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所作的种种解释，否定了科学作为一种文明和进步的武器的性质，使科学本身宣传蒙昧



主义，就它的社会意义来说，它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崩溃。<sup>①</sup>

我们认为，康福斯对逻辑实证主义所作的这个总的评价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诚然，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中包含有许多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但不能把它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同等看待，因为它们两者之间是有许多区别的。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在科学哲学方面所作的研究，尽管也含有许多错误看法，但也含有不少合理因素，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说它“否定了科学作为一种文明和进步的武器的性质，使科学本身宣传蒙昧主义”，也不能说它在社会意义上“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崩溃”。

康福斯还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分别作了分析和批判。首先，他批驳了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经验证实原则。他说，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它必须符合逻辑规则，而且必须是可以证实的。命题之所以必须符合逻辑规则，是因为各词能否结合到一起，这取决于它们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形式。某些名词能够结合到一起，是由于它们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形式允许它们如此结合，而某些名词不能结合到一起，则是由于它们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形式不允许它们如此结合。例如，我们可以有意义地说：“这个点是红的”，“这个声音是响的”，而不可说，“这个点是响的”，“这个声音是红的”。命题之所以需要证实，是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命题，我们就必须能够想象

<sup>①</sup> 参见《保卫哲学》第315—316页。

“如果它是真的，它看起来是怎样的”，而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我们又必须能够想象可以有某种方法把这个命题与实在相比较。即使物理上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把它与实在相比较，我们至少需要能够想象有某种方法可借以作出这种比较。康福斯指出，如果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它在我的经验中的证实方法所给与的，那又如何能保证经验的客观性呢？维特根斯坦的经验证实原则不能解决如何用我个人的经验去证实关于过去的经验（如“恐龙在中生代曾生活在地球上”）和别人的经验（如“特普里先生牙痛”）的命题，由于经验是某种个人私有的东西，因此维特根斯坦的经验证实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是主观主义的和唯我论的。他说：“这样，维特根斯坦决定命题有无意义的条件的标准，就引导到一种彻头彻尾的唯我论的境地。我不能说到或者有意义地想到（那是一回事）我自己的经验即我自己的主观世界界限之外的任何东西。整个世界缩小到我自己直接当前的经验的‘狭窄范围’中去了，这种经验是神秘地存在于它本身上面，并存在于虚空之中的。”<sup>①</sup>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康福斯以石里克为其代表加以评论。在他看来，石里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为，石里克也认为，凡是可说的必须是能够在经验中加以证实的，换句话说，对于任何陈述，一个人必须永远能够说哪种经验会证实它或者哪种经验会否认它，他必须能够提出一种方法，使他至少在理论上能够把他的陈述放在经验中检验其真假。石里克根据这一要求，提出了“一个陈述的意义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这条

<sup>①</sup>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第143页。

原则，并且从这条原则中得出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命题既然得不到经验的证实，因而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结论。然而，康福斯认为，石里克的证实原则把个人的“经验”抬高到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的地位，仿佛它是一种终极的实在。他说，维特根斯坦成功地把“经验”观点的形而上学性质强调成终极的实在，还成功地表达了一件事实，即这个观点不但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是“神秘的”。石里克也是如此，“他在证实原则中所祈求得到的绝对经验，就成为‘在永恒的观点下’的形而上学静观的一个对象，对自然科学的命题的‘阐明’，不是引导到理性的了解，而是引导到‘神秘的感觉’。”<sup>①</sup>

我们认为，康福斯对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人的经验证实原则的批驳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语句或命题的意义，不是指语句的字面意义，而是指命题的经验意义，即它是否有真假可言。他们把某一命题能否获得经验的证实作为判断这一命题是否具有经验意义或认识意义的标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对“经验”这个基本概念作何理解。如果对它作唯物主义的理解，即把经验理解为客观世界中的对象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一种认识，也就是理解为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那么经验证实原则在这种意义上也是可以成立的。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对经验作这样的唯物主义理解，而是把它理解为某种与客观实在仿佛无关的个人体验、个人感觉的总和，否认经验的客观内容，否认人的感觉经验是外界事物在人的主观

<sup>①</sup> 《保卫哲学》第63页。

意识中的反映。由于对经验作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他们所提出的经验证实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在理论上不可克服的困难，这正是他们的这个理论的症疾所在。

其次，康福斯批驳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物理主义和科学统一的论点。简略说来，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物理主义可分为两种：强意义的物理主义要求把科学陈述还原为物理语言的观察谓词；弱意义的物理主义则只要求把科学陈述还原为事物语言的观察谓词。在物理主义的基础上，卡尔纳普、纽纳特等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科学统一的论题，即认为经验科学的各个分支仅仅是由于分工的实际需要才被分割开来，它们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一门无所不包的统一科学的若干部分。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语言，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和说明它的研究对象和成果。因此，可以通过把各门科学的陈述还原为物理语言来实现科学的统一。科学统一问题其实不过是科学的逻辑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语言问题。

康福斯正确地指出：“然而科学的统一之所以可能，及其在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实现过程，并不依靠文字的、逻辑的、语义的特性，而是依靠世界的真实统一的物质基础。”<sup>①</sup>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世界的真实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科学研究发现了物质过程以及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规律，科学的统一是在科学研究本身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正是科学的进步创造了统一的科学，而统一的科学则是文明或物质进步赖以实现的手段。因此，科学的统一不能从思想和语言

---

<sup>①</sup> 《保卫哲学》第211—212页。

的特性中渲染出来，只能从客观的实在中导出世界的统一性。然而，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的统一问题是一个属于科学的逻辑问题或语言问题，而不属于本体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科学的统一首先要通过把一切科学还原为联结观察材料的陈述，然后通过发现一个可以从其中演绎出一切联结的单独公式来完成。康福斯说，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在这里不外是使用“科学语言”来玩弄语义学的魔术，他们所设想的是一种虚构的、梦幻的统一，这种统一不能在科学的真实实践中达到，只能在哲学家们的想象中依靠在形式上构造一种“普遍语言”而达到。

我们认为，康福斯的这些批驳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科学的统一过程正是在逐步深入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科学统一的实现，不是依靠科学语言的统一，而是取决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物理语言已为实现这种统一提供了必要而且充分的基础，这就把这个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其实，各门科学都有其特殊性，很难在保存其原意的条件下把各门科学中那些独特的抽象概念或理论命题，统统还原为物理语言；而且把各门科学的对象一概归结为一般的物理事件，这也否定了各门科学的特殊性。

不过，科学的统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仍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符合于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一体化倾向，这就是各门科学在分工的基础上出现多种形式的综合，越来越相互接近，在各门科学之间又出现许多边缘性学科，这种发展趋势将使各门科学统一为一个整体。康福斯在批驳逻辑实

证主义者关于科学统一的观点时，没有强调科学发展中的这种一体化倾向，只强调科学发展中的专业化倾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不协调的，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科学家们已经被迫孤独地工作，研究一连串个别的问题。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科学所特有的经验主义和专门化，这种经验主义和专门化又在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哲学中得到表现。康福斯甚至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不是主张科学的统一，而是主张科学的不统一，它的出发点是使科学彼此分离。”<sup>①</sup>我们认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个批驳是不公允的，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最后，康福斯还批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所谓“方法论的唯物主义”的论点。卡尔纳普等人从他们的物理主义观点出发，声称可以把他们的物理主义称为“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卡尔纳普说：“我们的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常被称为实证主义的，它也同样可称为唯物主义的。只要不忽略旧式的唯物主义和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它是同样的理论，但用纯化的形式——之间的区别，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称呼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sup>①</sup>

康福斯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断定逻辑实证主义不属于唯物主义阵营，而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更准确地说，属于“逻辑的唯心主义”。康福斯指出，首先，对于“世界及其规律是否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否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这个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回答是：

<sup>①</sup> 卡尔纳普：《科学的统一》。

科学是一个语句系统，而语句要和语句相比较，而不是和“经验”、“世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较。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要看一个普遍陈述是否与其他普遍陈述或观察记录相一致。康福斯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种回答是相对主义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的知识不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而只是代表我们选择的一种使普遍陈述系统化并使其与观察记录相一致的方式。其次，对于“物质或自然界是否是一种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这个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作回答，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认识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只承认“直接给予的经验”，而拒绝讨论在直接给予的经验之外是否有任何客观实在。康福斯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个观点意味着他们暗中接受或者支持主观唯心主义的下述论点，即除了我们自己的感觉、观念及知觉之外，没有任何客观实在。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仅仅取决于与直接给予的经验相一致，而不是取决于与客观实在相一致。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是以一种绝对抽象的方式考虑语言、即思想的表现形式的特性，完全切断语言与思想的物质基础的联系，完全不考虑思想作为反映和理解客观世界的工具的实际作用。最后，对于“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否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否是运动着的物质形态”这个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拒绝回答，认为这也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用“运动着的物质”来描述世界，或者用“知觉”和“感觉材料”来描述世界，这只不过是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做同一件事，即作出能在经验中被证实的陈述。他们不愿对世界的“本质”作出任何论断，认为这样的论断是没有意义的。根据以上分析，

康福斯断定说：“所以，我的结论是：逻辑实证主义，在其整个研究方法上和在其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它所代表的那种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型式的唯心主义。”<sup>①</sup>

我们认为，康福斯在这个问题上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因为，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承认客观的物质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等心理因素是第二性的。卡尔纳普在论证其物理主义观点时，根本拒绝讨论物质的客观存在问题，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的命题毫无认识意义。他们的物理主义不外是主张把科学陈述还原为物理语言或事物语言的观察谓词，这与哲学唯物主义毫无关系。诚然，卡尔纳普等人说过，由于他们的物理主义认为物理语言是对物理事物的描述，而不是对个人感觉经验的描述，这样就可以避免现象主义可能导致的唯我论。不过，他们又明确表示，他们在谈到物理事物的实在性时，所指的只是作为物理语言这种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指任何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因为物理主义纯然是一个逻辑的、句法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强调物理对象或物理事物，目的在于论证采用物理语言的条理性，并不表示他们承认物理对象的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可见，他们所谓的“方法论的唯物主义”与我们所说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是迥然不同的。

<sup>①</sup> 《保卫哲学》第132页。



## 五、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评论

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评论也是康福斯的著述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后期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就主要是针对日常语言学派而写的。日常语言学派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度盛行于英国,它的头一个支派——剑桥学派在30年代形成于剑桥大学,以威斯顿(J. Wisdom)为其主要代表,40年代在牛津大学又形成了它的另一个影响更大的支派,即以赖尔(G. Ryle)、奥斯汀(J. Austin)、斯特劳森(P. F. Strawson)等人为代表的牛津学派。这两个支派都继承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采用概念分析的方法,着重分析某些与认识有关的词汇之间的细微区别,企图以此澄清哲学混乱。由于它们都强调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因此被称为日常语言学派,有时也被称为“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①。

鉴于这个学派在40—50年代在英国哲学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康福斯特别写出专著对之进行分析批判。上面谈到,康福斯在后期著作中,改变了过去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而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作法,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日常语言学派的评价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日常语言学派的某些积极因素,他承认这个学派对语言用法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说:“透切地研究语言的使用,这对于哲学来说是一个好想法。由于思想不能与语言的作用相分

①需要说明,不要把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指一个哲学流派)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混为一谈。

离，因此，有关语言使用的问题确实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sup>①</sup> 他也承认这个学派中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例如，他赞扬赖尔的《心的概念》一书，认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教益的。他特别提出赖尔的“范畴错误”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不仅是深刻的，而且含有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因素，因为赖尔借助于这个概念有力地批驳了那种认为心独立于身的唯心主义观点。康福斯还很赞赏奥斯汀后期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语言的“完成行为式”用法。奥斯汀强调语言具有完成行为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具有陈述或描述的功能。在康福斯看来，奥斯汀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和很有意义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造成某些哲学混乱。与此相关，他还赞扬这个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赫尔（R. M. Hare）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分，并把这一区分引入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论述中。总之，康福斯表示：“不论我对任何一个‘语言哲学家’的这本著作或那本著作（或文章）提出什么样的批评，或者对他们的某些由此引出的总观点提出什么样的批评，我都要强调指出，这种语言学的方法可以是富有成果的。的确，语言分析对于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尽管它本身并不是唯一需要的手段。”<sup>②</sup>

另一方面，康福斯也有力地批驳了日常语言学派的错误。首先，他批评日常语言学派把语言研究局限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认为这种作法是使这个学派陷于困境并引起非难的主要原因。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各种语言

<sup>①</sup>康福斯：《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伦敦第253页。

<sup>②</sup>《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12页。

游戏之间只有部分相似之处，而没有共同之处。日常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个观点。康福斯指出“语言哲学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它声称哲学家应当研究词的用法（以前许多哲学家早已说过这样的话），而在于它采纳了维特根斯坦所宣布的下述原则，即词的用法中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sup>①</sup>日常语言学派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了他们据以研究语言用法的那种特殊的方法论，即把他们的研究局限于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的用法进行描述和例示，对这些用法进行区别和比较，以求在这一过程中清除某些语言混乱。康福斯把这种方法论概括为：只是描述，而不要试图作出解释，也不要试图从中推绎出任何理论。他正确地指出，日常语言学派的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因为哲学以及一般说来任何一门科学的任务，不能只局限于描述现象，而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寻求事物或现象之间的某种共同的东西，发现普遍性的规律。日常语言学派却把哲学的任务局限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回避或拒绝作出抽象性的概括，作出理论性的断定，认为作出那样一些抽象性的概括或理论性的断定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只不过是独断的形而上学思辨。日常语言学派的这种作法，使哲学不再是理论，不再是科学，而仅仅是一种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的活动，这就贬低了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康福斯还认为，日常语言学派采取这种局限于描述的作法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中间，早已有人把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任务归结为描述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而不致力于探索它们的内在联系，寻求规律性的东西，日常语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250页。

言学派只不过把这些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这种作法从社会科学移植到哲学中而已。

其次，康福斯批评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的研究是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现实的。他说，日常语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哲学，它的任务只限于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而根本不考虑其他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不研究客观世界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不研究人及其生活的目的，不研究人类获得知识的能力、过程以及人类知识的基础等问题，认为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不出什么有根据的结论，因而这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康福斯认为，语言哲学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哲学家，他们与社会生活脱离得非常遥远，以致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和毫无意义的。他们仅仅致力于用他们的专业化技巧去清除那些只有专业哲学家才感到伤脑筋的种种混乱。在他们看来，哲学问题的产生仅仅是由于哲学家们滥用了词汇，因此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一个一个地清除其他哲学家所造成的语言混乱。如果这个任务被完成了，哲学作为一种专业也就告一终结。不过，幸运的是，对他们来说，这项工作永远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因为他们清除掉他们的前辈们的语言混乱之后，他们发现还要清除他们彼此的语言混乱。

再次，康福斯还分析了日常语言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他看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是没有分歧的。例如：它们都承认我们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关于人生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知识，都是通过经验手段获得的，而不是先天地或先验地得知的，这些知识都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它们都拒绝那些独断的、

思辨的哲学理论；它们都不赞同那种旧式的哲学研究方式，即企图在经验科学作出具体发现之前预先规定“世界的本质”；它们也都认为在传统的哲学研究领域内只有逻辑这个领域仍然是独立于经验科学的，如此等等。但是，在另外许多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之间是有重大分歧的。例如，与罗素把哲学的本质归结为逻辑相似，日常语言学派也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我们语言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门独立于经验科学的专业化学科，它研究一些专门的问题，并采取一些专门的研究方法，而不依赖于其他学科。这些专门问题可以说是一些“逻辑的”问题，即对语言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澄清”，这些问题是不能用经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和检验的。由此出发，他们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或者说，归结为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即他们所说的研究“我们语言的逻辑”或“我们语言的实际用法”。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僵死的学说，哲学的任务是研究从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作出理论的说明，这些说明无论对于人类的生活，或者对于表述生活的目的以及用以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来说，都具有实际的效益。这样的说明当然不可能是独断的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的任务是面向广阔的世界，而不是被禁锢在狭小的书斋或课堂里。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同样使用“哲学”一词，但它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对哲学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作了显然不同的规定。康福斯写道：“马克思主义并不打算指责语

言哲学家对语言的用法所作的任何具体的分析性描述，相反，在这些仔细的分析中，有许多分析是很准确的。但是，语言哲学提出它的所谓治疗理论的方法，声称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那种哲学，即对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所作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是完全不中用的，这样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了。”<sup>①</sup>

我们认为，康福斯对日常语言学派所作的以上这些分析和评论，基本上是中肯的和正确的。日常语言学派重视语言分析，重视对词的意义的研究，仔细区分了某些与认识有关的词的不同用法，这有助于促使概念明确，从而对哲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等人对指称理论、意义理论以及言语行为理论，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他们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或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作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如果把哲学的性质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语言分析，那就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此外，他们在从事语言分析时，没有把语言本身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往往脱离社会现实孤立地研究语言，这也严重地影响这种研究的深入和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269页。

## 六、对波普尔的社会哲学的批判

康福斯的另一本大部头著作《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1968)一书,以波普尔(K. Popper)的社会哲学作为批判对象。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本世纪40—60年代,批判理性主义这个流派不仅在英国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范围内,特别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波普尔的学术活动主要在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两个方面。在科学哲学方面,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他主张反归纳主义和证伪原则,提出试错法和科学发展的四段图式。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发生过巨大影响,构成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在这个方面的观点,在他的《研究的逻辑》(1933年用德文发表,1959年改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用英文发表)、《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成长》(1963)等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表述。对于波普尔在科学哲学方面的观点,康福斯没有提出什么批驳,而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波普尔自己作为科学方法原则的阐释者在现代学术界中占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在这个领域内的贡献……过去和现在对现代思想一直发生了巨大的和有益的影响。”<sup>①</sup>又说:“波普尔对这个问题(指科学方法论——引者注)的研究是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如果我冒昧地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说出最后的定论

<sup>①</sup> 康福斯:《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伦敦,第5页。

（我想他自己是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这至少决不是贬低他的言论的价值、重要性和独创性。”<sup>①</sup>

康福斯所批驳的主要对象是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观点。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波普尔对社会哲学怀有浓厚兴趣。他在40年代中叶先后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乏》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二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它们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利益，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被译成好几种文本，多次再版。1965年，英国政府授予他以爵士称号，以表彰他撰写《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波普尔在这两本书中，以主要篇幅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社会改良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社会污蔑为“提倡盲从”和“抹煞理性”的“封闭社会”，而把资本主义社会吹捧为“崇尚理性”和“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如此等等。正是因为波普尔公开宣扬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哲学理论，康福斯特意写了《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一书，把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观点作为它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批驳对象。

康福斯明确表示他的这本著作是针对波普尔的上述两本社会哲学著作而写的。他说：“我选择把撰写这本书作为向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批评的一种讲道理的答复。在所有的批评者中间，我只挑选一个人、即卡尔·波普尔博士作为答复的对象。”<sup>②</sup>康福斯还补充说，他之所以选择波普尔作为答复的对象，首先是因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全部批评都立足于这样一个论点，即马克思主义无非是一个教条

<sup>①</sup> 《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1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页。



的体系，这样一来，他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论证就为康福斯论证马克思主义恰好相反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体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和方便的立足点。因此，康福斯在批驳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观点的同时，也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这还因为他认为波普尔也许是我们当代的批评者中间最为出名的人，他所提出的批评具有较大的威力和很高的代表性，尽管其中某些论点并不是波普尔首先提出的。

波普尔提出“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这一对概念。所谓“开放社会”，他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在那里尊重理性，反对盲从，人人享有民主自由，拥有批评国家权威的权利，个人的发展不受任何外在强制力量的约束和阻挠。相反，“封闭社会”则是那种“狂热的”、“有偏见的”、“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在那里，提倡“盲从”，反对“理性”，人们迷信于不变的法则和习惯，只强调总体或集团，而否定或“抹煞个人利益”，社会全体公民的生活受到统一的管制，个人得不到自由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属于这种“封闭社会”。与波普尔的这种观点相对立，康福斯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开放社会，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封闭社会。与此相关，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哲学”，而不是“封闭的哲学”。由此出发，他把这本批驳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观点的著作命名为《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

对于波普尔提出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开放社会”的观点，康福斯反驳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了生产资料，它通过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而积

聚了大量财富，拥有无限的特权，使社会生产仅仅为它获取利润和积累资本服务，相反，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更谈不上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能自由发展自己的才能，也看不清社会现实的真相和改变现状的道路。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能说这样的社会是“开放社会”呢？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地主和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已被推翻，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及其代理人手中，社会财富成为全民的财产，劳动者获得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个人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余地，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能看清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前景。试问，难道可以说这样的社会是所谓“封闭社会”吗？

康福斯还批驳波普尔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封闭的哲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哲学，因为它是一个教条的体系，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加强了独断论”。这就是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采取一种封闭的态度，把若干条例、规章、惯例加诸于社会，而这些条例、规章和惯例等等又受到“政治上的暴政”的支持，从而事实上封闭了个人以至整个社会自由发展的道路。康福斯对此反驳说，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以一些可以得到证明的规则为依据，力图弄清楚造成我们的生活贫困的根源，探索改变现状的道路和必要条件。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把一些僵死的教条加诸于心智，而是向心智揭示出改善人类生活的实际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向人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光辉前景，而且明确地说明了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民的政权，从而逐

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康福斯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开放的哲学’，而把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走向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开放的社会’。”<sup>①</sup>

康福斯在这本书中还以很大篇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观点，探讨了民主、自由、平等等问题，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他的观点一一评述。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康福斯对马克思主义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观点的阐述是清楚的、准确的，对波普尔的相应观点的批驳是中肯的、有力的。因此，康福斯的这本书在英国的出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澄清了波普尔的社会哲学著作在英国社会中引起的误解或混乱，端正了社会公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

<sup>①</sup> 《开放的哲学和开放的社会》第7页。

## 参 考 书 目

- M. C. Cornfor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 Introduction*, 3 vols. 1952-54
- M. C. Cornforth: *Science versus Idealism*, 1946
- M. C. Cornforth: *Defence of Philosophy against Positivism and Pragmatism*, 1950
- M. C. Cornforth: *Marxism and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y*, 1965
- M. C. Cornforth: *The Open Philosophy and the Open Society*, 1968
- M. C. Cornforth: *Communism and Philosophy*, 1980



# 克劳斯

梁志学 撰

## 篇 目

一、克劳斯的生平著述 .....	633
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	639
三、克服逻辑学研究中的障碍 .....	646
四、研究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 .....	650
五、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 .....	659
六、正常的学术批评与反常的政治批判 .....	666
参考书目 .....	672



克劳斯(1912年—1974年)





---

# 克 劳 斯

梁志学

## 一、克劳斯的生平著述

格奥尔格·克劳斯（1912—1974）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12年12月28日，他出生于纽伦堡的一个工人家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现状，促使这位工人阶级的儿子很早就政治上成熟起来。他在少年时期即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在1928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他曾经在爱尔兰根大学学习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1933年纳粹上台，克劳斯因为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判为所谓颠覆国家的叛逆犯，在监狱里关押两年，在达豪集中营关押4年。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从事政治工作，相继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佐内贝格县委书记和魏玛市委文教书记。1948年他以博士论文《认识论中的同构关系》在耶拿大学教育系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他以《论康德早期著作》在柏林洪堡大学取得授课资格，随即担任了耶拿大学教授。1953年他应聘担任柏林洪堡大学逻辑学与认识论讲座和哲学系主任。从1959年起，他一直在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工作；他是院士，曾任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部主任和控制论部副主任。在年近花甲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74年7月29日，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病治疗无效，逝世于柏林。

克劳斯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逻辑学和符号学领域里发表过一系列实事求是和大胆开创的论著，它们既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也显示了这个阶级的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因而使他不仅在国内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头哲学家，而且也在国外享有广泛的盛誉。正像人的本质是由他的行为过程构成的一样，克劳斯的长期的哲学著述过程也充分展示了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可贵品质。

首先，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天主教中的反共哲学家连篇累牍地发表他们的论著，攻击在各国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反动神学家发动的十字军征讨中最能蛊惑人心的，就是奥地利古·安·威特尔写的《辩证唯物主义》（都灵1948年）。克劳斯识破了这股反动思潮的险恶用心，经过认真的研究与分析，结合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与数理逻辑的成就，写出了《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一书（柏林1957年），对威特尔的那本书进行了深入的、令人信服的批判。这一批判很快就在国外获得了好评。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瓦·霍利彻尔认为，“克劳斯学识渊博，笔触锋利，他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对准了威特尔写的书，彻底地反驳和揭露了天主教耶稣会的反共主义，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sup>①</sup> 不仅如

<sup>①</sup> 霍利彻尔，《评克劳斯的〈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载《日志》，维也纳1957年9月第9期。

此，正如民主德国哲学家哈·查普夫指出的，“克劳斯还超出彻底分析批判的范围，提出和阐述了许多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sup>①</sup>也就是说，他把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了。

其次，我们这一代人也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形式逻辑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是极其可悲的。某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家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将它打入冷宫。后来虽然发现这样的观点不正确，也同意让它获释，但他们又认为必须把它关进隔离室，以免它受那种充满实证主义病毒的数理逻辑的传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德国也出版了意大利贝·弗格拉希的《逻辑学》（柏林1955年）。这本书的广泛流传引起了克劳斯的注意。他深切地感到，这本无视逻辑发展的现代阶段的书在科学上是错误的，会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逻辑科学的昌明，在哲学上是教条主义的，会扼杀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他依据希尔柏脱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和塔尔斯基的《数理逻辑导论》，写成了《形式逻辑导论》（柏林1958年），论证了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现代阶段，并大胆地提出和讨论了逻辑学中的哲学问题。本书俄文版译者阿·魏特罗夫在评价他的这项工作指出，“克劳斯善于对数理逻辑采取正确的立场；他所批判的不是数理逻辑本身，而是唯心主义地利用数理逻辑成就的企图，因为他了解数理逻辑本身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方面，“他同一批实质上拒绝在普通逻辑教程中利用数理逻辑成就的逻辑学家的代表弗格拉希的论战

<sup>①</sup> 查普夫：《一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佳作》，载《统一》1957年第9期。

是十分有教益的”。<sup>①</sup>

再次，克劳斯的第三项贡献在于他对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大家知道，自从维纳于1948年发表《控制论》这部奠基性的著作以来，国际哲学界一直就控制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黑箱方法的意义、自动机和思维的关系以及信息的本质等等哲学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滥用这门新兴的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种种反对唯物主义的荒唐结论。随之而来的则是苏联、东欧的某些教条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宣布控制论为现代的机械论，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克劳斯是坚决反对这两个极端的。他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研究控制论及其哲学问题，写出了《从哲学看控制论》（柏林1961年）一书。这部发人深思的专著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关于控制论盛行的唯心主义解释和机械唯物主义解释，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解决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的正确向导；另一方面也在克服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克劳斯在书中探讨了控制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阐明了它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证明了它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的这部著作立即在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管评论者认为他的这种探讨有什么失误或不当之处，他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是主要的和不容抹煞的。正如苏联哲学家巴·斯·格里亚茨诺夫说的，“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极其广泛地论述控制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充满了深刻的

<sup>①</sup> 魏特罗夫：《形式逻辑导论》俄文版译者序，莫斯科1960年版。

乐观主义和对于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深刻信念”。<sup>①</sup>

最后，克劳斯的第四项贡献在于他对建立唯物主义符号学所作的探索。大家知道，在现代科学中表现出一种利用抽象符号的趋势，它使符号学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使语言符号领域变成了迫切需要作认识论探讨的范畴。但是，从事这种研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都是带有柏拉图主义烙印的唯心主义者或新实证主义者，总是给符号学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唯心主义解释，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某些教条主义者则把符号学宣布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放弃了这一研究领域。与此相反，克劳斯则像列宁要求的那样，既善于汲取资产阶级学者所做出的科学成就，又善于克服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以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符号学研究。在他看来，这样建立起来的符号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它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这个领域发表的第一部系统的著作是《符号学与认识论》（柏林1963年）。随后，他又发表了研究符号学的各个分支的专著。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一俟公诸于世，就在国际上受到了重视。苏联著名哲学家马·米丁表示，克劳斯“在用唯物主义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试。他的论著中包含的论点很有意思，需要对它们作认真的科学研究”。<sup>②</sup> 民主德国的许多哲学家也对克劳斯的这项工

<sup>①</sup> 格里亚茨诺夫：《评克劳斯的〈控制论和哲学〉》，载《哲学问题》，莫斯科1965年3月。

<sup>②</sup> 米丁：《马列主义认识论与符号和意义问题》，载《哲学问题》，莫斯科1963年6月。

作作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克劳斯已经把神圣的禁物抛于舟外，沉诸大海，而进入了一个哲学新大陆，这十分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克劳斯的革命政治活动和哲学创作活动得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肯定。该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讣告全文如下：

“1974年7月29日，我们的教授、博士格奥尔格·克劳斯同志与世长辞，享年61岁。他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毕生献身于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踏上了革命工人运动的道路。作为共产党员，他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为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他在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崩溃以后，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投入了我们的工农国家的建设事业。

“作为社会主义科学家和高等学校教师，他20年来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参加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我们的阶级和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中变为革命力量的思想工作，参加了把广大青年变为有阶级觉悟的干部的教育工作。

“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士，他以自己的大量科学工作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这些工作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领域中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一个典范。他为此获得了杰出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和国家奖。党和政府曾授予他卡尔·马克思勋章和其他高级奖章，以表彰他所作出的贡献。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将永远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我们的教授、博士格奥尔格·克劳斯同志。”<sup>①</sup>

---

<sup>①</sup> 《新德意志报》，1974年7月30日。

## 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克劳斯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哲学战线上的一名斗士，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为工人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着战斗。他在自己的一系列哲学论著中都对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态度，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而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当推他对威特尔的反共哲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批判。

他的《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一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的部分。在这一部分，克劳斯一方面揭露了现代天主教哲学的反动作用，用大量事实证明：新托马斯主义者威特尔在天主教哲学阵营中是梵蒂冈教廷的官方哲学家，是伪造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神学家。另一方面，克劳斯批判了威特尔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谬论。威特尔曾经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混合。针对这个论断，克劳斯不仅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真正关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孔德实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使哲学成为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的理论武器。威特尔故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制造人为矛盾。他说，既然恩格斯说过，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那么，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自然辩证



法就意味着建立一种凌驾于各门自然科学之上的自然哲学。克劳斯批驳了这种谬论，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乃是关于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以具体科学的成就为基础的，同时它的研究成果又对促进具体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克劳斯还指出，力图使自己的哲学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正是托马斯派哲学，因为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说过，“凡是在其他科学中证明自身与神学相矛盾的东西，都必须作为谬误予以抛弃”。<sup>①</sup>

第二部分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威特尔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段，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类似于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针对这种谬论，克劳斯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如何正确地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而托马斯主义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写道，“托马斯派讲的实在虽然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因而不能说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是与主观唯心论一脉相承的），但并不是存在于任何意识之外，例如，不是存在于上帝的意识之外，由此可见，托马斯派的实在论无非是客观唯心论”。<sup>②</sup>威特尔还断言，列宁之所以把哲学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区分开，是为了逃避亚原子世界的发现给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难题。针对这个论断，克劳斯指出，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涉及的是物质的结构，哲学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则是人类长期的认识史的总结，只有在科学认识到物质在各个领域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后，才有可能制定出这个正确的物质概念。克劳斯肯定了列宁所作的那种区分的巨大意义，并且戳穿了威特尔的蓄意伪

<sup>①</sup>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6部分，第2题。

<sup>②</sup>克劳斯：《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第134页。

造。在批判威特尔的过程中，克劳斯进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意识迄今只是从认识论方面加以定义的，还必须从本体论方面加以规定；就是说，不仅要从物质与意识相互对立的关系方面说明意识是什么，而且要从它们相结合的关系方面说明意识是什么。在他看来，意识既然是特定物质运动形态的一种属性，那就必须从本体论方面被视为物质的。他的这个观点曾经在民主德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第三部分是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就像许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一样，威特尔也把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等同起来，从而证明辩证矛盾是毫无意义的。针对这种论点，克劳斯说明，不矛盾律是以客观实在的特定关系为依据的，就是说，一个事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方面不能既具有又不具有某个属性，不遵守这条思维规律，任何科学思维都是不可能的；辩证矛盾则在于，一个对象同时具有两个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对立倾向或方面，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与不矛盾律相容的事实。克劳斯用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论据阐述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说明它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动力，并且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客观矛盾，而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表现的那类思想矛盾。克劳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管有什么不足之处，但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大胆地纠正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形而上学观点了。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另立篇章，讨论了因果性范畴，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相互作用理论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因果决定论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内在目的论的揭弃，批判了托马斯派把上帝视为第一因的外在目的论。他的这个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他后来发表的《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启发了许多在唯物辩证法领域里进行探索的人们。

《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是以讨论逻辑学问题结束的。在这篇结束语里，克劳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形式逻辑是研究外延关系的，辩证逻辑则是研究内涵关系的。这个论点在他后来发表的《形式逻辑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的注意。

克劳斯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集中表现在他给《1917—1945年的德国哲学》(柏林1961年)所写的篇章里。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的特点在于：不是站在加以评判的学说的彼岸说长道短，指手划脚，而是深入到所要批判的对象内部，沿着其发展的线索，揭示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最后指明其不能成立的真正原因。因此，尽管他给这部论著集第一篇第五章写的“逻辑经验主义”从篇幅方面看不是什么巨著，但它的学术价值却是十分重要的。

克劳斯首先揭示了逻辑经验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为了不断革新生产技术，对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是具有莫大的兴趣的，但这个阶级并不希望从这些成就引申出有损其统治的哲学结论。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科学家一方面远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也希望自己的科学理论能拥有可靠的哲学论据。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逻辑经验主义打着“哲学中的严密科学精神”的招牌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维也纳学派宣称，现代数理逻辑的系统应用丰富了这种严密科学精神，但数学与逻辑对现实根本无所陈述，仅仅是改变句型的先天方法。克劳斯批评了这种先验唯心论。他指出，把数学与逻辑归结为关于先天符号及其变形的理论，就

否定了它们是以极其复杂的抽象形式反映现实事物及其种类的最一般的联系的，就意味着把现实歪曲为逻辑、思想和意识，而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

维也纳学派也完全意识到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而这是有损于他们那种坚持科学态度的外观的。于是，他们便直接宣称，科学中的一切问题如果不能用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得到说明，那就是假问题，只有能用逻辑或经验加以证明或证实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关于这种观点，克劳斯指出，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再是探讨现实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研究存在与思维的真正关系，而仅仅在于对各门科学作逻辑分析，因而整个哲学就被归结为语言哲学了。他分析了维也纳学派所讲的逻辑证明和经验证实，指出这种经验证实就是用逻辑方法去追溯符合于直接感受的语句，而根本不是判定一个语句是否正确反映某种客观现实联系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用这种证明方法宣布不依赖于意识的现实物质世界的存在与否是假问题，宣布这个世界可知与否是假语句，这都是与人类千百万年的实践活动史相矛盾的。他们自以为超越了休谟，其实，他们不过是用“这个问题无意义”的说法代替了“这个问题根本不可回答”的说法，而始终没有跳出休谟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论界限。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研究符号的对应关系的句法学。一个语句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所反映的实际关系，而是取决于可以推演出它来的、不能分析的语句的类型。克劳斯指出，这样一来，语言符号就被弄成了某种以自身为目的的东西，而整个以实践为基础的语言发展

史也就被取消了。

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语言分为两类，即句法语句和经验语句。经验语句是不在它考察的范围之内的。句法语句被规定为关于符号、符号序列与符号关系的语句，假句法语句被规定为似乎属于客体语言、但实际上可以译为句法语言的语句。但是，这种假句法语句看来又涉及语言之外存在的东西，即意义问题，而哥德尔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纯粹句法学的数学真理在科学上是不可取的。因此，逻辑经验主义就不得不从句法学的结构研究过渡到语义学的内容研究。关于这一转折，克劳斯指出，这决不是转向唯物主义，因为在这里对逻辑真理的论证并不是依据陈述与现实的关系，而是依据语义规则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一转折之后，逻辑经验主义依然如故，还是主观唯心主义。

如何保证科学的一切普遍命题都有意义，是一个使逻辑经验主义者大伤脑筋的问题。克劳斯批判地分析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尝试。关于卡尔纳普用以建立概念体系的“基本体验”，他指出，对应于“基本体验”的“基本语句”只能具有“现在这里是如此这般”的形式，这是单称判断，根本不包含全称性概念，显然不能确保科学命题的意义。关于代替基本语句的“记录语句”，克劳斯指出，尽管“记录语句”被规定为可以陈述直接经验内容，而不包含任何理论成分的语句，但是，任何语句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对于所予的联系的理论加工，因此，逻辑经验主义的“记录语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于纽拉特提出的那种用科学社会学选取科学语句的办法，克劳斯也指出，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只不过是推移到了另一个领域里，因为科学社会学也

有它自己的记录语句问题。

克劳斯清楚地看到，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对逻辑经验主义来说是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指出，虽然有些逻辑经验主义者建议在科学中承认表示无限多的事物的全称判断，但在他们看来，全称判断只能部分地得到证明，而不能完全得到证实，因而只能谈它可以得到证实的程度，而决不能谈它具有的普遍真理，所以，科学命题的普遍有效性问题仍然存在。克劳斯指出，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上也许有规律性可循，但这决不是走向唯物主义，而是陷入神秘主义，因为他们明确宣称，论证形而上学和宗教是求知的正确生活指导，因为他们并不把世界的规律性视为客观存在的，而是仅仅视为信仰的事实，所以，逻辑经验主义是以宣称“把形而上学与宗教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开始，而以“把科学原理消解于形而上学和宗教中”告终的。克劳斯最后指出，那种概括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物理主义认为，各门科学之所以不同，不是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而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科学语言，而且不同的科学语言都可以译为物理学语言，这就表明，逻辑经验主义不仅陷入了神学，而且也陷入了机械主义，因为各种物质存在形态在质上的差别都在物理主义中消失不见了。

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批判过程中，克劳斯得出了一个十分中肯的结论：“逻辑经验主义在无数的场合都试图通过诡辩来摆脱自己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以维护其科学精神的外观，这是徒劳无效的，因为这种矛盾是其主观唯心主义必然要导致的结果。摆脱这种矛盾的唯一、真正的和科学的出路就在于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但拒绝走这条道路正是逻辑

经验主义的社会使命”。<sup>①</sup>

### 三、克服逻辑学研究中的障碍

我们在这里评述的，是克劳斯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待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回答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以及他在把数理逻辑的某些重要问题列入普通逻辑教程时做出了什么贡献。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数理逻辑的问题，克劳斯早在1953年讨论逻辑问题时就指出，“把数理逻辑当作‘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取消的一切趋势，都已经由实践、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实践证实为荒谬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生产自动化，因而使用了为人们的需要服务的高级技术”。<sup>②</sup>但是，教条主义在当时还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他的这个论点曾经遭到许多逻辑讨论参加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形式逻辑导论》里，克劳斯从逻辑学发展史的角度批评了这种对待数理逻辑的教条主义态度，阐明了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他指出，数理逻辑是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创立的。其背景为，危及至今显得如此可靠的整个数学体系的一系列重要难题，都具有逻辑性质，但都无法用传统逻辑方法加以解决。于是就从传统逻辑母体中产生出一门探讨数学基础与数学方法问题的新逻辑。其最早代表人物有布尔和德摩根。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最早对数理逻辑作

<sup>①</sup> 《1917—1945年的德国哲学》第42页。

<sup>②</sup> 克劳斯：《论逻辑问题》，载《德国哲学杂志》1953年第2期。

了全面的叙述。希尔柏脱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以及希尔柏脱和贝尔奈斯的《数学原理》也对数理逻辑作了经典性的叙述。结果表明，数理逻辑对于数学基础与数学方法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克劳斯把这样得到发展的数理逻辑称为现代形式逻辑，而把传统逻辑称为古典形式逻辑。在他看来，传统逻辑包含一整套客观上有意义的规律，它们决不会被数理逻辑废除。相反地，它们在得到扬弃的同时，被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因而仍然保存下来；因此，传统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推理形式就成了数理逻辑的局部情况和组成部分，而且只有从数理逻辑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更好和更深刻的理解。他写道：“对待数理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并不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反对数理逻辑本身，而在于反对数理逻辑中的唯心主义。”<sup>①</sup>正是抱着这样的正确态度，他在他的这本逻辑学专著中一方面批判了弗格拉希反对数理逻辑的观点，指出了弗格拉希由于对数理逻辑的无知而在阐述传统逻辑问题时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某些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利用数理逻辑来论证唯心主义的论点。例如，在谈到公理的性质时，克劳斯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都认为公理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先天真理，这种论点是错误的。他用逻辑学与数学发展史中的实例证明了列宁的一个论断，即“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sup>②</sup>克劳斯的这种科学态度获得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高度评价。

<sup>①</sup> 克劳斯：《形式逻辑导论》，上海1981年第53页。

<sup>②</sup> 列宁：《哲学笔记》第203页。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克劳斯在《形式逻辑导论》里阐述了他以前的独创性观点。在他看来，传统逻辑的规律就象数理逻辑所研究的大量合乎规律的关系一样，只有当这种规律所依据的真与假的概念等于绝对真与绝对假时，才是有效的。反之，辩证逻辑则是从低级的相对真理向高级的相对真理发展的逻辑。所以，形式逻辑是辩证逻辑的极限，大致就象欧几里得几何是双曲几何的极限一样。凡在我们的命题不是绝对真便是绝对假的地方，凡在为了了一定目的而允许把我们的命题当作绝对真，因而不必考虑相对真理的存在的地方，形式逻辑都是普遍有效的。形式逻辑只能研究截然划分开的概念，而不象辩证逻辑那样，还研究相互过渡的互补概念。只有当现实中存在的各类事物本身具有截然的划分时，形式逻辑才是对现实的完全妥贴的反映。这样的划分显然是理想情况。在现实中，存在着不绝的过渡，存在着发展过程。形式逻辑只是撇开这些环节，对现实作出的把握。辩证逻辑则专门以这些环节为其研究对象。归根到底，

“形式逻辑是外延思维规定和外延关系的理论，而辩证逻辑则是内涵思维规定和内涵关系的理论”。<sup>①</sup>例如，复合命题

“P和q”是外延复合命题，因为整个命题的真或假，仅仅依赖于P或q的真，而不依赖于P和q的具体内容；复合命题“q因为P”则是内涵复合命题，因为整个命题的真不仅依赖于P或q的真或假，而且依赖于P或q的内容。以合取来说，形式逻辑只研究两个现象的并存或不并存，而不象辩证逻辑那样，研究并存或不并存的方式。内涵命题联系虽然具有外延

<sup>①</sup> 克劳斯：《形式逻辑导论》第134页。

结构，但作为现实联系的反映，属于辩证逻辑范围。

在“论技术逻辑的哲学意义”<sup>①</sup>一文中，克劳斯又从系统论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的论点。在他看来，一切现实的系统都是把连续性与间断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的、具有不同程度的统计学性质的系统，形式逻辑所反映的间断的、决定论性质的系统只是现实的系统的一种理想状态或局部情况。在辩证逻辑所反映的现实系统中，全或无、是或否的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而是存在着阶段区分、中间值等等，因此，作为布尔代数的形式逻辑只能起局部的作用。从这个方面出发，克劳斯得出结论说，形式逻辑是一切思维的解剖学，辩证逻辑是一切思维的生理学。

克劳斯依据自己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的这种论点，正确地指出，当黑格尔、恩格斯与列宁对形式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评价偏低时，他们所指的是在哲学和逻辑上有许多错误的、业已陷于停顿状态的传统逻辑；他认为，辩证逻辑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不会使形式逻辑的发展成为多余的，相反地，要求进一步发展形式逻辑，运用数理逻辑。这个看法同样获得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好评。

最后，关于克劳斯把数理逻辑的某些重要问题列入普通逻辑教程的贡献，我们想指出以下几点。其一，他认为形式逻辑在其发展的现代阶段上就是数理逻辑。无论这个观点在逻辑学研究领域会引起什么异议，比如说，普通逻辑只有一部分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也只有一部分是普通逻辑，但是，他十分重视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强调数理逻辑对于深

<sup>①</sup> 载《德国哲学杂志》，1961年第8期。

入研究普通逻辑的重要意义，这却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站在它所达到的最新成就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它过去取得的成就，理解它过去遇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克劳斯从事这项工作的方法是完全科学的。其二，克劳斯应用数理逻辑所获得的成果，对一系列重要逻辑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在谈命题逻辑时，他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实质蕴涵的悖论问题，说明这里毫无唯心主义可言。在谈推理学说时，他正确地表明，传统的推理形式只是数理逻辑所考察的推理形式的特殊情况，指出那些不讲命题逻辑和关系逻辑，把谓词逻辑归结为三段论学说的著作，给人一种弄错了时代的印象。他在谈演绎方法与溯原方法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了掌握现代逻辑工具对于研究现代科学的巨大意义。其三，在介绍现代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与基本概念时，克劳斯都用浅显的文字，向哲学工作者说明，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批判什么错误的看法，应该坚持什么正确的看法。虽然克劳斯曾经担心，有的哲学家会指责他有形式主义倾向，有的数学家会批评他没有全面地建成一套演算，但是，他的《形式逻辑导论》写得那么简明扼要却是一个突出的优点，这在对于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哲学问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 四、研究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

在195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普及协会第二届会议上，克劳斯以“电脑与人脑是对立的吗？”为题，作了关于控制论哲学问题的首次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把控制论规

定为研究开放的控制系统的科学，指出了电脑和人脑在逻辑方面的同构关系，说明电脑能够代替人脑的可以程序化的思维活动。针对1956年比利时那慕尔国际控制论会议上出现的那种机械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喧嚣，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某些哲学家否定控制论是一门科学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立场，克劳斯用这门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控制论作为一门普适学科支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特别探讨了控制论的社会意义。在他看来，自动机作为控制论的技术体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势必加剧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造成大量技术异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有助于劳动者从单调的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不断克服技术异化。他的这篇报告构成了他后来研究控制论哲学问题的纲领。

1958年7月，克劳斯在《统一》杂志上发表了他研究控制论哲学问题的另一篇文章，即“控制论的若干问题。脑力劳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程式化和机械化”。他论证了电子计算机不能代替人的创造性脑力劳动，批评了西方国家中流行的那种认为机器能思维、机器将反过来统治人类的错误论断，认为这种论断在当今的情况下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他论证了电子计算机能够代替人的机械性脑力劳动，批评了那种无视或低估控制论引起的划时代技术革命的保守态度。在他看来，要消除技术异化，使人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就必须应用控制论，把各种行业的机械性脑力劳动自动化，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其次是整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预言，新的社会主义时代是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企业完全自动化和太空航行的时代。

1961年出版的《从哲学看控制论》是克劳斯研究控制论哲学问题的代表作。此书以信息反馈为中心概念，结合整个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欧洲哲学史上发生的争论，对迄今仍在加以研究的控制论哲学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答案。

首先，克劳斯把世界划分为受直线式因果联系的支配的不稳定系统和受反馈式因果联系的支配的稳定系统。不稳定系统无法对付来自外部的干扰，以至趋于瓦解。稳定系统则能克服一定类型的外部干扰，维持自己的内部环境。按照物质进化的顺序，稳定系统又可分为简单调节系统、超稳定系统、多稳系统和学习系统。所有这类系统都叫做动态自调系统。在克劳斯看来，控制论就是从信息反馈方面研究这类系统的。所以，他认为“控制论是研究一切可能的动态自调系统的理论”<sup>①</sup>。在整个科学知识体系里，它不以系统的特定物质结构或特定运动形态为对象，而以系统的一般行为方式为对象，因而相对于各门科学来说是普遍的；但它不研究一般的运动，而研究自调系统的运动，因而相对于哲学来说是特殊的。因此，控制论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视野，带有既是哲学又是具体科学的双重面貌。

其次，克劳斯深入地研究了直线式因果联系与反馈式因果联系。前者以拉卜拉斯妖为代表，后者以麦克斯威尔妖为代表。当后一种因果联系中的反作用的量值等于零时，它就变成了前一种因果联系。因此，后者是前者的特例。在克劳斯看来，动态自调系统都是靠负反馈达到稳定其自身的目的，

<sup>①</sup> 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北京1981年第170页。

而这种反馈作用就是康德和黑格尔设想的内在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辩证发展的最终根据提出的相互作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相互作用理论从哲学上克服了欧洲哲学史中的机械论与外在目的论的对立，批判地改造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内在目的论思想，那么，控制论则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作的这些分析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克劳斯认为，我们有理由把控制论称为相互作用的理论；这门在自动化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新兴学科就其本质而言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称控制论为实验辩证法”<sup>①</sup>。

再次，克劳斯在研究反馈过程时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理解信息的问题。大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至今仍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哥·贡泰尔这位联邦德国著名哲学家认为，物质与意识的传统划分太粗糙了，世界上不是只有物质与意识这两个存在领域，而是还有第三个存在领域。维纳曾经说过，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贡泰尔就此作出一个论断，说“信息就是信息，而不是精神或主观东西。这种彼此不可超越的概念的三分法动摇了我们已往的世界观的根本前提”。<sup>②</sup>克劳斯从科学上阐述了信息就是缩小偶然事件出现的不确定性的度量，从哲学上论证了信息是由物理载体与语义构成的统一整体。他批驳了那种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他说，“信息决不是物质与意识之外的第三种独立不依的存在成分，而是一种构成的东西，在这

<sup>①</sup> 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第164页。

<sup>②</sup> 贡泰尔：《机器的意识·控制论的形而上学》，克里非勒德与巴登—巴登1957年第15页。

种东西里物质成分与意识成分以完全特殊的方式融合起来，这种方式使我们有理由说信息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而这种特殊的性质既不是物质的性质，也不是能量的性质”。<sup>①</sup>

再次，克劳斯特别重视黑箱方法的哲学分析，认为这里包含着关于物自体与现象、先验与经验、偶然性与必然性等等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把那类具有某种功能而内部结构不清楚的动态自调系统视为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那么，从外部进入这类系统的输入变化所引起的输出反应则是相应的现象。由于象人脑这样的黑箱是不能打开的特大系统，一俟打开，便失去其功能，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就认为黑箱是一个永远无法认识的物自体。克劳斯批驳了这类观点，指出黑箱决没有什么神奇的特性，而是我们在目前对它的性质尚未掌握足够的信息，但终有一天它会转变为为我之物。我们可以不考虑系统内部的结构，而把它简化为只具有输入与输出的定量关系的系统，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从外部输入的变化所引起的输出反应，推断系统的行为，了解系统的性质。这种方法既是处理直接与件的，因而是经验的，也是以概率论知识为前提的，因而是以一种相对先天的东西为前提的，而决不象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不需要任何理论前提的盲目实践过程。在这里，系统的状态在一定输入的影响下并不是确定地转变为另一状态，而是有时转变为这个状态，有时转变为那个状态，从而显示出系统的行为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矛盾发展的过程。

最后，克劳斯论证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具大意义。

---

① 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第82页。

就社会生产力而言，他认为，资本主义建立时期采用的机器是直线式因果性的机器，在人与这种机器的共生关系中，人虽然不再担任工具机的角色，但必须用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担任调节器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主义建立时期采用的机器则是反馈式因果性的机器，在人与这种机器的共生关系中，人已不再执行调节器的职能，而把它转交给机器，使自己进而成为调节系统的构造者。这时，人把自己的思维规律也外化了，并且控制着自己的这个精神产物，知道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对人来说不再是陌生的了。就社会关系而言，克劳斯认为，不仅信息反馈是革命行动的基础，控制论有助于估计阶级力量对比，而且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关于经济反馈系统的理论。他分析了商品流通、简单资本再生产、资本积累规律、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等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坚信，从控制论的观点重新彻底研究《资本论》，将会得出许多新的、迄今未注意到的看法。这会使我们比过去更有可能将控制论应用于政治经济学”<sup>①</sup>。

克劳斯在他这部著作中对控制论哲学问题所作的这些探讨，引起了国内与国外同行的巨大兴趣，因此，它很快就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了。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很清楚，控制论的诞生是一场可以同哥白尼、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发现相媲美的思想革命，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关于精神活动本身的概念。所以，他又进一步进行了探索，相继发表了《控制论和社会》（柏林1964年）、《控制论和认识论》（柏林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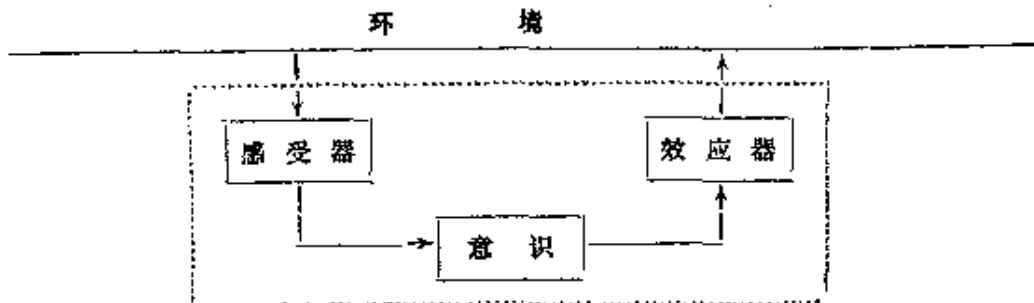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第4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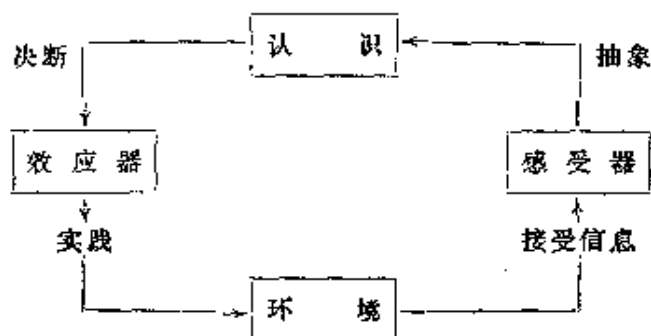
与《合理性·整化·信息》（柏林1974年）三部论著。

《控制论和社会》一书的内容是用控制论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克劳斯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复合的调节系统，他用控制论的概念与原理对这些系统作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它们遵循的控制论规律。其次，他分析了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在他看来，在私有制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断产生干扰、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是正比调节器，虽然国家力图将那种因素的干扰保持到某种界限内，但是，如果干扰很厉害，正比调节器采取的相应措施也很激烈，那就有可能产生许多持续偏离，它们使这类调节器受到损害，并最终失效，结果，业已变得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就转化成了符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稳定状态。

《控制论和认识论》的宗旨是要把古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克劳斯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克服了那种只从环境接受信息、不对环境作出反馈的静观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也克服了那种只用思维改造环境、不从环境接受信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把认识过程视为主体与客体耦合起来的信息反馈过程，因而拥有一种近乎完全的调节线路：



克劳斯认为，这个线路再现了认识过程的重要辩证环节，但它还是简化的，因为它只包含着对环境影响的有意识的反映领域，而不包含受情绪因素影响的思维领域。因此，他依据控制论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调节线路：



他把这个调节线路分为许多部分，具体地研究了其中的重要概念、学习系统和主客关系。概括起来说，他研究了两个方面：第一，关于从所知系统到能知系统的过渡，克劳斯认为，物质世界并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在它与我们的概念之间插入了作为信息载体，从它放送出来的信号；事物的属性在本质与现象的切面上要经过编码，通过渠道传递给能知系统；信号在信息流与能知系统的切面上要经过解码，使所知系统反映到能知系统里；能知系统并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的，而是借助于自己拥有的相对先天的模型，把信息制作为关于事物的概念图象。第二，关于从能知系统到所知系统的过渡，克劳斯认为，能知主体必须拥有一种解码器，以便按照意义把被加工过的信息转变为客观实在的状态，而且只有我们用解码器完成从我们认识的对象到我们制造成的同型对应的对象的转变，我们的编码器的正确活动才得到了验证。在这里，环境表现为达到一定目标的受调区间，能知主体是调

节器，它通过效应器对环境发生的反作用就是实践。

克劳斯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控制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巴甫洛夫的重要认识论发现在阿诺兴的工作中虽然保留下来，但又得到了扬弃和进一步发展一样，古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种用控制论概念充实、丰富和精确阐明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里也是虽然保留下来，但又得到了扬弃和进一步发展”<sup>①</sup>。

《合理性·整化·信息》主要表现了用控制论解释整个唯物辩证法的尝试。这本著作是克劳斯在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的时候写出的，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充分展开。不过，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他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首先，他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用控制论阐述了矛盾规律。他既批驳了那种认为系统无法在外来影响面前保持其稳定性的机械论，也批驳了那种认为超自然力量引起系统发展的目的论，详细阐述了辩证矛盾如何借助反馈机制保持系统的相对稳定，又如何从一种动态平衡演变为另一种动态平衡。其次，他区分了结构矛盾与过程矛盾。前者是一个母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互矛盾的关系，它使这个系统注定要灭亡；后者是一个系统的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对立的关系，它这个系统使经历了各种质量互变的阶段。再次，他还用控制论关于系统与环境的规定的规定，探讨了外部矛盾何如改变和决定内部矛盾发展的方式方法。最后，他还制定了控制论范畴与辩证法范畴的对照表，它尽管失之过简，但对于研究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sup>①</sup> 克劳斯，《控制论和认识论》第4页。

## 五、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

克劳斯在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时，首先考察了它研究的范围。在他看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四种因素，即思维反映的客体、语言符号、思维反映以及创造、使用和理解语言符号的人。如果把这四种因素两两组合为二项式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在组合出来的六种关系及其逆关系中，有三种关系及其逆关系是包含语言符号的，另外三种关系及其逆关系则不包含语言符号。例如，客体与思维反映的关系就不包含语言符号，属于反映论研究的对象。而那三种包含语言符号的关系，即语言符号与反映、语言符号与客体、语言符号与人的关系，都属于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在组合成二项式关系时，还有一个同一种因素的自相联系问题。不过，克劳斯认为，只有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关系是符号学所要考察的，而其余的关系则是其他哲学学科和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建立研究上述四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论纲是克劳斯于1962年在他与威·赛格特（W. Segeth）合写的“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论”一文<sup>①</sup>中首次提出的。他在1963年发表的《符号学和认识论》详细阐明了这篇论文中的观点。随后，他又不断地探讨这个课题，发表了《词的威力》（柏林1964年）、《狭义认识论》（柏林1965年）和《政治语言》（柏林1971年），贯彻了自己的观点。

<sup>①</sup> 载《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10期。

在克劳斯看来,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是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的句法学研究的对象。它撇开了符号与所指、符号与社会的联系,而仅仅考察符号之间的关系。它提出了一些规则,按照这些规则,单纯考虑符号的形式,就可以判定一个符号序列是不是一种语言的表达式。例如,可以按照句法学规则断言, $(\rightarrow p)$ 决不是命题逻辑的表达式,虽然其中出现的符号属于命题逻辑;反之,像 $(p \vee q)$ 、 $(p \rightarrow q)$ 这样的符号序列则是命题逻辑的表达式。克劳斯指出,这种句法学并不研究特定语言的具体句法结构,而是研究一种理想化的语言及其句法。这种逻辑句法与具体语言的句法不相同,因为在自然语言里并不是一切句法规则都是明显地被引用的,它们并不构成统一的、明确的系统,它们的系统应用也不可能保证总会出有意义的表达式。要校正这种情况,就必须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始终把内容的考虑与句法的考虑密切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在抽象逻辑演算中,句法规则却一定是明显地、完整地引用的,并且完全足以把有意义的表达式同无意义的表达式区分开。

克劳斯说明,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的语言符号具有示意功能和指称功能。语言符号表示的意义是思想的东西,是对某个对象的反映,所以,示意功能涉及的是符号与思维反映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指称功能则不同,因为这是要用语词指称对象,用语句指称对象的过程,所以,这里涉及的是符号与客体的关系。

克劳斯把语言符号的示意功能规定为符号学的第二个分支——语义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分支以句法学为前提,撇开符号与客体、符号与人的关系,而研究符号与思维反映的关

系，研究符号表示的意义。思维反映对符号的关系表明思维反映是语言符号的意义，符号对思维反映的关系表明符号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概念是语词或词组的意义，陈述是语句的意义。不过，这种语义学并不研究特定语言的语词、语句等的示意功能，而是研究语言符号与其意义之间的普遍关系。所以，它的重要课题就是给构造理想语言提供条件。虽然不可能把历史地形成的自然语言转变为理想语言，但提出这样一种语言理想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样的构造可以给自觉形成自然语言提出一种规范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形成科学语言、尤其是形式化语言提供精确的规则。例如，其中一个要求是建立这样一种语言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确立了符号与其意义的明确的可逆对应关系，从而排除了一切歧义性。另一个要求是在应用特定符号时保持意义的恒定性。总之，克劳斯认为这种语义学研究定会提供一些规则，说明简单符号在组合为复杂的符号序列时产生的意义。

克劳斯把语言符号的指称功能规定为符号学的第三个分支——信号学研究的对象。符号对客体的关系表明语言符号是作为表示客体的名称使用的。客体对符号的关系表明，在从客体到符号的方向上，指称功能是以思维反映为中介而产生的。所以，信号学研究与语义学研究不可分离。从这方面来看，语义层理论颇能说明问题。这种理论认为，零层语言是那些本身并非符号的事物、关系、过程等等；第一层语言是表示那些事物、关系、过程等等的符号，或者说，是零层语言的符号；第二层语言是第一层语言符号的符号，如此类推。第一层语言与第二层语言的关系是客体语言与元语言的

关系，第二层语言与第三层语言的关系是元语言与元元语言的关系，如此类推。这样就得到了一条重要规则，即一个在语言方面有意义的表达式不能包含两层语言的组成部分。应用这条规则可以排除语义悖论。例如，排除说谎者悖论，因为象“我现在说的是假的”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表达式，既包含客体语言，即“我现在说的”，又包含元语言，即“……是假的”。

克劳斯试图建立的符号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是研究语言符号与人的关系的语用学。语用学既要研究语词、语句对于人的意义和功能，也要研究人对于语词、语句的创造和应用。这种研究包括了对于语言的心理学探讨和社会学探讨。语用学以句法学为前提，因为只有那种在语句方面有意义的语词编排才有社会功能。同时，语用学也以语义学和信号学为前提，因为语词、语句必须意味着某种东西或指称某种东西。克劳斯以自由概念为例，解释了四个分支的关系。句法学研究“某人在不受剥削方面是自由的”，语义学研究这个表达式是否适合于明确表示自由概念，信号学研究现实中的某种关系是否与这个表达式相符合；最后，语用学探讨人用什么方式使用自由概念，它会引起什么情感、行动等等。克劳斯认为，语用学研究具有对人们的交往十分重要的功能，一为表达人的情感的征兆功能，一为用语言引起一定反映的信号功能。在他看来，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语用学，大有发展前途。如何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批判资本主义，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科学课题。如何用准确优美的语言表现社会主义，这又是一个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克劳斯力求把语用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

克劳斯在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时，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在符号学研究中获得的合理成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肯定了符号学奠基人皮耳士的成就，指出“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明确划分虽然起源于在许多方面同实用主义哲学有联系的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之一皮耳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个课题对现代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①</sup>。其次，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对逻辑句法学进行了研究，在哥德尔定理问世以后，对语义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因而在符号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无可争议地具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最后，他评价了以柯日布斯基为代表的普通语义学派，认为其合理内核在于，语词一俟被创造出来，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语词又反过来影响人的思维，从而影响人的行为。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符号学研究的 态度问题上，克劳斯批评了苏联日丹诺夫在1948年发表欧洲哲学史讲话以来流行的教条主义立场。他说，“近十五年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常完全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哲学语义学的：哲学语义学一定是一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大体上说，它应该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逻辑经验主义（一般地说）和哲学语义学（特殊地说）的态度，往往导致三个很严重的错误：第一，错误地评价现代形式逻辑，即数理逻辑；第二，这种错误的态度也常常导致在政治上对上述流派的代表人物作出错

<sup>①</sup> 克劳斯：《狭义认识论》第10页。



误的政治评价；第三，对上述流派持完全否定的批判态度，会忽视了在它那里实际上有许多真正的问题，并提供了一些局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若加以批判地利用，则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会具有重大的意义”<sup>①</sup>。为了更有力地批驳这种教条主义立场，克劳斯专门撰写文章，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符号学分析。他说，“符号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决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极其丰富的概念，自觉地进行过符号学分析。这种事实并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明确地使用现代符号学术语而有丝毫的改变”<sup>②</sup>。他认为，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到列宁最后批判反对派的著作止，都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符号学思想，我们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时，切不可忽视这个传统。

所以，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符号学研究的态度的问题上，克劳斯始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采取批判态度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新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想利用现代符号学的技术工具，来篡改一系列使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感到甚为麻烦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莫里斯的著作中引入大量符号学术语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吸取这些概念的合理的、唯物主义的内核的同时，与这些概念构成划清界限，或对相应的术语另作唯物主义的解释”<sup>③</sup>。他在自己的论著中

<sup>①</sup> 克劳斯：《符号学与认识论》第Ⅶ—Ⅷ页。

<sup>②</sup> 克劳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符号学分析》，载《德国哲学杂志》1963年第10期。

<sup>③</sup> 克劳斯：《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论》，载《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10期。

批判了符号学研究中的种种唯心主义观点。他在研究句法学时，批评了维也纳学派把真理概念归结为可证明性的纯句法概念；他在研究语义学时，批评了这个学派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视为符号与某种感觉复合体之间的关系；他在研究信号学时，批评了唯心主义哲学家否认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中的思维反映；他在研究语用学时，指出普通语义学派歪曲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关系，夸大语词的作用，他们竟然荒谬地认为，只要不使用阶级斗争等词汇，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我们可以说，克劳斯在清除符号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糟粕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最后，克劳斯在应用符号学概念建立学术批评理论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把科学性与无产阶级党性结合起来的范例。在他看来，学术批评与社会批评不同，不是涉及现实状态，而是涉及关于现实状态的理论。学术批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句法学批评，它涉及一种理论的内在结构，判定这种理论是否合乎逻辑。一个是语义学批评，它涉及一种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判定这种理论是否妥帖反映了所要反映的事态。最后一个是语用学批评，它涉及人对一种理论的态度，判定人的阶级属性。克劳斯由此得出结论说，“真理是一个语义学范畴”，“党性是一个语用学范畴”，“这样一来，在真理与党性之间就完全不会发生矛盾了，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矛盾，因为真理范畴与党性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方面”<sup>①</sup>。学术批评的全面性就在于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克服否认语义学批评的主观主义和否认语用学批评的客观主义。

<sup>①</sup> 克劳斯：《哲学和哲学家是必要的吗？》，载《德国哲学杂志》1964年第3期。

## 六、正常的学术批评与反常的政治批判

格奥尔格·克劳斯的哲学创作是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开花结果的。在那个时期,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冲破了斯大林时代设置的教条主义藩篱,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推翻了过时的、错误的哲学公式,在哲学的各个学科里提出和探讨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问题。在那个时期,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走向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在与国外哲学家的接触、交往和争论中,既了解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也逐步提高了自己分析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战斗能力。也正是在那个思想活跃、哲学繁荣的时期,我们评述的这位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进行大胆开拓、既道德高尚又学识渊博、既懂得哲学发展的历史又掌握现代科学的成就的德国哲学家,扬帆而起,驶入波涛汹涌的思想海洋,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研究逻辑学与控制论的哲学问题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做出的成绩,不仅使他受到本国人民、政府和党的重视,获得一枚又一枚勋章,而且也使他引起国际哲学界的注意,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

当然,克劳斯的哲学创作正像任何科学和艺术的创作一样,绝对不是没有瑕疵和无懈可击的。早在他的《耶稣会会士·上帝·物质》问世的时候,就有哲学家批评他说,给意识下本体论的定义,无异于假定一个“意识自身”。关于他对

逻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有的哲学家批评了他把形式逻辑仅仅视为关于外延关系的科学，认为这过于狭窄，因为形式逻辑也研究某些内涵关系；有的哲学家批评了他把模态逻辑的问题归于辩证逻辑范围，认为这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公理化的模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已经成功地把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等概念形式化了。关于他对控制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有的哲学家认为，克劳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相互作用范畴与控制论的反馈概念等同起来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前者比后者的意义要广泛得多；有的哲学家不同意把控制论称为实验辩证法，因为这会把控制论解释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从而导致用控制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局。关于他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尝试，有的哲学家甚至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但是我们看到，克劳斯的哲学创作引起的这些异议完全属于正常的学术批评。他作出了反批评，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批评与反批评，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辨明是非，探索真理。同时，克劳斯也从中吸取了教益。这方面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大幅度修订了他的《形式逻辑导论》，并在此书于后来再版时把书名改为《现代逻辑》（柏林1964年）。当时之所以能有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批评空气，并且克劳斯还能保持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的哲学创作活动得到了以乌布利希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具体地说，得到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库·哈格的支持。

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作活动从来都是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70年代开

始，随着苏联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之趋于缓慢，随着昂纳克之取代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故乡的自我完善过程也逐步受到了阻碍。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这种停滞，必然在思想领域里导致抱残守缺的教条主义的抬头，导致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的被窒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克劳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发起这场批判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支持过他的库·哈格。

1971年10月1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哈格在柏林举行的全国社会科学家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不能允许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们的活动的意义遭到歪曲。如果试图用控制论的系统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其结果就是用实证主义挖空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无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多么重要，我们都理所当然地不能允许用它们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允许用它们代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领导科学，不能允许把它们绝对化。如果非批判地接受具体科学的陈述和概念，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失去其世界观的性质，并在某种程度上非意识形态化，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sup>①</sup>。

在这篇报告的指引和号召下，一些既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正确、又不懂得现代科学成就的哲学家，相继在《统一》杂志和《德国哲学杂志》发表文章，批判克劳斯无原则

<sup>①</sup> 哈格：《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社会科学的任务》，载《统一》杂志1971年第11期。

地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用控制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错误。一些与克劳斯多年合作的同事们,也用比较婉转的方式,批评他在哲学创作中离开了列宁规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值得玩味的是那极少数拥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家。他们曾经认为,以乌布利希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领导人已经蜕变为修正主义者,但在这个场合又感到时来运转了,因而也积极参加了对于克劳斯的批判。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斯托伊克宣称,“克劳斯的整个说法的归宿,从阶级内容来看,就在于同维纳的唯心主义结合起来,与维纳一道,在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基础上致力于修改或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在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哲学家看来,“控制论是新资产阶级手中的领导工具”<sup>①</sup>。看来事物发展的逻辑总是这样的,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性研究被批判

控制论引起的争论，重申了他们的共同观点和基本信念。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援引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的决议，论述了控制论对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大意义，间接批评了那种反对或轻视控制论的错误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再次阐述了控制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指出了这门科学在被应用于其他科学部门时取得的伟大成就，间接批评了那些反对或轻视控制论的人们的愚昧无知。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控制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因而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而那些批评他们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们，不是出于误解，便是出于毫无根据的畏惧。作者最后写道，“由此可见，控制论既不是时髦现象，也不是幻想产物，而是我们的地球上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与精神发展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十分清楚，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立场越坚定，我们在实际应用领域掌握的专业知识越多，我们对控制论的科学内容的理解越深刻，我们便越能更好地推进这些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克劳斯发表了他的《控制论是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哲学吗？》（柏林1973年）这本近著，分析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滥用控制论的概念和方法，反对唯物史观的思潮。接着，又发表了他最后写的《合理性·整化·信息》一书，继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控制论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克劳斯用他这两本近著向读者表明，那种指责他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走向实证主义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对于克劳斯这位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遭受的这场政治批判应该如何加以评价，历史自有公论。当我们评

述这样一位哲学家的生平著述活动时，我们深深地感到，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他不仅需要牢牢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批判资产阶级思潮，也需要认真掌握当代科学成就，妥善克服教条主义障碍。但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会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发展。同时我们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开创性研究领域究竟有哪些成绩，究竟有哪些失误，也只有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加以判定，而决不能通过反常的政治批判，通过简单的推论加以解决。也许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劳斯在他的研究领域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颇有启发价值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如果现在就凭几条有待检验的命题给这些问题的某种答案作出判决，则肯定为时尚早，而难免不犯主观武断的错误。



## 参 考 书 目

1. G. Klaus: Jesuiten—Gott—Materie. Des Jesuitenpaters Wetter Revolte wider Vernunft und Wissenschaft. Berlin 1957.
2. G. Klaus: Einführung in die formale Logik, Berlin 1958.
3. G. Klaus: Ky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 Berlin 1961.
4. G. Klaus: Der logischer Empirisums. In: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von 1917—1945, Berlin 1961, S. 36—51.
5. G. Klaus: Semio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1963.
6. G. Klaus: Kybernetik und Gesellschaft, Berlin 1964.
7. G. Klaus: Die Macht des Wortes. Ein erkenntnistheoretisch-pragmatisches Traktat, Berlin 1964.
8. G. Klaus: 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Theorienbildung, Berlin 1965.
9. G. Klaus: Kyberne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 1966.
10. G. Klaus: Spieltheorie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

---

Berlin 1968.

11. G. Klaus: Sprache der Politik, Berlin 1971.
12. G. Klaus: Rationalität—Integration—Information. Entwicklungsgesetze der Wissenschaft in unserer Zeit, Berlin 1974.
13. G. Klaus; M. Buhr (Hrsg.);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1964.
14. G. Klaus (Hrsg.): Wörterbuch der Kybernetik, Berlin 1967.
15. 克劳斯: 《形式逻辑导论》, 金培文、康宏逵译, 上海1981年。
16. 克劳斯: 《从哲学看控制论》, 梁志学译, 北京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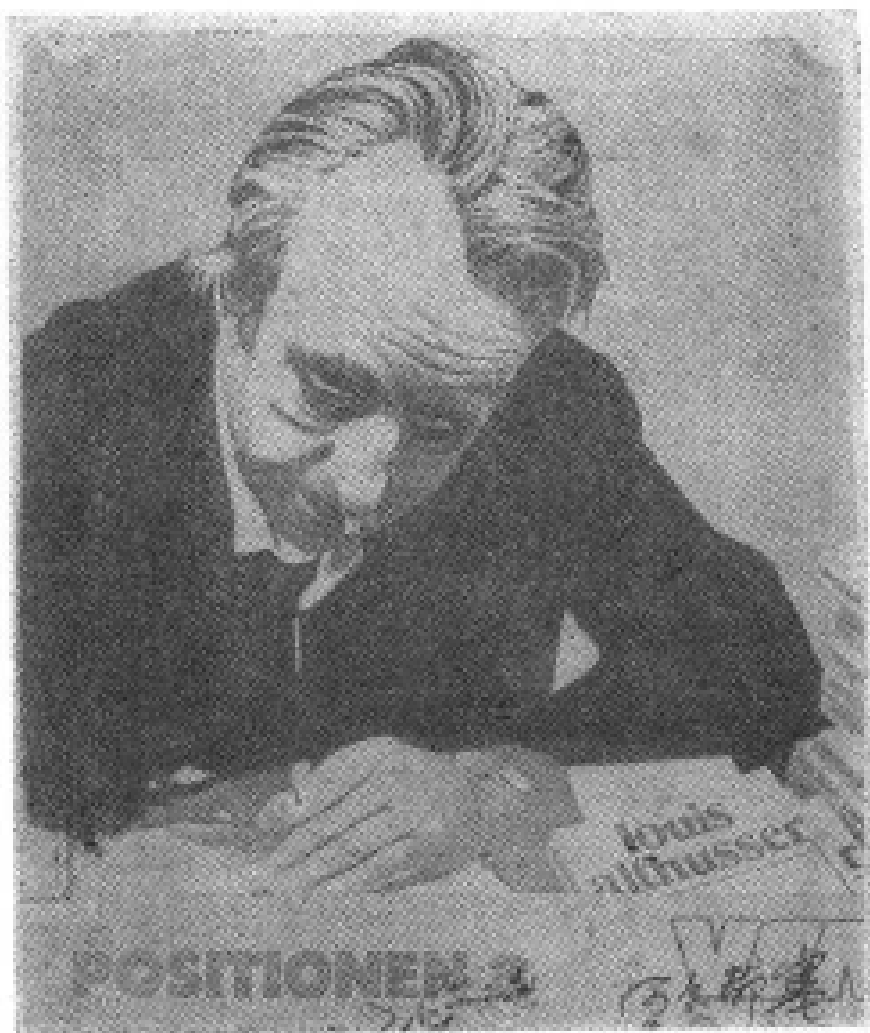


# 阿尔都塞

王荣栓 撰

## 篇 目

一、生平和理论活动.....	679
二、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	684
(一)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685
(二) 成熟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关系.....	688
(三)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	695
(四) 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	702
三、基本评价 .....	706
(一) 理论贡献和思想成就.....	706
(二) 理论上的失误和缺陷.....	710
参考书目.....	711



阿尔都塞 (1918年—1990年)



---

---

# 阿尔都塞

王荣栓

## 一、生平和理论活动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是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尔近郊比曼德雷小镇上，其父是一家银行的经理。1924—1930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塞读中学，1936—1939年在法国中部城市里昂的帕尔卡公立中学，为报考法国最高学府——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其间，他于1937年在该校参加过天主教青年运动和青年学生中的基督教组织。1939年7月通过会考，进入该校文学院。就在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开始入侵法国，阿尔都塞应征入伍，随军驻守布列塔尼半岛。1940年6月，他在瓦纳斯不幸被俘，关在德国集中营内，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才重获自由。长年战俘生活的虐待和折磨，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来他多次出现的精神失常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但战争和战俘生活也同时激发了阿尔都塞的政治热情。正如他本人所说：“战争和多年被囚禁的生活，使我与工人、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



使我结识了不少的共产主义战士”。<sup>①</sup>从此，阿尔都塞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并接触了法国共产党，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战后不久，他于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5年，他返回巴黎重新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投师著名哲学家加斯东·白歇拉的门下学习哲学，完成了题为《黑格尔哲学中内容的观念》的博士论文。同年，他结束学生生活留校任教而成为该校哲学教师。从此，阿尔都塞一直在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任教。先后发表了《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1959年）、《保卫马克思》（1965年）、《阅读〈资本论〉》（1965年）、《列宁与哲学》（1969年）、《答雅恩·莱维》（1973年）、《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立场》（1975年）等论著，从一名普通哲学教师成为很有名望的教授和理论家。

阿尔都塞入党后，最初只是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使他在60年代一举成名。人们把其视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因为60年代初，当阿尔都塞积极活跃在法国思想舞台上的时候，正是战后发生着由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在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形成的。阿尔都塞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对‘个人崇拜’的谴责，它所采取的形式和突然急转弯的状况，不仅在政治领域中，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有深刻的反响。”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使之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思潮的污染；阿尔都塞同人类学

<sup>①</sup>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载《立场》第36页。

家塞巴格、高迪勒等人一起把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提出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认识论上的决裂、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依据症候的阅读等新观点。在1966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把他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介绍给公众之后，他便成了公认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

对于阿尔都塞借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和理论，法国及国际评论界赞扬与批判声纷至沓来，毁誉参半。赞扬者认为阿尔都塞把大家从以往注释者的乏味的重复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闯开了一条新路；批判者则认为阿尔都塞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日益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而阿尔都塞本人从未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

在国际上，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结论曾引起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强烈反响，爆发了他和波兰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研究的著名哲学家沙夫的激烈论战，引起了他们各自国家及国际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与评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针对沙夫的《青年马克思的真面目》一文中的有关论点，阿尔都塞批评沙夫企图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来统一成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认为沙夫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马克思同他的青年时期调合起来，以达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道主义化的目的。阿尔

都塞竭力主张把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一口咬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沙夫则针锋相对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把人作为最可宝贵的财产，就是为推翻压迫人的社会关系而进行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它的最终目的与对象也是人，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保证个人幸福创造最有利条件的纲领，是用人本主义考查历史的结果。对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基本论点，沙夫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驳：

①关于社会主义的口号所依据的前提。沙夫认为，任何人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前提仅仅局限于对客观结构作分析，而把人和意识排除在外，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社会主义向科学性提出的要求不仅涉及基础，而且也涉及到上层建筑，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谁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而阿尔都塞恰恰就是患的这种病。

②关于生产关系的问题。沙夫指出，阿尔都塞把生产关系说成不是人与人之间、而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把人从结构世界排除出去而得出的一种谬论。

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的问题。沙夫认为，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概念宽泛得几乎未加限制，其中也包括否定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的地位：人死了。沙夫列举了马克思主义成熟时期的著作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来证明阿尔都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由此论证马克思成熟期的思想与青年时期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沙夫与阿尔都塞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上的论战

十分激烈，影响颇大，及至后来阿尔都塞的个人悲剧发生后，沙夫仍然愤愤不平；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不仅削弱了人道主义作为道义上的强大力量，要我们面对极权主义的肆虐无动于衷，而且否定我们所面对的极权势力和结构的心态基础和文化根源，否定人争取尊严和自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沙夫甚至感情用事地由此引伸说：“将自己的妻子活活勒死，这就是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面对东西方理论界的激烈批评，阿尔都塞本人也曾修正了自己在以前著作中的一些提法。在他的《自我批评材料》（1974年）中，承认自己把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思辨地对立了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作了理性主义的解释，从而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他也承认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让结构主义这只小狗……趁虚而入。但是他极力辩解，矢口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声称这是一场误会。进入70年代后，阿尔都塞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11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关于“革命后的社会”的国际讨论会上，阿尔都塞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为题作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一反过去“保卫”之常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空白，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某些否定，公开宣告马克思主义不是纯洁的，明确认定列宁关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论述是轻率的，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迫使我们改变我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的某些东西，从而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一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友好的情谊。他每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向毛泽东同志以礼相送。他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的注释中写道：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一文对矛盾问题作了一系列分析；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这部小册子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著作中都是无从找到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文章是根据中国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写出的……在叙事部分，他的概念与具体经验相适应。在抽象部分，这些含义丰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必然蕴涵。他认为《矛盾论》言简意赅，理论深刻，值得研读。在他的著作中，他多次把《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引证。总之，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赞赏溢于言表。粉碎四人帮，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尔后，当中国人民展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于晚间将妻子埃莱娜·阿尔都塞勒死，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1984年出院，1990年11月去世。

## 二、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

使阿尔都塞一举成名的是他借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得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新结论。阿尔都塞所借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是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它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的

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当把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概括为一种结构主义哲学后，它常常试图凌驾于哲学的两条路线之上，以结构整体为基本概念极力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但由于它把结构看成是人的无意识的某种认识能力的产物，是人心的结构化能力的结果，因而又得出先验主义的认识论结论。此外，它强调同时态，反对历时态，强调横断面，反对纵断面，因而在方法论上具有反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性质。它由于强调结构的客观作用，忽视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人溶化在无个性和无意识的结构中，所以它带有明显的反人本主义和反人道主义性质。

阿尔都塞借用某些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对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阿尔都塞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中心议题阿尔都塞研究了①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关系，②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③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

### （一）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阿尔都塞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保卫马克思主义呢？阿尔都塞认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我们共产党人举起反人道主义的旗帜的本意并不是去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标和理想，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染，使马克思主义更富有科学性和战斗性。因为用人道主义概念去证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遭受的挫折和不

率，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既不深刻，又不科学。它使人们用肤浅的说教代替深刻的分析，用对人的谴责取代对一种社会现实的批判，用一时的义愤冒充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造性实践。他以个人崇拜为题对此进行了说明。阿尔都塞的理论纲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从他对这个纲领的大量阐述中可以看出，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反对从“人的本质”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和演绎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来。阿尔都塞认为，这层含义的根据，除开早已论证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对立，认识论上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决裂，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对立，一元决定和多元决定的不相容等等之外，其最主要的支撑点是：马克思在其成熟著作中，不仅抛弃了有关人的哲学的总问题，不仅创立了一套崭新的范畴和概念，而且明确声称：“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sup>①</sup>人不再成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中心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一系列革命理论和策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原则，已从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异化等概念转向社会自身的结构及其功能，转向社会的深层关系。它对社会必然性的认识是依靠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指：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历史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客观发展的自然过程。阿尔都塞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页。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不仅在于它坚决排斥和批判一切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说教，坚决拒绝以个人为中心展开自己的学说和从人的抽象本性中演绎出社会和历史的规律，而且它创立了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社会结构范畴为主干的概念体系，它使用这些科学概念揭去社会生活的种种假象，抛弃实践活动的偶然因素，通过透彻精辟地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不是人，不是人的意愿、需求、观念、意志和思想，而是以物质关系形态出现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活动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决定社会实践的规模和条件。阿尔都塞认为，《资本论》所阐发的唯物史观的要害就在于：它不是告诉我们人怎样去支配“物”，而是物如何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支配人！由此，阿尔都塞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是独立于人的活动和意志而存在的东西；二是个人只不过是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承受者或执行者。因而，历史是无主体的客观发展过程。

阿尔都塞的思想纲领的第三层含义是指社会的变革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按其自身的对社会活动的制约性和决定作用自然发生的功能，而不是单个的人或具体的人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结构的制约，按照人自身的抽象人性而进行的自主活动。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把人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来分析，而且还把人置于资本主义的法律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中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最后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维持下去，也就是



说不能重新产生出其存在条件。所有这些关系都把具体的人当作它们的承受者，他们也象生产关系一样决定着个人的地位，并在个人的身上和生活中打上烙印。这样，社会的变革，不管是经济结构还是政治结构或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管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在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决定和规范下实施的。具体的人和革命的阶级也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演着一个代理人的执行者的角色。阿尔都塞坚定地断言，《资本论》正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就表现在它指出并展示了这些关系是怎样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打上烙印，具体的人怎样在一系列的阶级斗争中被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关系所规定。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之所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出发，去揭示社会的变革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那是因为马克思不仅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而且站在阶级的立场上，通过观察大量的阶级斗争现象，以此向工人阶级揭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加强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总之，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工人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关系和自然规律——结构决定活动，生产关系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去进行革命并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除了阶级斗争以外，没有别的目标。

## (二) 成熟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关系

### (1)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在阐述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关系时，阿尔都塞提

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他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分别属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分属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存在着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认识论上的断裂。从理论框架来看，意识形态和科学有质的区别，从前者发展到后者，要求对前者的基本结构作彻底改变，这就叫认识论上的断裂。阿尔都塞认为，为了正确认识成熟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关系，必须抛弃一些过旧的非科学的旧方法和经验方法，而代之以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为此，他提出了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条方法论原则：①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②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③推动独特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在该思想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在这种思想的此岸，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以及在这一个人发展中根据个人同历史的复杂联系而得到反映的真实历史。根据这三条方法原则，他提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史时，应坚持“三要三不要”。这就是：一是要把马克思的每一个时期的思想和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为此就必须用总问题的概念去思考某个思想整体，并要弄明白联结这个思想整体的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统结构，并进一步发现该思想整体所具有的特定内容，由此去领会该思想各成份的含义，以此揭示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向思想家提出问题的联系；而不要把马克思的著作或思想肢解成各种成份，然后把肢解了的马克思的思想与某些“真理”一一对

应。就是说，要把马克思的某一时期的思想或著作当作一个整体，一个有结构的体系和系统去理解，而不要肢解马克思的思想。要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同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结构的关系来揭示马克思思想的性质，而不是用从某个思想体系内随意抽取的某个标准去揭示这一性质。二是要把马克思的整个学说看作是一个发展前进的变化过程，即把整个马克思的学说史看作是由青年马克思转变为成熟马克思的过程，而不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仅仅看作是一个展开过程或机械地直奔某个目的的预成过程。即是说，不要用青年马克思去统一成年马克思，也不要成年马克思去统一青年马克思。阿尔都塞认为哲学家和思想家首先是他那个环境的产儿，然后才是那个环境的叛逆者和批判者。马克思不是超人和神，他也存在一个他与环境的交流和辩论，存在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解放过程。三是要把马克思的整个学说看作是有质变、有飞跃、有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不要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看作是一个平稳的演进过程和逐步的量的增益。在这里，他提出了总问题的转移，认识论的决裂和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等概念。

根据以上的三个原则和“三要三不要”的见解，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1845年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后，是科学阶段。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而这个断裂又是逐步展开的，所以他又把马克思的著作细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1840—1844年的著作是青年时期的著作；1845年是“决裂”时期的著作；1845—1857年是成长时期的著作；1857—1883年是成熟时期的著作。

## (2) 认识论的断裂

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认识论断裂的根据就在于：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念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中谈到人、经济、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使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阿尔都塞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其次，认识论断裂的根据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新认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的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是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的体系而出现。再次，马克思主义发生的认识论断裂和决裂，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阿尔都塞认为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只有这门科学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

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②在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有“三个来源”的理论，这个经典性理论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份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飞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③阿尔都塞通过简略地回顾马克思思想的演变来证明这一断裂的真实性：青年马克思提出并实行了革命决裂的著名口号：“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宣告新哲学从此不仅仅解释世界，而要改变世界。这些都可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得到经验的验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找到这场危机的结局及其对这个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由此阿尔都塞得出结论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青年马克思虽然经常谈到政治，谈到异化的人的具体生活，但青年马克思只是一个用伦理总问题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先进分子，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是意识形态。因为确定思想的本质特征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他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及其作为这一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这样，阿尔都塞通过证明和分析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就把前期确定为意识形态，把决裂或断裂后的思想确定为科学。

### (3) 《手稿》的地位

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后期的思想统一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上，他主张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一个整体，从《手稿》的整体结构出发，通过揭示它的总问题和理论框架去理解《手稿》，认识《手稿》。他认为必须把《手稿》当作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看待，它同思想发展的其他阶段一样，虽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但也确定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独特的现在。

首先，阿尔都塞认为，与马克思早先的著作相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大特点和新东西是：《手稿》是马克思接触了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时间（1844年2月至5月）是个关键，他那时着重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家并作了大量笔记，这在《手稿》里可以找到痕迹。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接触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据。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接触，首先是他的政治立场和经验与经济矛盾和冲突的第一次接触。马克思研究了为政治经济学所承认、记录、接受、甚至加以美化的矛盾，特别是研究了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与现代世界中出现少数人暴富（政治经济学对此表示祝贺）相对立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恰好打中了这门论据贫乏但又一味乐观的科学的要害和弱点。马克思正是要通过给政治经济学提供它所缺乏的本原来洗掉这个耻辱的。

其次，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阿尔都塞认为，这个哲学开始是唯心主义。正是这一哲学从一个关键的概念出发，即从“异化劳动”

的概念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个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及其全部范畴，尔后才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考察“异化劳动”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论地位和理论作用，承认这一概念确实起到了马克思当时赋予它的原始基础作用，由此也就必须承认，这一关键概念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这就说明，《手稿》的逻辑和推理本身的意义依然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关于人的哲学的哲学含义，而不是依照从经济学的细胞出发的那种科学意义上的经济科学。

阿尔都塞通过上述的分析后提出一条补充意见：对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和理论角度去阅读，不能把马克思形成时期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搞混了。当青年马克思拥护无产阶级的事业和共产主义时，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业已制定，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先有革命的行动和实践，尔后才产生和制定了革命的科学理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阿尔都塞得出结论：《手稿》在政治上虽然已明确地表现出马克思已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在哲学上仍然属于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属于意识状态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段奇异插曲，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马克思最后转变为马克思的时候，在他实行既是最后一个又是第一个彻底转变的时候，他的既是胜利的又是失败的思想。

这样，阿尔都塞通过分析《手稿》的地位，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全面论证了他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关系的观点：既不能用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去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用成熟马克思解释青年马克思，而应该如实地把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一个有飞跃、有质变、有发展的历史过程。

### （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

阿尔都塞为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以人的本质为历史主体的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提出了结构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并以此详细考察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区别和对立，从而论证了不仅人道主义并非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经济还原主义，也只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遗迹。

#### （1）不同结构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和对立，首先表现为他们的辩证法有不同的结构和总体性。黑格尔的总体性暗含着理念的一种简单、原始的统一。与黑格尔的这种关于一个原始本质的简单统一性的还原主义不同，复杂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组织概念的中心，依照这个原则，构成组织的各种结构都是不可还原的各不相同的。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总体性和黑格尔的总体性的这种不同，归结为因果性的不同：马克思的总体性属于结构因果性，而黑格尔的因果性则属于表现因果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理论革命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概念，而主要在于它分析了作为有结构的整体的各种社会及其社会结构，发现并论述了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方面的科学规律。为了论证马克思的这种结构因果性，阿尔都塞甚至绕弯绕到斯宾诺莎那里，用斯宾诺莎的名言“事物本身是它自身的原因”来论证这



种结构因果性。

阿尔都塞在论述“结构因果性”时，同时批判了“线状因果性”与“表现因果性”。线状因果观是一物作用于它物的因果观，是物与物之间的单向度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理论。这种因果观根源于笛卡尔，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因果观。而表现因果观在考察整体对于它的各个局部的影响时，预先假定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而整体的各个局部则无非是它的现象上的表现。这种因果观不能把整体看成是一个结构，而且必须预先假定整体具有某种性质，并且恰好是一个精神整体的本质，在这个整体中，每个要素都无非是莱布尼茨单子论的整个总体的表现罢了。这种因果观由莱布尼茨所首先表述，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实际上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因果观，这就是结构因果观。这种结构因果观与上面两种因果观的主要区别在于：结构是一个出现在或内在于它的要素/效果之中的原因，而不是外在于它们的；结构只存在于这些要素/效果和它们的关系总体中；结构并不完全地出现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之中，而只是作为一个结果，以其决定性地不再出现在那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描写为既出现在又不出现在它的效果之中。阿尔都塞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再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机械实证主义，或解释成一种倒过来的黑格尔主义呢？阿尔都塞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因果观只是以实际状态存在的因果观，虽然马克思为建立和发展一种完全新型的因果观经历了思想上的斗争和曲折，但他本人从来不曾概念上系统地表述过它。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易从

马克思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出这个作为方法基础和思想基础的结构因果观。而正是这个科学的因果观，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使得他们具有不同的矛盾观。

## (2) 完全不同的矛盾观

阿尔都塞认为，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具有不同的因果观，因而马克思的矛盾观与黑格尔的矛盾观也完全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矛盾是复杂的，一切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的“多元决定”，而黑格尔的辩证法，矛盾是单纯的，事物的发展是由一个矛盾（一元的）自始至终地决定的。阿尔都塞指出：一元决定的实质就在于，在事物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中，只包含一个单一的矛盾，所有的现象只是这个单一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只有“一条路径”可走（正象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渐进发展的目的论的阐述一样）。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矛盾之所以能够是简单的，只是因为构成任何历史时期本质的内在本原是简单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才充斥着千篇一律的“辩证”变化。阿尔都塞由此断言：实际上，黑格尔所认为的历史运动，在本质上是非辩证的，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是单一的，是由绝对精神一元决定的。

而马克思的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其矛盾是复杂的，构成事物总体的一切因素都是各不相同和相对自主的，因此马克思不是把历史看作一种精神本质的表现，而是看作构成它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过程。除经济以外，它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等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会总体的性质由经济因素决定，然而这种决定作用只是归根

结底的决定作用，即由它决定由何种因素起主导作用。例如，在封建制度下，虽然经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然而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这种矛盾观称之为多元决定。阿尔都塞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这种矛盾的多元决定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经验证明，一般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到议事日程”时的形势，而一系列“环境”和“潮流”的积聚，最终“汇合”成为促使革命爆发的一个统一体。而在各有关领域活动的“不同矛盾”虽然“汇合”成为一个真实的统一体，但并不作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中的简单现象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所以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对此，阿尔都塞强调指出，社会的革命时期，矛盾的多元决定是一个事实，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所以发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就是因为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各国的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中发生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决定的作用。历史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也是经济条件以外的原因，这就是矛盾多元决定的明证。接着，阿尔都塞又以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为例来说明他的上述观点。阿尔都塞还引用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定义和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多元决定性原理。阿尔都塞写道：列宁是对辩证法这样下定义的，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自身中的矛盾，或者说，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毛泽东引证了这些论述，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并研究了这一核心的内容。在毛泽东为矛盾的特殊性所下的定义里，有三个十分值得注目的新概念：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矛盾的不平衡发展。阿尔都塞认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概念直接意味着在同一过程中存在着几个矛盾，这就等于说存在的是一个复杂过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则恰恰反映了在每个矛盾内部的复杂性。而矛盾的不平衡发展则指明矛盾作为既与的复杂过程又作为原始过程产生出一个具有许多不平衡的矛盾的结构。

总之，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对经典作家的大量引证，阿尔都塞证明了以下结论：没有由单一矛盾构成的简单事物；没有单纯的直接对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起作用的抽象矛盾；事物的矛盾结构是复杂的，多元的，并且是不可还原的；矛盾和环境相关联；其发展和性质是多元决定的。这样，阿尔都塞通过阐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矛盾观上的对立从而证明：从抽象的人的本质演绎出社会的性质、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活动的种种规律是不科学的，而把整个社会的发展还原为最后单一的经济因素，也是一种经济主义、技术主义和教条主义。

### (3) 历史观上的对立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观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既没有颠倒又没有保留黑格尔关于社会模式的术语，他甚至打乱了这些术语原有的关系，使术语或术语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和含义上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术语已不是原来的术语。阿尔都塞以市民社会一语为例指出：对马克思说来，重要的是对现实世界的“解剖”，以及这一“解剖”演变的辩证法。所以“市民社会”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消失了。因而，抽象的现实本身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是一种更加具体和更加深刻的现实的结果。生产

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关系的状况，从此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虽然“市民社会”向马克思指明了新概念的所在，但应该承认，市民社会并没有向马克思提供制造新概念的原料。

其次，字面相同的概念，在成熟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其内容是根本不同的。阿尔都塞以“国家”一词为例进行说明。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不仅不再是“观念的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国家当作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服务的镇压工具而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再次，不单术语变了，甚至术语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对此，阿尔都塞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论证。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而市民社会则依靠理性诡诈的作用只是在国家中实现的自身现象。而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不言而喻的等同消失了，而代之以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合体的各决定性领域形成相互关系的新观点。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链条的两端”：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由此可见，马克思明显地与用自我意识（观念）作解释的黑格尔原则决裂了，而且也与关于现象、本质和真理相等同的黑格尔论题决裂了……我们这里接触到的，确确实实是新术语之间的一种新关系。

最后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如下名言是马克思的多元决定历史观的明证：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仅此而已。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

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阿尔都塞认为，承认多元决定历史观与一元决定历史观的对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概括起来有：①整体的每一个相对自主的平面，都有其相对自主的历史，都有它自己的发展韵律和连续性。这样，就不仅有经济结构的历史，而且还有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等，在他们相互之间是不可还原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能被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唯一的线状时间的连续性，意味着一个历史过程的横断面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无所不在的本质，而是那个复杂结构的特殊的多元决定局面。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全部政治实践虽然是“具体经验程式”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但还必须承认，关于上层建筑和其他环境的特殊效能的理论大部分有待我们去制定（因为只有承认它们的效能，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为此，必须制定出关于上层建筑特殊因素的特有本质的理论。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有谁真正从事或继续进行了这一探索呢？阿尔都塞回答道：据我所知，只有葛兰西。③由多元决定可以引伸出崭新的革命观。根据这个观点：A，社会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子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假如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革命就会引起这样的改变），因为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因而能够在其直接生存的环境之外保持自己的生存，甚至重新创造出或暂时“分泌”出替代的生存条件；B，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

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 (四) 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

阿尔都塞认为,经验主义是意识形态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验主义。所以,从经验主义下面解放出来,是把成熟马克思同青年马克思区别开来的认识论决裂的标志之一。阿尔都塞指出,经验主义认识论是由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体等中心概念来规定的,它认为认识过程的出发点是“一个纯个体的所与”。这种把认识看作是见识而不是生产的经验主义认识观,一是把理论实践的对象或原料当成了实践本身,从而把主体所作的抽象作用误解为从实在中解放出或抽象出它的本质来;二是由于它把关于实在的思想还原为实在本身,以致于它既把思想同实在混淆了起来,又把实在的东西说成比企图理解实在的理论来得更加丰富和更有生命力;三是由于认为抽象的理论至多只是对具体实在的一个接近,这就使认识不能充分适合于它是其认识的实在。阿尔都塞认为,经验主义认识观的这些缺陷,既是恩格斯的哲学努力的标志,又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著作的标志。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任何科学认识的过程,都始于抽象,始于一般性,而不是始于实在的具体时,他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自觉抛弃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真的同意识形态决裂了,真的同它的前提决裂了。

针对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阿尔都塞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显著特征是把认识看作是“生产”。他说:和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科学从来

就不是一种从以纯直接性和独特性为其本质的存在（“感觉”或“个体”）上面工作的，它总是在某种“一般的”东西上面工作，即使这具有事实的形式。依据这种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阿尔都塞把一切将所与的一定的原料改造成一定的产物的过程，一种由一定的人类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手段所实现的改造叫做实践。由此，阿尔都塞提出理论实践的概念。阿尔都塞分析了理论实践的全过程：理论实践原料G I是概念和抽象。这种要加以改造的原料不是现成的所与、具体的实在，而是一种已经作成的原料，它是由先前的实践产物的抽象概念所组成。对G I进行改造的是理论生产的手段G II，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门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实践的产品G III，则是具体表现认识的科学概念。阿尔都塞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说法，把他的理论实践过程解释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样，理论就同经济实践、政治实践一样，也成了一种实践。显然，在阿尔都塞看来，认识的对象（客体）并不是实在的客体，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但认识的过程经过这种认识的对象（客体），最终所认识的对象，又还是实在的客体，实在的客体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是认识的对象。阿尔都塞宣称，他的这种“两客体”论是如下一段名言中的应有之义：“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



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sup>①</sup>

阿尔都塞还以他所阐述的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观，论证了关于检验理论的标准看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阿尔都塞认为，所谓保证认识的真实性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而不是一个真问题。他断言：任何认为认识本身是一个问题的认识论，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必须加以摒弃。阿尔都塞认为，之所以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这整个问题是一个非问题，是因为“理论实践”是它自己的标准，在它本身中间包含有把其产品弄确实的一定“议定书”，理论实践所建立的科学本身就提供了它们在认识上的确实性的标准。这些内在于一门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确实性的标准，是它的证明的形式，而生产出这种（证明的）效力的机械装置，则是科学的全部概念体系，它不仅决定概念的意义，而且也决定它们在关于证据的谈话中出现的次序。

阿尔都塞曾从他的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观出发，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定义为：在理论上表述实践一般的本质的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后来，在他的哲学定义受到许多批评之后，通过认真思考自己哲学立场中的矛盾，在1967年为《保卫马克思》英译本写的序言《致我的英语读者》中，他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认为，由于他没有探讨在政治实践内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问题，因而产生了理论主义倾向。他说，如果说我的确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并因而谴责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1页。

所有形式的经验主义，那么，我确实没有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同样，如果说我着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在理解上的革命的特征，并指出马克思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和一门崭新的哲学，那么我对于至关重要的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点确实是阐明得不够的。这就势必产生实证主义倾向。1968年，阿尔都塞用《列宁和哲学》这部著作来详细阐明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关于哲学的新见解。

1968年，阿尔都塞在《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一文中，更加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为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都塞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认为，阶级斗争中对立的阶级立场，在各种实际意识形态的领域中表现为对抗倾向的世界观；最终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世界观则在理论的领域中表现为哲学，哲学代表理论中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已经改变了理论领域的全部形式。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历史科学。后来，阿尔都塞又再三强调了他对哲学的新定义：哲学归根结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他解释说：归根结底一词意味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简单地说哲学是阶级斗争，会导致对哲学的过于庸俗的解释。

总之，阿尔都塞认为，经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经验主义把认识看作是以直观反映为特征的见识，而马克思主义则把认识看作是以积极改造为特征的生产。②经验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纯客观的所与，而马克思主义的反经验主义则把认识的起点放在由先前实践产

生的抽象概念上。③经验主义认识论主张认识的结果是对客体的接近，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认识的结果是思想上对具体的再现。④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公式是由纯客体的物——→见识（对物的见识和接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是由抽象——→具体。⑤经验主义把哲学看作是意识形态和见识，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哲学看作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样阿尔都塞为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猛烈地批判了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惯常于直观看问题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为他直接论证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对立提供了又一个理论根据。

### 三、基本评价

#### （一）理论贡献和思想成就

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理论纲领，其目的是回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就这个出发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阿尔都塞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活动中，他力求从整体上把握整个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勇敢地认定马克思是通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后才创建了科学的世界观的。这种从整体上、从阶级立场和哲学纲领（又称总问题）上去阐述马克思的转变，回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进攻的理论气度和势如破竹的战斗风格，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得出了一些不同凡响和出人预料的结论，阐发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为正确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为继承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首先，阿尔都塞针对人道主义一味大谈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说教，提出了历史观上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性原理，为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示。阿尔都塞所反对的只是对“真正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功能的夸大。他认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异常紧迫而又严重的，不能把这些严重的上层建筑的结构问题拖到道德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去认识、去解决，那将是徒劳无益的。为了真正地提出和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应该直言不讳地使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法、法制、社会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科学概念，而不应使用人性、人道、尊严、作风、心理状态等意识形态和非科学的概念。从这一观点和理论出发，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误和社会主义所发生的非人道、非理性现象，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不应该到社会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方面去找，更不应该将其归结为某个领导人的性格和品质，而应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中去寻找。这既提供了一条考察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又鸣响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最早先声。

其次，由历史结构的多元决定引伸出了新的革命观，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成功后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个革命观由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所构成：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子就能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

和意识形态；二是由革命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针对残余一说，阿尔都塞提出新的革命观，这就是，所谓残余，实际是一些未被革命所闪电般地改变的上层建筑，是以稳固的状态在其直接生存环境之外而生存下来的旧社会的结构。旧因素并不会在新的环境下自动灭亡。因而旧因素的保持和早已灭亡了的旧因素的死而复生，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条件下是会发生的。而旧社会的早已埋葬了的旧因素、旧结构甚或灭亡了的集团或阶级，会以新的装扮重新登上革命胜利后的社会舞台。这说明一切社会结构的产生和形成，只有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能说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借口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否定上层建筑旧因素旧结构的存在，是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这在阿尔都塞看来，唯生产力论、唯经济因素论、唯经济基础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历史观及其由此制定的革命观才为人们提供了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由阿尔都塞的这个革命观必然引发出如下结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不断探索和改革，以寻求最佳的社会结构形式，不断铲除旧因素存在和死而复生的条件。在这方面，第一个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并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行探索的当首推阿尔都塞。这在基础理论上是一个重大贡献。

再次，为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阿尔都塞通过论证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立，揭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共同特征：一元矛盾观。在论证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立时，阿尔都塞对三种因果观——

结构因果观、表现因果观、线状因果观的阐述，虽然带有深刻的科学主义的烙印，但极具创造性和启发性。阿尔都塞对三种因果观的概括，揭示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从而也再现了因果观的历史发展进程。阿尔都塞把唯物史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概括为结构因果观，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述的构建规律是相一致的。而关于一元决定矛盾观与多元决定矛盾观的区别和对立的分析，这与毛泽东有关特殊性的理论相一致；又与斯大林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相暗合。还与列宁对辩证法的阐述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经典论述相吻合；多元决定和一元决定是阿尔都塞论证马克思与黑格尔互相对立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在某种意义上说，阿尔都塞的论证确有打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黑格尔主义的颠倒这一神话的足够力度。它揭示了两种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之点，黑格尔辩证法是矛盾的还原论、展现论，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体现了上升论、发展论。可以说，在这里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倾向性最明显，而他的论据也最充分、最有说服力。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历史观，只不过是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多元决定历史观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系统分析的历史观，它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革命理论是基本一致的，只是阿尔都塞使用了某些结构主义的术语和方法，在理论和方法上过于理论化了。

最后，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立的分析，在认识论上划清了经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尤其是阿尔都塞把经验主义的认识特征归结为一种见识，这在理论上是很有见地的。阿尔都塞揭示了经验主

义的认识本质和方法论的根本缺陷，提出认识就是生产的命题和其根本对立，表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洞察力，提供了反经验主义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 (二) 理论上的失误和缺陷

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倾向解释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出了不少给人以有益启发的新观点，但也必然会有某些失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实际上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包含着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但又不能把其归结为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而阿尔借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术语和方法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来必然既是深刻的，又是片面的。

阿尔都塞理论观点上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三点：夸大了社会的多元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一元决定论；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学说，又否定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其在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作用；从“左”的方面进行两个介入，对斯大林错误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误解。

## 参 考 书 目

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1973年版。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李清宜：《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伦敦英文版1971年版。
5.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英文版1977年版。



## 参 考 书 目

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1973年版。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李清宜：《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伦敦英文版1971年版。
5.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英文版1977年版。

## 参 考 书 目

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1973年版。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李清宜：《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伦敦英文版1971年版。
5.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英文版1977年版。

## 参 考 书 目

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法国马斯贝罗出版社1973年版。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李清宜：《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伦敦英文版1971年版。
5. 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英文版1977年版。